

河海大学社会学系

# 河海社会学 (学生版)

*Journal of Hohai Sociology*

2022 年秋季号

总第 35 期

---

# 河海社会学（学生版）

---

*Journal of Hohai Sociology*

**主 办：**河海大学社会学系

《河海社会学（学生版）》编辑部

**指导老师：**薛芳璿

**主 编：**张志华

**副 主 编：**薛雨珍 潘恩慧

**编 辑：**陈奕含 柯佳丽 刘纪矜 李懿 潘思羽

邱亚珊 孙诗琳 魏楠楠 肖典 印薇 杨梓聪

**投稿 E-mail：**sociology\_hhu@163.com

**刊 号：**校 028



欢迎扫描二维码添加关注  
《河海社会学（学生版）》微信公众账号

## 目 录

### 暑期调查

走近争议的校外培训：机构经营的模式差异与变迁路径

——以 N 市 Y 机构、A 机构的发展历程为例 ..... 王世文 (05)

秽物的生死之辨——物质性视角下的 Q 市 H 村农厕改造思考 ..... 徐 强 (25)

残障的再生产：身体区隔与自闭症家庭污名信息管理 ..... 潘恩慧 (38)

企业型单位社区居民认同变化研究——以安徽省宿州市 Z 社区为例 ..... 高 雅 (50)

### 本科生专栏

妈妈工人：服装加工厂的非正规就业 ..... 罗楚怡 (64)

缝纫机间的交往：A 镇制衣间的生产模式与往来 ..... 杨子萱 (74)

守龙世家的观念基础：一个巡护员的家族使命 ..... 玉可可 (84)

大梦先觉，浮世清欢——读庄子思想有感 ..... 张陈晓 (94)

### 教育与家庭

脱嵌与重塑：乡村学校课后服务实践困境及优化路径

——基于皖北 S 镇初级中学的个案研究 ..... 何经纬、严登才 (102)

城市新老人的群体特征与代际责任研究 ..... 徐依婷、沈 毅 (113)

## 环境与移民

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与乡村振兴产业有效衔接

——以新疆易地搬迁社区 W 县 P 村为例 ..... 閻小操、陈绍军 (123)

环境协同治理势能何以转化为治理效能

——基于兴国县水土流失治理的观察 ..... 赖慧苏、曹海林 (134)

## 社工专栏

近 20 年国内外独生子女研究

——基于 CiteSpace 和 HistCite 的可视化分析..... 昌昊甜、元 迪 (149)

社工赋能，新心相印——新业态新就业女性社工公益服务项目..... 王 悦 等 (169)

## 硕士毕业论文信息

2022 届社会专业硕士论文信息统计表 ..... (187)

## 新闻快讯

2022 年社会学学科喜获两项国家社科基金项目 ..... (24)

我校举办第二届全国社会学院院长论坛 ..... (37)

我院在中国社会工作教育协会 2022 年年会暨第四届研究生论坛优秀论文评选中取得佳绩

..... (122)

我系 2 位教师喜获江苏省第十七届哲学社会科学优秀成果奖..... (133)

我校江苏高校哲学社会科学重点建设基地通过考核验收取得优秀等级 ..... (148)

《环境社会学》获评优秀新创集刊 ..... (168)



# 研究生 暑期调查

暑期调查实践为社会学专业学生提供了接触社会、扎根田野、方法提升和视野拓展的宝贵机会。在 2022 年的暑期调查实践中，社会学专业 2021 级硕士研究生带着一定的问题意识进入田野，对热点、经典问题进行调研，获得了丰富的一手资料，并撰写了暑期调查报告。在综合社会学系老师建议的基础上，编辑部进行了再次遴选，本期推选出 4 篇研究生优秀调研报告，研究主题包括校外培训、农厕改革、企业型单位社区的居民认同、残障再生产，希望与读者进行交流。

## 走近争议的校外培训：机构经营的模式差异与变迁路径

——以 N 市 Y 机构、A 机构的发展历程为例

王世文

**摘要：**校外课业培训机构作为市场化进程中兴起的教育型社会组织，以其对考试制度较强的针对性和应对能力，成为了广大中国家长迫切关注且高度依赖的对象，并呈现井喷式发展。而在培训机构内部，围绕规模、结构以及教学特征等方面，又存在彼此之间的差异，进而产生不同的经营模式。近年来，缘于自由竞争和社会阶层差异的存在，培训机构产生了超出教育功能之外的诸多社会问题，引来政策的变化。在外在环境的压力下，大部分培训机构的经营从明到暗，走上了求取生存的变迁之路。但在集体转入地下的背后，不同机构从组织结构、招生方式到教学特征与家校沟通等方面都走出了独特的路径与模式。

**关键词：**教学型 功利型 “快餐式”培训 情感共同体

### 一、问题的提出

#### （一）校外培训机构的概念

从组织或场所角度出发，校外培训机构指的是在学校生活之外，针对学生开展不同类型的教育活动的组织，具体类型包括综合性的校外培训机构和专业性的校外培训机构<sup>[1]</sup>，后者更贴近与我们日常所熟知的围绕考试和文化课培训展开工作的“辅导班”，也是笔者在此所要讨论的针对中小学生的校外课业培训机构。现阶段我国的校外课业培训机构主要是以民办为主、以市场为导向，具有独立教学场

所、管理模式和师资队伍。

关于校外课业培训，在国外的研究中曾用“影子教育”来描述这一现象，该概念最早由 Stevenson 和 Becker 在对日本高中生研究中提出，指的是发生在主流学校教育之外的课外补习活动，目的是提高学生的学习成绩进而让他们顺利进入理想的大学<sup>[2]</sup>。

## （二）争议的校外培训

作为校外培训的承担角色，校外教培机构是基于对学校课程与考试内容的研究，为教育再生产过程中有所期待与需求的不同层次学生经营和服务的。之所以在履行其教育功能的同时凸显功利性和竞争性，是因为第一，它们不同于公立学校，需要在盈利的基础上维持运营和教学的成本；第二，不论是公立学校还是校外培训机构，他们目标的共性体现在都服务于教育过程对学生的筛选与流动。因考试所带来的竞争性以及优质教育平台如重点高中和重点大学的稀缺性，培训机构所服务的目的本身也是功利的，并且难以在充斥竞争性和功利性的选拔机制中去苛求过程维持绝对公平或保持绝对纯洁的教育本色。但在教育领域竞争日趋过度的当下，对这一不良局面的讨论逐渐涉及校外培训及机构。而“双减政策”的出台、实施则将校外培训机构彻底推向争议的漩涡。

在现有的部分研究中，宁本涛通过访谈 10 所培训机构指出“双减”后培训机构乱收费、超前教育以及大量占用学生时间现象得到初步整治<sup>[3]</sup>。周洪宇认为双减带来了培训机构由“地上”转到“地下”经营，小型而隐蔽，治理难度加大<sup>[4]</sup>。陈园园则认为此类“封堵式”治理一定程度上忽视了影子教育中的公平性，培训机构的存在并不完全是优势阶层的狂欢，中下阶层在辅导中也有大的收获<sup>[5]</sup>。面对争议，笔者认为，首先，培训机构在双减前后确实发生了经营模式的巨大转变，但这一转变是否只是单纯受到政策的影响，其变迁路径与原有的经营特点是否有关联，培训机构之间是否存在差异。其次，多数研究站在政策的立场看待机构治理的困境，但政策本身是否给未规范化的机构留下了生存空间。最后，从“地上”到“地下”的转变得以成功是否只是培训机构的一厢情愿。在现有问题的基础上，有时需要适时切换调查立场，站在培训机构的生存角度，探讨影响机构经营与变迁路径的内外因素。

## 二、“教学型”与“功利型”的两种模式

### （一）机构分类

校外培训机构作为私人运营、自负盈亏并且以课业辅导为主要功能的组织，其在运营过程中始终面对着处理好教学质量和商业盈利之间的关系。影响机构教学质量的种种因素往往也成为了关乎机构利益的重要变量。根据在机构运行过程中对影响教学和盈利的诸多因素层面的不同态度和措施，可以将校外培训机构简单区分为教学型机构和功利型机构。从总体上看，机构生存与发展的基本逻辑是依靠自身的能力不断吸引生源。维持机构的生源稳定一方面要不断开创新的生源，另一方面则是巩固旧有生源。在实现生源稳定的逻辑方法上，首先存在以高品质教学质量的打造为核心以赢得长远名声和利益、不计眼前得失的机构，此类机构可称之为“教学型”机构。另外，存在依赖某些非教学性手段强化招生和沟通能力以弥补教学缺陷的机构，此类机构时刻以成本与收益的核算为第一顺位甚至以损耗部分教学投入为代价，相比之下因其具有更加强烈的功利性气息可被称为“功利型”机构。二者在

组织结构和教学特征中的差异，使得当外在教育环境发生变化之后，它们走向了不同甚至截然相反的变迁路径。

在教育环境发生转变之前，即校外培训机构处在“明处”的自由竞争时期，结合案例，通过对两所培训机构——教学型“Y 机构”与功利型“A 机构”概况的梳理，笔者旨在探寻不同类型的校外课业培训机构得以生存的先天条件、教学特征及其差异，从而明晰机构在应对政策环境变化时其经营逻辑与变迁路径之间的内在关联。

## （二）机构概况

Y 机构成立于 2020 年 6 月 21 日，是一家致力于提供高品质学科辅导和特色课程教学的教育实体。机构创办者是来自当地最好的初级中学的一名物理教师，具有三十余年的从教经历，具有丰富的学科教学和学校管理经验。Y 机构秉承“日升月恒，只争朝夕”的理念，提出“教师悉心，孩子舒心，家长放心，社会倾心，政府称心”的工作目标。A 机构成立于 2020 年 3 月，创办者兼顾幼教、兴趣类培训和义务教育阶段课外培训，机构品牌属于连锁品牌。创办者没有相关教育经历，通过机构的统一培训加入该行业的经营。

### 1、组织规模

表 1：Y 机构、A 机构组织规模

	Y 机构（教学型）	A 机构（功利型）
员工规模	50 人	12 人
招生人数（人次）	1000 人左右（2500 人次左右）	300 人左右（700 人次左右）
师资规模	35 人	9 人
场地面积	3200 平方米	600 平方米
教室数量	37 间	9 间

机构规模数据以 2021 年暑期机构状况为例。从总体上看，Y 机构在教学空间和师生规模上占有一定的优势。暑期往往是一年内校外培训需求最旺盛的时期。在生源规模上，Y 机构最高曾达到 1000 名学生，而人次总数是指机构开设的每一门学科报名人数之和，即一名学生可能会同时报名两门及以上的学科，人次就会相应增加。不论是学生的个体数量，还是课程总人数，Y 机构都更加充裕。此外，从师资数量、教学场所数量与生源规模的比例上看，A 机构单位班级的规模相对更大，而 Y 机构在课程设置和教学选择上留下更灵活的空间。

### 2、组织结构

#### （1）Y 机构：权责分明的“事业部”型结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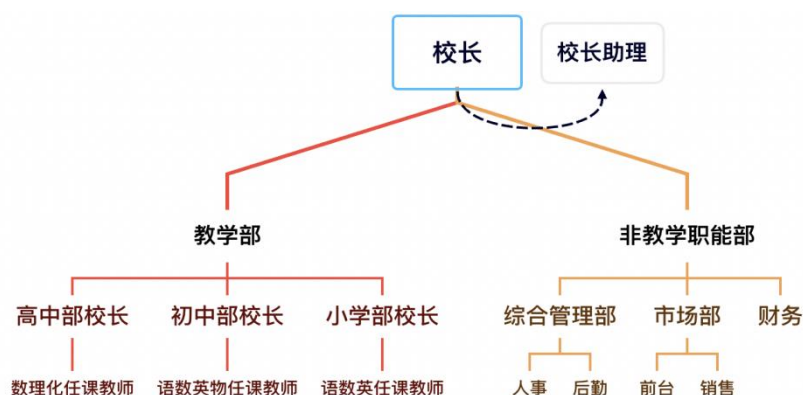


图1：Y机构组织结构

Y机构的组织架构总体上借鉴了公立学校的结构特点。根据工作分工的不同，机构组织大体上分为承担教学任务与对接家长的教学岗位和承担所有教学任务之外的其他工作的非教学职能岗位，教学岗位占据了机构组织结构的主体部分。在教学岗位内部以年级和学科的差异为标准形成师资结构。年级大体分为小学、初中和高中三个年龄段，据此分别设置小学部、初中部、高中部三个彼此独立的管理部门，并从相应年级的老师中挑选出一位认真负责的教师担任部门校长，直接对机构校长负责，部门内教师对部门校长负责。教学学科主要涵盖小学语文、数学、英语，初中语文、数学、英语、物理、化学，高中数学、物理、化学。

### （2）A机构：权责混淆的“直线-职能”型结构

A机构作为具有商业偏重的组织在结构上更多体现了节约成本与效率优先。总体上工作岗位分为教学岗位和非教学职能岗位。所有小学、初中的不同学科教师直接对机构校长负责、统一管理。教学学科主要涵盖小学语文、数学、英语，初中语文、数学、英语和物理。受机构规模的局限在具体分工上的界限并不清晰。机构管理者如校长、财务也扮演着机构教师角色。同时，承担机构课程宣传与推广职能的销售人员在教学过程中显得过分涉入，甚至在对接家长的环节里形成了和老师相近的角色地位。

### （三）教学特征

#### 1、教学主体：教师队伍的组建

##### （1）教学型：全职、紧密的教师队伍

影响生源类型和教学质量水平的关键因素在于师资队伍的建设，教师的招募直接受到机构负责人的办学理念 and 办学要求以及机构规模的影响。“申老师（Y机构创办者）在公立初中任教了三十多年，我从开始跟着他参与培训机构工作开始就认为他是一个极具教育情怀和抱负的老师，他办机构的目的是教学目的大于盈利目的，他本身并不缺钱。因此，他对于老师的能力尤其是态度的要求是非常高的。”（小董老师）

首先，依靠机构在当地较大的经营规模和丰富的经济资本，设置较高的薪资福利水平吸引优质的



教师人才。“我们机构对优秀老师的吸引力最关键的还是工资待遇好，对重点大学毕业的即 211 以上毕业生返乡来这里工作的都是底薪 8000，外加五险一金、老带新指标、课程续费绩效和各类节假日、活动补助，全部按照制度计算工资，不会有关于钱上的拉扯。”（小董老师）这对于难度较大的高年级教培所需要的高层次人才而言具有较强的物质吸引力。其次，机构在薪金、假期、权责等方面建立了清晰的管理制度，有章可循，更符合能人结构的组织原则。最后，机构创办者凭借其相应的社会资源招揽富有教学及学校管理经验的老师加入机构协助教学与管理。多样的招募条件和渠道使得机构组建了较为丰富的师资队伍。

此外，关于 Y 机构教师的特点，其一是全职招募，在一定程度上使得教师群体相对比较稳定，降低流动性的同时增强教学的延续性。其二，在“事业部”型的组织结构中特定年级部门内部的教师之间形成了相对紧密的互动关系，包括因工作需求带来的正式关系和频繁互动后产生的友谊，即以小学部、初中部和高中部的划分作为边界形成了各自紧密的“教师团体”，甚至形成以某一位老师为核心的小团体而共进退，包括社交互动和职业选择，这也为双减背景下机构的变迁路径埋下伏笔。“负责小学、初中和高中的老师们都是在不同的办公室里备课、交流，他们各自往往有更多的共同语言，集中办公更方便。所以我们跨年级部门的老师之间交流相对少一些，跟自己部门的老师更熟悉。像我们小学部的其他老师们，我如果做了什么决策或者其他选择，他们基本都会跟我一起走。”（小董老师）

## （2）功利型：流动、松散的教师队伍

A 机构创办者的职业背景是作为商人而非教育从业者身份创办培训机构，因此相比之下，该机构对于教师本身的质量和教学过程并没有明确的理念上的要求，在日常对教师的监管过程中也表现出制度与实际管理的脱节。“我们日常的备课、上课内容彭校长几乎都不会管我们，入职刚开始的时候还会一个月开一两次会进行课堂总结，现在连开会都很少了，他只负责找到生源，然后就交给销售和我们去说服他们报名并对接，因为他还有其他事情忙，要兼顾幼教和互联网工作，这里只是他事业的一部分。”（小韦老师）同时，受限於机构本身的规模，其招募老师的渠道主要包括招聘平台的发布和老师之间的相互介绍，教师数量的需求也相对有限，加之制度流于形式和机构较强的商业性，使得机构教师队伍整体呈现出很高的流动性。“我当时进入机构也是阴差阳错，本来是陪我朋友去机构面试，她在论坛上看到的招聘信息。到了现场后他们当时之前的老师有几个离职了缺老师，现场就让我也参与了面试就留下当初中数学老师了，很好进。包括后来我工作了大半年，身边的老师也陆陆续续换了好几批，流动性是很大的。”（小韦老师）

基于机构有限的规模和直线型的组织结构，往往特定年级的某一学科教师只需要一位就能满足需求，因而在工作上，老师之间所建立的联系也并不多，每一位老师直接对校长负责，结构简单，并且局限于教学的单一功能，老师间的工作关系往往是松散的。此外，一定数量的兼职教师即“临时工”属性教师的存在也威胁了教师关系的稳定性和教学工作的延续性，甚至形成了对兼职教师的长期依赖。因此从总体上看，松散性与流动性的特点损害了机构师资的整体质量。该机构内兼职教师的存续主要来自于两种途径，其一，多数学生具有相关学科的教学需求且机构内此学科教师尚缺，进而通过短期

聘用兼职教师的方式，一方面能便捷快速地满足开课条件，另一方面成本较低，以完成眼前课程赚取利润为目的。其二，部分教师在履职过程中出于职业选择的变化产生离开机构的计划后，如果课程未结束或机构未找到继任者，此类教师往往会由全职转为兼职。相比之下，兼职身份除了上课，其余时间会更加自由，同时对机构而言付出对成本也会相应降低，但教学质量或多或少会受到消极影响。

## 2、教学内容：生源类型与课程体系

### （1）教学型：多元的生源类型与课程体系

生源作为教学客体与课程体系共同构成了教学过程中的重要内容板块，同时也是教学质量的反馈渠道。同一机构内的生源类型、课程体系与师资队伍三者之间往往存在着相辅相成的依附关系。Y 机构优质师资的吸引力和组建，为广泛、多元的招生来源和课程设计提供了先决条件。生源招收的多元性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第一，年级跨度广。在全面的师资力量支持下，机构生源涵盖了从幼升小群体到高中生的教育范围，年龄跨度较大，进而使得课程设计也相应的覆盖幼小至初高中群体。第二，基于学生学习成绩水平的差异化和不同程度的发展需求给予多元的课程服务。首先是以辅导学生完成学校作业任务为核心的作业班。这类班级对教师要求较低且班级规模一般较大，平均为 30 人左右。其次是面向不同年级学生，以复习旧课、预习新课为目的将讲课和练习结合起来，即上课班。此外，机构设置了针对面临升学的学生群体的衔接班，包括幼小衔接、小升初、初升高三类。在衔接教学中需要不同部门的老师负责教学前后的不同阶段，教学形式上类似于上课班，所不同的是上课班全年存在，而衔接班往往是机构暑期推出的更好应对适应升学任务的班级。最后，培优班的设置对于机构教师而言也是最具挑战性的课堂。一方面针对小学生群体开设奥数班。另一方面，对初中生而言因为面临具有选拔性质对中考带来对升学以及分流压力，其内部也会存在不同层次的教学需求。“我们接触和培训的初中生可以分为三种类型。第一种是基础特别薄弱以考上高中、避免分流到职校为目的；第二种是基础一般，期望通过辅导提升进入重点高中的概率；第三种则是机构通过统一考试到方式在招收到的所有初中生中进行选拔，挑选出最优秀的生源组成‘永升班’，他们进入到重点高中相对稳妥，期望通过训练进入重点班级。”（Helen 老师）

### （2）功利型：单一的生源类型与课程体系

受制于 A 机构师资队伍的流动与松散的整体特点，生源与课程也相应呈现出机械、单一的特点。首先，年级跨度有限，机构生源主要集中在小学、初中的课业辅导。其次，与此相称的班级课程体系相比教学型机构而言也更加单薄，分为托管式作业班和上课班。由于学生和师资规模有限，其班级间的划分标准基本按照年级差异而非学生素养或学习需求的差别。在单一的课程设置状况下，生源的整体质量普遍走低。通过观察，此类功利型机构整体的生源质量相较于教学型机构而言更低。“来这的学生基本都是成绩很差的，很多只能考 20、30 分，完全是淘气不学。这样的学生很多也都难管。”（销售小殷）此外，较高频率的新陈代谢成为功利型机构生源流动的显著特征。从某种意义上说，机构教师队伍的质量与稳定性程度构成生源稳定与否的决定性因素，当功利型机构因其过度的商业性而无法维系机构教师的质量与稳定时，生源的维持则更多需要在招生中的额外投入，因而也为销售角色在此类

机构中的异军突起埋下伏笔。“之前在永升（Y 机构）的时候，学生的教学、续费都是老师亲自抓，都需要长期的日积月累的负责才能赢得孩子和家长的信任。基本上每学期续费率能到 9 成以上，后来来到艾宾（A 机构）后一般在 5、6 成就不错了。虽然双减也有影响但老板在教育理念上还是有差距。”（Helen 老师）

教学型机构通过事先建立完善的师资结构、购买配套的课程资料与服务如奥数班等进而匹配具有不同需求的潜在生源群体，在形成多元化的课程体系的基础上赢得更加丰富的生源，即以教学质量为核心。相比之下，功利性的课程体系在教学质量与完成教学形式的次序上略有颠倒，即以顺利完成教学任务、满足开课条件为目的而较少关注课程完成质量本身。“这里不管是课程的设置还是老师的运用都是有很大变化的。中小学辅导课程里需求相对热门的数学和英语基本是稳定的，但像初中语文、物理这类科目有时无法匹配需求。比如今年寒假，为了留住想要离开的一位全职物理老师，让他以兼职身份又坚持了三个月，这三个月留下来方便再去找新老师，但兼职老师只能负责上课时间，课下无法参与学生答疑。如果兼职老师已经无法腾出上课时间，甚至出现过其他老师临时顶替的情况，上课效果可想而知。”（小董老师）因此，功利性的课程体系最大的特点就是教师群体的不稳定性带来的课程本身的多变与低效。

### 3、家校沟通：沟通角色的实践模式

校外培训机构相较于公立学校而言显著的区别之一在于公立学校对于家长和学生而言是固定的，而培训机构则因其市场化的特点具有较强的竞争性与可选择性。因此，机构教学功能的发挥不仅在师生关系中彰显机构的教学质量，更需要在课外的反馈中维系良好的家校关系，即保持与家长良性的沟通、建构稳定的家校关系。进而，教学功能的发挥所指向的客体不仅在于学生群体，也在于家长群体，家长成为教学反馈阶段机构互动的主要对象。不同类型的培训机构在反馈阶段的机制差异带来了家校关系的不同特点，在某种程度上构成了环境变迁背景下机构分化走向不同轨迹的重要原因之一。对培训机构而言，建立起与家长的沟通机制是以维系与家长的可持续性关系、形成长期合作为目的，以机构制度为约束手段，同时对对应的任课教师与销售作为沟通角色，沟通角色间的分工与行动构成沟通实践。家校关系的影响因素将在后文探讨不同机构分化过程中的比较时再做讨论，笔者在这里将着重探讨不同类型机构中沟通角色实践的差异所带来的对家校关系的影响。

#### （1）教学型：“教主销辅”的沟通实践

在家校沟通的环节中，承担机构沟通功能对主要角色是机构教师和销售，二者的行动关系反映了机构沟通机制或模式的特点及差异。在长期的沟通实践中，教学型导向的 Y 机构形成了以机构教师为主导、销售人员协助的沟通模式。

该模式的形成条件首先与机构的组织结构特点紧密相关。如前文所述，教学型机构内的教师队伍往往经历了高度的整合而团队化，整合纽带主要在于小、初、高相应年级范围内的工作联系，例如相近的考纲与考核难度、对接的家长群体基本相同等。而特定教师团队内部相对成熟的管理结构也完善了沟通的一般程序。以小学部的沟通为例，在销售约好沟通时间后，家长来到学校一般是由小学部校

长负责接待，介绍所开设课程，了解孩子的学习情况以便分到水平相近的班级，进而分析孩子的优势与劣势以查缺补漏，最后询问孩子自身的意愿。

相比之下，销售往往是个体化的、零散的，同时在工作上也更贴近其商业性和衔接性的角色特点，即围绕招生宣传、活动策划和协调家校沟通时间等方面展开。

家校沟通中机构角色主次地位的最主要判断标准在于教学过程的参与程度。因而，机构教师的主导作用体现在三个方面，其一，在所有需要参与沟通的过程中，教师占据了与家长沟通的绝大部分时间、负责了更为重要的教学内容反馈。所有涉及机构和家长的沟通过程基本可以分为两个阶段，报名阶段和教学阶段。“在报名阶段，销售和老师会共同参与到招生的工作中，从宣传到电话咨询再到同家长的面对面沟通。销售人员主要参与到宣传/电话咨询以及约面谈时间的工作中。而老师除了参与宣传过程之外，还独立负责与家长的面谈过程。相比之下，更长时间的沟通发生在报名后的教学阶段，根据机构制度的要求，每周至少一次私聊家长进行本周教学反馈，这并不包括家长的主动质询。此外，每学期一次的集体家长会形式也是搭建家校沟通的重要平台，由任课教师介绍阶段性教学成果。”（小董老师）其二，虽然宣传与咨询服务中离不开销售人员的角色职责，但在家长但观念里老师的话语占据了更加重要的地位。“家长选培训机构其实就是选老师，家长当然希望通过与老师的直接沟通来了解孩子近期的学习情况。报名之前我们也会和家长大致分析孩子的学习问题和学科弱点来展现我们的专业实力和素养，这些都是展现机构服务和老师质量的必要措施，家长选择机构也最看重这两点。”（小董老师）其三，在教师与销售的关系上，二者在沟通过程中因所承担工作的差异而具有不同的职责，就职责性质而言，老师与家长的沟通更加直接和深入，更紧扣教学辅导的内容。相比之下，销售人员的工作集中在前期的宣传咨询和对老师定期反馈制度践行状况的监督之中，与学生的联系是间接的，与家长的沟通是低频的。“在宣传和学生报名期间销售承担家长和老师之间的桥梁，因为在机构的宣传内容中留下的是前台销售的电话，他们需要将来咨询的家长分配给相应负责老师。在教学相对稳定的时期内，销售人员会定期通过回访家长的方式监督机构教师教学反馈的执行情况，并且有时会在续费环节帮助教师为留住生源出谋划策。”（Helen 老师）

据此，沟通时间的长短、话语地位的高低以及职责关系的主次三个层面的差异共同奠定了教学型机构“教主销辅”的沟通实践模式，教师在家校沟通中的主导性地位也映衬了 Y 机构以保障教学质量为核心追求的特征。

## （2）功利型：“教销共担”的沟通实践

销售在部分培训机构中有时又称“招生老师”或“教学导师”，顾名思义在招生和教学环节中，虽然他们并没有教学能力与教学经验，但却与机构教师共同发挥作用。而在功利型导向的培训机构中销售人员在招生、教学环节的参与感有显著的增强甚至形成与授课教师分庭抗礼的局面。所谓“教销共担”，即在家校沟通中相较于教学型机构，除去承担必要教学功能的教师角色之外，功利型机构中销售角色的作用不仅对招生宣传助力，而且在教学阶段担负起家长十分注重的课后服务，通过逐渐参与到孩子教学的过程中建立起与家长稳定的沟通关系。

这种教师与销售的“共担”模式与教师主导模式相比，其显著差异在于教学介入中销售人员的异军突起，其形成条件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其一在于教师群体的相对弱化，包括弱集体化和弱参与度。首先，受制于组织结构与管理方式，机构教师之间呈现出各自为政的弱集体化状态。因为组织结构简单、制度模糊，每个老师都直接和机构校长互动，使得教师队伍内部缺乏统一成熟的沟通机制、各自形成与家长的沟通习惯，进而在沟通过程中放大了老师之间的声誉差异，即负责的老师通过长期良好的沟通习惯更可能留下好的印象，反之则将沟通的主动权让给了对应的销售老师，也因此产生了家校沟通中的弱参与地位。此外，这类机构教师较高的流动性同样弱化了教师的集体性与参与感。例如兼职教师的长期存在既压缩了教师与家长的沟通时间，也整体上抑制了其沟通积极性。其二，销售对教学过程介入的例行化促进了销售群体的相对强化并成为他们得以与教师共担家校沟通的条件。进而在教学过程中，销售人员从教学型机构中合理的“局外人”角色转变为功利型机构内合规的“参与者”角色。

销售参与教学过程的例行化主要表现在课前和课后阶段。首先，功利型机构开课前的沟通角色完全由机构的销售团队承担。“双减之前在招生的时候也是由销售跟学生、家长负责沟通，因为有时候机构在即将开课之前可能甚至连老师还没有确定下来。等上课稳定一周、班级人员基本不会变动后，对我们老师的沟通要求是最少新生一周沟通一次、老生一个月沟通一次。销售与老师是相互独立办公的。”

（小郭老师）关于机构课前沟通的主要内容，“机构的销售团队一直稳定在六个人左右，报名沟通的话老板要求是我们首先负责跟家长对接，包括从微信上开始沟通再到学校里面面对面沟通。内容上一方面能够根据家长提供的孩子的成绩进行分析、给出辅导建议；另一方面回答家长提出的问题，包括师资情况、场地设施、费用及大致的课程教授内容等，基本会按照事先统一好的口径进行沟通。”（销售小左）据此，在沟通内容基本一致的情况下，销售取代教师主导教学沟通前期过程成为功利型机构销售介入教学过程的表现之一。其次，在销售主导课前沟通、教师负责课堂教学的分工模式下，课余时间的课后服务又一次成为二者角力的空间。除了教师的定期反馈，销售同样以教学辅助的身份定位自身、保持着课前与孩子、家长沟通的延续性，这种延续性主要依赖于额外的课后服务，即不同于机构教师的教学服务，包括作业打卡与批改校正。“家长对培训机构的要求都越来越高，要求各种各样的课后服务。因为我之前在外地好的机构待过，有一些做教学导员的经验。我带头弄了一个课后作业打卡模式，每次课结束除了老师布置的作业，我建议销售团队成员给各自对接的学生额外布置一些练习题，让家长拍照反馈，我们自己予以批改，也能让家长感受到我们机构较好的服务与反馈。”（销售小殷）

基于“教学共担”的分工模式，A 机构销售介入的例行化构成了功利型机构进行家校沟通的显著特点。然而，由于销售自身在招生层面的商业性以及教学层面的非职业性，其在教学中的深度涉入一方面干扰了老师的教学节奏、悄然导致了销售团队与教师团队的对立；另一方面也强化了功利型机构的功利性气息，销售主导的课后服务某种意义上构成了刻意取悦家长的“鸡肋”。

### 三、从自由竞争到政策限制

2021年7月，“双减政策”的出台构成推动校外培训机构分化的最大外力因素，在明确指出减轻校外培训负担这一基本思想的指引下，校外培训机构所处的外在环境发生了相应的变迁。

#### （一）供给侧治理：机构压缩<sup>[6]</sup>

从校外课业培训的供给侧着手，在双减政策的影响下，校外培训机构在社会教育环境中的发展空间被不断压缩。首先，机构数量受到限制。以安徽省N市为例，双减政策实施后，社会面被官方允许运营的机构数量变为3家，远远低于双减前对机构数量要求。仅存的3家机构需要通过认缴资本获得经营许可的资格。（彭校长）其次，机构培训时间受到限制。所谓校外培训，便是利用学生在校上课之余的时间根据他们的需求予以补课。双减之后，官方认可的校外机构被允许经营授课的时间仅仅局限于周一至周五晚上学生放学后至八点半之前，双休日以及寒暑假的时间全部被禁止用作校外辅导。（彭校长）此外，在教学内容的限制方面，由于辅导时间大大缩短，可供选择的教学内容也受到了限制。在政策要求下，仅有与课后作业辅导等类似的托管班或作业辅导班可以继续运营，一切涉及到聘请老师进行新课程教学的培训皆被要求取缔和禁止。（彭校长）最后，出于防止机构资本化运营、减轻家庭校外培训经济负担的目的，政府对所有被许可运营的培训机构开展“营转非”工作，即转型为非盈利机构。具体表现为地级市及以上政府协同教育部门依据当地的居民收入水平制定统一标准的培训机构收费标准，同时根据特殊家庭的情况允许设定费用浮动区间，上浮不得超出10%，下浮无下限<sup>[7]</sup>。

#### （二）需求侧治理：降低依赖<sup>[8]</sup>

在考试选拔制度短期内无法变革的前提下，降低对培训机构需求的现实手段之一即寻找可供替代的选择。因此，双减政策进一步强化了学校在学生课后教学服务的主阵地作用以逐步降低学生与家长对校外培训的依赖。一方面，学校老师的发声成为号角。“学校曾经做过一次信息搜集，让家长将校外辅导的报名情况进行登记上报。我们老师也在课堂上直接跟我们讲不要在外报班辅导，马上学校里会有相应的课后服务。”（初中生座谈）另一方面，校内课后服务活动的开展不断压缩着机构的生存空间。以N市为例，从近两年开始，在春、秋季学期内，中小学生每天在学校上课结束后就进入了相应的课后服务时间。初中的课后服务直接借鉴了传统高中的晚自习形式。“我们五点半放学，差不多一个小时的吃饭休息后时间后要回教室上晚自习，一直到八点半结束后才回家。晚自习就是让我们写作业，老师在讲台上管纪律。”（初中生座谈）相比之下，小学阶段的课后服务呈现出差异化的特点，部分小学开展了诸如体育运动、自习等不同形式的课后活动。同时，寒暑假期间的返校自习模式也从2022年暑期开始于部分初中学校先行试点。“七月底的时候老师通知我们可以自愿报名回到学校参加暑期班级自习。但我们都知道，就是多布置一点作业让我们写没有什么特别的，老师本人也不太情愿甚至跟我们说不建议报名，所以我们都没有报名回学校。我了解的我们班四十九个人也就报名了十来个，其他班也差不多。”（初中生座谈）此外，双减政策致力于改变家长的教育观念，通过运用诸如因材施教、身心健康以及综合素质等切入点将家长对单一的校外课业培训的关注和重视予以抽离，从而推动家庭、学校与社会教育的“减负”共识。



### （三）供需治理的局限：夹缝生存

校外培训机构的生存一般取决于招生能力和续约能力，即依靠宣传和教学质量获取大量且稳定的生源进而在机构的自由竞争中赢得生存。然而，当政策环境发生改变甚至取代市场竞争成为抑制机构生存与发展的最大阻力时，机构的生存状况与方式也会发生相应的变化。“双减”政策的控制手段基本围绕着供给与需求两侧展开对机构生存的限制，与此同时，在限制过程中因政策限制的局限性与现实需求的延续性，使得在双减环境下的理想与现实之间产生了一定的距离。

以 N 市为例，首先，在对盈利性培训机构对抑制手段上趋于单一。政策执行总体上是举报制度与定期巡查制度相结合。依赖第三方举报机制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了执行主动权，这给了培训机构夹缝生存的空间。其次，官方对受举报的中小规模培训机构的容忍度仍然较高、处罚力度有限。“这个暑假我们自己租了一间房子开班，规模大概就十几个学生分几个班。7 月初刚上课没几天不知道被谁举报了，当时教育局、市场监管局和派出所来了十几个人上门查处，说有人接连举报了很多次不来也不太好，但可能觉得我们这点规模太小了最后没有细究，做了批评教育后面我们还是照常办下去了，就是动静弄小一点，我猜可能是居民楼里的邻居觉得太吵。（Helen 老师）最后，家长对校外培训机构的依赖短期内难以消除。一方面，双减政策试图通过引导新的教育理念降低家长对培训机构对迷信与依赖，但却并未对激烈竞争的源头——考试选拔制度进行改革，在“学而优则仕”的传统观念影响下，虽然当下的职业选择远比过去更加多元，但优质但选择相较于竞争者的庞大数量依然是稀缺的，通过成为考试的胜利者来赢得未来依然是最重要的考虑。“虽然现在对培训机构管的紧了，但中考高考仍然是要面对的挑战，中考分流比例 1 比 1，一半学生因为成绩差要去上职校，另一半上普高，甚至只有 20% 的学生才能进入本地唯一的一所重点高中学习。从每年的高考录取结果不难看出一旦没能进入重点高中，考进一本院校的可能都很小。”（彭校长）另一方面，在取缔、限制校外培训机构之后还未形成相对成熟的可替代选择帮助家长分担教育压力。从校内课后服务的实施现状来看，存在着教师与学生的积极性不高，课后服务流于传统的自习形式，为了打压培训机构而形式化地将学生的自由时间绑架到校内等问题。因而在理想与现实之间距离尚存的“过渡期”，夹缝生存的培训机构依然存在现实需求。

诚然，因为供求限制的局限性使得培训机构依然在运行，但由于显著的政策压力使得机构在运行中因面临种种限制而不得不产生“适应性变迁”的过程，即通过转变运行模式以最大限度利用仅存的空间走向“由明转暗”的运行路径。结合教学型机构与功利型机构在双减前不同的先天条件和运行模式，在由明转暗的过程中也走向了不同的转变轨迹。

## 四、“功利型”的存续与“教学型”的分化

### （一）变迁背景：共性与差别

从自由发展到受到引导与监督成为“双减”政策落地后校外培训机构所面临的环境变化的实质所在。基于政策限制的基本逻辑，校外一切以上课形式呈现的规模化课业培训都不被允许。但在需求尚存的条件下，机构的经营形式由明转暗或是说由地上转到地下的现状是既有的相关研究所得出的共识性结论，其现实中的具体表现在于其一，机构的主动宣传逐渐消失，公开招生的途径受到制约而放弃

并转为私下沟通。其二，机构的教学与官方部门之间的关系也从独立自主变为“猫鼠游戏”而充斥更多隐秘性的色彩。这些由明到暗的变化是显而易见的，但在其变化的背后，由于机构之间的差异，不同类型机构的变迁中除了由明至暗这一共性的变化外仍然存在其他不同之处。

在限制校外培训机构发展扩张的洪流之下，既有的多数研究站在政策立场探讨了对培训机构限制的现状和问题。所不同的是，笔者旨在立足于机构主动求取生存的立场挖掘在环境变化中机构的适应过程，或适应失败而走向衰亡，或以某种新的形式依然存续。但这种立场下需要将外在环境与机构本身的特点做更紧密的结合，从而明晰现状。在两种类型机构差异化的经营模式下，它们在新环境中的适应方式和适应能力也产生相应的不同。

## （二）功利型的极端化：“快餐式”培训

### 1、“快餐文化”

对“快餐式”特征的理解可见之于快餐文化的发展。“快餐文化”运用快餐特征的隐喻，是一种以“快”为典型代表的文化，意在最大限度地追求效率。这种效率文化也在不断融入特定活动领域之中，例如“快餐式”阅读、学习等。无论在哪一领域，快餐文化融入所带来的就是通过快速地吸引人进而获得大的流量与热度，而作品本身则显示出浅显和相对低质量<sup>[9]</sup>。因此，效率最大化和商业性构成了“快餐式”风格最显著的特征。对于在夹缝中存续的功利型培训机构而言，从功利化培训到“快餐式”培训的过渡似乎成为了政策限制环境下最现实的选择。

### 2、商人思维：“能做一天算一天”

机构创办者或领导者所具有的身份特征、经验能力和社会资源等对机构的经营与发展方向往往会产生至关重要的影响，尤其在面对剧烈环境变迁之时，领导者之间的观念差别又会被无限放大。以A机构为例，其在自由竞争时期以功利型的经营模式存在，很大程度上归结于创办者的商人思维远远超出了其教育情怀或教育思维所具有的水平，将培训机构更多视为盈利的工具。进而，在适应“双减”带来的限制过程中，面对生源缩减、教学隐秘化的不利状况，如何控制成本以保障尽可能多的利润再次成为机构坚持开办的核心诉求。

首先，校外辅导是A机构创办者参与投资的众多行业之一，并成为帮助他度过经济压力的重要利益来源。即使是在校外辅导受到严格管控的时期，面对尚存的市场需求，他所传达的观点是“能做一天算一天”。“除了辅导班，隔壁的幼教也是我开的，并且在三楼大厅办了击剑班。智联招聘的代理和海外贸易我也都在做，现在生意压力都很大，教培的钱能挣就偷偷挣一点，不能做就不做。”（彭校长）其次，不同产业之间的边界不甚清晰，甚至存在人员、场所相互顶替的情形。例如幼教合伙人充当机构的物理教师，没有任何授课经验和从教资格的机构创始人担任初中数学的教授等。作为创办者而言无法保持各产业之间发展的独立性，其结果只能是以牺牲机构的教学质量为代价。因此，以机构领导者浓郁的商业动机和商人思维为起点，开启了机构“快餐化”的趋势。

### 3、角色颠倒：“退回幕后的教师与走向前台的销售”

保障教学质量的关键在于保障参与培训的教师质量。部分优秀公立学校凭借其高门槛的准入标准

和严格的制度约束使得学校的招牌往往就是优质师资的象征符号。而培训机构因其较低的门槛往往成为青年人的“中转站”和职业受挫后短暂的归宿，所以，培训机构内的教师队伍往往良莠不齐，需要依靠老师自身树立起机构的招牌。这既要求教师不断提升自身素质，同时也离不开机构的制度整合与约束，即树立工作中教师的中心地位应当成为机构合理的选择。然而，角色却在功利型机构中发生了颠倒，老师逐渐从台前退向了幕后。

### （1）教师角色的淡化

功利型机构角色颠倒的表现之一在于各个时期内机构对教师质量与权利地位把控的欠缺，使得机构教师的角色趋于淡化。即使处在政策限制前、相对自由的发展环境下，功利型机构在教师挑选上缺乏严格要求，甚至接收由其他机构所淘汰的部分教师。“A 机构里的教师质量都很一般，有几个熟面孔之前在 Y 机构试讲都没通过后来都去了那边当老师了。比如说那个从广西来的郭老师，且不说教学质量了，她那一口地道的方言口音孩子听起来就会很吃力。但那边就不在意。”（小董老师）同时，因机构内的教师具有较高的流动性导致机构生源新陈代谢的频率很高，难以积淀一些忠实的学生及家长进而打造机构声誉。教师的流动性程度一方面受到他们自身职业规划的影响，但另一方面，在机构的职业体验也会成为影响其去留的重要因素。A 机构带来的对教师职业体验的消极影响源自于非制度化管理中的主观随意性，尤其是当精于计算的商人思维主导了管理中的主观性时，教师对机构的不满与失望就会不断累积。例如在工资结算上的“装糊涂”，“如果你是新来的我奉劝你第一次和彭校长谈工资一定要录音，他说的很多话后面他都不会承认。尤其是在寒暑假学生多的时候，刚开始会跟你说好工资标准比如按学生人数收费，到后面人数越来越多他也就想挣更多的钱，前面谈的一些条件他会找成本高等理由不认账，最后跟你达成一个很不划算的一口价工资额。制度都是假的，工资的涨扣他总会找各种理由。在工资上一定要在代课中前期跟他达成一致，否则越到后期你的课快结束了，他不再依赖你了你就很难谈成功。”（小韦老师）

而当“双减”时代来临之后，对依然存续的机构而言不利因素除了招生规模紧缩之外，维持机构师资的相对稳定也愈发可望不可及。对过去全职从事机构培训的教师群体来说，政策限制带来市场需求的降低，机构为压缩成本使得他们的报酬无法得到有效的保障。而通过日常经营，机构全职教师大都收获了自己或大或小稳定的生源圈子，他们意识到自己独立地从事课外辅导收益会比继续待在机构更加稳定，机构面临全职教师加速流逝的危机。因而，过往机构中以“临时工”身份存在的兼职教师在眼下却成为机构得以存续的必须选项甚至是主力军。由此，功利型机构内的教师结构特征由较高频率的流动逐渐趋于一种极端流动，即以临时性的兼职教师取代绝大部分的全职教师构成机构教师的主要组成部分。兼职教师只是为特定阶段的工资工作的临时工，他们没有晋升需求、没有取得学生及家长信任的必要，因此在教学中也难有全身心的投入。如果说在双减之前，功利型机构的教师尚且能够与销售形成分庭抗礼之势，那么，当他们最后一点对努力的期待被磨灭后，就注定了淡出前台的命运。

### （2）销售角色成为新的“枢纽”

角色颠倒的另一方面则是在机构“快餐化”经营的过程中，销售取代教师成为机构运行新的“枢

纽”逐渐走向前台。与教师的临时性与个体化不同，销售群体始终维系着较强的团体性，而贯穿其中的整合力量主要源自于机构所施加的多元工作内容以及他们日常所形成的分工与协作。例如，A 机构中的销售团队往往身兼数职。除培训机构外，销售还参与到机构老板其他产业的职能工作，涉及比教师更宽广的领域，因此，在工作中的沟通需求和沟通频率上，销售群体甚至高于教师。

与此同时，机构面向家长的沟通模式在教师角色不断淡化的过程中悄然发生了改变，销售角色从作为教师与家长形式意义上的“桥梁”转变为机构实质意义上的沟通“代理人”。在今年暑期的招生阶段，“A 机构从今年暑期班招生、报名开始，全部工作都是由我们负责执行，因为当时暑期课程的老师尚未敲定。家长难免要首先询问任课老师的情况，我们只能借用以前一些老师的基本信息并回答他们说老师都还没有放假。其实很多家长都会因年轻老师过多而不放心，虽然暑期需求很多，但从全年看市场需求很不稳定，采用全职教师的方式在这一行确实已经不合时宜，我们也因此遭到了很多家长的拒绝。”（销售小左）

学生日常的生活管理与学习监督也采取了销售负责制。对于学生而言，他们与各科老师的互动仅停留在课堂时间里，上完课的老师很快就会离开机构，当日的作业监督和问题反馈大多留在了由销售负责的自习时间中，但他们往往缺乏帮助学生及时解决课业问题的能力，寻求与老师沟通的时间也十分有限。因而，在学生心目中，老师相对来说成为了敬而远之的存在，销售则成为了他们每天在机构稳定的管理者甚至是依靠与寄托。

此外，教师在课后反馈中的缺席成为推动销售走向家校沟通“前台”的最后助力。一方面提升销售在家长心目中的存在感，包括前期对学生的成绩分析、学习计划的设计以及上课后的课后反馈。另一方面，最大限度地降低老师与家长的沟通频率。老师与家长所建立的唯一对话渠道便是微信群聊，因其具有公共属性使得家长难以与任课教师进行单独且深入的沟通以了解孩子的学习状况，因为老师与家长的私下交流并不被机构所赞同和倡导，课下反馈的职责最终由销售所承担。“如果群聊里有家长想和你们老师了解情况，尽量委托销售人员告知，以防在沟通中出现不必要的问题。”（彭校长）

#### 4、成为“快消品”：“被摆上流水线的学生”

功利型机构的“快餐式”运作使得教师队伍走向兼职化与极端流动，导致了他们工作上的无欲无求。同时销售人员对于教学与对外沟通的全职介入彻底取代了培训机构传统“招牌”的中心地位，同时也使得机构的延续与否不再只依赖于教师队伍的质量高低与完整与否。而这一角色颠倒所带来的后果则是教学过程的流水线化和学生的“商品化”。

课外辅导机构所惯用的获取生源的方式除了通过宣传招取新生外，更多是仰仗旧有生源基本稳固的前提下凭借良好的教师评价及声誉获得以老带新的拓展，这近似一种“滚雪球”式的关系红利所带来的生源累积，前提条件是教师教学质量的保障和师资队伍的稳定延续。但在内外环境的双重挤压之下，教师渐渐成为齐美尔笔下机构的“漫游者”<sup>[10]</sup>。教师与学生往往被塑造了双向成就的关系，因而教学过程不是单纯地完成上课形式与任务，而是要建立信任与依赖。当教师在机构中“失根”<sup>[11]</sup>，对机构而言学生也难逃匆匆过客的结局，成为机构“流水线式”教学过程中的“快速消费品”。首先，从

招生阶段开始，学生及其家长就呈现出被摆上货架的状态，被动地接受机构的询问与争夺。因为全职教师尽数离开导致机构旧有的生源流逝殆尽。面临暑期招生的关口，A 机构的选择是通过社会关系获取大量中小学在读学生的家庭信息，进而通过销售团队的推销、问询能力在大量的可能性中挖掘成功率。“招生的时候彭校长给我们每个人一份名单，每份名单都有成百上千个人的联系方式甚至是就读的学校，让我们一个一个的打电话询问，尽力说服他们来补课。这份名单看起来像是公立学校里面才有的，应该是他托关系弄到的。之前的老师都走了，这个暑假全部仰仗这个名单和我们尽力地劝说。来的几乎都是新来的学生，大概最后有二百多个，其他在做的机构也都在联系。”（销售小左）其次，为了规避官方的定期巡查和被举报的风险，机构“暗地里”的培训难免使得教学过程磕磕绊绊。以 A 机构为例，在暑期为期一月的课程里，因故推迟的时间达到了近两周的时间使得最后的课程超出预期的时间安排，很多学生没能完整地参加整个辅导过程。加之机构日常沟通的大量内容都被如何规避检查的注意事项所占据，教学内容和教学节奏的安排全无监督，反复无常的“猫鼠游戏”使得上课沦为一种“应付”，即单纯为了兑现学费而凑足课程的形式游戏，就像流水线上的工人只顾完成自己手头的工作，所不同的是产品本身不会给予反馈但学生可以。缺乏良好教学效果和教学体验的学生会选择离开，但对于机构而言不过是新生源检索任务的又一次开始。

商人思维的指引下，机构存续手段的现实意义在于培训费用的赚取，这让功利型机构难以收获能够沉淀下来的名声与文化。角色的颠倒隔离了家长与教师，也使得信任与依赖与机构渐行渐远。商品化的教师与学生走进教学的“流水线”后又共同离开。“快餐式”培训是迫于现实的存续模式，但绝不应成为“双减”时代再一次被默认的现实。

### （三）教学型的分化：从机构到“小作坊”的共同体化

#### 1、共同体化的渊薮

德国社会学家滕尼斯在研究人类社会生活的方式时提出了“社会”与“共同体”的区分，认为“共同体”是具有亲密关系特征的、建立在具有“共同领会”或共识基础上相互扶持的有机结合体<sup>[12]</sup>。他们在共同的目标和情感认同中形成了较强的依赖与信任关系。相比之下，“社会”的生活方式则更偏向利益的交换为纽带，依赖契约的控制而非情感的认同。结合培训机构的差异化模式，功利型机构由明转暗的全过程培训模式皆具有“社会”生活方式的特征，因而其运行逻辑是商业性的，并最终走向“快餐式”的生存模式。而教学型机构出于生存的需求，在双减政策之前也难免具有商业机构的属性，但在丰富深入的教学过程中积淀了机构忠实、稳定的生源和良好的声誉，埋下了在危机环境里机构分化走向共同体化的种子。

#### 2、优势变劣势：Y 机构的终结

##### （1）理想屈从现实：“没必要和政府对着干”

与功利型 A 机构的“快餐式”存续不同，教学型 Y 机构在双减政策的压力之下最终走向了解体。作为课外培训的主要力量之一，在自由竞争时期里教学型机构凭借其对教学质量的注重和对教学规律的探索曾建立起在行业内较为明显的竞争优势，这一优势的取得离不开多重条件的支持。以 Y 机构为

例，机构创办者是具有丰富的教育经验、社会声望和教育抱负的教育从业人员。“申校长（机构创办者）在 N 市最好的初中教了三十年的书，教的是初中物理，带了二十多年的班主任，而且有特级教师的称号，不管是在教学上还是班级管理上都有很强的能力和丰富的经验，有很多本地很有名的人物比如大企业家、政府官员的孩子都曾经是他的学生，并且最后都考上了很好的高中。”（小董老师）卓有成效从教经历不仅使他形成了针对义务教育阶段学生系统化的教育理念和教学方法，而且获得了广泛的社会认同和文化认同，一方面认同他的专业能力，另一方面也逐渐对其产生了信任与尊敬，进而在从公职教师转型校外培训的过程中得以实现他影响更多孩子的教育理想。但是，维护社会声望需要与主流的社会价值相向而行，具有一定社会声望的个体往往会更加顾及行为的社会影响。因而，当社会政策剥夺了校外辅导的合法性地位后，继续坚持反而会损害自身的社会形象。“申老师在 N 市是有头有脸的人物，他没有必要在管控这么严的情况下跟政府对着干，何况他有能力的朋友很多，还有很多其他合作的机会，不会影响他后续的职业发展。”（小董老师）理想抱负伴随着政策和价值的转变而屈从于现实，曾作为助力的社会声望反而成为放弃坚持的关键因素之一。

### （2）经营难以为继：“继续坚持就是持续亏损”

Y 机构办学的逻辑之一就是借鉴公立学校的管理模式，如第一部分所论述的，无论是在规模、组织结构还是确立教师在教学过程中的核心地位上，都体现了机构将教学质量摆在首位。在两年的发展时间里，招生规模慢慢跻身当地所有机构的前列，同时用于教学的场地规模是最大的，师资和工作人员的质量与规模与生源数量基本匹配以保障富有效率的教学，通过打造比肩学校的教学扩大机构知名度、赢得长远效益。但巨大的投入也需要相应数量的生源回馈加以维持。“双减”环境下生源数量的减少一方面受到公立学校呼吁和回流的影响，部分学生开始参加学校开设的自习班；另一方面来自于机构校长主观意愿的退缩，对暗地经营的模式嗤之以鼻使得机构逐渐走向解体。“机构成立的前期投入大约是一千多万，因为占地面积达到近 3300 平方米，每年的房租很高，还有大量的员工以及购买课程和管理系统维护等，两年的经营依然处于亏损状态，继续经营因为我们的目标太大，加上申老师主观上很难接受偷偷摸摸地做事，继续坚持下去只会持续亏损，没有必要了。（小董老师）因此，对于教学质量的追求在受限制的环境中反而成为持续生存的最大“拦路虎”，规模化的经营也变身为政策监督的最大“标靶”。

### （3）出路可供选择：“成为被替代者”

教学型 Y 机构得以在“双减”出台后两个月走向终结的重要条件是通过机构校长的努力帮助部分教师找到短暂的过渡方式。校长自身依靠社会关系资源实现产业转型。但因为 Y 机构的注销意味着机构内教师与尚存生源的安置，进而申校长借助其在课外培训市场的人脉促进了机构间的跨越合作，接收 Y 机构剩余生源和教师并转让学费从而帮助机构止损，而接收方则是功利型 A 机构。“因为机构当时不得不面临注销，我们所有小学部的老师和以 Helen 老师为首的部分初中部老师临时去到艾宾（A 机构）那边，利用那边的场地设施继续带完手头上的学生，当然也有其他老师出去转业或者自己单干了。”

（小董老师）由于存在大部分已经签约的学生的教学需求，机构间的接济开启了教学型 Y 机构分化的



过程，并且原本处于规模劣势的功利型机构因其成熟的商业运作模式替代教学型机构转而成爲政策限制环境中的幸存者。

### 3、成为“小作坊”：化整为零的情感共同体

#### （1）观念冲突：“教师的集体离开与化整为零”

功利型 A 机构对教师和剩余生源承接意味着教学型 Y 机构在政策限制下名义上对终结。但作为在经营模式上呈现截然不同特点的两所机构，在合作中也显得艰难与短暂，背后原因主要源自于模式背后所蕴含的培训理念或观念的冲突进而带来日常行为中的对立与摩擦。前文已述，A 机构老板精于算计的心性和习惯性对口头承诺的违背使机构教师心生不满。同时更为剧烈的矛盾在于作为外来者的 Y 机构教师对 A 机构的过分商业性以及“快餐式”办学的倾向心生忧虑与不合。

首先，教学型机构老师延续下来的基本理念始终是通过坚持与陪伴提升教学质量，赢得稳定的生源，而这与 A 机构寻求快速挣得学费并降低教学成本的功利性思路相悖。“多次与彭校长交流后发现他的想法是对我们之前以教学为中心的企业文化的彻底摒弃。例如他将小班全部改为大班教学，用意就在于在老师的一个课室内尽可能多的增添学生，付出相同工资的情况下能够增加学费收入。大班最多达到了 16 人一个班，出于教学效果的考虑我们基本没有安排超过 10 人课堂的先例，教学效果会大打折扣，学生的水平也不一，不利于因材施教。如果把我们带过来的学生交给他们管理，通俗地说就是由奢入俭难，他们会很快感觉到落差。”（小董老师）

其次，教师的角色在招生过程中的“销售化”招致老师的集体反感。迫于双减的压力，A 机构的所有教师与销售全然没有差别，都加入了“电话推销”的行列，尽管 Y 机构迁移过来的教师团队带来了部分稳定的生源，但依然要为机构生源的拓展出力。“过去我们生源扩展的主要渠道是老生家长的介绍，很多家长会带新客户来找我们因为我们尽职尽责家长看在眼里。然而现在完全颠倒过来，我们要不断在电话里央求对方过来补课，既要上课又有招生要求的环境给了老师很大压力。”（小董老师）

机构终结的过渡期是观念冲突下格格不入的时期。从教学型机构游离出来的辅导老师们一方面坚持着自己被塑造的教育理念，因为身边的学生一直在追随着自己；另一方面，功利型机构所带来的冲突与压力加速了教师队伍的分化。“彭校长这个人太精于算计，双减带来的压力确实很大，生源受到影响我们拿到手的工资一次又一次的减少，而且还被他找各种理由拖延和克扣。所以寒假之后，从 2022 年春季班开始，我们和永升（Y 机构）过来的老师全部都离职私下合作了。”（小韦老师）这一次，不只是外来教师的犹豫和彷徨，而是 A 机构教师的集体离开。在政策限制的环境下，留给游离教师的机构平台不断被压缩，他们以年级为单位化整为零，走向各自独立的“小作坊”式培训。

#### （2）情感共同体：“亲密、互助的小圈子”

从机构到“小作坊”的转变，其实质表现为学科、年级与组织结构的分化，即学科、年级的专一化和人员结构的简化，只存在老师和学生的互动关系。因此，“小作坊式”教学的特点之一在于规模较小。之所以选择化整为零的小规模办学，其一在于办学规模的增大也在加大规避巡查的成本和受到举报的风险，其二，紧紧依靠身边稳定的生源，缺乏争夺生源的能力和资源，其三，在“双减”政策的

限制下，通过机构平台辅导的利润往往比私下独立补课更低。因此，从 A 机构集体离开的教师在相互选择了适合彼此的合作老师之后开启各自的“小作坊式”教学，每组合作的教师数量基本维持在两到三人。“我们离开机构的同时也带走了我们自己的学生，学生与家长和我们一样不会对机构有归属感只会认老师。自己办辅导成本低，我有地方不用租房子，开班很方便，因为那些熟悉的家长还会帮我找人拓展生源开班，即使我收费跟大班教学一致我也能盈利，低学费还能赢得家长的好感。所以，我和另一个语文老师一起合作开班，只带小学语文和数学，已经坚持近半年时间，学生人数目前已经达到 40 人，周末上课 31 人，晚上作业辅导 9 人。”（小董老师）

作坊式教学缩小了办学规模，但却是建立在过往的强关系基础上的小圈子，这便引出其第二种特点——较高的亲密性或情感导向。教学作坊内在这种亲密关系的基础上形成了彼此互助的共同体，即家长与老师之间因信任和依赖而主动地相互帮助。滕尼斯认为，共同体的存在不仅仅具有亲密关系，还具有一定的排他性，而这种排他性在“作坊式”培训中体现在“新鲜血液”注入的特点上，其实是一种强关系的传递。在小规模培训中，辅导班开班不再是老师所需单独面对的问题，家长也主动担起了输送生源以保障辅导班正常开设的重担。“刚开始跟我一起走的老生有十几个，都是我从永升就开始带的。后来计划小班教学和一对一教学，排班时生源不够，为了保证这些班能正常开起来，我跟家长反馈生源不够的问题后，好几个家长很快主动找了身边的朋友让他们带孩子来补习，有的甚至家旁边的培训机构都不去偏要来我这，因为孩子喜欢跟我学。后来人数也慢慢多了，但我后来拒绝了一些，因为我的场地有限容纳不下，而且我已经满足于带好我身边这些熟悉的孩子，多了我不能保证能教出效果。”（小董老师）家长将对老师信任与依赖在自己的熟人圈子中传递主观上是一种莫大的信任与支持，老师对学生也本着最大程度的负责与付出，客观上促成了“小作坊”成为教师与家长、学生互助的情感共同体，也是政策限制中“暗地里”得以生存的模式之一。

### （3）“强关系”何以可能：“教学沟通与情感沟通并重”

如果说“快餐式”培训需要依靠高强度的新生源搜索与推销求得存续，那么“小作坊”式培训得以生存的重要前提在于它是建立在老师和学生、家长已有的“强关系”或亲密关系基础之上。关系亲密的背后往往蕴含着家长对老师的态度，因为课外辅导的老师相对而言是具有较强的可选择性和可替代性的，家长对不同课外辅导老师的不同态度或不同的喜爱程度会直接反映在关系性质上的或亲或疏。在日常互动中，学生学习成绩的进步与否成为影响家长与老师关系最重要的指标，但在追求成绩进步这一结果的背后存在诸多的培养细节和漫长的过程，这恰恰成为课外辅导老师能否获得家长信任、被视作“好老师”的重要环节。

教学型机构老师与家长之间亲密关系的保持得益于机构正常运行时期所积淀的“教学遗产”。首先针对家长，机构要求老师树立全面、周到的课后服务意识。“老师固定的课后工作包括每月至少一次与每位学生家长的电话沟通，了解学生的情况，听取家长的反馈，帮助家长解决学生存在的问题。同时，批改作业也是很繁重的任务。因为在平时学生基本一周来一次，比如你带了四十位学生分四个班带，来了之后在课上不可能有时间现改作业，都是平时家长用微信发过来，我们批改后在微信上反馈。除

了固定工作之外，有一些家长对自己小孩格外关注的，跟我们沟通的会更多一些，问题也会多一些。

（Helen 老师）其次，老师给予了学生严格、细致的教学安排和教学要求。“比如上课，老师被要求课前半小时进教室，熟悉教案，整理教室。学生被要求课前 15 分钟进教室。根据具体需要，这 15 分钟可以用来做课前检测例如英语听力、数学计算题、语文语言文字训练等等，也可以用来答疑解惑、心理辅导等。并且，所有老师上课不能碰手机。下课后老师也不是立刻就能离开，有学生课前检测没通过或者上课有疑惑没能解答的，课后需要及时解决学生的问题，学生通过后老师才能离开。结束后老师要及时在家长群布置作业、反馈学生的表现情况。通常如果 11 点下课，老师基本到 12 点才下班。”

（Helen 老师）教学过程的程序化，课程要求的严格化以及课后反馈的及时性使得在日常互动中，学生与家长能够真切地感受到老师在他们身边的存在与支持。看似基础的工作，难能可贵的是老师日复一日的坚持让尽责的印象在越来越多的家长心中持续深化。最后，在面对学习存在困难的学生时，教育不仅是知识的讲授，也是情感的支持与细节处的关爱，需要老师课上课下持有对学生的爱心和细致的观察。“关于课前的情感沟通，比如说近几次课发现某位同学上课不在状态，情绪不对，就在下课时主动找他聊聊天，让他表达出他心里的烦恼。当然要很温柔很善意，跟学生的情感沟通需要解除学生心中的戒备心，可以了解他们的兴趣爱好，自己去了解相关的知识，然后和他们一起聊感兴趣的话题甚至是‘八卦’什么的，调整他们的学习状态，激发学生的主动性。”（Helen 老师）因为年龄和心理成熟度的差异，非课堂时间里的互动与交集有时也显得尤为重要，站在学生的立场，进入学生的内心世界与感兴趣的话题，更有助于赢得好感与依赖。

教学型机构教师的过渡阶段是历经了合作与冲突的时期，在学生和家长的信任与追随下，老师始终坚守着以教学质量为核心的教育理念，亲密的关系与互助的行动引导了“游离”的师生们走向化整为零的共同体化的教学模式。

## 参考文献：

- [1]王楠，2020，《减负背景下校外辅导机构存在问题及对策研究》，河北师范大学公共管理系硕士论文。
- [2]鲍佳，2021，《中小学校外辅导中的不规范问题及其治理研究》，湖南理工学院教育管理系硕士论文。
- [3]宁本涛、陈祥梅、袁芳、张耀贞，2022，《减轻校外培训负担实施成效及生态复合治理机制透析——基于我国 152 个地级市校外培训负担现状的调查》，《中国电化教育》第七期。
- [4]周洪宇、齐彦磊，2022，《双减政策落地：焦点、难点与建议》，《新疆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第 43 卷第 1 期。
- [5]陈园园、李会春，2021，《影子教育治理的政策演变、困境及对策》，《复旦教育论坛》第 19 卷第 5 期。
- [6]丁青，《‘双减’背景下的管理创新与实践》，南京市玄武区教师发展中心。
- [7]国家发展改革委、教育部、市场监管总局，2021，《关于加强义务教育阶段学科类校外培训收费监管的通知》，9 月 2 日。
- [8]殷飞，《‘双减’政策背景下，教育如何提质增效？》，南京师范大学家庭教育研究院。

[9]李莹莹, 2020,《快餐文化对大学生价值观的影响及引导对策研究》,暨南大学思想政治教育系硕士论文。

[10]侯均生, 2006,《西方社会学理论教程》,天津:南开大学出版社。

[11]杨善华, 2005,《西方社会学理论(上)》,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

[12]王晓晴, 2014,《对滕尼斯<共同体与社会>的理解》,《市场周刊(理论研究)》第2期。

☆ 作者简介:王世文,河海大学社会学系2021级硕士研究生

☆ 责任编辑:魏楠楠

※ ※

### 2022年社会学学科喜获两项国家社科基金项目

2022年9月13日,全国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办公室发布《2022年国家社科基金年度项目和青年项目立项结果公布》、《2022年度国家社科基金西部项目立项结果公布》,对2022年度的国家社科基金项目 and 青年项目,以及国家社会科学基金西部项目进行公示,共计5183个。其中,国家社科基金年度项目(包括重点项目和一般项目)和青年项目共计4683个项目拟获立项。

根据全国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办公室公示的2022年国家社科基金年度项目和青年项目立项名单,河海大学公管院社会学学科沈洪成教授和丁百仁老师所申报的项目获得国家社科基金年度项目的批准立项。

国家社科基金项目作为国家级哲学、社会科学和人文科学的研究项目,其研究成果代表国家哲学社会科学的学术水平,能有效引领科研发展,支撑专业建设,服务社会进步,对于提高社会学学科建设水平、打造高水平师资队伍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此次我校社会学学科获得两项国家社科基金,是社会学学科发展的又一重要展现。

# 秽物的生死之辨

## ——物质性视角下的 Q 市 H 村农厕改造思考

徐强

---

**摘要：**在乡村振兴的时代背景下，改善农村居民生活环境的农厕改造运动声势浩大，大有“厕所革命”之势。虽然在国家政府和基层村组织的大力配合下，我国的农厕改造取得了巨大成就，但是不同地区依旧存在不同的问题。本文以 Q 市 H 村为例，通过对 H 村农厕改造方案的分析，基于深入访谈与实地调查的结果，尝试以“秽物”为社会分析的中心，建立其社会生命框架与行动者网络，通过对“秽物”的“生死”之辨，去思考农厕改造出现的问题根源。

**关键词：**农厕改造 物质性视角 行动者网络 农村环境

---

### 一、前言

中国著名文学家梁秋实先生曾说：“察人观耳后，看国家则看厕所”。厕所虽然是藏污纳垢之地，但是一个国家或者一个家庭的厕所如何，在一定程度上也反映出了这个国家的文明与现代化程度，或这个家庭的生活习惯与水平。我国农村地区在很长一段时间里，旱厕等传统厕所占据大多数农村家庭，为了实现粪便无害化处理，我国很早之前就开始了农村改厕工程（全国爱卫会，2009）。

在 20 世纪 60 年代，农村地区就开始了管水、管粪、改水井、改厕所、改畜圈、改炉灶、改善环境的“两管五改”运动，这是新中国成立以来的最早的农厕改造的尝试（胡宜，2011：115-116）。在改革开放之后，随着经济水平提高，人们关注中国城市发展的同时，目光也逐渐转移到农村。20 世纪 90 年代初期，国家发布的《中国农村初级卫生保健发展纲要（2001—2010 年）》中明确提出农村改厕是一项重要措施（农村卫生管理司，2002）。步入 21 世纪后，国家对于农村厕所改造的重视程度越来越高，在 2009 年，农村改厕还被纳入到“医改”项目中（刘宝林，2019）。2015 年，习近平总书记在延边调研时，提出要进行“厕所革命”，让农村人用上卫生的厕所（徐学东，2016）。截至 2021 年底，我国农村地区的厕所普及率超过 70%，东部地区以及中西部城市近郊等条件较好的农村卫生厕所普及率以及超过 90%，仅自 2018 年来，就已累计改造厕所 4000 万户（新华社，2022）。

在党和政府的大力推广下，我国的农厕改造工程成效显著。从传统开放坑式的旱厕，到冲水式的卫生厕所的变化，不仅仅是厕所形态的变化，同时对于改善农村的卫生环境、降低蚊虫病菌引发疾病等方面起到了一定作用（王永生、刘彦随等，2019）。并且，厕所形态改变后，其所带来的良好卫生环境有利于促进农村居民卫生意识与习惯的形成（胡海娟、樊福成等，2019）。还有研究表面，这种改厕后健康的生活环境以及卫生意识的提升，还对农村地区的儿童长期人力资本产生影响，提高农村地区

居民的受教育水平，为我国的乡村振兴产生积极的影响（梁超、王素素等，2022）。

虽然我国的农厕改造成效显著，但是同样存在一些问题。如地区差异带来的厕所普及困难、卫生厕所质量堪忧导致农民积极性受挫（马金彤、张华等，2013）、治理主体单一、“上热中温下冷”（刘宝林，2019）等问题。在一些农村地区，农厕改造因为不符农民的生产生活习惯，甚至造成了农民生活不便，引发农民不满等问题。在乡村振兴的时代大背景下，农厕改造究竟该走怎样的道路，才能在创造一个干净又卫生的环境同时，更加贴合农民的生活习惯，让农民主动参与到农厕改造的过程中，是一个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

## 二、研究思路

### （一）Q市H村厕所改造工程

Q市位于安徽省西南部，H村为Q市普通村庄，全村耕地面积近8000亩，主要农作物为水稻，经济作物以棉花、油菜为主，是Q市内重要的农业村。曾经的H村的传统农厕由一个较大的秽物存储坑以及数个裸露坑位组成，居民与家畜的排泄物通过坑位口自然滑落到存储坑，并无任何处理设施。这种暴露式的存储使得厕所周边常存在异味，严重影响农户人居环境，部分农户虽将存储坑置于半户外的场所，但是家中内部的开放式坑位因与存储坑相连，同样会引来恶臭。每当春夏之际，排泄物存储坑存在的大量秽物，导致大量蚊虫滋生，通过屋内的坑位口侵扰室内，不仅对室内人居环境造成严重破坏，同时也存在传播传染病的健康卫生风险。

但是由于H村起初由各户承包耕种农业为主要生计来源，以粪便等秽物为主的农家肥为农业生产提供了充足的肥料，再加上当时经济条件较为落后，农民无力也不愿更换厕所。

随着经济社会发展，H村居民离乡务工人员增多，农业生产人数降低，生活水平不断提升，在二十一世纪初，开始有部分家庭更换卫生厕所。2010年，H村实现土地流转共5000亩，H村开始了第一次集体牵头的农厕改造，村集体对于需要改造的农户提供秽物存储坑改造费以及补偿部分抽水马桶购置费。

十三五期间，在国家提出改善农村人居环境的号召下，H村集体在当地政府的财政补贴下，实现了农村自来水全覆盖，在用水保障的基础上，H村开始了大规模的农厕改造工程，在此次改造过程中，扶持力度增大，每户农厕改造提供购买设备、施工、改造安装等全过程工程资金1700元，由最初的自愿申请改变为“应改尽改”，在十三五期间，实现卫生厕所覆盖率超过90%。但是H村的农厕改造以户为单位，并未进行后续处理设施建设。

### （二）物质性的研究视角

我国对于农村厕所的改造工程起步已有数十年，近些年来，随着乡村振兴战略，全国农村的“厕所革命”都在轰轰烈烈开展，面对我国农厕改造过程中的成果与问题，很多专家学者都做出了相应的研究。面对改厕存在的种种困难，一些学者提出改厕是不间断的过程，需要不断投入力量加强（马金彤、张华等，2013），或者让基层操作人员有更加完备的专业知识以实现改厕公平性（张红培、李孜等，2018），或采取更为具体明确的扶持政策（李养秀、张立，2016）等。在我国农厕改造的影响因素层面，



大部分学者都从人自身进行社会分析,如当地经济条件对于农村改厕的影响(王永生、刘彦随等,2019),民风民俗对农厕改造的阻碍(周和宇、周婷婷,2009),农村劳动力流失与农厕改造的关系(赵春燕、卢愿清等,2007)等。

由此可见在以往的关于我国农村改厕的研究中,学者们往往聚焦于人类的社会分析,仅仅将改厕过程中的重要组成部分“秽物”当作被动的客体看待,缺少以秽物为中心的研究进路。

物质性研究则是超越这种传统的以人中心,将除人类以外的有生命或者无生命的一切同样视为研究对象的一种研究视角(张劭颖,2021)。在物质性研究视角下,人类自身与非人之物共同处于社会分析的框架之下,通过研究人、非人、自然环境之间的相互作用,并以此挖掘三者之间的彼此联系(Epstein, 2008)。物质性的研究视角通过赋予所研究的非人之物以生命,将传统意义上处于社会环境之外的非人物品赋予社会性,并将其置于社会分析的中心。在具体的研究过程中,这种强调物的能动性的研究视角首先要探讨所研究的物是何物,进而利用 ANT 的理论与研究框架,并强调从生态环境角度来看待问题。其中,所谓的 ANT 分析框架,即将某个社会分析过程中的人、物、技术、组织、设施等相关方面均视为社会行动者一起纳入分析过程中,并通过绘制过程框架,以此来挖掘彼此之间的交互作用,不仅可以体现不同物体之间的演变过程,同样绘制出其相关的关系网络(张劭颖,2021)。

在进行农厕改造的过程中,粪便等秽物因为其对于生态环境、人居环境、卫生健康所产生的威胁,而被人们视为一种急需处理的废弃物。因此,在部分农村地区,由于其农厕改造过程过于简单地将秽物视为一种与主体相对立的客体,必然也就容易导致在改造措施产生问题、后续漏洞弥补不及时。在这种条件下,农厕改造所产生的问题不得不从秽物这个客体自身角度出发,去寻找问题产生的根源,并提出根本性解决措施。

本文将基于物质性的研究视角,赋予常被视为“死物”、“客体”的秽物社会性活力,以农村厕所的秽物为中心,分析在部分村落的农厕改造过程中的问题由何而起,站在农村、农民、农业、秽物四者交会的关系网络上去寻找解决农厕改造存在的问题的解决方法。

### (三) 研究方法

本文选择 Q 市 H 村作为研究案例,通过非结构访谈的方式,选择 H 村村干部、H 村已完成农厕改造的部分村民为访谈对象,以此来挖掘 Q 市 H 村农厕改造过程中存在的问题、原因,并从物质性视角提出相应的破局之路。

## 三、视秽物为死物:农厕改造矛盾初现

### (一) 由私域向共地的污染

根据卫生部于 2009 年发布的《农村改厕管理办法(试行)》的第一条就提到农厕改造所需要承担的“保障农村居民身体健康”的任务,所以在农厕改造后,通过抽水马桶、隐藏式下水管道与位于户外的秽物存储场所的建立,人体排泄物通过抽水马桶直接进入到较为封闭的存储场所,室内的马桶与排泄物存储场所之间得到有效隔绝,异味与蚊虫难以从存储地进入室内,农厕改造后的私人场所内的环境卫生得到有效提升(农户 1:“夏天的时候,那个蹲坑蚊子满天飞,上个厕所都不敢多待,有时候

下大雨，那个臭味闷得屋里都闻得到。现在抽水马桶，臭味上基本是没了，最少屋子里面没了。虫子的话，屋外那个池子把盖掀开全是蚊子，人看着都发麻”）。

在 H 村的农厕改造过程中，人体排泄物等秽物被视为导致农户家庭“私域”卫生环境恶化的罪魁祸首。因此在改造过程中，村里选择的主要做法就是将秽物从农户家中隔绝出去（村干部 1：“臭还不是那些粪臭？是真的不卫生，我们习惯了还好，小一代根本受不了这个，改厕所，不就把厕所那些脏的从家屋里头搞出去”），单纯认为农厕改造就是利用城市中干净卫生的抽水马桶代替传统旱厕，就能够完成农厕改造。

通过农厕改造，大部分 H 村农户家中建立了卫生厕所，很大程度上改善了农户家中的卫生环境，一些受访的农户也明确表示出卫生厕所带来的生活上的便利（农户 1：“家里卫生是好多了，原来那厕所一块臭的死，下雨家里一回潮还有污水，现在都冲水的，家里干净不少。家里有老人也方便一点”）。此外，农厕改造使得 H 村农户卫生习惯逐步接近城市居民，实现初步“城市化”（辜胜阻，1991），这让一些常年居住在外的子女以及外地城市长大媳、婿、孙辈等适应农村居住环境，改善家中生活氛围（农户 3：“我家那孙子从小在上海长大，回家那个旱厕他不敢去，硬憋着不上厕所，有一次实在没办法，还带到县城去他姑家上的。后来因为厕所，孙子在家待的时间不长，不愿意来老家”）。

从农户角度来说，随着厕所设施的更新迭代，人居环境确实得到了提升，但是这并不意味着农厕改造就收获了成功。在《农村改厕管理办法（试行）》中，同样提到了“进一步改善农村环境卫生”的目标，但随着 H 村的农厕改造带来的农户私域的环境提升，属于村庄的公地环境却在这个过程中被恶化了。

H 村农厕改造目标即将污染的罪魁祸首从室内清除，室内端的投入占据绝大部分，因此对秽物产生后的后续处理并不好。H 村并没有采取部分乡村建立发酵池或者统一化粪池，为农户提供沼气供应或进行秽物净化，而仅仅是在农户屋外原有的秽物存储池的基础上进行拓宽、加深、加固、加密等工作（村干部 1：“上头也没让我们搞沼气，就要我们搞厕所，资金也就主要用在厕所这一块），完善存储池的内壁，使得秽物难以渗透，传统露天的存储池也被加上顶盖，利用密闭井盖进行封闭。这样的处理虽然节约了农厕改造成本，但是这样简单粗暴的处理为公共环境的造成威胁。

根据村民与村干部描述，农户根据自家厕所使用情况，定期向村中相关负责人提交清污申请，每次缴纳 5-15 元清污费用，由村里进行机械抽污清污作业，但是村里并未制造统一的化粪池供存放处理清理出来的秽物，为了节省作业成本与时间，许多时候抽污管道会直接通向远离人家、农田的土地，直接进行露天排放（农户 4：“排放哪里有啥规矩，就往没人没田的空地乱排，那边上平时是没人去，现在就更没人去了，臭气熏天”）。秽物从农户家中的私人存储池直接来到了公地，对排放地周边造成环境影响（农户 6：“我家承包的地比较多，有时候那些污水，也不管是谁家地，看那里没种东西，也没有人家，就直接排，搞得很不卫生，我还要来搞那些东西。找过村里，村里问排污的，他们也不是本村人，也不晓得哪里是谁家地”），有时随着雨水，这些秽物残留会顺着雨水流到村中一条供灌溉、洗涤衣物的溪流，造成严重水质污染（农户 5：“原来大沟还可以洗衣服洗脚，现在有些人家排污的地

方，离沟近，一下雨，就顺着流下来，今年清明边上，有一次大沟都搞成臭水沟了，臭了好几天”）。

在存储池建设过程中，为了减少池内气体压力等不安全因素的威胁，通常会建造排气口，排气口管道往往远离农户房屋，如遭遇大雨，存储池内秽物过多便会从排气口灌出（农户 3：“去年热天下大雨，那些脏水尽灌出来了，也是离家里远，还是隔壁跟我家讲的，不然我还要找村里人问”），而背向农户家的排气口将秽物流向了邻居、公地等场所。

而之所以在农厕改造过程中出现污染从私域转移到公地，与 H 村农厕改造过程中将秽物仅仅视为一个与农户相对立的毫无生机的客体，片面认识到农户家中秽物存在的弊端，没有清楚去审视秽物与农户、农村之间存在的关系，从而以清理对立物的方式去处理，故而引起了这种污染转移的问题。

## （二）“节水”意识与污染之忧

除了私域转移向公地污染外，H 村“秽物”被客体化对待的农厕改造立场也造成了忽视部分农户生产与生活传统习惯与需求。

H 村地处秦岭淮河以南的皖西南地区，气候为温带季风气候，Q 市内河流众多。H 村不仅有一座水库，还有数条溪流与池塘，自然水资源较为丰富。自十三五时期，Q 市开始大力提高农村地区的自来水普及率，大部分农户逐渐将家中水龙头接上附近自来水厂。而在使用自来水厂供水前，H 村大多数家庭通过挖凿水井来满足日常用水，除旱季抽水时所用电费与机器油耗，几乎没有其他用水费用。

由于 H 村是传统农业村，村中除个别种田大户外，缺少非农产业，经济较为落后，大量青壮年选择外出工作或经商，留守家中的老年人大多勤俭，部分人在即使已通自来水的情况下，依旧愿意继续使用家中水井中的水，认为水费是一个负担（农户 3：“水井水吃几十年了，也没啥事，现在要交水费用自来水，自来水还没有我家水井里水好喝嘞”）。随着近些年来水井水位下降、老井逐渐失修、使用群体逐渐衰老等因素，H 村的自来水使用率才有所上升（农户 2：“要不是老了弯不下腰，我情愿去打水井水，哪还有喝水还要给钱的”）。虽然 Q 市农村试行二部制水价收费，每个月水费不过数元至十元，留守 H 村的老一辈，由于使用数十年免费的井水，对于政府收费用水的行为感到不满，但无奈难以去改变这一既定事实，只得从日常用水节约上来降低水费使用（农户 5：“我洗个衣服还要去大沟里，热天傍晚全是蚊子，咬死个人，热天天天洗衣服，家里自来水不要钱啊？”）。

而 H 村在进行农厕改造时，出于干净卫生的目标要求，将较为费水的抽水马桶等卫生设备直接安装到农户家中，而村集体对于农户的补贴仅有马桶设备、秽物存储池改造两部分，并不在水费上进行任何补贴（村干部 1：“帮你修马桶，上厕所冲水还要政府给钱？这哪里的道理？反正我们这没有”）。H 村的传统旱厕，其蹲口斜坡式设计使得排泄物可以依靠重力自然滑落到存储坑中，但是抽水马桶却需要通过水箱的冲水才能将排泄物处理，对于农户来说，冲水过程所使用的水量让其感到“心疼”、“舍不得”，认为每上一次厕所就要冲水一次浪费家里水，进行引发对于水费的担忧。这种“节水”意识使得部分年长农户在家中上厕所时，选择“小便不冲水、大便统一冲”的冲水方式，甚至有些农户利用网上学来的，利用三餐的洗米水或洗菜水，每天分时间段冲水（农户 4：“上个小便就要冲那么多水，我是想不通，反正也没人天天往厕所跑，不如索性几次一起冲”），这种多次积攒冲水或者利用厨余用

水的方式，虽然一定程度上实现了节水的目的，但是却让排泄物长时间处于室内，不仅产生异味，同时招引蚊虫，使得原本农厕改造所需要完成的居住环境改善目标一定程度上落空（农户 3：“小孩回家就每次都要冲水，小孩说臭死了，还招小虫子。一年回来就那几次，为小孙子用水也无所谓，我们这些老头子都习惯了，这总比之前干净点吧”）。

这种节水意识与环境卫生相冲突的悖论之所以在 H 村出现，与 H 村农厕改造的方式有着巨大联系，政府与集体补贴仅仅被用来创造隔绝秽物的条件（村干部 2：“给他们买马桶，修粪坑，都是我们村里掏钱搞的，还要我们搞些啥？这也不是大锅饭时期了”），但是却忽视了在传统生活习惯下，农户是否愿意利用这些条件。秽物处理与水之间的纠结只是 H 村村民在农厕改造利益权衡下一种直观体现，而相关组织对于这种多主体之间的关系的忽视，则是导致政策难以起到足够效果的原因。

### （三）“卫生”意识与邻里之争

H 村在进行农厕改造的过程中，为了增加村民参与积极性，尤其是农厕改造的最初阶段，村民对于使用卫生厕所的积极性并不高。故而，H 村便通过写黑板报、拉横幅、进家宣讲等方式，宣传秽物堆积可能导致的如气味、蚊虫、传染病、卫生健康等方面不利影响（村干部 2：“当时不是逼得紧嘛，村里人脑瓜子当时转不开，然后我们就宣传这种厕所怎么怎么好，然后不卫生也不健康，我们都是网上找点资料，然后就那老几套法子，进家啊，挂横幅啊，现在村委会搬了，原来老村委会那里，专门有大黑板，还写过几期黑板报”）。但是此时的宣讲，并没有对村民改用卫生厕所起到过多的作用（村干部 2：“那时候要改的基本都不用我们说就改了，但是不改的，我们那宣传也没啥大用其实”）、（农户 4：“我们厕所当时用的好得很，还养着猪，搞那个，不方便”）。

当时的卫生宣传虽然没有起到促进卫生厕所改造的作用，但是在部分村民心中留下了卫生意识的种子，在多年后的近乎全覆盖的农厕改造过程中，这种“卫生”意识却意想不到地带来了更多的矛盾。

在最初改造时，大部分村民依旧对秽物利用有一定需求，并且由于改造推广不强，很多村民见左邻右舍没有改厕的动作，其也对厕所改造态度较为暧昧。但是随着大规模改厕运动的推广，已经没有太多秽物利用需求的 H 村村民，在左邻右舍的影响下，也开始跟上了厕所改造（农户 7：“隔壁娃三叔家先改的，后来讲确实干净，又说政府给钱，还管清理，当时哪晓得还要我们掏钱，刚开始都讲免费的，都开始搞，然后我家就申请了，很快就装上了”）、（农户 8：“都是看着边上人家搞了才搞，前面那谁家，是 12 年吧就装了新厕所，后来政府又给了一大笔钱吧，又开始搞，那我家就搞一个”）。在那场近乎全覆盖的厕所改造运动中，邻里之间的攀比对于厕所改造进程产生了意想不到的影响，仿佛错过了这个改造时机，谁与邻居比起来，家中就更脏乱差，或者就如错过了一次巨大实惠而吃了亏的挫败感。

但是随着 H 村村民纷纷开始申请农厕改造时，由卫生意识引发的邻里之争出现了。由于农厕改造一改原本传统开放式存储坑，转为仅留气口的密闭存储坑，农户在家中干净的同时，便担忧起其他人的污水对于自己的影响。这种担忧即对于“臭水流到我家田”、“臭水流到我家屋”的恐慌（农户 5：

“我自己看见过，就那个污水，一下大雨，往外冒，可脏了，我家本来地就矮一截，他那个气孔还对着我家后院，把我家当下水池啊”。这种工程上的问题，其实并不难解决，但是由于卫生意识的影响，原本和睦甚至存在亲属关系的邻里之间，开始疑神疑鬼，甚至连正常排雨水的下水管因露出地面，也会有被邻居拿来质问的可能（农户 8：“就是故意的，那个气口朝哪里开不好，就对着我家开，还那么近。自己家搞干净了，就把细菌往我家撵啊？”）、（农户 3：“都快修到我家墙根上了，清理的时候，那个管子就从我家后面过去，这影响我家啊”）。

村民邻里之间因此而起的矛盾并不罕见，甚至不乏闹到了村委会的（村干部 3：“讲起来都是同宗同姓的人，往上数三代都是亲弟兄，就你管子走你家屋后过，就不卫生了？去年下半年，就这点破事吵，有四五家吧。我们去劝，就说我们村里说这东西不卫生，招病，现在又不管这些事”），面对村民邻里之间因农厕改造所起的矛盾，村干部并无心去多管，本应做调解人的他们，选择了让邻里之间自行协商解决，而这种解决的方式，除了友好协商，更多是争吵甚至闹掰关系（村干部 2：“现在就修之前，还要他们左邻右舍商量好，地方定在哪，有管道的话就怎么走，气孔往哪里开，排污怎么走。让他们先吵去吧，别到时候修好了又来找我吵”）。

由于过于片面强调秽物的弊端，让 H 村村民不再使用秽物时，脑海中便只剩下不卫生、不健康的看法。他们效仿邻里争相进行改厕的行动，除了不甘落于人后，在某种程度上，也是一种对于邻居可能对自家产生卫生影响的一种回应。并非指卫生意识不好，而是这种建立在对秽物弊端的片面理解基础上的卫生意识，其所产生的“邻避效应”，从而带来邻里之间的冲突，是完全不必要，完全可以避免的。

#### 四、赋秽物以生机：农厕改造出路何处

##### （一）物质性视角下的秽物再理解

在如今 H 村的农厕改造的视角下，秽物被视为急需清理出门户的无用之物。农户家庭内部的秽物存在，成为环境脏乱的一个体现，成为农户日常生活的负担与村集体的消除对象。可是在曾经，农村秽物的地位却不只于此。

在中国农村地区，尤其是以小农耕种为主要农业生产方式的地方，人、畜粪便为主的秽物曾是重要的农业生产资本。在还没有厕所这一场所出现的远古时期，在野外方便的古人发现方便之处的植被更加茂密的现象，于是便在长期农业生产实践中逐渐形成了收集人、畜排泄物作为农作物种植的肥料的习惯。我国作为一个传统的农业大国，农民使用粪便为主的有机肥进行农业生产已经有数千年历史，人畜粪便中存在的蛋白质氮素、磷元素、钾元素以及其他的微量元素对小农生产起到了保持土地肥力的作用（申向东、赵曦阳等，2016）。作为农业生产的必需品，以粪便为主的有机肥在很长一段历史中在农村是占有重要地位的，秽物不是作为每户的废弃物，而是被视为私人财产被收集起来，以至于流传出“肥水不流外人田”的说法（农户 2：“家家户户都种地，我们觉得农家肥还是比化肥好点，自己家肥料那么多，没必要全部花钱买化肥”）。

正是因为传统农业使用农家肥的需要，储存量大的开放式的传统农厕成了 H 村村民的首选。但是

这种农业生产模式有一个必需的要素，那就是人。在 20 世纪九十年代，H 村的青壮年村民便开始了外出务工的生活。在最开始的时候，由于外出务工的人并不占多数，家中仍然有主要的农业劳动力，于是农家肥依旧在发挥着作用。随着进入 21 世纪，外出打工所带来的经济收入，相较于农业生产具有极大的吸引力，越来越多的 H 村村民离家前往外地务工（村干部 1：“零几年的时候，外面打工的，县里面做生意的人格外多，家家户户小一辈都在外面，家里头全都是老，平常村里哪看得到年轻人啊，也没人种田，待家的小伙子基本都是游手好闲的”）。

原本应该是农业继承者的青壮年的不断流失，H 村的农业生产面临断层危机。为了保证土地利用率，H 村在 2010 年前后开始了土地流转工作，村里出现的种田大户开始承包无人耕种的土地，那些家中留守老人年事过高的家庭大多将土地流转出去，仅保留部分房前屋后的园地，或者被子女接到城中生活。而对于这些土地流转的家庭来说，粪便等秽物因为土地的丧失，已经失去了其作为有机肥的功能，因此地位快速降低，逐渐从“家中宝”变成“家中废”。在此背景下，H 村第一次农厕改造展开，但是效果却并不明显。据村干部介绍，这一次农厕改造由于自来水线路还未完全铺开，抽水马桶仅仅是部分家庭有所安装，大部分改装的家庭仅仅是对秽物存储池进行了加封。与此同时，其他家庭却依旧反对农厕改造，任凭村干部如何做工作，却鲜有成效（村干部 2：“我算是村里老干部了，那时候改厕，就十几二十家改的，其他家根本不改，好说歹说也不照，给钱补贴也不干。任务刚下来时候上面追得紧，但是后来也没啥人管这个事，就不了了之”）。

在近十年后，即 2020 年前后，随着 H 村的从事种地人群不断老去，传统农业断层现象的后果愈发凸显，再加之猪、牛等大型农畜逐渐无人看养，家中厕所也无需为畜栏预留空位。农业肥除了少量需要浇灌小面积菜园外，几乎失去了农业生产用途，越来越多的土地也被流转。在访谈的 20 余农户家中，一户四五口的农户仅保有不足一亩自耕地的情况十分普遍，而进行规模化、农业化生产的种粮大户几乎不会采用农家肥，而是利用机器进行统一化肥施肥（农户 6：“农家肥肥力哪有化肥高？在讲了，我那上百亩地，都用农家肥，那得要多少？一家两家自己搞农家肥施肥还行，我这么大地方，肯定是机器上肥划算啊”）。随着农业功能的丧失，H 村的秽物彻底成为必须解决的危害人居环境的产物。

由此可见，秽物并不是一种永恒不变的物体，虽然其物质形态层面并不会随着时代发生什么变化，其并非一种死物，而是会随着时代的变迁转变其功能，转变自身地位。从历史变迁的角度重新审视今日的农村秽物，不难发现如今“被排挤”不过是特定历史变迁过程中的一个阶段，若将这种历史阶段性变迁视为秽物毫无生机，这将使人们在对待秽物时进入故步自封的茧房，这种背景下产生的一味从家庭中驱逐秽物的农厕改造行动，也就为各种问题出现埋下伏笔。

## （二）秽物的行动者网络

在物质性视角下，秽物并非是与人类简单对立的客体，而是具有时空属性的存在。在漫长的实践历史中，秽物将农业生产、农民、村集体、政府、农业环境等跨越自然与社会的因素串联起来，共同编织了多重社会事实。面对这个多重社会事实，可以将多元行动者组合起来的 ANT 分析框架，可以通过网络语言呈现不同参与者之间的关系，可以更为直观地展示赋予秽物以生机的可能性。通过借用阿帕

杜莱的“物的社会生命”概念构建起相应分析框架，展示 H 村秽物产生与使用之间的行动者关系网络，从而追溯秽物的社会生命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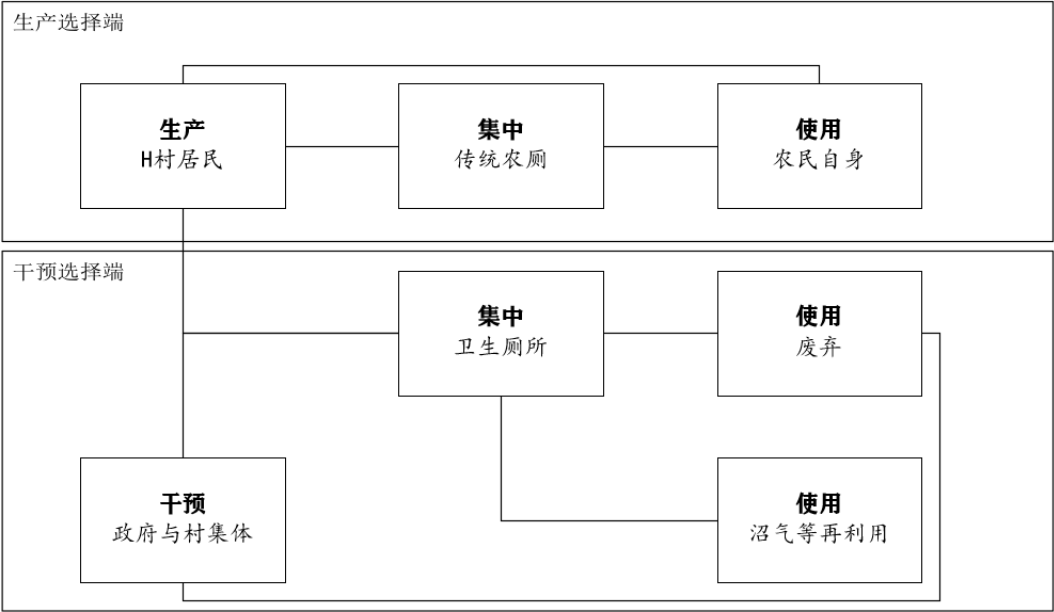


图 1：H 村秽物的社会生命

正如图 1 所示，H 村居民作为秽物的主要生产者，在农业生产为主要收入来源时，根据自身生产生活需求，会主动选择传统农厕作为秽物“集中”的过程，并在最后的使用过程中将秽物投入农业生产，在得到秽物带来农家肥便利的同时，自身的人居环境也要承受相应的秽物附加侵扰，而这便是生产者自主选择的结果。而当农业生产逐渐从 H 村家庭中脱离的时候，作为秽物主要生产者的 H 村村民，在秽物处理结果面前，便选择让渡选择处置秽物的权力，交由政府与村集体的干预端来进行处理，而卫生厕所这一“集中”过程，便是干预端选择的结果。

在集中结束后，理应还有第二次选择。即击中后如何“使用”。在生产选择端，H 村农户选择将秽物当作肥料进行农业生产，实现了秽物的再利用，秽物助力庄稼生长反过来满足了农户的经济需求，实现了秽物社会生命的完整闭环。但是在干预选择端的第二次选择过程中，H 村并没能认识到秽物所能拥有的价值，简单选择直接废弃的方式，虽让农户人居环境改善，却也造成了较为严重的公地污染，这种干预选择让原本有能力继续发挥社会生命作用的秽物成了百害而无一利的死物，其所形成的社会生命闭环并不完美。而这种不完美的社会生命闭环，则需要进入到相应的行动者网络中寻找答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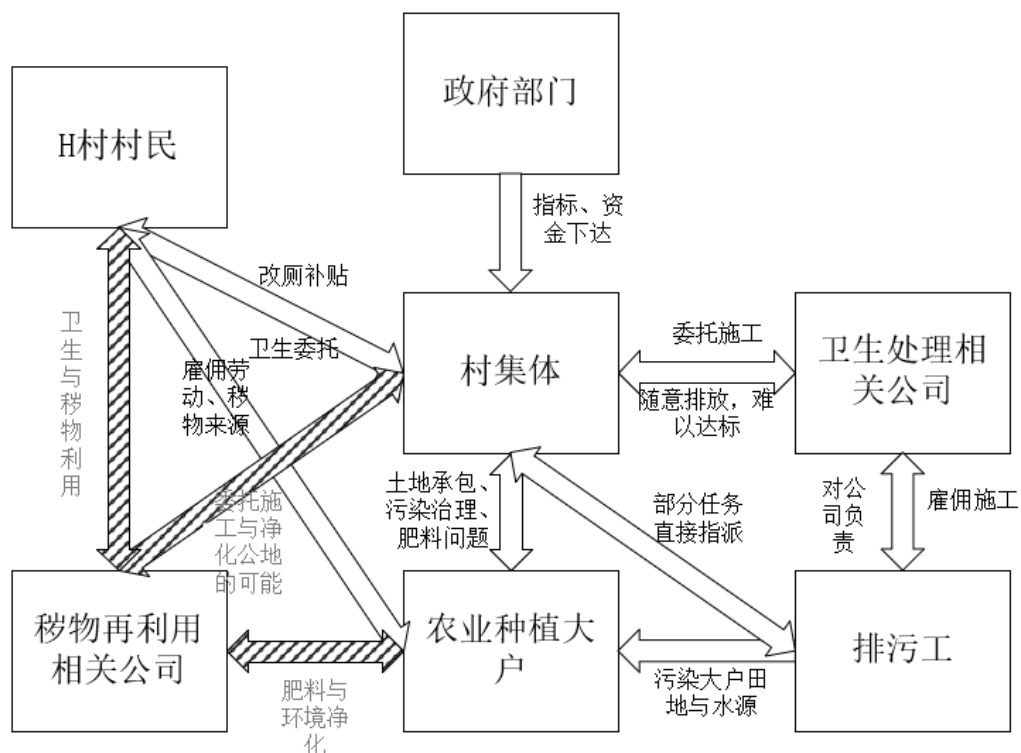


图 2：H 村秽物的行动者网络

如图 2 所示，政府部门通过下达指标、给予专项资金，要求村集体根据相关规定对 H 村进行农厕改造。村集体的改造首先对 H 村村民产生直接影响，并选择卫生处理的相关公司，由这些单位提供厕所改造方案与排污、清污工，排污工接受卫生处理相关公司的雇佣，并对其负责，但是同时下派到村中时，会根据村集体的清污需求进行工作，但是在村集体有限预算与要求情况下，其仅能简单进行秽物排放，从而导致大量污染，不仅对农业大户产生影响，同时对村集体环境造成破坏。

而黑色线条，则为干预选择端可以选择，但是没有选择的行动路径。将 H 村秽物置于一个现实的行动者网络之中进行审视，很容易发现如今 H 村秽物改造存在问题的根源就是“政府——村集体——相关卫生处理公司——改造后排放”的简单粗暴行动路径，而之所以选择这种行动路径，看起来是村民与村集体，在面对秽物处理等诸多问题时的利益权衡选择，仿佛秽物本身只是一个任人摆布的木偶，而如何完成上级任务、将秽物清除出私人场所，也就顺理成章成为了村集体与村民等主体首要任务。从而，正是这种将秽物视为“死物”的态度，让人们忽视，或者是没有意识到秽物能够对人所能产生的建构作用。而对这种秽物建构作用的忽视，也就让农厕改造在开始的时候，就为后来的诸多矛盾，埋下问题的伏笔。将 H 村秽物置于一个现实的行动者网络之中进行审视，很容易发现如今 H 村秽物改造存在问题的根源就是“政府——村集体——相关卫生处理公司——改造后排放”这样简单粗暴的行动路径，而解决这一问题根源就显而易见要在另一条路径上进行努力。

### （三）秽物利用与农厕改造



粪便为主的秽物再利用已经不是新鲜的话题，如沼气等技术的应用已经在很多地方的农村成功实践，如四川省井研县就利用“沼改厕”工程，在 2020 年实现了农村卫生厕所普及率达到 95%，这种沼改厕所提供的用电、薪柴、化肥节费达 850 元，并且预估全县农户沼气池可起到减碳 3.08 万 t-4.3 万 t 的作用，完全有望起到提升人居环境、降低卫生健康风险、降低生活成本、净化公共环境的作用（周琨、冉毅等，2021）。

H 村的农厕改造过程中，虽然“政府——村集体——相关卫生处理公司——改造后排放”的行动路径十分便于实施，且极大降低了政府与村集体的财政负担，对于农户的家庭环境起到了提升作用。但是这种行动路径，并没有实现秽物利用的同时，还带了因生活成本上升带来的农民“弃用”与公地的卫生环境污染。而选择“政府——村集体——秽物再利用相关公司——秽物再利用”的行动路径，虽然投资相对较高，后续需要建立完善且相对复杂的管理机制，在操作上有一定的难度，但是这种行动路径可以将原本被视为死物的秽物再一次利用起来，延长其社会生命的同时，通过再利用带来的生活成本降低，避免农民因担心生活成本而导致的“节水之忧”，同时村集体在公地环境污染得到缓解的同时，也可以通过秽物再利用的受益分红，缓解管理成本带来的经济负担。同样，H 村也可以通过按村民小组或生产队为单位建立联户式沼气池等秽物处理设备，集中利用秽物进行再生产，为种田大户提供沼肥等，在村民、村集体以沼肥受益同时，集体环境也得到改善，种田大户农田环境也免遭威胁，还能利用上相对便宜的沼肥，实现秽物在干预选择端完整社会生命闭环形成。

## 五、结语

厕所中的污秽之物，在很多人看来都是避之不及的，但其却是一个十分重要的社会事物。在物质性视角之下，农厕改造过程中的秽物并非只是作为一种非人的客体，其并非站在人这一主体的对立面而存在。其作为一种社会之物，与农民的现实需求、农村的现实变迁、农业的现实发展产生着密切的联系，如何在农厕改造中处理好秽物与其行动者网络之间的关系，是农厕改造过程中十分重要的一环。

本研究在物质性视角下，引入 ANT 分析框架，将 H 村农厕改造过程中的秽物赋予了“生机”，将其置于社会分析的中心，勾勒出 H 村秽物的功能与地位的历史变迁，提出“生产选择”与“干预选择”两种不同时期的秽物处理道路，在此框架中以秽物的社会生命为线索，勾画出“生产——集中——使用”的秽物生命过程。在此基础上塑造出了秽物的行动者网络，沿着 H 村农厕改造的行动脉络，挖掘出了造成 H 村农厕改造过程中出现的那些问题，如私域向公地的污染转移、农民节水之忧所产生的根源。从农户、当地政府、村集体、种粮大户、等相关公司等多方行动者的共同呈现，展现出了如今 H 村面临农厕改造中的问题时，所可以采取的有效解决方案。

以 H 村的农厕改造为个例，可以清楚认识到如今全国性“厕所革命”的浪潮下，部分村落仍然没能把握好农厕改造的利益权衡，仅仅一味以个人为社会分析的中心，必然导致看待问题与处理问题的片面性。从 H 村的经验教训中可以看出，在农厕改造的过程中，政府、村集体、农户等主体，应该在分析时赋予这些非人之物一次平等对话的机会，首先应需要回答三个问题：第一，秽物是什么。究竟是主体绝对对立的客体、死物，还是有着自己社会生命的活物？第二，处理秽物的目的是什么。究

竟是为了促进农户个人家庭人居环境,改善个人卫生健康环境,还是为了促进农村和谐、美丽发展?第三,如何处理秽物。是选择简单排放处理,还是利用现有技术进行高效利用,这个问题相对简单,因为这并非一个技术问题,而是基于前两个问题答案的既定结果。

综上所述,重新认识我们认为毫无意义、恶心的秽物,是一个可以从另一个角度更好地理解社会、理解农村的机会,这不仅仅对于个别村落的农厕改造有着现实意义,也在引导着我们从人本中心的视角挣脱开来,站在物质性视角去审视社会,去重新挖掘人与物之间的关系,这对于不同维度上的实践与转型,都有着重要的意义。

### 参考文献:

- [1]辜胜阻, 2021,《二元城镇化战略及对策》,《人口研究》第5期。
- [2]胡海娟、樊福成、姚伟、付彦芬, 2019,《我国农村改厕情况及其影响因素分析》,《环境与健康杂志》第11期。
- [3]胡宜, 2011,《送医下乡:现代中国的疾病政治》,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 [4]刘宝林, 2019,《治理学视域下的乡村“厕所革命”》,《西北农林科技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第2期。
- [5]梁超、王素素、孙涛, 2022,《公共卫生与长期人力资本——基于中国农村“改水改厕”事件的研究》,《财经研究》第7期。
- [6]李养秀、张立, 2016,《韩国新村运动的政府援助及应用策略》,《国际城市规划》第6期。
- [7]马金彤、张华、韦艳、汪思顺, 2016,《浅谈农村改厕存在的问题》,《环境卫生学杂志》第6期。
- [8]农村卫生管理司, 2002,《中国农村初级卫生保健发展纲要(2001—2010年)》,4月9日。
- [9]申向东、赵曦阳、艾鹏慧、冀保毅, 2016,《传统农业施肥的不足及现代农业施肥的发展方向》,《河南农业科学》第12期。
- [10]王永生、刘彦随、龙花楼, 2019,《我国农村厕所改造的区域特征及路径探析》,《农业资源与环境学报》第5期。
- [11]新华社, 2022,《全国农村卫生厕所普及率超过70%》, [http://www.gov.cn/xinwen/2022-06/28/content\\_5698070.html](http://www.gov.cn/xinwen/2022-06/28/content_5698070.html)
- [12]徐学东, 2016,《厕所革命,让农民过上更精致的生活》,《中国农村科技》第7期。
- [13]张红培、李孜、赵秀竹、刘昉, 2018,《我国农村改厕的成效及问题研究》,《中国初级卫生保健》第6期。
- [14]周和宇、周婷婷, 2009,《我国农村安全饮用水地区差异及对策研究》,《中国农村卫生事业管理》第7期。
- [15]赵海燕、卢愿清、张春娟, 2007,《我国农村改厕存在主要问题及对策》,《中国公共卫生》第12期。
- [16]张劼颖, 2021,《垃圾作为活力之物——物质性视角下的废弃物研究》,《社会学研究》第2期。
- [17]周琨、冉毅、吴进、贺莉、孔垂雪、向政亦、高志飞、毛靖, 2021,《“沼改厕”推广模式的实现及其在四川省的应用》,《农业工程学报》第18期。
- [18]Epstein, Steven 2008, “Culture and Science / Technology: Rethinking Knowledge. Power, Materiality, and Nature.” The ANNALS of the American Academy of Political and Social Science 619.

☆ 作者简介：徐 强，河海大学社会学系 2021 级硕士研究生

☆ 责任编辑：魏楠楠

※ ※

### 我校举办第二届全国社会学院院长论坛

2022 年 12 月 10 日，由河海大学主办的第二届全国社会学院院长论坛顺利举办。此次论坛由河海大学主办，河海大学公共管理学院、河海大学公共管理学院社会学系、河海大学公共管理学院人口所、河海大学 MSW 教育中心、河海大学中国移民研究中心、河海大学环境与社会研究中心与河海大学亚洲研究中心共同承办，河海大学研究生院、河海大学社科处与河海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协办。本次论坛以社会学学科建设和人才培养为交流主题，来自厦门大学、复旦大学、清华大学等 32 所社会学博士点单位的院长、系主任和学科带头人参会进行了深入交流。本次论坛以线上+线下结合形式开展。

论坛开幕式由河海大学副校长张兵主持。河海大学党委书记、中国工程院院士唐洪武，教育部学位管理与研究生教育司司长洪大用，中国社会学学会会长、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研究所所长陈光金教授分别进行致辞，嘉宾致辞结束后，主持人张兵宣布第二届全国社会学院院长论坛主旨报告正式开始，欢迎各位教授带来精彩的学术报告。

本次论坛分为四个单元，分别由南京大学成伯清教授、河海大学王毅杰教授、陈阿江教授和沈洪成教授主持。第二届全国社会学院院长论坛取得了丰硕成果，会议议题丰富而多元，与会专家为社会学体系的科学建设和社会学专业本科生、研究生的高质量培养提供了诸多经验和前瞻性的建议。

# 残障的再生产：身体区隔与自闭症家庭 污名信息管理

潘恩慧

---

**摘要：**自闭症是一种生理障碍，也是一种社会经验，形塑家庭的疾病叙事和生活轨迹。通过对自闭症儿童家长的深度访谈发现，确诊自闭症使家庭生活出现裂缝，对疾病原因的追溯是家庭自我污名的开始。在求学和就诊过程中，自闭症家庭所遭遇的来自社会各方显性与隐性的排斥导致其对主流社会包容度的信心降低；为了成为主流，他们采取的策略包括：冒充普通家庭、掩饰自闭症信息与否定自闭症身份。自闭症家庭在对抗疾病及与之相关污名信息的过程中受“正常-异常”的二元逻辑的影响和主流社会的排斥，将自身重塑为了与主流相区隔的、污名意义的承载对象。

**关键词：**残障 自闭症家庭 身体区隔 污名 身份管理

---

## 一、引言

### （一）问题的提出

美国临床医学家 Leo Kanner 于 1940 年代提出 "Autism"，国内译作自闭症或孤独症，其特征包括：对社交活动不感兴趣、缺乏共情能力与行为模式刻板。这一病症如今已被纳入自闭症谱系障碍（autism spectrum disorders, ASD，本文简称为“自闭症”），是一组具有神经基础的广泛性发展障碍，其亚类还包括阿斯伯格综合征、雷特综合征等<sup>[4]</sup>。随着这一疾病概念扩展至世界各地，确诊自闭症患者数呈上升趋势，加拿大学者 Mayada Elsabbagh 的团队综合 32 个国家的数据，计算出自闭症发生率的中位数为 1%<sup>[7]</sup>。五彩鹿研究院院长孙梦麟指出，按 1% 的发生率进行换算，我国 14 亿人口中，可能有超过 1000 万自闭症人群与 200 多万自闭症儿童。

自闭症的病理特殊性与庞大患者数引起了官方的持续关注，中国残联于 2007 年将自闭症归类为精神残疾并呼吁公众的关爱和理解，但自闭症患者常被污名化。欧文·戈夫曼将污名描述为“令人丢脸的特征”<sup>[2]</sup>，这些特征往往源于身体、性格或族群上不受欢迎或令人不愉快的属性，由于在社会交往中被识别、区分而使得当事人成为有污点的、丧失了部分价值的人，从而导致其社会关系中的地位、身份受到相应的损伤<sup>[6]</sup>。

残疾污名的形成经历了长期、循环的历史建构<sup>[3]</sup>，而自闭症病源无法确定、外表上不易辨别、各种症状均可能改善但几乎无法康复的特质使其在残疾谱系中占据特殊位置，也影响着自闭症家庭从发现孩子症状到确诊再至康复治疗这一漫长过程中的亲职实作与意义。现实生活中，自闭症儿童的家长作

为孩子具备血脉联系、最亲近的伴随者，面对的除了孩子巨额的康复干预费用，还有普通学校教育的排斥压力、社会交往过程中蒙受的冷眼与歧视等。这些不仅将其与“普通人”相区隔，也严重降低了其对主流社会包容度的信心；不仅让他们承受了巨大的道德压力，也让他们在社交活动中主动退避。

自闭症家庭因养出一个自闭症孩子而被社会排斥、贬抑的例子屡见不鲜，一个自闭症儿童是家庭的经济黑洞，更是家庭成员社会关系的休止符，他们的最大期盼是让孩子成为一个普通的正常人。作为正常人的我们关注的通常是如何应对自闭症的异常行为、如何教导他们直至融入主流生活，因此，自闭症及其家庭的“异类”形象往往受社会结构与公共话语体系所建构，但家庭同时需要对生活经验进行意义解释，二者相互交叠，构成了具丰富内涵的社会意义网络，那么自闭症家庭的生存境况应如何理解？本文把污名作为一种理解社会关系的视角，尝试讲述自闭症家庭如何与残疾污名共存，又如何在主流社会寻见自己的位置。

## （二）研究方法

A 市 Q 自闭症儿童康复中心创办于 2007 年并于 2014 年获得教育局颁发的特殊教育办学资质，经历十五年的发展，Q 机构目前成为 A 市口碑最好且办学规模最大的自闭症儿童康复机构，已经建立起专业的特教模式和家庭支援体系。Q 机构分为本部与新校区，新校区包括青少部与少儿部，本部与市残联合作，主要负责已申领残疾证的大龄自闭症患者的托育工作，新校区青少部与少儿部主要负责 6-12 岁与 2-6 岁自闭症的康复治疗<sup>1</sup>。由于市教育局与残联规定，本部与新校区青少部 7、8 月放暑假，因此本次田野调查在 Q 机构新校区少儿部进行，笔者有幸以研究者身份对机构内康复教育课程进行了参与式观察，并且对 11 位自闭症儿童家长进行了半结构式访谈。

本次调查的访谈资料具有两个特点。第一，在以往对自闭症家庭进行的研究中，受访者被认定为自闭症谱系障碍患者的家长，未对儿童症状严重性进一步区分，因此本研究希望能够涵盖不同症状自闭症儿童家长，在机构负责人的引荐下，笔者得以与融合班<sup>2</sup>中一些中轻度、单方面患语言障碍或社交障碍的儿童家长进行接触并访谈。同时亦结识了一些重度、全方位发展障碍儿童的家长并对其进行了访谈。

第二，笔者尝试分别访谈自闭症的父母以挖掘性别间的叙事差别，但由于多数自闭症家庭是母亲照顾孩子、父亲赚钱养家的模式，难以接触到大部分家庭父亲，因此本次调查的受访者可被定义为孩子的主要照顾者，其中包括两位男性与九位女性。

## 二、身份转变：“一切都不一样了”

### （一）确诊：情感连接缺失

家长常说自闭症是“退步型”的，一岁之前各方面发展都不错，之后开始慢慢退步，对几乎每位被访者来说，首先察觉到孩子的异样就是不会说话。普通孩子在几个月的时候就开始咿呀学语，一岁左右

<sup>1</sup> Q 机构于 2019 年末开始招收 2-6 岁自闭症谱系儿童，但受新冠肺炎疫情影响，2020 年 9 月才正式开始上课。

<sup>2</sup> 融合班：是特殊教育学校为那些能够在一定程度上适应集体生活的小朋友开设的，在教学模式与课程安排系统上均趋向普通幼儿园的班级，一个班级约 5-7 个孩子。

可以说出简单的音节，但自闭症儿童到一岁多甚至更晚的时间也无法说出一个清晰的音节，例如“爸爸”“妈妈”。这虽让多数家长感到沮丧，但多将孩子归类为发育迟缓，选择多观察留意一段时间。

真正令家长焦虑往往也是父母们下定决心带孩子去医院检查的原因是：与孩子情感连接的缺失。语言是一个方面，另一个重要的方面是，孩子似乎只活在自己的世界里，不仅面对父母积极的互动完全没有回应，甚至无法与孩子对视，孩子眼神像看没有生命的物体一样毫无波澜，更遑论从中感受到开心和亲近。没有反馈、没有喜悦、没有成就，并且随着孩子年龄的不断增长，和同龄孩子的差距愈来愈大，这击溃了父母心中那道脆弱的防线，让每个父母在哄孩子睡着后的深夜焦急上网查找资料，也在一次次沉重的家庭会议后决定就医。

寻找答案的过程对家长来说无疑是煎熬，诊断过程并非一帆风顺，有的家长跑遍了附近大城市最权威的儿童医院，在每处都得到“疑似自闭症”的诊断后才逐渐面对这一现实，也有的家长在得到孩子“发育迟缓”的诊断后吃药、打针无效才将孩子转院进而确诊的。虽然早已经知道孩子和普通孩子不一样，也在每个深夜上网查找资料时怀疑过孩子是不是自闭症，但是真正拿到确诊单的那一刻，才发现远未做好承受的心理准备。

“那个时候对于自闭症也不了解，去医院检查（发现）自己的孩子得了这个病呢，当时就感觉怎么回事？这个孩子怎么就这么倒霉，偏偏是这个情况？心里就非常郁闷，一个人的时候心情就非常低落，有的时候半夜躺在床上就是想哭。”（HX20220712）

## （二）溯源：孩子究竟何以至此？

事实上，自闭症是一种先天性的神经发育障碍，遗传因素占主导，广义上的环境因素也会影响自闭症儿童的发病率，如果后天的养育方式不当，可能会影响甚至加剧孩子的障碍程度，但家人的教养方式并不是造成自闭症的原因。<sup>1</sup>

目前医学界尚未发现导致自闭症的单一原因，且鉴于这一疾病的复杂性和特殊性，每个患者的症状和严重性都不相同，因此家长在临床询问为何孩子是自闭症时，得到的回应通常是“和遗传以及孩子的成长环境有关”。面对这一模糊的答案，家长不甚满意，这导致无论家庭内部或家长之间讨论到孩子病情问题时，都迫切把这一“病根”揪出来。虽然在各种自闭症的官方网站中，明确指出了家庭教养并非导致孩子自闭症的原因。但调查显示，多数访谈者仍认为父母双方应当为孩子的异常负责，并延伸出了两种主要叙事，一是将自闭症归咎于怀孕与生产期间的照顾不当，二是将疾病归于家长对孩子的后天教养失职。

### 1. 孕期、产期照顾不当

这一疾病叙事认为，在孩子出生前及生产过程中家长的疏忽和不慎是导致孩子自闭症的重要原因。笔者在调查中曾听过两位家长对于“生产中”的疾病归因存在矛盾的说法。

“她出生之后我辞职每天在家带她，不觉得我教的有什么问题。之后确诊了，到这边（Q 机构）来，

---

<sup>1</sup>来源：中国自闭症评估干预平台 <https://www.alsolife.com/column/art/1455111807754502146/>

我们很多家长都聊过，然后发现生产是个很重要的问题，像我孩子，我生她的时候是顺产嘛，然后不顺利转的剖腹产，那很可能当时顺产的时候就是出了一些问题，你知道现在医院有剖腹产的指标，不会让你那么简单就剖的，我在想如果当时我坚持或者找关系要剖腹产，是不是她就不会是自闭症。这边很多妈妈都是顺产出了问题。”（JY20220718）

“当时生他的时候因为顺产受罪啊，他妈妈就是剖腹产，但是你想啊，剖腹产就少了顺产过程中对大脑那样一个挤压的过程，就导致孩子大脑神经发育得不好，没有经过外部那种刺激，你的神经没办法做出反应，这都是经过科学认证的。我们现在做感觉统合训练其实就是在弥补这个事。”（JT20220714）

不仅生产过程受到家长们的关注，在孩子确诊后家长还会反思：是不是在怀孕期间不注重饮食健康、作息时间才导致孩子神经发育障碍。一位妈妈向笔者讲述过，自己在孩子确诊后的很长一段时间都因怀孕期间上班加班、经常熬夜而没有得到适当的休息而深深自责。虽然医生与特教老师都与家长说明过导致自闭症最重要的也是唯一可以确定的因素是遗传，但家长始终记挂着自闭症成因的不确定并在一次次回溯自己行为时受到疾病的责难。

## 2.后天教养失职

更多家庭把自闭症归结于父母后天的教养失职，这呼应了社会对于“理想的父母”的期待，正常的、懂事的孩子是父母教养有方，孩子竟然出现了自闭症一类的问题，他们免不了为这一成长状态负起责任。因为笔者访谈的家长多数称孩子的自闭症是“退步型”的，在周岁前察觉不到明显的异常，这让父母极易受到家庭其他成员或外人的谴责，既然孩子小时候发展是正常的，那么父母究竟犯了什么过错，给孩子造成了不可挽回的心理创伤，继而去承受自闭症这一苦果？

“我一直和家里说，医生讲这个病是遗传的，但是我和他爸爸都没什么问题，家里人也不信。他们就说肯定是小时候让他看电视看太多了，我们做生意比较忙，平时把他带去公司，我们公司地方比较老了，旁边都是些爷爷奶奶，没有小孩子陪他一起玩，就给他一个平板，让他自己看动画片。哎，我觉得也是吧，讲得不好听一点，说这个病是遗传的，就是让自己好受一点，我们在他小的时候也确实没有给他太多的关爱。”（YX20220713）

“其实这个孩子在一岁、一岁多的时候好得很，就有一个什么原因吧，有一次他发烧了，我们给他开了中药，黄连太苦了他不想喝，但是烧得很啊，我们就把黄连磨碎冲水硬灌他喝，他就直接把那个碗刷到地上碎了，洒的一地都是。当时他妈妈火就上来了就骂他，他就一直哭一直哭，后来那个药还是给他灌下去了。之后那几天就不理我们，我们想着小孩子生气过两天就好了，但是后来连续好长时间都是叫他没反应，一天说不了两句话，还特别喜欢在家里摔东西啊，拿着一个东西一直往桌子上敲，桌子都敲破一层皮。后来就去医院检查了，医生说是疑似自闭症。”（ZB20220722）

家庭和压力助长了父母的内在归因倾向，反省孩子出生以来的教养方式已是常态，更多家长会回溯从怀孕开始到孩子确诊的过程中出了什么差池，使得孩子从“正常”沦落为自闭症儿童。西方曾有“冰箱妈妈”理论，指责冷漠的母亲将孩子冰冻成自闭症患者<sup>[5]</sup>，这一说法虽已被摒弃多年，但由于对自闭症的陌生、对完美父母的想象、对孩子出众的期盼，导致对父母的指摘在当今社会并不少见，

并进一步使多数父母引咎自惭形秽。

关于原因的讲述以及与之产生的愧疚情感，更关乎家长对疾病与自我、生活经验和社会关系的诠释。陷入自责，往往是其自我污名的开始，正如有位母亲同笔者说“越想越难受，怎么把孩子教成这样的，都没脸见人”，羞耻感与消极情绪给家庭带来的巨大的心理压力，让父母不敢面对他人、更不敢将自己的“失误”在他人面前撕开，展现出血淋淋的伤口。

### （三）断裂：从“我们”到“他们”

孩子确诊自闭症为家庭蒙上了一层新的生活意义，是家庭历程的关键节点，家长的身份也经历了重大变化。从发现孩子异常开始，家庭便开始产生与旧生活的裂缝，以前从育儿书中学到的教养方法不再适用、在其他家人面前照常夸赞孩子佯装无事、不得已走上四处求医的道路。由于对自闭症的科普并不普遍且多数人对它不乏刻板的想象，发现异常后家长通常宣称孩子“没有别的小孩发育的那么好”，但内心深处已设想了上百种可能性，而自己就像“悬着一颗心”，整夜都睡不好觉，也没有办法专心工作。确诊前孩子出现的症状，例如刻板行为、社交和语言障碍，也是家庭矛盾的导火线，尤其是隔代帮助抚养孩子的家庭，会出现奶奶与母亲相互批评教养方式，二者的差异导致孩子不知道怎么做才是正确的进而出现孩子干脆不与人沟通的行为。

一位妈妈在孩子确诊后便放弃了原本有希望蒸蒸日上的记者事业，带着孩子请教专家、周边哪个城市开展有关自闭症的讲座，她从不缺席，而但凡出门她就神经紧绷，死死牵住孩子，寸步不离。因为自己学习了很多特殊教育知识，在自己慢慢给孩子做干预的同时也在不断寻找能够信任的特殊教育机构。

“那段时间基本上是没心思想别的事情，也不想去想，因为不能让自己闲下来胡思乱想。甚至我看见那些机灵的孩子心里都很难受，到这边一段时间，跟别的家长聊了很久才好一点。”（MQ20220719）

孩子的主要照顾者难免面对身份转换的问题，他们逐渐抛弃了原本属于个人的身份特征，成为一种“类型”——“自闭症孩子的家长”，是不得不也只能接受的事情。同时，他们还面对着孩子的成长从已知的正统求学道路到未知的康复治疗道路、从既定到模糊的转变。

## 三、身体区隔：“我好像被困在这里了”

### （一）艰难求学

大部分家长在孩子确诊后四处奔波寻找诊疗方式，但是几乎没有人来到 Q 机构的路是一帆风顺的。这些家庭分别经历了正规学校的排斥和私人医院的欺骗，有的甚至吃了学校的闭门羹，又被骗钱后才跌跌撞撞来到特殊教育学校，同时由于对自闭症儿童需要长期且不可中断的干预，近年新冠肺炎疫情在国内各地反反复复，家庭抗风险能力差，导致孩子错过最佳干预期的家庭不在少数。

小雨妈妈因为孩子的症状较轻，仅存在一定程度的语言和社交障碍，且家庭生活较拮据，和一位幼儿园老师邻居打了招呼，希望老师能在幼儿园多关注小雨，奈何当老师把小雨妈妈引荐给校长说明情况时，遭到了校长的严厉反对：

“他直接就说‘我们这里不收这样的孩子’，态度还特别差。而且我不是关注了他们公众号吗，过两



天上面就出了招生海报，上面写着‘招收 3-6 岁的正常孩子’……正常海报有这么写的吗？再怎么说，我孩子也是人，我也是人。”（SY20220721）

也有家庭或隐瞒孩子的症状、或给校方交了巨额保护费顺利进入幼儿园的，然而后来都遭到了校方显性或隐性的驱逐。有老师以孩子无法遵循学校的规则以及“太孤僻”为理由建议家长把孩子带去医院检查并且送去特殊教育学校，称“我们教不好这样的孩子”，也有家庭给学校交了五万保护费请求校方给孩子多一点关注，但后来因为担心而查看监控发现老师带小朋友做游戏时，根本不管待在角落偷偷擦眼泪的孩子。

还有一部分家长选择先把孩子送进私人医院进行治疗，其中包括在医院被确诊为发育迟缓的，也有被确诊自闭症后上网搜索资料或找熟人打听出一些“偏方”能够快速有效治疗这一疾病而赶来私人医院的。笔者在调研的第一周便从老师口中听见“又从 xx 医院过来了一个孩子，家里花了好几万，那个妈妈哭的特别厉害，说自己害了孩子。”并在调研过程中遇见了一位主动提起曾经受骗经历的母亲：

“一开始在北京的一家医院做干预。他们本来是想给她又吃药又做针灸疗法又上课，我想着做针灸对小孩来讲不是太那个了嘛，就只开了药，配合上课一起。那个针灸，真的是往两三岁的小孩头上、手指上到处扎针，我都不忍心看，太痛了。吃了一段时间的药，我发现她好像进步不大，但是本来医院又和你说只是发育迟缓，在他们那做一段时间的治疗就好了，而且收费特别贵，一节课半个小时就好几百块钱，我们在那边治了三四个月吧，几乎是砸进去了三十多万。我现在是经历的多了、老油条了才跟你说，有的家长不会和你说，但是他们很多都在那种医院被骗过，少的 7、8 万，多的可能就像我一样，那个医院口碑特别好，现在想也可能是宣传做得好，而且他抓住了我们想让孩子赶紧康复的心理呀，哎。不过我们当时也没有判断力，因为一想到可能她以后一辈子就这样了，一辈子没有办法上学、工作，甚至是独立生活，就很抗拒。”（LY20220722）

私人医院劝家长留下的游说方式与互联网上展现的营销内容，均抓住了慌乱焦急的家长希望孩子早日康复的心理，家长们随即成为机构的敛财目标。这不仅源于家庭并未了解到目前科学证明自闭症是需要终身干预且无法完全愈合的疾病，更出于对“自闭症”深深的惧怕，不仅是害怕疾病本身，更是恐惧因病而生的、将其与正常社会区隔开的、一条无法填平的深深沟壑。

## （二）走出家门

对普通家庭来说，带孩子去公众场合是再平常不过的事情，但自闭症孩子会因症状不同而多多少少存在一些不在公众认知范围内的“偏常行为”，非但无法同其他人交流，还容易受外界刺激而产生应激反应、自伤行为，因此对自闭症家庭来说，能够迈出门，在外不发生任何家长控制范围外的事，再安全回到家中，是不可多得的福气。大多数家庭在外常遭受的，是他人的冷眼、排斥与嘲讽。

### 1. 公共空间的“闯入者”

公共空间在城市中占据重要地位，人们在公共空间互相产生连接并且共同生活，是一个“社会”的体现，形塑公共空间的并不仅是城市建筑，更与人的行动息息相关。公共性是公共空间的首要特征，因此有西方学者认为它应该是一个在意识形态上完全“中立的”（即不受任何政治意识形态支配的）、提供

开放而平等的社会交往的平台<sup>[1]</sup>。但这一理想通常难以实现，普通人为公共空间设置了一道隐形的壁垒，把自闭症家庭乃至更广泛的残障人士群体排斥在外，在调研中笔者经常听见爸爸妈妈们诉说自己的苦处：

“平时出去我都把他拉着，就那一次我没太注意，他一下子就冲出去然后撞到别人了，然后我就一直和人家道歉说我家孩子有自闭症，那人态度也不好就讲‘自闭症还会在外面瞎撞人啊，那带出来干嘛’，然后旁边人也都在那议论。我真生气又委屈。他们就是觉得你低他们一等，而且也不愿意理解我们。”（JT20220714）

“我有时候带她去公园，但是她有个习惯就是喜欢捡东西往湖里扔，有一次她自我刺激比较激动，直接抓着另外一个小孩的玩具就扔进去了，我看到了但是没来得及阻止，然后我就和那家长解释讲她有自闭症，我可以重新买一个玩具给她孩子或者给她赔钱，但是那家长好像怕我们一样，说自闭症就应该好好待在家里，出来害人害己什么的。然后就带着她孩子走了，我当时是真的就是觉得很无语，虽然她确实是扔了人家的东西，但是我已经把自己的姿态已经放得很低在和你道歉，你也没必要把我们当成什么怪物。”（LY20220722）

自闭症家庭在公共空间易就行为方面与他人产生冲突，且他们即使已经把绝大部分的精力都放在阻止孩子产生偏常行为上，但孩子的行为是无法预判的，难免出现偶尔的疏忽，这成为其进入公共空间的阻碍之一。且此种特质易成为他人手中握持的把柄，导致自闭症家庭与人交往时往往落入较低地位，并被质问为何要带这类孩子占用公共资源，沦为道德上的被审判者。

## 2.“面子”还是“里子”？

虽然容易在外遭受他人的排斥，但从科学的角度看，出门接触不一样的事物对自闭症儿童来说是一件有助于康复的事情，笔者访谈的每位家长均提到她们是非常希望能够把孩子带出门的，因为能够帮助孩子做“泛化训练”。泛化是教育训练自闭症儿童过程中非常重要的一个步骤，指需要训练孩子与不同的人、或使用不同的物、或在不同情况下，运用同一技能，也是打破孩子“刻板行为”的必要训练。这一训练过程并不平和，而是充满了孩子的不配合与哭闹。孩子在家中情绪爆发家长尚可应对，但在外面对着他人的围观与议论时，家长便开始在“面子”和“里子”间动摇。

“有一次我带小胡去超市，每次去都要买他喜欢吃的那个小龙人奶糖，这也是刻板行为，觉得每次去就一定要买。这次我就和他说，我们家里还有奶糖，下次没有了妈妈再带你来买好不好？他觉得必须要买，就开始又哭又闹的，而且他脾气跟我一样特别倔，哭到在地上打滚。但是不行啊，给他买了又强化了他的刻板，以后更难纠正过来，然后我俩就在那僵持。旁边人都在那看着，在那嘴碎说哎呀这个妈妈太心狠了，小孩要点糖都不给他买，那工作人员还来劝我，我就说不买，但是也不想和他们多解释，我只想我孩子好，其他人我都不管。而且他情绪上来了一个控制不住自己，一个听不进去我说话，我看着也心疼啊，但是只能等他心情平复一点一次又一次跟他解释，最后我们就没买，后来他这个一来就要买奶糖的刻板行为就没了。”（HX20220712）

几乎所有自闭症家庭在外都遇到过此类问题，也有妈妈回忆起刚成为“自闭症妈妈”时带孩子出门的

局促：

“她症状算比较严重的，而且年龄也比较大了，经常会自伤。刚确诊时候除了上课，我就关在家不敢出门，后来知道在外面也可以做些日常训练嘛，就慢慢开始带她出去，但那时候我也没经验比较紧张，也比较在乎别人的眼光吧，哎，她在外面要干嘛就让她干嘛，尽量顺着她稳住她，现在想想其实那是对她不好的。所以现在我在外面也比较能下的了手了，她要是开始激动我有时候还会把她压住，不管哭多大声都没用。在人家看来你这就是公然虐童，呵呵，但是明明她们什么都不知道，就爱怎么想怎么想吧。”（JY20220718）

帮助自闭症孩子稳定情绪与在日常情景中进行训练却容易受到他人的误解，是每个家庭都会遇到的棘手问题；在康复的荆棘地中艰难行走已经尽显疲态，不仅无法得到他人援手，还易受到责难。笔者访谈的自闭症家庭陷入此种境况后，通常采取“不理睬”的策略，只希望孩子尽早康复，但无一没有倾诉当时委屈又无能为力的心情，而这种境遇进一步导致其出门意愿降低，或是选择当有其他自闭症家庭同行时才走出家门，因为“至少身边有个理解你的人”。有少数家庭则选择顺着孩子，尽量不让孩子自闭症的身份暴露，也避免成为众人的关注焦点，但这类家庭明白，这种做法并不利于孩子的康复，甚至起到反作用。

有的自闭症家庭渴望孩子走进和认识家门外的世界，有的因望促进孩子康复不得不拖着沉重的步伐走出去，但是在外的种种遭遇使他们产生惧怕与排斥心理，最终选择返回自己的安全领域，即退回自闭症儿童康复机构或在出门时寻找同类家庭的陪伴。虽然公共空间在理论上应当为所有人享用，但事实是自闭症家庭在其中受到垄断公共空间的普通人的道德审问，即使他们感到不公。在康复机构与小胡妈妈做访谈时她告诉笔者：“我好像被困在这里了”，因为做出努力却无法得到他人的理解，因为公共空间容不下一个自闭症孩子的哭声。

#### **四、身份管理：“不想让他们知道”**

在康复机构中，家长们会就孩子的病情展开讨论、互相交流育儿经验，以此为纽带构建了一个讲真心话的圈子。但走出机构，家庭便会遇到很多麻烦，如果他人不知道孩子的情况，是否应该告诉他、又应该怎样告诉他、怎样解释？同时面临心理上的挣扎与受到的身份污名，自闭症家庭需要在和他人的微观互动中形成自己的身份管理路径，如何管理自己家庭的“污名”信息或令人丢脸特质的信息，与其身份问题紧密相连。

下文总结了笔者根据参与式观察与访谈归纳的三种身份管理路径，第一种是冒充，即在不知情者面前将孩子整饰为一个“普通孩子”并且“从容”地融入主流生活；第二种是掩饰，相比冒充程度较轻，采取这种策略的家长在外不提及或淡化而非招摇孩子的自闭症身份；第三种是逆行，即家庭认为孩子与普通孩子并无区别且严格与其他“自闭症”孩子划清界限，是对孩子自闭症身份的否定与“矫正”。

##### **（一）冒充**

所谓“冒充”，即自闭症家庭即使接受了孩子患有自闭症，但是选择在外赋予孩子“普通”的身份，为了避免如上述在外遇到的种种麻烦，也为了冒险尝试融入大部分人身处其中的、按照常规步伐行进的

普通人社会。

典型的冒充事件是掩盖孩子有自闭症的事实并把孩子送进幼儿园。家庭做出这一的决策往往是由于抱有“觉得他和那些正常孩子待在一起久了慢慢就好了”的侥幸心理或出于害怕孩子只要进入特殊教育学校就很难再步入寻常升学道路的挣扎心理。多数幼儿园只能保证普通集体幼儿教学模式，并没有针对特殊需求儿童的课程或活动安排；同时，自闭症儿童常因听不懂指令、无法理解规则而破坏教学秩序，幼儿教育与特殊教育专业的分离导致幼教缺乏应对特殊儿童行为的知识，因此幼儿园老师和家长均不希望也无法接受自闭症儿童。所以铤而走险的家长需要面临的问题是：如何确保孩子的自闭症不被其他家长与老师发现？

“因为他平时看起来和普通孩子差别不大，不像有的孩子一眼就看出来和别人不一样，而且家里做生意也没有很多时间，就还是把希希送去我们那一个比较好的幼儿园了。当时不敢跟老师说他有自闭症，我们就请校长还有几个老师吃饭，说他从小跟着我们做生意，没人和他玩，现在比较内向不爱说话，麻烦老师多带带他。”（YX20220713）

“现在比起刚开始来这边（机构）的时候好多了，经过测评是可以毕业了哈哈哈，也能和人简单打交道、交流，虽然跟其他孩子比起来肯定还是有点差距，但是上幼儿园目前是没什么大问题。我也没和那边（幼儿园）说我孩子有这个情况，有人问起来为什么小雨上学这么迟，我说他之前身体不好经常去医院就没有上幼儿园，现在康复了比较有活力了……我也经常会给他们班里收拾打扫卫生啊、节假日的时候帮老师组织活动啥的，平时帮班里做事，拿人手短吃人嘴软啊，虽然他有时候还是有一些问题行为，那些老师家长看在你平时的面子上也不会特别去说你。”（SY20220721）

孩子的行为是不受控制的，家长却可以采取一定的话语和行动策略扭转他人的印象，尤其是当家长需要为孩子的特殊行为做出解释时，往往应时应景地根据孩子的特点描绘出一个虚构的形象，如“内向”、“之前身体不好”，把“问题行为”合理化而非采用病理解释。

在与幼儿园的互动中进行身份管理的例子虽典型，但基本仅存在于症状较轻的家庭中，即唯有孩子一眼看上去与普通孩子区别并不大时，才有可能进入幼儿园。除此之外，几乎所有自闭症家庭都需要掌握的是日常生活中展现和披露家庭信息的要领——用言语塑造一个正常的孩子、寻常的家庭。

“现在我到这边来照顾希希，家里（生意）就只能雇个主管帮忙，以前我们都是一起做嘛，有的人看到就会问老板娘呢？希希呢？怎么不在这上学了？因为他爸爸做生意很看重关系、面子什么的，这个事情讲真的说出去就是不太好嘛，不想让他们知道，我们就说现在小孩竞争都好厉害的，把希希送到市里好一点的幼儿园上学去了。”（YX20220713）

“有次我在小区遇到楼里一对爷爷奶奶，他们比较热情，平时见到小胡也都会打招呼，他肯定就回应啊，我之前就和他们说我孩子不爱讲话而且比较怕生。那次碰到，他们问小胡怎么还没上学，我就和他们说‘哎呀他年龄还没到唉！’，他们当时虽然是没说什么吧，但是谁知道平时街坊邻居啊聊八卦的时候他们会怎么说呢。”（HX20220712）

在自闭症家庭为了淡化或隐藏自身不受欢迎的、一旦被他人察觉就会丢脸的身份而迎合主流时，

便产生了诸多“伪装”策略，他们需要编造情由以保护自己，进入一个由常人垄断的社会，正如戈夫曼所认为的，“常人不经思索的例行事物，在丢脸者那里能变成需要管理的事务。”<sup>[2]</sup>

## （二）掩饰

自古以来差异都是存在的，但如今尽管尊重差异、多元兼容是人们心照不宣之事，包括自闭症在内的残障弱势群体及其家庭对信息与身份管理的需求却经久不衰。如前所述，“冒充”是自闭症家庭面对排斥他们的不公平的现实不得已采取的一种行为方式，现实对这一行为的默认是同化的一种形式，若想在现实中有尊严地生存下去，家庭需要抑制自闭症的污名。

对身份的管理和对信息的展示也是一个谱系，不同家庭在各种社会情境下选择披露的信息性质与多少有差别，一个家庭也受其生活阶段、所处情境等因素的影响选择不同的信息策略。采取“冒充”策略的家庭在外用话语为孩子构建了虚拟身份，家长也以常人身份与他人交流和建立关系，这也是调研过程中笔者接触到的家长们最普遍使用的方法；也有部分家庭承认并接受自己与主流的区别，然而选择在外不隐藏、但也不强调和招摇其身份。

“和陌生人没什么好说的，但是我朋友都知道他的情况。因为这个病就是没法过得和正常人一样，所以别人问我的话不如就说实话，早点接受让自己好过……不过我不觉得这是什么应该去宣扬的事情，你看起来平时学校（机构）里面有什么事情她们都是找我出头，但是这和走出去向其他人说明自闭症是什么、自闭症也有人权是不一样的。”（MQ20220719）

“平时我不怎么带她出去，要出去也挑人少的时候，因为她不喜欢出门，所以跟外人交流不多。但是基本我身边人现在都知道她自闭症嘛，现在得这个病的孩子很多，有好多家长都在排队（进机构）。但是她们也只知道有自闭症这回事，不了解，我偶尔出去和她们吃饭聊到这个事都会避开……不是这个圈子的没法感同身受，网上那些关爱自闭症，还有好多说自闭症过得多惨的文章，当然还是正能量文章多，我都不怎么看。没必要抓着这个说，让别人觉得你很可怜。”（ZX20220715）

相比冒充，掩饰的形式更加复杂，社会对其的态度也更加多样。一位家长向笔者反应在康复治疗中最棘手的问题就是钱，即便可以为孩子申领残疾证领取政府补助，但家长更在意的是那张残疾证，即便日后孩子康复了可以注销残疾证，但这张纸如同一道审判，把孩子与主流社会隔绝。

若“冒充”区分的是对外是否承认家中存在自闭症儿童，那么“掩饰”区分的就是在外低调与高调的自闭症家庭，前者关系的问题是在外如何隐藏身份，后者则是“应当将自闭症作为一个公众议题带进日常生活中吗？”笔者所访谈的采取这一行动策略的家庭通常仅将自闭症作为私人困扰在小范围内讨论，他们接受苦难，却拒绝将其上升为社会议题，阻止了家长之间对自闭症症状与康复治疗以外主题的讨论，也无法让他们成为团结为一个组织抵抗主流霸权、捍卫自己的基本权益。“冒充”和“掩饰”是自闭症家庭逃避各种麻烦与歧视的方式，这个过程亦揭示了其身份困境与焦虑，普通人的日常事务终是他们梦寐以求而不得的，但冒充和掩饰总是不知不觉就在各种场合上演，这也是一种让人心力交瘁的重担。当多数家庭采取这两种行为策略伪装或淡化污名特质，社会的默许让他们合理合法地成为比寻常人低等的群体。对于这些家庭而言，自闭症常常是一种需要被管理的状态，而非一种生活。

### （三）矫正

“我孩子跟他们不一样，这里很多孩子一眼看上去你就能知道他有点问题，但是他不是自闭症，就是语言发展有点障碍，理解能力也没问题，上课的时候他也能听懂，我之后打算把他送到幼儿园了，他就是一个正常的只是要提升下自己语言能力的孩子。”（GB20220713）

在机构寻找家长访谈的过程中，一位妈妈向笔者明确表示自己孩子与其他自闭症孩子不一样，但孩子小博却是 Q 机构开办以来招收的第一批自闭症孩子，且机构的招生流程包括提供就诊材料与进行入学测评，如果小博并非自闭症，那么家长是如何了解到 Q 机构、成功入学且渡过了两年多的“康复训练”时光？通过少儿部负责老师的介绍，笔者得以访谈到两位前后教过小博的特殊教育老师，两位老师均表示小博的各项能力在两年不间断的训练中得到了肉眼可见的提升，但无论是日常的机构测评抑或行为表现，他仍属于“典型的自闭症孩子”。

“现在确实比我刚接手他的时候进步很大，上课也配合多了，刚来的时候一哭都是一天……他妈妈平时和我们沟通不太多，不过听她说过去幼儿园的打算，谁知道这是不是个好的打算？我举个例子吧，平时你也看到了，他会模仿别的小朋友的一些行为，而且不知道什么是好的坏的，就像他最近喜欢学 YDF 喊叫，跟他解释了他也不明白这个是不对的、不应该学的；有时候复杂的指令他也听不懂。之前给他抠发音，一个‘好’字教了好几个月，到现在每个音节都没有发得很清楚，这就是要去上幼儿园的小博。”（H 老师 20220719）

针对小博的情况，家长与老师的说法背道而驰。老师认为小博应当在机构内继续接受康复训练，直到掌握足够让他在幼儿园中生存的技能，且这一观点得到了机构内部评估结果的支持——根据机构用于测量自闭症儿童发展水平的 PEP-3 量表结果来看，小博的最新一次测评显示其多项发展能力仍属于轻微或中度自闭症程度。即使面对这样的量表结果，家长也拒绝承认孩子确实存在一定的自闭症症状，执意将孩子送进幼儿园，因为“我的孩子怎么样我自己心里清楚，要怎么样也是我自己的事。”

站在现代科学的立场上，小博显然应当积极接受干预，特教老师也表明在这一阶段送孩子进入幼儿园不仅是“硬融”，最差的后果甚至是使前两年的干预努力功亏一篑。机构内的自闭症家庭不乏有将孩子送入普通幼儿园后因各种原因退出最后仍然选择进入特殊教育学校的，对他们来说，普通的幼儿教育不仅不能作为帮助孩子康复的有效渠道，反而可能成为一种危险的矫正行为。

与“冒充”和“掩饰”不同，“矫正”是对身份某种程度的否定，危险之处在于它反映了社会对自闭症甚至于更广泛的残疾身份的恐惧与逃避，这是主流社会对自闭症家庭在内的弱势群体程度更深的一种同化。当家庭采取“矫正”策略的时候，他们选择的是在这个社会中成为一个“不奇怪”的家庭，这也是最为保险的生存之道。

## 五、结论

对家庭来说，自闭症不仅是一种生理现象，也是一种叙事来源和生活经验。在我国《残疾人保障法》中，残疾人被定义为“在心理、生理、人体结构上，某种组织、功能丧失或不正常，全部或者部分丧失以正常方式从事某种活动能力的人。”在非正常即异常的思维框架下运作的，是一种对“残障”的不

断再生产，主流、非污名者对自闭症家庭的不理解，甚至是贬低与排斥凸显出其“正常”的优势与正当性，由此筑成他们融入主流社会的障碍，从而生理与身体上均区别于常人。

自闭症家庭对于污名信息的管理亦划分了属于自己的社会空间。戈夫曼指出，蒙受污名者的空间世界能够根据他在管理社会和个人身份时被划分为禁地、全民之地和后院<sup>[2]</sup>。特教学校作为自闭症家庭的后院，他们在此处无需遮遮掩掩，反而可以共享污名信息与家庭教养方式；而在作为禁地——普通幼儿园的时候则需要隐藏自身身份，一旦暴露则面对被驱逐的风险；在全民之地即常人社会和公共空间中，这些家庭需要掌握不同的信息管理策略，以保证自己免遭排斥。

但我们不能仅下诊断不开处方，仅以一种身体或空间区隔的客观结果看待和思考自闭症家庭的弱势地位和窘迫处境，在揭示自闭症家庭如何与主流社会互动并学会信息管理、找到自我空间的基础上，还需要反省社会关于“残疾”或“异常”的定见。自闭症家庭与残障群体的遭遇不是个人问题，通过预防治疗去迎合主流的解决思路不仅无法增强社会的包容度，更容易导致其降低自尊。

每个人的身体与经历都是与众不同的，差异是必然的存在，残障或弱势群体与每个人息息相关，我们难免会在某一生活阶段或生活的某个方面成为小众、成为异类。每个人都会步入老龄，器官的衰败、认知的衰退、身体的衰老让我们终将成为“弱势群体”；主流的大势在某一时刻可能压制自己的一点浪花，让我们不得不采取措施被视为主流。自闭症家庭只是残障与弱势的一个切角，为他们提供合理的便利是需要整个社会一同解决的问题，解决之道涉及普通人之间的理性对话与“尊重差异的美感”的建立。

## 参考文献：

- [1]陈竹、叶珉,2009,《西方城市公共空间理论——探索全面的公共空间理念》，《城市规划》第6期。
- [2]戈夫曼,2009,《污名——受损身份管理札记》，宋立宏译,北京：商务印书馆。
- [3]关文军、孔祥渊、胡梦娟,2020,《残疾污名的研究进展与展望》，《残疾人研究》第1期。
- [4]片成男、山本登志哉,《儿童自闭症的历史、现状及其相关研究》，《心理发展与教育》第1期。
- [5]约翰·唐文、凯伦·祖克,2019,《不同的音调：自闭症的故事》，高天放、诸葛雯译,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
- [6]姚星亮、黄盈盈、潘绥铭,2014,《国外污名理论研究综述》，《国外社会科学》第3期。
- [7]Zeidan, J., Fombonne, E., Scolah, J., Ibrahim, A., Durkin, M. S., Saxena, S., Yusuf, A., Shih, A., & Elsabbagh, M. (2022). Global prevalence of autism: A systematic review update. *Autism Research: Official Journal of the International Society for Autism Research*, <https://doi.org/10.1002/aur.2696>。

☆ 作者简介：潘恩慧，河海大学社会学专业 2021 级硕士研究生

☆ 责任编辑：陈奕含

# 企业型单位社区居民认同变化研究

——以安徽省宿州市 Z 社区为例

高 雅

---

**摘 要：**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社会结构发生了巨大变化，企业型单位社区作为计划经济时期建立的特殊居住空间类型，其衰败是不可逆转的趋势，在此过程中，人们对单位社区的认同产生了一系列变化。而自新冠疫情出现后，社区逐渐成为了疫情防控工作下沉的重要承接主体，居民的认同也随之出现了新变化。本研究以宿州市埇桥区 Z 社区为例，分析在社会变迁和特殊事件的影响下，居民社区认同的变化及影响因素。研究发现：（1）企业社区居民认同路径从单位为纽带转向以地域为纽带；社会生活方面，社区功能完善提高了居民的认同感，但社会交往生疏化和物业管理不当使居民认同弱化；物理环境方面，居住空间环境优化维系了居民的积极式认同，但关键公共空间减少带来了消极式认同。（2）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带来了社区空间上的封闭及虚拟社区的形成，为居民提供了新的互动纽带，重塑了人们的社区认同。（3）居民对社区的认同会随着社会环境变迁与个体特征差异而发生变化。

**关键词：**企业社区 单位社区 社区认同

---

## 一、引言

计划经济时期，为了实现对经济资源和社会生活的整合，当时社区主要以单位制为主，整个社会表现为一种典型的“大政府、小社会”现象。但改革开放以来，随着城镇化、现代化的发展进程加快，城市社会发生了巨大转变，单位制结构组织逐渐松动、解体，大量单位人变成社会人。社区作为城市新的基本单元，受到极大的影响，单位社区虽然并未随着单位制度的瓦解而逐渐消失，但仍面临空间重构、社区人员复杂化、单位居民原子化等变化和问题。

从“单位人”向“社区人”转型过程中，被认为是中国特色的“单位认同”急需寻找新的出口，以维持社会整合，“社区认同”被寄予厚望。但对于社区的探索仍然处在初级阶段，市民在没有足够心理准备的情况下，被单位的剧变推进了“普遍的他者们”存在的社区空间，且社区认同缺失，并不能像预期那样延续“单位认同”的脚步<sup>[1]</sup>。而社区认同作为社会团结的主要纽带之一，对缓解城市快节奏生活、联结社会有着重要的作用。而现存的社区普遍表现为居民参与度不高、社区意识淡薄，因此，提高单位社区居民参与社区治理的积极性，重构社区认同，更新主体关系，提高社区居民的满意度和幸福感显得尤为迫切。

之后，面对突如其来的新冠肺炎疫情，社区地位变得十分重要，成为了贯彻执行疫情防控措施的重要主体。且由于疫情下个人利益和整体利益的高度契合，激发了非常态化防控情境下社区集体行动的动力，居民的社区认同也出现了新的变化和特征<sup>[2]</sup>。



本研究基于历史和现实背景下，选取了宿州市企业单位社区——Z 社区作为研究对象。剖析和解读随着社会发展，企业单位社区居民社区认同的基本变化，以及在重大公共卫生事件这一特殊背景下居民社区认同改变的情况，进而发现影响居民社区认同的因素。

## 二、核心概念界定

### （一）企业型单位社区

企业社区是指依附和围绕企业开展建设与管理的社区，主要指计划经济时期由企业出资建设，以解决职工住房问题，占据一定空间并延续下来的社区类型。它的类型主要包括工业企业社区、建筑业社区等，是社会主义及后社会主义单位社区的重要组成部分<sup>[3]</sup>。

### （二）社区认同

地理学家认为，社区作为地方的一部分，社区认同是居民在社区这一特定范围内与居住环境间的情感联系，同时也可以看作个体对居住环境的评价、适应和融合的结果<sup>[4]</sup>。徐文燕<sup>[5]</sup>强调社区认同体现居民对社区的情感依恋，居民个体偏好、价值观、感知状况与社区环境的吻合程度。还有学者提出社区认同包括社区功能认同及情感认同<sup>[6]</sup>。

综上所述，社区认同具有多样性，个体在不同的性格、记忆以及评价标准下，其社区认同感也是不一样的。本文结合不同学者的社区认同概念，将社区认同界定为居民对所属社区的一种特殊情感联结，是对社区的管理方式、环境、人际互动的喜好、信任与归属感。具体而言就是人们在社区里通过一些公共的平台产生相互之间的交往合作从而形成对社区这个大型的空间中的人和公共要素的认可、喜爱、归属和共识。

## 三、研究设计

### （一）研究方法

#### 1.访谈法

首先，在获取社区基本信息的基础上，根据研究目的，制定访谈提纲；其次，在走访观察社区的同时，对不同年龄层次、职业群体的八位居民进行访谈，主要了解他们对本社区人口共同历史的回忆及感觉到的变化、对其他邻居基本状况的了解程度、是否愿意参与社区事务、对社区管理的满意程度及原因、和社区居民互动多少及形式、向他人说明时是否称自己是本社区的人、对本单元人际关系亲密程度的评价等等，收集具有代表性的一手资料；最后，根据记录的访谈内容将资料整理归纳，进行信息的编码提炼，为后续的研究分析提供具体的数据支撑。

#### 2.观察法

本研究主要采用参与式观察法，指的是深入到所研究对象的生活背景中，在和研究对象共同参与相关活动的过程中进行观察。深入社区内部，参与日常的社区活动，以更好地了解社区现在的发展状态和居民的生活情况。

### （二）调查地点与对象基本情况

本文拟选取的调查地点是宿州市埇桥区 Z 社区，这里是原安徽省化工厂在宿州市的公司为厂内职

工所建立的社区，经历了贝斯特集团、丰原集团的收购，最后被央企中粮集团收购，改名为 Z 社区。Z 社区始建于 1993 年，占地面积 9.5 公顷，现有住宅楼 13 栋。截止 2022 年 8 月，Z 社区中登记在案的常住居民有住户 183 户，人口 675 人，其中原住居民 496 人，约占 80%，外来租住人口 179，约占 20%。尽管社区不再受单位管制，但是许多在单位工作的新老职工仍然选择在这里居住。特别是一些年龄在 40-50 岁之间的人比较多，他们基本都是属于从年轻时就在单位上班至今，已有二三十年不等的工龄，对于单位他们有着很深的感情。以下表格是对访谈对象的大致情况介绍：

姓名	性别	年龄	居住时间	是否为原单位 工作人员	现状
A1 高先生	男	53	22 年	是	职工
A2 韩先生	男	50	20 年	是	职工
A3 孟先生	男	51	13 年（搬走 10 年）	是	个体经营
A4 陆先生	男	42	5 年	否	装修公司职工
B1 张女士	女	41	14 年	否	其他公司会计
B2 张女士	女	55	23 年	是	退休
B3 马女士	女	21	21 年	否	幼儿园教师
B4 徐女士	女	66	25 年（随子女 搬迁进来）	否	退休

#### 四、Z 社区变迁过程

Z 社区是原安徽省轻工化学厂在宿州市的公司为厂内职工所建设的生活区，原名“乙烷厂宿舍”，小区共 13 栋住宅楼，其中北边 8 栋楼是从 1993 年开始建造，南边 5 栋楼是从 1996 年开始建造。小区占地面积约 9.5 公顷，距离单位仅 3 公里左右。Z 社区是依托单位建起来的，因此，在初期社区体现出很强的等级制特征，只有单位里工龄长、职位高、对单位贡献多的职工可以优先选择房子，以比较低廉的价格购买，达不到标准的居民则没有资格参与分房。

“当时分房子时不是谁都可以分到房子，反正轮到我的时候已经没有楼层低的房屋可以选择了，只能选择买五楼或者六楼，这也算不错的了，毕竟这个单位的房子便宜啊，当年就两三万块钱。像后来前面新建的那几栋楼，一楼带小院的，那都是我们处长以上住的，都说是处长楼。”（A1）

1995 年，单位改制为安徽省贝斯特轻工化学有限责任公司，提出“房改房”政策改变居民的住房产权单位职工里的人越来越多，社区也开始计划建造新的家属楼。除此之外，单位在社区内增设了“贝斯特幼儿园”，给单位职工的子女提供了基础的教育场所。1998 年，国家明确提出居民住房停止实物分配，住房制度进入全面改革阶段，城市居民住房不再由国家与单位分配，而是实行自行购买制度，社

区居民从此开始变得更加复杂和多元化。2002 年，安徽丰原生物化工股份有限公司收购了单位的部分资产，于是原单位变成了丰原宿州生物化工有限公司，社区也随着改名为“丰原小区”。一直到 2006 年，单位加入了中粮集团（央企），成为了其成员公司，正式改名为中粮生物化学（安徽）股份有限公司，社区被命名为“Z 小区”。

随着单位性质不断变化，社区也在转型，2006 年之前，社区管理一直都是单位的两名员工负责，公共服务也是由单位直接提供，一切事项都由单位决定并处理，主体非常单一。2006 年之后，Z 社区所在的街道办事处开始介入社区的管理，随后成立了 Z 社区党委，下设党支部，并成立了社区居委会，社区各项事务开始转由街道社区管辖。单位在社区中的社会职能逐渐减弱，曾经单位委派的两位工作人员变成了一位，主要负责小区的物业，可以看出，虽然单位在发展过程中弱化了对 Z 社区的治理，但还没有完全退出，Z 社区呈现出一种“半单位化”的状态。

### 五、企业社区居民社区认同变化分析

项目	单位主导时期	单位消解后
认同路径 (-)	对单位的依赖和共同记忆	同处一块地域
社会交往 (-)	相对封闭、简单、熟悉	相对开放、复杂、生疏
社区功能 (+)	单一、不全面	多元化、完善
物业管理 (-)	服务少、费用低	不作为、费用高
居住环境 (+)	破旧、基础设施不完善	改造后配套设施齐全
公共空间 (-)	面积大、使用多	被封锁、使用少

#### （一）个人认知方面：单位制消退带来的居民认同途径改变

从前人们对社区的认同基于特定的地域关系，人们也更多的受到单位制度的影响。单位使大规模的、持续性的、相互依存的交流网络形成了，也构成了人们生活、工作、成长的主要场所，这使得社区成员对单位具有高度的认同。

但经历了一系列变迁后，单位制度逐渐弱化、消退，也慢慢退出了对社区的管理，居住在社区中的人不止是从前原单位的同事了，原来的单位人搬迁的搬迁，租房的租房，社区中的居民变得更加复杂和多元化。对于现在的社区居民而言，大家只是因为生活在同一个地域空间内才有了交往的可能，但不再因为职业而联系在一起。从前单位人由于对同属一个单位的相互依赖和共同记忆形成了社区认同，变为现在的由于同处一块地域形成的认同，可以发现居民认同的路径确实发生了明显变化。

#### （二）社会生活方面

##### 1. 社会交往生疏体现的认同疏离

邻里之间的交往是居民产生社区认同的重要渠道，从单位到社区的变迁过程中，可以发现 Z 社区

居民原本的交往是相对封闭、简单、熟悉的，后来随着越来越多非原单位的人加入社区，邻里关系逐渐变得陌生，居民的交往也发生了变化。

在计划经济时期，企业社区作为居民生活的空间，与企业一起形成了相对封闭、同质性高与联结密切的基础社会空间单元。居民的交往更多的局限于社区内部，基于职业及地域形成了一个较为封闭的交往圈子，大家彼此熟悉、互动密切。由于在一个单位工作，人们的日常生活轨迹是很相似的，再加上单位离社区距离比较近，大部分人都会相伴骑自行车或者电动车上下班。回到家里后，邻里之间的交流也很多，比如做菜时缺少什么调料都会直接去邻居家里借。有居民回忆：

“以前就是不夸张的说，从一楼到六楼，每一户住的谁家里有几个人，包括可能有比较熟悉的家里面具体的一些事情，都清清楚楚的很。而且当时大家家里如果有年龄差不多的小孩话，小孩经常会在了一起玩，我们要喊他们吃饭，有时候还一起接送小孩，交流也更多。”（A1）

除此之外，由于人们年龄相同所以很多人家的孩子年龄也相仿，之前社区里就有幼儿园，所以很多居民自己是同事，孩子又是同学，人们之间的交流频率就更高了。

“我是零几年搬来的，虽然我不是这个单位的，但是当时因为我孩子就和我们邻居孩子在一个幼儿园，而且当时幼儿园门口有很多那种小吃摊么，卖豆脑的，那时候经常去接孩子的时候，孩子就想在那里喝豆脑，我们就会坐下来一起聊聊天什么的，现在关系也一直很熟。”（B1）

后来随着时间的推移，经历了改革开放，居民的交往不再受到单位社区的约束，很多原单位的居民由于各种原因搬迁到了其他小区，一开始还会选择经常回小区看看，但由于失去了共同地域作为纽带，很多年后他们也和原社区的居民没什么联系了。

“我们楼上的就是六楼那户，之前大家走的可近了，后来差不多在小孩上初中的时候，他们就搬走了，刚开始我们还经常有来往，会在一起吃饭，但后来时间长了，因为也不在一个单位工作了嘛，基本上这么多年也没什么联系了。”（A1）

有搬走的就会有新搬来的，有些新加入社区的居民由于是原居民的亲戚朋友，所以可以尽快融入新社区，但更多的是完全的陌生人。原来熟悉的单位人逐渐流失，新的异质性高的陌生人慢慢增加，邻里之间的关系也逐渐变得冷漠了，有些可能当了很多年的邻居彼此还都不了解。尤其是对于很多原单位的职工来说，更愿意和一直熟悉的人交往，因为大家有共同的经历和集体记忆，聊天也很方便，对于新搬来的人，他们觉得重新建立关系很困难，也不太可能比之前同事的关系更好了。

“我邻居就是搬来的新的人家，虽然这么多年了，也不太清楚他们家具体有几个人，大概只知道他们叫什么名字，但是平时在楼道里见到基本也不会打招呼，因为就觉得很尴尬，毕竟人家也不和你打招呼。”（B3）

从居民的反馈中我们可以看出，社区中人们的交往频率和深度都发生了变化，从前是同质性高的居民组成群体进行深度的交往，到后来变成异质性高的浮于表面的个体交往。

## 2.社区功能完善促进认同提高

传统单位制时期，Z社区中的治理主体是单位，社区内的公共服务都是由单位直接提供，一切事项

都由单位决定并处理，主体非常单一。并且由于单位只委派了两名工作人员对社区进行管理，所以管理并不完善，除了负责基础的社区环境、安保秩序、水电维修工作等，并没有建立一些文体中心、老年大学等公共服务中心，也几乎没有组织过文体活动。

“以前我们这社区完全是单位管，当时单位就派了两个工作人员，一个是李 X，还有一个是刘 X，他们两个就主要负责我们这个小区的物业相当于。以前社区没啥活动，就只是保障大家的日常那些需求，更不要说那些什么社区的残联，针对养老的一些服务那都没有。”（A1）

随着社区的转型，新时代下 Z 社区内治理主体逐渐多元化，政府、单位和居民等都成为社区治理的中重要的主体部分。政府的参与主要表现在 Z 社区所在的街道办事处开始介入社区的管理，形成行政化的管理。居民对社区的治理体现在成立楼长、单元长与其他主体相互协调合作。随着社区转型，单位在社区中的社会职能逐渐减弱，曾经单位委派的两位工作人员也变成了一位，成为了小区的区长，这也是 Z 社区治理主体中的又一重要组成部分，因此单位虽然在发展过程中弱化了对社区的治理，但其治理主体的地位依然保持着。

“现在也不是说单位完全没有参与，他也有，只不过换成了张 X，相当于是我们这个小区的一个代表，然后但是大部分社区的工作还是由街道办事处那边来搞，之前有疫情的时候嗯，居民就有被分为这个小区楼长和单元长，然后经常会开一些会。”（A3）

Z 社区治理主体增多后，管理也更完善了，社区不但建立了残联、养老服务站、社保工作室、妇联、计生服务室、老年人健身活动室和图书阅览室等，还经常举办文体活动，比如三八妇女节时为全体妇女同胞举办庆三八创意插花活动，读书日时开展“4.23 世界读书日——把读书学习当成一种生活态度”文化活动，国庆时开展“爱国心报国情强国志”爱国主题书法宣传文化活动等等，大大丰富了居民的精神文化生活，也提高了居民对社区的归属感与认同感。

有居民对社区治理的变化感触较深：“现在街道办事处统一管理组织之后，活动就多了，春节还有大戏台，就是一些小型晚会，文体活动很丰富，以前就单位统一管理的时候根本没有，娱乐活动很少。现在好狠了，还有志愿者，有微信群，对咱们国家福利政策也能宣传贯彻，小区居民能及时了解。”（B2）

### 3.社区物业管理不作为带来的认同弱化

Z 社区内居民对社区的不满情绪主要体现在业主与社区的物业服务方面，Z 社区建成年代较为久远，属于老旧小区，由于年久失修，社区内的基础公共设施老化，损坏严重。从单位制时期至今，都是由单位的工作人员负责社区的物业，对社区内的维修主也是发现损坏才进行维修，缺乏日常的设备维护。后期经历了老旧小区改造工作，虽然很多基础设施更新了，但改造中还是出现了一些问题，其中房顶的防水层重新做却质量更差了。于是，每逢下雨天气，就有居民在社区微信群里拍照片、视频反应漏水的问题，希望物业尽快解决，但每次物业都只是草草敷衍，并没有彻底解决。住在顶楼的张阿姨就是其中之一，她提到：

“之前我们这个屋顶就有点漏水，后来老旧小区改造之后，工人来重新做这个防水层，本来以为可能情况会好很多，谁知道越做越不好了。而且每次我们在群里面发关于这个房屋漏水的问题，张 X

（物业管理人员）都只是草草敷衍，就说会找人上门给我们修，有时候修了下次又坏掉了，根本不可能彻底解决好我看。”（B2）

除此之外，社区的主要供水还是来自单位的水塔，但由于水塔管道老化，经常停水，而且管理人员也没有提前通知大家储存水，导致居民不满情绪高涨。住在顶楼的陆先生反映：

“前两天这不还停水了，这么热的天忽然就没水了，而且张 X 也不提前和我们说，都没有办法存水，就饭也没办法做了，我们楼层高，都待到晚上到 12 点才来了一点水。”（A4）

物业管理的服务态度也导致很多居民的不满，尤其是在老旧小区改造期间，物业管理人员为了应付上级领导的巡查要求，清理楼道卫生时，在未告知居民的情况下，图方便直接用高压水管暴力冲刷楼梯，导致泥沙冲入居民的家里。很多居民都是在下班回家之后才发现，大门入口处全是黑色的泥沙。并且在大家向社区群里发照片、视频反应时，物业管理人员只是打官腔敷衍一下，并不实际解决大家的问题。提起这个，居民都感到愤愤不平：

“就之前扫楼梯这个事儿，从来没见过我们这个楼梯有人扫过，都是我们居民没事，自己打扫一下楼梯，就那清理了一次，还直接拿水冲的，我们家门口全是那黑色的泥，而且放在家门口的鞋架上面的鞋搞的都是，刷都刷不掉。”（A2）

除此之外，因为之前小区里有很多空的土地，很多居住在一楼的居民都会选择在家门口的地里种一些蔬菜。但是老旧小区改造时明确要求不允许在小区里种菜，有的居民没有及时关注处理，于是物业管理人员就采用打农药，或者是硬拔菜这种极端的方式去解决，这也引发了很多居民的不满。住在一楼的徐奶奶感触较深：

“搬来之后我也没什么事，门口的地空着，我们就种了一些花生呀、辣椒、一些青菜什么的，一直都没事，平时和这旁边的邻居也互相摘菜吃。后来那边说改造，你改造可以呀，但是也没和我们说怎么样，就打农药，把我的这个菜全药死了。”（B4）

物业服务费的增长也造成了居民与物业之间的矛盾加深。单位制时期，由于社区居民基本都是单位职工，企业为给职工提供福利，物业费的收取标准都较低，且由单位给予一定程度的减免，单位在给职工分发工资时会直接代扣掉相应的物业费用，不用居民单独去交，导致了居民没有养成缴纳物业费的习惯。“以前物业费都特别低，也就两块钱三块钱，不过以前确实物业也没什么要干的。”（A1）转型后，社区居民类型变得复杂，外来人员增加，本单位职工减少，于是物业费全部由个人单独缴纳，减免的福利也相应取消，这给职工带来不满，于是延期拖欠物业费的情况显著，一方面居民希望提高服务水平，另一方面又延期拖欠物业费用，激化了双方之间的矛盾，造成居民满意度、认同感低。有居民就提到物业费的提高与物业的服务水平不成正比：

“后来物业费就越来越高了，从两三百到现在五六百块钱，主要是你缴这么多钱，你干事也行啊，很多时候我们交这么多钱，这物业也没干什么事，就扫扫地清理一下垃圾，维持一下这个秩序。”（A3）

### （三）物质环境

#### 1. 居住空间优化有利于认同提高

2021年7月，宿州市人民政府办公室印发了《全面推进城镇老旧小区改造工作实施方案》，对2000年底前建成的小区应改尽改，有条件的县区完成2005年底前建成的城镇老旧小区改造任务。在完成小区内水、电、路、气等基础设施改造的基础上，因地制宜在老旧小区内及周边建全社区的公共服务设施。

Z社区刚好被列为改造的老旧小区之一，作为2000年之前建造的小区，Z社区的基础设施出现了不同程度的老化，比如水管道由于常年暴露在楼外，很多出现了风化破裂；楼内的防水层做的不够好，很多居民家里出现“外面下大雨，家里下小雨”的现象；路面坑坑洼洼，凹凸不平，影响居民的出行等。还有一些基础设施不完备，小区内没有统一安装电动车充电桩，仅有一个比较小的车棚，还需要每月缴费才能够使用，所以很多居民都选择会把电动车停在楼道内，接连很长的充电板到家里给电动车充电，楼道很狭窄，这不但影响居民的日常生活，而且非常危险。小区内没有统一安装路灯，楼内也没有声控灯，仅有之前不知道什么时候社区管理人员安装的两三个路灯，但远远满足不了居民的需求。有些居民就反应道：

“之前小区比如说像这个路都是坑坑洼洼的，这一个大坑那一个坑的，骑车都不好骑，还没有路灯，晚上大家都只能手电筒，你见过哪个小区没有路灯的？而且社区不让我们在这个楼底下给电动车充电，（小区负责人）还天天大喇叭喊，但他又没有人家那种充电的地方，那我要骑车咋办，总不能不充电吧，车棚一个月还要交钱。”（A2）“楼前很多地没有硬化，还是泥地，一下雨就容易有淤泥，还有下水道也特别不通，前几年下大雨，小区都被淹了，一楼家里还进水，都用沙袋挡着也没啥用，走在小区里面积水都到我膝盖。”（A1）

经过几个月的改造后，Z社区已经变得焕然一新，曾经经常掉皮的外墙和内墙重新粉刷了几遍，增设太阳能路灯，每层楼也增加了声控灯，安装了非机动车车棚和充电桩，增设了机动车停车位，重新做了屋面的防水层，地面做了硬化，下水道也进行了雨污分离设置等等。小区居民普遍反应较满意：“以前小区路面坑坑洼洼，也没有路灯，晚上都小心翼翼的。下个雨地上都是泥，还容易存水，现在改造好了，住着也舒服多了。”

#### 2. 关键公共空间的减少导致认同弱化

社区认同离不开客观物理环境作为活动中介的作用和影响，邻里之间的情感互动强化了居民的社区归属感（王梦永，2018）。但近年来由于老旧小区改造活动，社区的公共活动空间急剧萎缩，居民与社区公共空间原先的感情连接被切断了，居民之前互动的关键中介也消失了。尤其是许多公共用地被闲置，导致社区居民没有一个可以活动的公共场所，也就失去了参与活动的积极性。

Z社区从前有一块占地约100平方的操场，虽然在改造之前这个操场没有铺上塑胶跑道，也没有安装篮球框、足球框和乒乓球桌等运动设施，但作为社区中为数不多的公共活动空间，人们都很喜欢在操场进行一些业余活动。有居民回忆：

“在我有记忆的时候，这个操场就已经在了，然后我大概小学的时候，我记得经常和周围的邻居家的一些和我差不多大的小朋友在这个操场上滑滑板呀，或者是经常玩一些小游戏。因为本来整个小区就比较小，也没有什么可以玩的地方，大部分小朋友都是在这个操场上去玩，包括也会打一些羽毛球什么的，家长会在操场上面散步等等…”（B3）

后来由于小区房租和一些基础设施过于老化，区里就组织了老旧小区改造活动，操场被铺上了塑胶跑道，也安装了许多健身器材。但与此同时，管理人员却把操场用锁封住了，美名其曰防止居民破坏场地，大家都以为只是刚装修好的那段时间，结果之后却再也没有打开过，曾经热热闹闹的操场如今却变成了一个虽然设施崭新却毫无人气的地方。很多习惯于使用这个公共空间的居民都感到无所适从，也有很多人表达了不满：

“当时说要改造小区的时候，我们都很开心，尤其这个操场之前完全就是水泥地，还有很多烂的一些砖头啊，还会有一些杂草。他后来改造的非常新，当时我们也很开心因为看到他又安装了这个篮球框呀足球框呀，包括这个乒乓球台。但没想到那个管理员他直接把操场的两个门都封住了，一开始是说可以去，借这个钥匙，然后就用这个操场。但是后来不知道为什么就再也没有打开，装修的这么好看有什么用，以前算不好看但是最起码大家还可以在上面自由活动，那现在进都进不去。”（B2）

由此可见，社区没有搭建好一个供大家参与活动的公共平台，之前的一些公共空间被封锁也让很多居民感到不满，就算大家希望组织一些活动也无处可去。对于一些后来加入社区的居民来说，失去了一个可以增进邻里关系的渠道，对社区的认同感也很难建立起来。有居民就提到：

“我本来不是这个单位的，然后是在这个小区租了房子，其实在这个小区生活也感觉还不错，但是我都会发现他们原来单位的一些居民关系会非常好，就经常看到他们在一起聊天什么的。其实我也希望在工作之余也可以和大家有一个良好的邻居关系，毕竟在外面，可能还是要靠邻居嘛，但很多时候不知道怎么融入大家。”（A4）

## 六、突发公共卫生事件下单位社区居民认同的重塑

2022年7月1日，为应对新冠疫情的扩散，安徽省宿州市埇桥区新冠肺炎疫情防控工作指挥部决定自7月20日12时起，在市主城区实行临时性管控措施，进行静态管理，降低社会流动性，降低交叉感染风险。直至2022年8月1日，区委组织部对低风险区域进行“无疫小区”验收，低风险小区在确定为无疫小区后方能解封，解封后依然要外防输入。

面对突如其来的新冠肺炎疫情，社区成为了实施疫情防控措施的重要承接体，发挥了强有力的组织协调和管理服务作用<sup>[7]</sup>。在此期间，笔者发现在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的背景下，Z单位社区居民的社区认同也发生了改变。

### （一）社区多元主体的集体行动产生了积极式认同

Z社区的疫情防控力量主要由社区党员、社区工作者、物业工作人员及居民志愿者组成。小区中再选出“小区长”“楼栋长”“单元长”来保障疫情防控需要及居民的日常生活需求。由于疫情较严重，居民需要每天做一次核酸检测和抗原检测，工作量较大，因此，需要多个主体配合完成。由此，社区



居民的线下交往频率增多，深度也增大了，这种集体行动迅速拉近了居民彼此之间的距离。

疫情中的一天是从早晨五点半开始的，社区工作人员及党员志愿者已经就绪，为了进行每日核酸检测，他们需要提前搭建检测帐篷，安放检测桌椅，安装照明灯具，组织居民有序排队、登记、采样进行检测。除了党员志愿者，还有其他居民主动报名担任志愿者，大部分都是与大家熟识的原单位职工。

“我们社区夜里 12 点在群里发布的志愿者招募，到今天早晨五点左右，有二三十个居民都报名了志愿者，早上都准时到岗，我们主要负责维持秩序、帮助登记信息，尤其是对于一些不会扫码的老年人。”（A2）

他们在岗位上紧密配合，严守阵地，充当“讲解员”“疏导员”“引导员”“信息采集员”，为疫情防控出了自己的一份力，也拉近了与居民之间的关系。有居民志愿者提到：

“我现在一般是从早晨 5 点忙到 10 点，可能喝口水、吃口饭都来不及，但是我觉得只要每个人都愿意站出来出一份力，就能尽早结束疫情。而且担任志愿者也让我和其他居民关系更近了，之前可能根本不认识的，大家一起干活，这几天也慢慢熟悉起来了。”（A1）

除了为核酸检测忙碌的社区工作人员与志愿者外，小区的“楼栋长”与“单元长”也在疫情防控中发挥着重要的作用。Z 社区的“楼栋长”与“单元长”是由小区物业负责人选出，由于负责人就来自单位，所以选择的人员一般都是大家熟悉的原单位职工，这样更方便他们与居民进行沟通。根据社区统一调度和安排，“楼栋长”负责统筹工作，“单元长”负责具体的实践工作，为住户发放出入证，做好人员进出登记和健康码扫码工作，挨家挨户通知住户，告知静态管理期间，除每户一人在规定时限外出采购外，其余人员不要外出。“单元长”还需要每天去疫情防控办公室领取抗原检测试剂，再发放到负责单元的居民手里，同时进行居民的信息采集和统计询问，比如家中具体人口数量、是否做核酸检测、家庭人员是否外出等等。针对空巢老人、独居老人、独居孕妇、残疾人等不方便行动的人群，“单元长”需要统计信息汇报给“楼栋长”，统一与社区协调进行上门核酸服务。

在这样的工作安排下，“楼栋长”与“单元长”必须要对负责的居民信息了如指掌，还需要和居民保持密切的沟通与交流，除了那些已经熟识的老居民外，不知不觉间也增进了和新居民之间的联系。居住在 10 栋 301 的大爷感慨：

“我是后来才搬过来的，儿子女儿都住在其他地方，就我自己一个人住，疫情很突然就封小区了，孩子都进不来，我身体不太好，很多事情都做不来…手机我也不懂，周围邻居也不熟，每天单元长都跑来给我做这个抗原。有时候我在楼下，还有其他我们岁数差不多的一起拉呱，单元长就一起帮我们做了，真的谢谢。”

此外，物业公司也积极行动，每天按时做环境消杀、通知居民及时做核酸、安排人员定时巡查等。为了更好的为大家提供服务，Z 社区的物业负责人也就是原单位的职工每天吃住在小区，努力 24 小时为居民提供服务。

（二）业主群成为了加深居民认同感的纽带

疫情来临后，大家生活都发生了改变，隔离、居家、核酸检测……成了这段时间 Z 社区居民生活的常态。由于社区采取封闭式管理，居民日常的互动方式发生了巨大变化，除了下楼做核酸外，面对面的线下交流趋于停滞，居民间的互动机制由线下延伸至线上。微信业主群成为了社区疫情防控的大阵地，串联起了社区内的各个家庭，小小的手机屏幕成了人们沟通交流的主要平台，平日里邻里之间被钢筋水泥隔开的距离感，忽然拉近了许多。借此，依托互联网形成的“虚拟社区”也就应运而生了，“虚拟社区”使社区不再受空间的限制，而是可以用归属感和认同感来划定边界。社区居民通过“虚拟社区”守望相助，实现了信息的供给、支持的获得，形成了具有强大凝聚力和认同感的共同体。

手机微信由于沟通交流便捷、人与人之间无接触的特点，成为了社区防疫的新武器。虽然从前 Z 社区就建立了业主群，但使用频率并不高，一方面很多新搬来的居民没有加入群，另一方面熟悉的居民更倾向于选择线下的交流或者私聊，不熟悉的居民更不会主动在群里发言。此次突发的疫情，让 Z 社区的业主群真正“活了起来”。在社区工作人员的宣传下，小区大部分居民主动加入了微信群，群里人员大大增多了。疫情刚开始，业主群主要被社区工作人员用来传递疫情防控信息，比如什么时候做核酸、什么时候领取抗原、如何自己做抗原检测等。除此之外，就是关于买菜、水电等基本日常需求的沟通，比如需要加入哪些买菜群，只要居民在群里问，总会有其他居民及时分享。大家在群里互通消息、彼此打气，传递爱心与温暖。从某种意义而言，微信群为疫情中的社区居民提供了互动的纽带，重塑了人们的社区认同。

“这个微信群真是方便，以前没怎么看过，现在疫情封闭了，都得从群里能看到最新的消息，什么时候做核酸啊，做核酸人可多，一般你问都有人回你，就算大家之前都不认识。现在觉得更有归属感了，毕竟确实远亲不如近邻，尤其是出不去小区，亲戚也见不到，其他有的小区可能解封了，但也不能来送菜，不然又红码了。不像这前后左右的邻居，有事大家都方便，感觉更踏实吧。”（A4）

随着群内成员慢慢增多，居民在群内互动增多，成员的归属感与凝聚力不断得到强化，群内的信息内容也不再局限于疫情相关了。大家开始在群内分享各种日常的信息，比如育儿技巧、厨艺分享、宠物饲养等。有居民遇到问题也会在群里求助，比如有一位业主最近报考了消防员考试，但由于疫情快递不通，他购买的书一直派送不到，于是在群里求助向居民购买或者借相关的书籍，很快就有热心居民回复愿意把书免费送给他。还有居民想吃螺蛳粉但买不到的，也有居民主动分享自己的囤货。

“我印象比较深刻的就是我们单位给大家统一报名了那个消防员的相关考试，本来我都网上买了书，谁知道疫情那么突然，快递也动不了了，但马上就快考试了，我就想在群里问问看有没有之前考过的书用不着了，能借来看看。没想到一发出去，马上就有人回复了，也不是我们单位熟悉的同事，就是后面楼不认识的人，说用不到了可以把书送给我。我就觉得很感谢，真的，虽然真是不认识，本来大家都接触不到的，还是因为这个疫情群里才活跃了，有好有坏吧。”（A1）

类似的事件还有许许多多，可以看到，平日里很难碰面也不太熟悉的邻里，在疫情下相互交流，帮助解决生活之忧，业主群不再嘈杂，更多的是携手、理解和坚持。就这样，个体在一轮轮的互动中交换了价值与情感，为实现身份共在和情感共在提供了可能<sup>[8]</sup>。同时，这种以弱关系为基础的虚拟社区

交往，不但给大家带来了更多异质的信息，构建了一个特殊时期的社会支持网络，还为居民提供了一个获取归属感与认同感的场所，使 Z 社区原本分散的居民们重新联结在了一起，成为了互帮互助的“命运共同体”。

## 七、企业型单位社区居民社区认同变化的影响因素

### （一）客观因素

#### 1. 住房制度改革

住房是计划经济时期单位为职工提供的重要的社会福利资源，因此，住房制度改革是影响居民社区认同的重要因素。在计划经济时期，住房作为一种基本福利被纳入到社会“再分配”系统中<sup>[9]</sup>，对干部职工根据工龄、职位等进行内部分配，而不是按照商品经济原则进行出售出租，于是，工龄越长、职位越高、对单位贡献越多的职工就可以优先选择更好的房屋资源。企业为职工分配住房也成为了单位给予职工及其家属福利的重要体现。

“当时分房子时不是谁都可以分到房子，反正轮到我的时候已经没有楼层低的房屋可以选择了，只能选择买五楼或者六楼，这也不算不错的了，毕竟这个单位的房子便宜啊，当年就两三万块钱。像后来前面新建的那几栋楼，一楼带小院的，那都是我们处长以上住的，都说是处长楼。”（A1）

同时，由于是单位福利房，居民不具有私有产权，只有居住权，并没有买卖权，所以各户都有来自同一个单位的居民，受到业缘、地缘的影响，大家有着相似的生活方式，变得更加同质化，整个社区就形成了一个“熟人社会”。居民对企业与社区怀有强烈的归属感与依赖感，都亲切的称社区为“我们生活区”或者“我们院儿”。

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中国拉开了改革开放的序幕，旧住房制度（改革开放前住房制度统称“旧住房制度”）的弊端不断暴露，不利于经济体制改革的深入发展，城市住房制度开始进行改革。国务院先后出台多部房改文件，从[1988]11号文件，到94年43号文件，到98年23号文件，到03年18号文件，07年24号文件，到了10年就开始房地产市场调控，十条，八条，五条，逐步确立了住房社会化和商品化的改革方向。1995年提出“房改房”政策改变居民的住房产权，1998年明确提出居民住房停止实物分配，住房制度进入全面改革阶段，城市居民住房不再由国家与单位分配，而是实行自行购买制度。

[10]

由此，房屋变成了彻底的居民私有产权，现代社区商品房成为居住空间的主要形态。居民由此逐渐脱离了对单位的依附，尤其是很多居民迫切希望住更宽敞、面积更大的房屋，解决二代、三代子女住房问题，于是原单位社区的居民开始逐步外迁，选择卖房子或者出租房子，带来了大量外来租户的进入，社区居民异质性增强，不再是只有亲密同事组成的熟人社会了。有居民反映：

“主要是这边最大也就三室一厅，大部分其实都是两室一厅，对于有两个孩子或者是有老人的话，居住很不方便，所以后来我们很多同事都把这里的房子卖了，然后去其他小区付个首付。除了这些嗯，因为我们小区地理位置还可以，离这个高中还有一个初中都比较近，很多外面的，因为孩子上学来我们小区租房子。还有因为这边本身也二十多年了，所以卖出去价格也比较低，也有很多买我们院房子

的。”(A2)

## 2.现代生活方式的影响

Z社区居民中的第一代职工很多都是出身农村,后来才来到城市工作,住进了楼房,即便如此,很多人还是带有农村的习俗,比如会在空地上种菜种树、在院子里养鸡。在生活方式上,他们也深受乡村的影响,没有很强的隐私观念,也并不觉得家里是一个私人的领域。尤其是在夏天居民为了通风,经常把门打开,没了空间上的阻隔,邻里之间的来往自然而然也就多了。“我就记得我小时候大家家里都没空调,为了凉快,我们都拿着凉席板凳到操场或者路上坐着躺着,小孩都在一起玩,大人们就坐在一起聊天。”(B3)但随着社会发展,新一代人已经没有了乡村生活的习惯,再加上现代生活方式朝着城市化发展,在这种情况下,居民开始觉得家是一个私人领域,而非公共空间,并且由于物质生活的丰富也让需要邻里帮助的需求减少。另外,随着互联网的发展,很多情况下,人们不必再面对面地交流,网络在生活中扮演的角色越来越重要,网上购物和外卖的普及减少了人们出门的频率。随着邻里之间交往机会的减少,人们对社区的认同感也会发生相应的弱化。

## (二)个人因素

人是地方认同构建及其变化的情感主体,与人有关的各种微观因素,也会直接影响居民地方认同的变化过程。首先是居住时长,Z社区的很多原单位职工在小区刚建造时就搬了进来,居住时长基本在20多年,除了日常和同事的工作交流,平时也会因为婚丧嫁娶而有所来往,对社区的情感是比较深厚的。相比之下,外来租户大部分都是为了孩子上学暂时搬迁到小区,忙于生活,基本上没有多余的时间来参与社区的活动,和居民的来往也就更少了,对社区的认同感较弱。其次,居民个人的身份、经历也会影响个人情感,从而影响地方认同。对于原单位的职工来说,大半辈子都受到单位的影响,骨子里会为自己是单位职工感到自豪,对单位社区的认同感也就越高。一位退休的居民就提到:

“我工龄已经快三十年了,在单位就待了这么多年,也算是看着咱单位发展越来越好,现在退休了,待遇我也还比较满意了…后来好多同事都搬走了,但我就觉得我们院挺好的,大家都认识,都熟悉多好。”(B2)

但其他外来的居民由于没有类似的经历,对原单位没有什么感情,能体会到的社区的归属感与认同感也就弱一些。除此之外,居民的文化背景、收入、年龄等个体特征也会影响地方认同。以前社区中人们由于来自同一个单位,基本上有着相近的收入水平,同质性比较高。但随着社会发展,很多人不再拘泥于一辈子生活在同一个地方,社区中的人口结构变得越来越复杂,人们的文化背景、教育程度、经济收入都不一样。这使社区的异质性大大提高,也就增加了邻里交流和沟通的成本,使人们对社区的认同感弱化。

## 八、结论

本文以宿州市Z社区作为案例,在查阅文献的基础上,运用访谈法和参与观察法收集资料,回顾了Z社区随着社会整体变迁而发生变化的过程,分析了在这一过程中居民的社区认同变化,以及在重大公共卫生事件这一特殊背景下,居民社区认同改变的情况,并从宏观和个人因素角度,探究了影响

居民社区认同变化的因素。

本文研究结论如下：

1.企业社区居民认同路径发生了转变，从前是对同属一个单位的相互依赖和共同记忆形成了社区认同，变为现在的由于同处一块地域形成的认同；在社会生活方面，社区功能的完善提高了居民的认同感，但社会交往生疏化和物业管理不当加剧地方认同弱化；在物理环境方面，居住空间环境的优化维系了居民的积极式认同，但同时关键公共空间的减少带来了消极式认同。

2.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带来了社区空间上的封闭、集体行动的增多及线上虚拟社区的形成，为居民提供了新的互动纽带，重塑了人们的社区认同，使原本分散的居民成为了互帮互助的“命运共同体”。

3.居民对社区的认同会随着社会环境变迁与个体特征差异而发生变化。客观因素有住房制度改革、现代生活方式的影响，主观因素有居住时间、个体经历差异、个体特征等内部因素，共同塑造居民的社区认同及其变化过程。

#### 参考文献：

- [1][英]齐格蒙特·鲍曼著、范祥涛译，2002，《个体化社会》，上海三联书店。
- [2]杨林楠、李涵、周业勤，2021，《新冠肺炎疫情背景下社区行动机制研究》，《南京医科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第1期。
- [3]吴文恒、黄坤、丁竹慧等，2019，《西安市企业社区分布格局与形成机制》，《地理研究》第12期。
- [4]王孟永，2018，《社区认同、环境情感结构与城市形态发生学机制研究，基于上海曹杨新村的测量与评价》，《城市规划》第12期。
- [5]徐文燕、钟丽莉，2016，《基于地方依恋视角的旅游地居民对乡村旅游支持度研究》，《哈尔滨商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第3期。
- [6]辛自强、凌喜欢，2015，《城市居民的社区认同：概念、测量及相关因素》，《心理研究》第5期。
- [7]盛洪涛、周强、汪勰等，2020，《新冠疫情考验下的武汉社区治理新思考》，《城市规划》第9期。
- [8]何康，2020，《信息疫情中的谣言传播：微信群的移动对话》，《中国报业》第4期。
- [9]柴彦威、刘志林、沈洁，2008，《中国城市单位制度的变化及其影响》，《干旱区地理》第2期。
- [10]宋金平、王恩儒、张文新等，2007，《北京住宅郊区化与就业空间错位》，《地理学报》第4期。

☆ 作者简介：高雅，河海大学社会学专业2021级硕士研究生

☆ 责任编辑：陈奕含



# 妈妈工人：服装加工厂的非正规就业

罗楚怡

**摘要：**通过对江苏省泰州黄桥镇上的服装加工厂的微观民族志，探讨服装加工厂的非正规就业模式和管理组织形式，分析了其与服装加工厂中女工的“妈妈工人”身份的适配性。这些服装加工厂用工高度女性化和灵活化，家庭场所、生活场所和工作场所融为一体，把女性“为妻为母”的家庭角色调入这类服装加工厂的生产与劳动控制中，使“妈妈工人”能兼顾到家庭和工作。

**关键词：**非正规就业 “妈妈工人” 客厅工厂

## 一、引言

20 世纪末，生产全球化使得跨国公司为了追求利益最大化将触角伸到世界各个角落，形成全球生产网络。在这一生产链条之中，为了利用更多的劳动力和资源，外包成为常见的一种生产组织形式。在全球资本寻求廉价劳动力的过程中，生产资料通过订单外包的方式送到了个体的家门口，使得越来越多中国妇女被纳入全球生产网络。对于家庭主妇们来说，如果缺少老人的帮助，接送孩子上下学、做饭等家务就背负在了她们肩上，如此一来，她们便不可能进入全日制的大工厂工作，只能寻找“时间自由，方便照顾小孩”的工作，她们很多进入了一些小型的来料加工厂，一边照顾孩子一边赚钱“补贴家用”。

熊秉纯(2010)发现台湾现代工厂体制把作为母亲、妻子和儿媳的已婚妇女纳入了生产体系，成为个体制中重要的劳动力，她们在父权制和资本主义生产制度叠加的结构体系中面临双重弱势地位，熊秉纯博士的研究展示了妇女在社会经济发展中的作用。熊秉纯博士强调两性不平等，后续有学者借用“家庭本位”来理解女工在经济行动中的意义，提出这些妇女之所以乐此不疲是因为她们重视家庭本位，而非市场经济中强调的个体化，是因为将家庭本位嵌入了经济选择，来维持家庭的存在和完整(陈文超，2012；白美妃，2017)。类似地，张曦（2019）在乡村服装来料加工厂中也发现，教育发展目标下形成的陪读工群体决定了当地劳动力市场的特殊性，使得工厂管理方式需配合陪读工的特征，使得当地的产业发展实践路径中表现出市场适应家庭，而非家庭适应市场，形成流动的工厂（熊秉纯，2010）。此外，熊秉纯提出了“客厅即工厂”的概念。即为了最大化地利用劳动力，工人们把自己的住所变成工厂。林慧琳等受此启发提出了“工厂即客厅”的概念，在对莆田制鞋工厂的研究中，发现做工成为女

工社会生活的一种延伸，工厂有着“客厅式”的工作氛围，工厂中的劳动关系和劳动控制借用了家庭关系中的情感和道义（林慧琳等，2020）。

在这些研究和理论的基础之上，本文通过对江苏省泰州市黄桥镇上几个典型的服装加工厂的调查，探究这类服装加工厂的劳动过程，本文将回答，这些小型服装加工厂的基本运作过程是怎样的，女工为什么会来到服装加工厂工作，加工厂的组织管理机制是怎样的，与这些“妈妈工人”“为妻为母”的角色有什么契合之处。

首先，本文将简要介绍调研方法和调查所在地的基本情况，用表格呈现笔者所接触的服装加工厂和工人的基本信息。其次，本文将展现这类服装加工厂的运作模式和其中的非正规就业，重点讲述加工厂的工资计算方式和其中的熟人关系网络，并进一步对“客厅工厂”的特性进行说明。再接着，本文将对服装加工厂中的“妈妈工人”这一群体进行介绍，表现出她们为妻为母的家庭角色，再对服装加工厂的组织管理机制与“妈妈工人”需求的适配性进行说明，最后一部分做简单的总结。

## 二、研究方法

### （一）访谈法

本次调查主要采用了半结构式访谈和开放式访谈，通过访谈服装加工厂 A 的老板初步了解了当地服装加工厂的运作模式和市场生产逻辑。接着，在服装加工厂 A 老板的引介下，我们得以接触了服装加工厂 B 和 C 并进行了老板和员工的深入访谈。最后通过偶遇抽样对街上另外四家服装加工厂即 D、E、F、G 的老板进行了访谈。

### （二）观察法

通过实地走访 7 个服装加工厂，对服装加工厂的室内设施、布局、工作氛围进行观察，在走访过程中，留意服装加工厂发生的事件并进行记录，观察多个服装加工厂的最真实的日常工作状态。其中，笔者在服装加工厂 A 进行了多次长时段的深入观察。

## 三、调查地点与调查对象

### （一）黄桥镇基本情况

黄桥镇是一座具有悠久历史的千年古镇和丰厚底蕴的文化名镇，位于泰兴、如皋、海安、姜堰、靖江五市（区）中心，是沟通苏南苏北的重要门户，334 省道、229 省道在镇区内交叉穿越，盐靖高速穿境而过。全镇下辖一个省级经济开发区，2 个国有场圃、4 个副中心社区、66 个村居，总面积 176 平方千米，总人口 23 万人，其中城区面积 36 平方千米，城区人口 15 万人。是苏中苏北规模最大的城镇之一，是国家建制镇示范试点镇、国家新型城镇化综合试点镇、江苏省经济发达镇行政管理体制改革试点镇，是泰兴市东部地区经济文化、商贸和交通中心，泰兴的“副中心”和小城市，先后获得“中国历史文化名镇”“提琴产业之都”“全国文明镇”“国家级生态镇等 16 个国家级称号。2020 年黄桥镇地区生产总值 137.16 亿元，镇上中小学 15 所，在校学生 17845 人<sup>1</sup>

---

<sup>1</sup> 资料来自江苏省泰州市泰兴县 2020 年县志

## （二）调查地点及调查对象基本情况

调研的 7 家服装加工厂位于黄桥镇某道路的一段，该路段约 800 米。该段南靠黄桥初级中学，和黄桥镇中心小学，东面靠东街小学和中心幼儿园，教育资源集中。该段共有服装加工厂 20 个左右，个别已歇店闭门，在营门店十几个。7 家服装加工厂的基本情况如下：

**表 1：服装加工厂的基本情况**

	工资计算方式	开厂时长	管理人员
服装加工厂 A	计时计件并存，计件为主，熨烫工计时	七八年	老板+老板娘
服装加工厂 B	计时	-	老板
服装加工厂 C	计时	-	老板+老板娘
服装加工厂 D	计时	-	老板
服装加工厂 E	计件	不到半年	老板+老板娘
服装加工厂 F	计时计件并存，员工自选，选计件的更多	四年	老板
服装加工厂 G	计件	十一年	老板娘

**表 2：妈妈工人的基本情况**

员工	子女情况	该厂工作时间	工作地点
女工 A	儿子 12 岁上小学五年级，女儿 18 岁刚高考完	2 年	服装加工厂 A
女工 B	儿子 11 岁上小学，21 岁女儿在外地	半年	
女工 C	儿子 11 岁上小学，20 岁女儿外地上学	半年	
女工 D	女儿 6 岁，儿子 17 岁上高中	3 年	
女工 E	女儿 13 岁上六年级，儿子 16 岁即将进入高中	半年	服装加工厂 B
女工 F	一儿一女，都在外地上学	若干年	
女工 G	儿子 17 岁上高中	2 年	
女工 H	一儿一女，一个上初中一个上小学	3 年	服装加工厂 C

## 四、服装加工厂：非正规就业和客厅工厂

### （一）非正规就业

非正规就业由国际劳工组织提出，是针对发展中国家的一种就业状态。区别于国际劳工组织 1973 年提出的非正规部门这一概念，20 世纪 70 年代，国际劳工组织将其定义为：“发展中国家城市地区那些低收入、低报酬、无组织、无结构的很小生产规模的生产或服务单位。”彭希哲等将其概括为：非正规部门就业主要是指在广大发展中国家的城镇地区，那些发生在小规模经营的生产和服务单位里的以及自雇佣型就业的经济活动。非正规就业不等于非正规部门，在许多正规部门中也存在非正规就业。



彭希哲在比较了多位学者对于非正规就业的理解之后，发现学者们“一般对非正规就业的理解集中在其灵活多样的就业形式，不具备确定的法律保障的劳动关系，其所有制形式以个体、私营为主，生产规模很小且常常以家庭为单位，产品或服务的对象主要是低收入群体，其从业的目的主要是维持生活。”（彭希哲，2004）总之，非正规就业指一种个人的就业状态，而非正规部门更多的是指一种组织形式。学者一致认为相对正规就业的劳动收入，非正规就业的劳动者的收入偏低。接下来文章将呈现所调研的服装加工厂中的非正规就业及其特点。

## （二）服装加工厂的基本情况

服装加工属于服装产业链的一环。笔者所调研的小型服装加工厂规模不大，其所有制形式为个体私营，有的也以家庭为单位经营。员工少则不到十人，多则十几人。服装加工厂的老板从上家公司接单，一般来自上海和江苏其他周边城市如无锡等，也有少量外贸单，如日本。加工厂的老板将每一单的任务分配给各个员工，一般以工序进行分工，同一个订单，员工的工序比较固定，但也会根据做工需要进行分工调整。服装加工厂配备的基础设备一般有缝纫机、锁边机、烫台等。服装加工厂的成品主要为上衣、裤子、裙子和帆布包。经营服装加工厂的老板不仅是老板，也是工人，在负责协调分工、对接客户、质量检查等运营管理事宜的同时，一般也需要自己亲自干活。服装加工厂所对接的“上家公司”负责采购面料、辅料，并进行打样设计，服装品牌商采纳其服装设计款式之后，根据品牌商需要采购面辅料并交由服装加工厂进行加工制作。“上家公司”既与服装加工厂对接，也与服装品牌商对接。当地政府主要负责对服装加工厂进行消防安全检查，并督促疫情防控。近几年的疫情打乱了人们的生活节奏，交通管制较多，当地服装加工厂接单的上家公司多位于江苏周边和上海等地，上家公司所采购的面辅料受到疫情影响，无法送到至黄桥镇。2022 年的上半年的上海疫情导致上海的货源无法进入黄桥镇，当地服装加工厂生存更加困难。而加工厂制作出来的成品也无法送出。疫情之下，企业生存困难，为了保持盈利水平，部分客户会压价，导致服装加工厂的盈利水平也下降，加工厂生存困难。当地加工厂老板表示，近几年黄桥镇上服装加工厂数量比以前少很多。

镇上服装加工厂的员工以已婚妇女居多，多数生育有 1-2 个孩子。从劳动雇佣关系上看，员工与雇主（服装加工厂老板）的劳动契约十分松散，雇主与员工之间并没有签订劳动合同，员工没有固定工资、最低工资，更没有五险一金和一些社会保障，就业与社会保障体系之间并无制度性联系。员工的流动性大，由于女工们需要照顾儿女上学，在儿女毕业离开附近学校之后，女工也会离开服装加工厂，所以每逢毕业季，都会有工人流动，有新入学的孩子妈妈进来打工，也有毕业带孩子离开的。除此之外，加工厂的工作时间比较自由，不同于全日制的工厂，也没有严格的纪律管理条例。

“员工是流水的，因为他的小孩毕业以后就要走了。”“像我们相处的来的话，有的话会做一两年两三年。比如小孩上初一，然后到初三。如果上了高中到别的地方去了。但有的做一年也有的做几个月的。不固定的，流动性比较大。”（服装加工厂 A 老板）

## （三）报酬形式：计时和计件的工资计算方式

从报酬形式来看，服装加工厂采取计时工资和计件工资，不同的服装加工厂工资计算方式有差别。

据表可知，在七家服装加工厂中，有三家加工厂只采用计时工资，采用指纹打卡下班，有两家只采用计件工资，另外两家计时工资与计件工资并存，其中，服装加工厂 A 只有熨烫工采取计时，其他工序上的工人采取计件工资，服装加工厂 F 的老板表示，工人可以自由选择工资计算方式，可计时可计件。但是有几家加工厂的老板表示，不论是计件还是计时，最终给出的工钱差别并不大。

具体来说，计时工资计算便利，采用了计时工资计算方式的服装加工厂都配有打卡机，工人们上下班进行指纹打卡，由打卡机计算每位工人的工作时间，月结工资前将该月的工作总时长作为工资发放的依据。计件工资计算方式相对复杂，需要计算每个员工每道工序的件数。服装加工厂 A 以计件工资为主，熨烫工之所以采取计时工资是因为服装加工厂 A 的货款式复杂，熨烫数量多，计件麻烦。但对于需要经常离开工位去忙自己的事情的工人而言，打卡上下班也是比较琐碎不方便的。

计时工资在同一个加工厂的不同的员工之间也存在差别，在招聘公告上我们也能看到计时工资以区间的方式呈现，例如 16-19 元/小时。老板们表示，由于每个工人的技术掌握情况不同，做工出库的速度不同，计时工资会因人而异，做工速度快的员工每小时的工钱相对较高。确定工人计时工资给多少，需要在刚招工时观察和计算工人的做工速度，至于后续是否会根据熟练度变动工价，不同的服装加工厂并不相同，例如，服装加工厂 B 老板认为熟练度不会变化太大没有必要后续更改工价。此外，计件工资的工价也可能因为工序复杂而适当上调。

从质量上来看，采取计时工资的服装加工厂认为，计时的话工人的出货质量更高，因为工人没有必要为了工钱赶件数，因而质量更有保障。计件工资可能出现员工为了工钱重量不重质，影响最终出货的质量。

“她们要自由嘛，你要是按照时间做的话，做少了我们也不开心。做多了嘛，人家也做不长时间。”  
(服装加工厂 A 老板)

“他那种也要要求你计件的。比如说你做多长时间，你做了多少条啊，要记下来。做了这么长时间，做了多少东西？”(女工 B)

服装加工厂 A 老板表示，计时工资容易使老板和员工之间产生矛盾，计时工资需要老板发挥监督作用，确保每小时工人所完成任务带来的利润超过这一个小时老板给的工钱，如果员工经常在计期间偷懒或休息过久来混时间，容易引起老板的不满。计件工资被认为是更自由的，工人可以随时离开岗位，工作时间可以随时休息。相对来说，计时工资在工作时间内不是那么自由。但是，有的采取计时工资的加工厂可能也会要求员工将件数记下来，使得计时计件工资之间的界限相对模糊。

“对啊，试做一天两天，看你能不能够适应我们这里的环境。你能习惯你就在这做，我再跟你谈工价。你一个小时能值多少钱。”(服装加工厂 C)

“计件我们接小孩也方便啊，老板这边也方便。”(女工 A)

“计件自由一点。计时的话，总归你要做这么多活。”(女工 D) “一道工序要是没得做了，几个人就抢着做。太不好了。我就这样，我做计时的多好。”(女工 H)

(四) 工作场景：“客厅工厂”

女工们的家离服装加工厂并不远，最近的工人住在服装加工厂对面的，远一点需要骑电瓶车但也只有几分钟的路程。每天接送孩子然后到加工厂上班，工人们在家-学校-加工厂之间穿梭也只需要花费几十分钟的时间。服装加工厂的环境被整合进女工们日常生活模式之中。加工厂对于老板和工人而言，不仅是一个工作的地方，在这里家庭场所、生活场所、工作场所融为一体。以服装加工厂 A 为例，该厂的门面是老板租用的，前屋摆放了缝纫机等一二十台做工机器，老板与女工们每天就在前屋干活，在往屋内走有卫生间和厨房，过道也堆放了许多材料。老板一家人每天就在这里吃饭。客厅即是工厂。

由于“妈妈工人”的身份特点，服装加工厂的上下班时间很自由，工作时长没有限制，多数可以随时离岗处理紧急的事情，“妈妈工人”的时间以自己孩子的作息为中心，这点后文将会详细体现。服装加工厂没有严格的纪律条例，多数情况下，工人们可以自由交谈，老板表示，一般情况下，只要不影响出货速度就不会阻止工人们交谈说笑。在调研中，笔者也能感觉到服装加工厂“客厅式”的氛围，工人们会一边干活一边说笑，聊孩子、唠家常，有的戴着耳机听着音乐，有的一边看剧一边赶工，时不时地还会闲下来回微信消息。有时候哪一道工序不太会了她们随时请教其他女工和老板，工厂时不时有工人走动，去喝水、上洗手间。炎炎夏日里，老板会买上个西瓜，在后屋切好让工人们放下手中的活去吃西瓜，也有工人把自己家里好吃的带来分给工厂里的工人们和老板。有的女工下午四五点会把孩子接到加工厂，有时候工厂里好几个孩子在玩闹，不忙的时候老板也会逗小朋友玩。某种程度上，服装加工厂也是“妈妈工人”和孩子家庭住所的延伸。

“我们相处也是很平和的，不是什么老板高高在上。认识大家很开心，很舒服，这是最主要的。”  
(服装加工厂 A 老板)

来到服装加工厂也是女工们社会生活的一种选择，在这里，她们能交到更多的朋友，比一个人在家里什么都不做要好、要更开心。她们相对不那么在意工资，“能做多少做多少”，她们更在意良性的人际互动和工作氛围，“老板人好”是她们选择工厂的重要依据。女工 2 表示自己来到厂里是因为要照顾小孩，赚钱不是主要目的，自己在厂里待着不会寂寞。对于工人们而言，一个老板“好”主要体现在：按时发工资，不拖欠员工工资、与员工交流多、热情好相处等等。

“他人挺好的，真的好，也肯帮人，就是你找他，他愿意帮你。我们也不拖欠工资，每个月月底就发了，也不吞你的。”(女工 F)

“像我们接孩子，都随时走。随时想走随时走，有时间你就来。他也不控制你。像今年嘛，疫情嘛特殊，老板说工资嘛，反正都是你们的，早一天发晚一天发都不要紧。不是说今天几号就一定要几号，提前一天都不行。”(女工 E)

这些服装加工厂的规模并不大，每个加工厂的老板加女工 A 共十几人，老板与员工工作地点相同，且多位于同一个门面，平日里大家也会一起聊天。女工 D 在服装加工厂 A 工作了三年，以前也有过在大厂工作的经历，她说在大厂，员工之间都很少聊天，老板也见面比较少，女工 B 也表示大厂难以见到老板。但在镇上这些小的加工厂里，老板需要监督和检查工人們的成品，与工人一起工作，也要随时准备解决可能出现的问题和差错，在赶货期的时候积极调动工人们的情绪，督促她们加快干活速度，

加工厂充满着类似家庭客厅的氛围。

“平常干活没事也聊几句。我们这边主要是老板，你带孩子，他能给你提供的方便也都给你提供，能帮的也帮。都挺好的，现在都人性化嘛。”（女工 E）

#### （五）重要基础：以信任为基础的熟人网络

所调研的服装加工厂中，家庭成员是生产和经营组织的基本成员，并扩展到人际关系覆盖到的劳动力市场。

调研发现，服装加工厂并不依靠平台接单，加工厂老板都表示，平台接单没有信誉保证，不熟悉、不信任平台上的客户，担心完成订单之后无法受到酬劳，客户也不放心把订单交给不熟悉的加工厂制作，担心成品的质量和货期问题。调研所走访的七家服装加工厂都是通过熟人接单，一般是以前打工所认识的朋友，或者长期合作下来的伙伴，如果没有从事相关行业的熟人，一个服装加工厂也很难开起来。

“比如说你一直是做这个生意的，他也一直是做服装的，有联系方式。正常我们就是三家公司，这么多年做下来比较稳定。……我有个客户，以前在上海的时候，我是做服装管理，他是做服装设计的。然后他也认识我嘛，知道我开了这个之后也就跟我合作。然后慢慢的你的产品做下去没有问题，价格也比较合理。他就会一直找你合作。合作的多了嘛，只要是衣服下来就会来找你。不是说这个单子做完了客户就没了，一年四季我们都是保持合作的。”（服装加工厂 A 老板）

“接单的话，我们以前在上海那边待过认识人。”（服装加工厂 B 老板）

老板之间也会互帮互助，疫情之下服装加工行业更加不稳定，几个熟悉的老板之间也会互相帮助，单子特别多的可以分给单子缺乏的加工厂做，老板表示，只有熟悉对方、信任对方才肯帮忙，一旦出现回踩和背刺，便会引发信任危机，使得老板之间的往来和互帮互助变少，友谊的破裂也即合作的破裂和信任的崩塌。

老板们主要依靠朋友、亲戚、熟人“相互介绍”招募工人，工厂的员工多数是通过熟人介绍而来到服装加工厂，通过熟悉的、认识的人能够提前了解到服装加工厂的具体情况，比如工资会不会按时发放、老板人怎么样等等。当然也有员工通过店面的招聘信息进入加工厂，与老板沟通工钱等，可以先试着做做，只要适应该厂的模式，即可留下。但老板们都表示多数员工还是通过熟人介绍来到加工厂。人之间住的比较近，有的和老板也住的比较近，在服装加工厂形成的人际关系也是她们日常生活中重要的部分人际圈，所以，工人和老板往往还有地缘关系，有着人际圈的交叉。

“大家互相之间就是一个信誉度。她如果比较信任我，就继续留在这里做。如果小孩毕业以后家里又离这比较远，可能就不会来了。像我有个工人，我刚刚开厂的时候，她就来我们这上班了。小孩从高一读到高三，然后毕业了，家里又离得比较远，不方便来上班。她就到我这拿点活回家做。她信任我，在我这里做，不用担心拿不到钱。然后我给的工钱也比较合理。他到别的人家那里去做可能不适应。有的就算离她们家近，但是她总觉得相处来不舒服，就还是来我们家这里做，还是愿意到我们这里拿点回去做。基本上还是老板和员工之间的信任。”（服装加工厂 A 老板）

## 五、“妈妈工人”：“为妻为母”的家庭角色

服装加工厂员工以本地女性工人为主，在服装加工厂基本见不到男性工人。女工年龄集中于 40—55 岁，女工们在一二十岁的年纪跟裁缝师傅学习过裁缝技术，从事裁缝行业数十年，老板称之为“熟练工”。女工们多数是学龄孩子的妈妈，她们一边在服装加工厂做工，一边照顾在附近上学的孩子，接送孩子上下学，给孩子们做饭，照顾生活起居。早上给小孩做早饭然后送小孩去附近的中小学上学。之后再赶往服装加工厂做工。中午回家做饭休息，下午继续做工，孩子放学时下班接小孩回家做饭。晚上视情况而定，当孩子在家时，如果孩子小需要陪护，就不去加工厂干活。孩子大一点的、放心独自在家的，女工就可以来加工厂干活。多数工人在工厂内做工，部分工人家里有缝纫机，也可以在家做工，这样更加方便照顾小孩，也有的将不便于留在家中的小孩带到服装加工厂来。

这些女工拥有一定的裁缝技术，但是“为妻为母”的家庭角色使她们选择留在家乡，在离家近的一个服装加工厂做工。笔者所接触到的女工，有的以前在外地打工，且很多都有在大厂工作的经历。但因为自己的孩子逐渐长大，自认为不能继续交给老人照顾，需要更多妈妈的陪伴和照料，而到了学龄的孩子也不方便跟随父母在外地上学，于是，这些女工回到家中，承担照顾子女的家庭责任。女工们的丈夫则继续留在外地打工，因新冠疫情也很难回家，少了丈夫的分担，女工们身上照顾孩子的责任更重了。此外，照顾孩子、履行母亲的职责时，她们也要尽可能为家里补贴家用，减轻家庭的经济负担。妻子在本地一边打工一边照顾小孩、丈夫在外地挣钱的模式在服装加工厂女工的身上非常典型，这也反映了当地社会文化情境之中的性别分工观念，是基于家庭性别分工策略的决策。

女工 E 有一个刚中考完的儿子和一个六年级的女儿，丈夫在上海打工。她来到服装加工厂 B 也是因为 B 厂就在家对面，带小孩也比较方便。女工 E 不是本地人，以前因为丈夫在黄桥镇学手艺便搬到此地，后来孩子陆陆续续在这上学便留了下来。她打算等孩子考走了，就离开镇上。之前她在黄桥镇北边的一家服装加工厂工作，因为孩子升学，便跟着孩子换了一个更加方便的加工厂。女工 E 之所以到这种小型服装加工厂工作是因为厂里能为她提供“想来就来，想走就走”的人性化环境。女工们的生活重心都是自己的孩子，缺少自己的娱乐时间，当笔者问她们平常会不会和其他工人约着出去玩或者自己旅游时，女工们都会说“哪里有时间啊，我们要照顾小孩啊。”女工 E 正计划等女儿考完期末考试之后，每天晚上带孩子出去玩，白天就在厂里上班。为妻为母的家庭角色在她身上得到了体现。服装加工厂工人人们的“时间自由”其实是“照顾孩子自由”，她们在加工厂的时间安排从属于养育孩子的时间安排。

“为妻为母”的家庭角色使得这些妇女工作时间受到限制，她们不太可能进入全日制的加工厂。若要将她们吸纳进入生产体系的话，那么，资本则不得不承认“为妻为母的家庭角色”在她们的价值序列中的首要位置，并据此作出相应的机制安排，下文将介绍服装加工厂对于“妈妈工人”的吸引力。

## 六、加工厂的吸引力：“不同于大厂”的组织管理

在服装加工厂与老板和女工交流时，女工都表示自己在小厂比较自由，方便照顾小孩，才来到加工厂做工。在调研中，问及加工厂的工作模式和员工关系时，老板和员工会不自觉地说出：“小厂跟大

厂不一样”“不像大厂”之类的话语，他们会不自觉地将小型服装加工厂与大工厂进行比较，并突出小厂“自由”的特点。服装加工厂的时间弹性和“不同于大厂”的组织管理机制与“妈妈工人”们要求的“自由”相适配。

“反正有时间就做。不像那个正规的企业几点到几点钟上班，中间也不能走动什么的，他们有什么事了就可以放下来回去弄一下。为他们提供方便嘛，在家里带个小孩，找点工作嘛也没事，坐在家里还不如出来工作嘛，赚点钱，增加她们的收入。”“也不像人家那种大的企业嘛，只要这些员工跟着我们做，别什么上两天班回家休息三天。”（服装加工厂 A 老板）

服装加工厂的老板清楚女工们“为妻为母”的角色，会“为她们提供方便”。这些服装加工厂很“自由”、“人性化”，没有成文的管理条例，配合了“妈妈工人”的家庭照料的需要。服装加工厂上下班时间自由，在服装加工厂 A，我们发现，大家下班的时间并不统一，员工们也可以随时放下手中的活去处理紧急的事情。服装加工厂也不区分休息日和工作日，多数服装加工厂没有严格周末双休或者单休。员工们的工作时长并没有硬性规定，一天的工作时间可长可短，用老板和员工的话来说就是“有时间就做”。员工的工作时间是事先与老板沟通好的，有的员工工作时间长，有的员工工作时间短。如果员工哪天有事不来，提前说一声即可，没有繁琐的请假手续和步骤。

“大厂上班也有的，但是那样就没时间了，小孩上学补课就没时间去接送了。”（女工 A）

“大厂主要是不自由。小厂自由一点。因为我们要照顾小孩的嘛。大厂的话时间就比较固定，然后人多一点，管理的人多了。不像在这里就是老板和老板娘。”（女工 D）

逢年过节、寒暑假和毕业季，员工的流动性很大，但是服装加工厂却很少出现不能按时交货的情况，这是因为订单管理很灵活。在与上家公司约定货期的时候，服装加工厂的老板会考虑货期内自己服装加工厂的生产能力，有多少个员工，多少货，大概需要多久能完成。老板们充分考虑“妈妈工人”的劳动特性来进行服装加工厂订单的选择和货期的考量，才得以维持加工厂生产体系的运转。

从工资计算方式来看，服装加工厂采取计时工资和计件工资，不同的服装加工厂的工资计算方式略有差异。如果是计件工资，女工们在一定时间范围内完成工作量即可，而在此范围内的时间可以自由安排，随时休息。如果是计时工资，那么只需要指纹打卡上下班，工作时间内尽量抓紧干活，有事还是可以随时离岗，毕竟她们的自由是“照顾孩子自由”。对于“妈妈工人”来说，无论计时还是计件，都比全日制的大工厂来得自由，更方便照顾孩子。

“我们比较自由。你有时间的话就多做一点，没时间的话就少做一点。我儿子上学的话，我晚上一般就会做到 9 点多。他要是上补习班啊，他什么时候放学我就什么时候走。”（女工 B）

虽说工作时间和时长没有硬性规定，但是也不会出现工人经常不来上班的情况。因为工人们一方面自己要赚钱养家，另一方面也要考虑与老板的情分。另外，学龄孩子的作息比较规律，工人们上下班也还比较规律，所以工人们都保持着相对稳定的工作时长。

总之，为了吸纳有着缝纫技术的“妈妈工人”，同时满足她们照顾家庭的需要，服装加工厂在订单管理、工资计算、工作时间上都有着相应的适应机制。

## 七、结语

随着非正规就业、远距离外包等劳动用工和生产模式的出现，劳动力市场逐渐形成弹性机制，雇佣关系和劳动技能更加灵活。服装加工厂的“妈妈工人”们从前外出打工到后来因为照顾家又离开劳动力市场，如今又重新回到了全球生产产业链。在传统的家庭分工和性别文化的影响下，她们没有进入所谓的大工厂进行枯燥乏味的流水线生产，而是直接进入了就近的按需生产、直接揽活的小型服装加工厂。她们劳动内容属于传统劳动范畴，但是劳动组织形式却不同。女工们在小型服装加工厂的就业形式属于非正规就业，加工厂没有劳动合同和五险一金，工资按件计算、按小时计算，加工厂的招工、接单等也离不开熟人关系网络。这些服装加工厂有着类似家庭客厅的工作氛围，这里既是她们的工作场所，也是老板和员工的生活场所。服装加工厂的时间弹性和“不同于大厂”的组织管理机制与“妈妈工人”们要求的“照顾孩子自由”相适配。服装加工厂可以通过控制单量和调整货期来协调不稳定的员工做工件数，计时计件的工资计算方式使她们有了自由的上下班和做工时长，便于女工们照料小孩。镇上的小型服装加工厂既离学校近，也离家近，在这里的非正规就业其实是这些已婚妇女在平衡为妻为母的家庭角色和工作角色之间的矛盾，在这里工作既满足了她们照料家庭的需要，也满足了赚钱补贴家用的需求。

在黄桥镇的小型服装加工厂，我们看到了拥有着“家庭本位”价值观的“妈妈工人”在参加工作时对工作和家庭的平衡，也看到了为了吸引“妈妈工人”这类嵌于家庭的劳动力进入劳动力市场，加工厂在组织管理机制上做出的调整。这类工厂形式，不仅存在于黄桥镇，也不仅存在于服装加工行业。在现代工厂制度逐步确立和发展的同时，我们尚不能忽视像这类建立在“乡土性”社会之上地方特色的来料加工厂，它们对“妈妈工人”有一定的积极意义。但我们也要思考，这些加工厂在推动女性走向社会的同时，家庭和工作的双重责任是否也加剧了女性的负担，是否也加剧了社会性别不平等。

### 参考文献：

- [1]白美妃, 2018,《客厅工厂与妈妈工人——鲁东山县缝纫加工点的民族志研究》，《广西民族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第40卷第1期。
- [2]陈文超, 2012,《嵌入于家庭本位中的经济行动及其实践理性——兼评熊秉纯博士的〈客厅即工厂〉》，《创新》第6卷第5期。
- [3]林慧琳、肖索未, 2020,《工厂即客厅：外包制鞋厂的劳动过程研究》，《社会学评论》第8卷第5期。
- [4]彭希哲、姚宇, 2004,《厘清非正规就业概念, 推动非正规就业发展》，《社会科学》第7期。
- [5]熊秉纯, 2010,《客厅即工厂》，重庆：重庆大学出版社。
- [6]张曦, 2019,《乡村产业发展模式的实践机制——基于家庭与市场互动的视角》，《暨南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第41卷第10期。

☆ 作者简介：罗楚怡，河海大学社会学 2020 级本科生

☆ 责任编辑：杨梓聪

# 缝纫机间的交往：A 镇制衣间的生产模式与往来

杨子萱

---

**摘要：**A 镇制衣间作为当地具有一定数量和规模的产业类型，为迎合当地留守女工的需要从而产生了随停随走的独特生产方式。在制衣间中，在情感劳动的调动下留守女工得以喘息却又受其控制；女工们拥有了经济价值却仍处于传统性别的枷锁中；员工们、老板们相互交流并达成团体进行内部交往；以计件计工资制度为代表的不同的生产制度也体现了其特色与差异。

**关键词：**留守女工 情感劳动 去性别化 计件工资制度

---

## 一、引言

制造业是国民经济的主体，是立国之本、兴国之器、强国之基。十八世纪中叶开启工业文明以来，世界强国的兴衰史和中华民族的奋斗史一再证明，没有强大的制造业，就没有国家和民族的强盛。根据国务院发布的《中国制造 2025》文件，我国正逐步走在制造业飞速发展的道路上。我国制造业类别包含多样，目前正加大力度推进高科技信息相融合的制造业进一步发展，走向世界舞台，同时，我国内部长久以来发展的第一产业的制造业也在逐步推进，其较为代表性的则为制衣业等。据中商产业研究院发布的《2020 年中国服装产业集群市场前景及投资研究报告》显示，目前全国共有纺织服装产业集群 216 个，集群内规模以上企业数量、主营业务收入、利润分别约占全国纺织行业规模以上企业的 41%、43%、45%。其中，江苏吴江、江阴、常熟，浙江萧山、柯桥、桐乡，福建晋江、福建长乐，广东普宁等重点纺织服装产业集群年主营收入过千亿。同时，国家也在引导和支持长三角、粤港澳大湾区等纺织产业主要集聚地的纺织服装企业加快转型升级。

随着经济发展的同时，我国从事产业生产人员也逐步递增，尤其以外出务工的流动人口为代表，在流入地从事产业生产相关活动。然而，流动人口的生产劳动，具有明显的拆分型劳动特征，即流动人口到城市或沿海地区打工，但是他们的劳动力再生产仍然由家乡来承担。沿海城市等流入地区政府不用承担他们的住房、养老和子女教育等责任，他们不得不像候鸟一样往返于农村家乡和城市沿海地区，这种现象被著名社会学家迈克尔·布洛维称为“拆分型”劳动体制，具体表现为流动农民家庭层面离散化、碎片化和再生产拆分状态。针对流动人口而言，其在流入地所工作生产获得的工资最后大部分用于户籍所在地的家庭生活如赡养老人、抚养孩子等，因此，对受到拆分型劳动体制影响的从事生产制造相关工作的人员，形成了鲜明的性别割裂特征：女性作为承担家庭抚育责任的群体留守于户籍所在地进行相关工作，而男性则外出流动从事其他工作。留守女性在维系家庭承担责任的同时，也需要一定的经济来源，而本地的制造业迎合了适合留守女性的生产制度，令留守女性可以自如选择从业时间、甚至是地点，从而使其可以在家庭与工作间流转，因此大受留守女性的欢迎。熊秉纯在《客



厅即工厂》中便探讨了相关制度，以批判的视角与质性的方法揭示了工厂女工的劳动机制、工厂体制等，探索工厂女工在生产间的人际关系和角色扮演，从而见微知著，剖析政治体制、社会脉络、家庭结构、社会性别模式间的互动与关系。熊秉纯所探讨的工厂女工已是十余年前的台湾社会，在变速如此之大的时代下，在如今的中国大陆，城镇中具有代表性的纺织制衣业又是否还具有其所揭露的特征，又或者是否在时间的变化中产生更改或催生新的制度，具有如何特色？如何的人际交往关系？不同生产制度之间又是否存在差异和比较？本调研选取 A 镇具有代表性、成规模的小型制衣间为对象，探索其依靠缝纫机所带来和维系的制度作用和人际交往。

## 二、研究对象和研究方法

### （一）研究地点及对象

A 镇位于长三角地区，2020 年，A 镇主要经济指标领跑其市，全国县域经济基本竞争力百强排名第 22 位，比上年提升 6 位。全年实现地区生产总值 1127.47 亿元，增长 3.99%，人均 GDP 超 10 万元。一般公共预算收入 85.43 亿元，位列全省第七。2020 年本地轻工纺织产业实现开票销售 174 亿元，同比增长 2.31%。A 镇作为当地经济较发达的地区，其纺织业也保持着良好的发展水平。其中纺织业制造业主要分为两种类别，分别是规模庞大的大型公司工厂以及规模较小的人数大约 20 人左右的自营制衣间。其中规模较小的制衣间迎合了当地留守女性平衡家与工作的需求，产生了员工可以自行上下班不限制时间与地点的灵活就业制度，本调研发现此类制衣间在当地成规模、且具有固定的相似模式，围绕其制衣间内生产展开调研，共调研 6 家制衣间，访谈近十位员工与老板。

### （二）研究方法

#### 1.文献法

文献调研可以帮助研究尽可能掌握目前已有的研究内容和结论，有效指导调研明确其研究方向，并为其提供参考。本调研通过研究目前已有的关于小型制衣间的研究资料、当地的地方志与相关报告，了解目前制衣间的发展状况和背景，明晰目前已有的制衣间相关制度，从而推动本调研进一步明确对制衣间的调查方向与内容。

#### 2.访谈法

访谈作为质性研究方法中的重要环节，可以更清楚切实了解到研究对象的主观想法，从而将资料进行整理对比与分析，得出相关结论。本调研访谈制衣间中多位女工，意图了解其对制衣间相关制度的真实看法，探讨其与老板间的劳资关系，知晓其生活环境和家庭背景。同时访谈不同制衣间的老板，进一步从不同维度视角对原有调研内容进行补充，得出更完整的研究内容与结论。

#### 3.观察法

观察法作为第三视角进入现场观察，可以获得更客观更全面的信息。本调研于 A 镇制衣间开展了多日的实地观察，观察员工与老板间的互动以及员工间相互的交往，同时来往于不同制衣间，对比其不同生产制度所带来的不同效果与影响，寻求更客观的资料对研究内容加以辅助。

### 三、蜜糖还是砒霜：逆向情感劳动与控制

情感劳动来源于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其侧重点是“生产”，强调情感与资本积累、再生产之间的关系。情感劳动中既包含着“数字经济”对劳动者的剥削，又包含着“礼物经济”中劳动者解放、实现主体性的潜能。德勒兹将情感劳动视为一种使人从现有的组织化经验中脱离出来，重新获得新的感性经验的生成流过程，是一种“存在之力或行动之力的连续流变”。它不是一种“刺激-反应”的单向度功能，并不是传统批判理论所强调的“非自愿的、强制性的劳动”，而是“劳动者在情感劳动的实践中不断地肯定自己，发挥自己的才智，以喜爱和激情作为驱动力，构建社群网络，获得极度自治的认同感。在此过程中，劳动实践是一种主体性生产，在劳动过程中不断地获得自己的本质力量的确证”。情感劳动作为对员工劳动积极性与能力的一种调动，同样也在制衣间内员工中体现了出来。但这种情感劳动的体现并非为传统意义中“老板作用于员工”，而是形成了相反的境地，倒置产生逆向的情感劳动，由员工工作于老板，“要求”其提供一定的“情感服务”。

制衣间员工以女性为主，且身份多为需要照顾家的留守女性，因此小型的制衣间成为她们平衡生活与工作的不二选择。在制衣间内可以看到员工的孩子在店内肆意玩耍，而这种情况大家对此也早已习惯，老板甚至还会和员工的孩子进行互动与玩耍。制衣间内主要以计件为主，缝纫机在店内工作且马不停歇，但这种工作并非如工厂一般是持续的、固定的，而是可以由员工自行决定继续与否的——特别是家中有孩子的，会在孩子下课的时间准点进行停止，从而“潇洒离去”，而老板并不会斥责，反而任由他们而去：

“我们是没有固定的工作时间的，你想来就来，想走就走。我们这里基本上都是家里有小孩的，他们必须回去给小孩做饭，照顾小孩，不然小孩还怎么办嘛。而且给工资也是按件给的，你做多少你就拿多少，你看要是做的少，那对应的拿的工资就少了。有的人她自己回家也会在家里做的。”

同样的，制衣间女工这正因如此才选择在制衣间进行工作：

“我家里有孩子的，我小孩在这边的中学上学，我就回来了，总得有人照顾小孩吧。……我不去工业园那边的厂子上班，那边不自由。那边就是计时的，每天你要做够时间，要到点才能下班，我没法照顾小孩。像年轻人去那边干活的多一些。”

制衣间这种独特的生产制度带来的人身与时间的自由满足着留守女工最根本的需要，同时，老板对其独特的相处关系也令她们在精神上得到更多慰藉。制衣间内，不同方向的小桌与缝纫机错综复杂，员工彼此相对而坐，埋在缝纫机里，老板也同员工一起坐在其中，如果不进行仔细寻找，无法在第一时间分出谁是老板，错综的排版将老板与员工的距离拉近，同时也打破了固有的劳资关系。

“老板人很好，真的。我们会有个群呀，里面都是我们，然后老板过节还会发红包啊之类的，而且老板他人很和气的，都和我们在一起。我以前在那个大厂，老板一天都见不到人的。……会的呀，如果谁家有事儿，老板肯定会过去看，送点东西什么的，看能不能帮帮忙。”

传统的情感劳动中，员工在老板的要求下对自身进行要求，提供相应的情感服务，而制衣间由于其主要员工的身份——留守女工的特殊需求，反而促成了对制衣间生产模式和老板的情感服务要求，

产生了逆向的情感劳动。制衣间内老板与员工之间的关系，似乎除了在发工资与制定任务时体现两者之差别，其余时间更像是同事、朋友之间的关系，在制衣间内似乎并没有额外的身份差距，人们都像被缝纫机同化了，之间的交流都是平等的、无差的。制衣间员工极其享受并受用这种老板的“好”，在某制衣间感受不到老板的“好”时，甚至会在一定时间后逐步辞职并由他人介绍来到“好”的制衣间。而老板的“好”也让留守女工们死心塌地在制衣间工作而非选择其他行业，情感所赋予留守女工在传统社会下承担家庭责任的喘息的空间，无形之中促进了他们在制衣间持续且长久劳动的可能性。

然而，情感带来的并非只有表面上的“糖的甜蜜”，在暗地里也在隐形地控制她们。当问及关于老板的“好”时，她们除了描述相关的交往所带来的温馨外，更多的还是提及其工资问题——这家老板好，从来不拖欠工资。在员工心中，不拖欠工资作为资方本应该履行的义务反而成了其人格优异的标签，而对于无法正常给予工资的老板，员工们却无可奈何只能另找下家。情感劳动所为之带来的可平衡家庭与工作的慰藉，换来的代价便是无劳动合同的拟定与签订，让其对劳资关系中两方矛盾的反抗成为不可能。更甚一步，留守女工强烈的在家和工作间奔波的平衡需求也似乎只能通过制衣间的独特生产制度为之满足，于是留守女工不得不在上一任失败的工作经历后继续寻求制衣间的工作，并把发放工资等作为资方的义务归结为老板的人格差异。

逆向的情感劳动表面上颠覆了传统的劳资关系，让资方受制于劳方，老板为员工提供的情感服务似乎带来了制衣间内特有的和气与平等交往。事实上，这种独特的生产模式也仍旧逃不过本质上劳方被资方的控制：制衣间独特的随停随走模式实际上是制衣间留守女工不得已的妥协，疲于奔波家庭与工作的留守女工只能选择制衣间的生产模式作为她们唯一的选择。当出现劳资矛盾时，由于其没有劳动合同的特殊性，劳方被迫失去了维护其利益和权利的筹码，却由于留守女工身份的需求，不得不仍然再次选择回到制衣间的独特生产模式，进行一次又一次的循环。于是，制衣间内表面上看似是缝纫机陪伴的欢声笑语与带来的情感满足，实际上是员工潜在中不得不被控制在缝纫机当中延续其生活、维系其家庭的被迫于无奈。

#### **四、如线团般紧密：制衣间内的团体与交往**

##### **（一）员工团体**

制衣间由于较为小型，人数大约在二十人上下，同时制衣间平均 50m<sup>2</sup> 左右，因此桌子都相对、交错而排列，巧妙地促成了员工间紧密相间、面面对的空间。面对枯燥且单调的手部制衣动作，熟练工的员工自然而然开始了之间的对话，包含生活、家庭以及一些打趣儿的玩笑话，逐渐员工形成了相应的互相熟悉的团体。

“我们平常就聊聊天，在这里相处的挺融洽的，说说笑笑的一天就过去了。平常也可以随意走动的，小厂不是那种（大厂），是可以的，我们平常吃饭也是可以一起吃的，在后面，自己带饭来或者老板他们做。”

留守女工们由于身份都相似，在传统社会下具有相似的家庭与烦恼，因此他们自然而然在缝纫机作伴中找到了有共鸣的话题，互诉家长里短。逐渐的这种由工作带来的表达和倾诉欲深深吸引着留守

女工们，将“通过工作获得表达与倾诉的机会”模式进行了颠倒，从而形成了“为寻求表达的机会从而寻找工作”。

“其实我也不是很需要钱，这点钱也不是很多，我就是在家里闲得，想出来找人聊聊天陪一陪，而且这里也自由，能照顾小孩。”

制衣间已经不单单成为女工们进行工作的场所，而是在一个团体共同的促进下，成为了他们对社会交往的需要的承担地。通过制衣间内的交往，员工们形成了超脱于同事之上的近乎朋友的关系，在相关的微信群里发布自己的照片、一起相约旅游、一起出去吃饭等等行为都在促进并维系她们的关系，并让她们可以在工作与生活中紧紧相依。同时，制衣间的工作应聘更倾向于熟人社会中的介绍制度，通常都是由员工介绍熟悉的人直接开始工作，从而进一步增强了员工团体的熟悉程度与紧密性。在红白喜事等相关邀约时，员工们也通常作为被邀请的对象一起出席，而非仅单独挑选其熟悉的好友进行邀约。同时，员工们也维持着“有难同当”的关系，在家中出现困难时也会积极相助伸出援手。这种通过工作间所诞生的情感的联结，让员工们紧密相拥成一个互助互娱的团体，承载着其对情感的需要与社会交往的渴望。

## （二）老板团体

员工们互帮互助紧密相连，某种意义上“被排斥在外”的不同制衣间的老板也同样进行交流：

“我们是有一个微信群的，我们老板都在一起。在里面就聊聊天之类的，有的时候在外面遇见也会打招呼聊一聊，就聊一些工作上的事情，今年的活就很难办，很多老板都倒闭了，疫情对我们影响还是很大的。”

相较于员工之间的团体交流，其抛却了员工与同事的身份，老板间的交流更倾向于工作方面的来往与讨论。但老板间的团体并非互相联系便不紧密，老板间互不相助，而是以相关工作的形式进行另一种体现。

“疫情生意真的不好。有些老板家里生意不行，或者家里有困难的，我们也是能帮则帮，给他们匀过去一点单子之类的，尽量帮帮他们。”

老板之间通常会互相交流对方的工作状态和当今形式，对于有困难的老板，通常会改变自己的客单数量，转移给另一位老板进行接济。制衣间老板都有着制衣间的工作经历，其大部分为外地打工后，返乡继续工作的人员。通过在外打工的经历认识并结识相关的制衣老板可以提供客单，从而返乡做起制衣的第一产业进行客单的输送。而这种上下道工序流程的连接，正是基于与制衣老板间的熟悉度，从而得以进行。

“你们（没有认识的人的话）根本开不起来店的，都没有人认识你们，你们开什么，也没有人给你们单子。”

老板间的团体，通过工作的形式紧密联系在一起，也会通过工作的形式将“异端”排斥在外，在互帮互助的团体内，仍然存在着私下的竞争关系，而部分老板的恶性竞争则会卷走令一些老板的单子，从而致使其脱离老板团体从而被排斥。

“诶呀，有的呀，只能说当时没有认清楚人。我们当时给了他们单子，结果他们私下去联系，把我们后面的单子都卷跑了，我们很生气，但也没办法，只能说吃了个教训，以后不和这种人来往了。……其实这种人也不多，他们后来就慢慢倒闭了。”

相较于员工团体，老板所形成的团体间的交往是更隐形的，潜伏在工作的形式之下，但这种交往却是更关键的，直接决定着制衣间客单的数量与发展，熟悉的关系催使客单的到来，破裂的关系推动其疏远，老板间团体的往来更是围绕着制衣业的，并在暗地里形成了人尽皆知的规则：尽量帮助困难的老板、不要恶意抢单等等，不遵守规则的老板将会从人际关系上进行疏远受到团体的排斥，从而逐步在受到人情关系深刻影响的制衣间行业中被迫退出。

### 五、希望中的枷锁：女工的去性别化

传统经济下通常男性作为家庭经济的主力军，而女性则作为辅助，更有甚者女性无经济收入而作为附庸依附于男性。伴随经济发展，女性也逐步进入工厂等地，获得其经济收入，但女性的步入并没有对男女性别间的差异做出巨大的改变，两者间鲜明的在社会中的性别差异仍然存在并倍受关注。制衣间生产作为 A 镇具有一定数量和规模的生产方式，其员工配比也体现着鲜明的性别特征，其员工皆为女工，而老板则为男性，通常以“1+N”的一位男性老板与多位女工的员工配比模式。

制衣间作为当地制造业中的一个类别，也吸引了一定数量的从业人员，但从业人员却全以女性为主，几乎没有男性的身影。在制衣间的工作，一定程度上可以给女性带来相应的经济支持，补贴其家用，缓解其女性的经济压力，但对于其他行业、甚至是本行业的其他生产模式相比较，制衣间所带来的经济收入是微薄的。

“没有的，我们没有那么多工资的，如果要工资多的话可以去厂子那边，进工厂里干，那里钱会多一些。像我们吧，小孩上学，我们自己在家也很无聊。早上还好，送小孩呀，买菜，做菜。上午吧，下午我就没事干了，然后我们又不喜欢打牌呀。就在这做做，做几个钱算几个钱，无所谓的。”

制衣间女工虽然获得了相应的工作并从事了相关的体力劳动，同时获得了一定的经济收入，但由于收入是微薄的、无所谓的，女工在制衣间中的经济角色与地位被剥夺了，作为制衣间中从事主要经济生产的她们将自我的工作定义为对孩子的陪读，是一种次要的辅助品，否认了自我的经济价值，即便这个价值微小但却切实存在。

制衣间内最具有其性别代表性意义的角色是老板娘，老板娘同为女性，但在劳资关系中的身份却存在于女工的对立面，作为资方参与进制衣间的生产中。事实上，老板娘的资方身份仅从客观上进行定义，在实际上的工作过程中，老板娘更像是一位制衣间内的员工，与女工们共同工作，在展现资方身份——进行任务下达、工资发放时，老板娘却隐身其间，由老板进行相关事务。老板娘作为老板与员工中间的连桥，其角色只被认定为老板的妻子，而非制衣间内共同的老板，从事着与员工相同的工作，更履行着做饭等相关的义务，其行为和角色，不过是在将家庭嵌入进了制衣间，形成了另一层面意义上的“留守女工”，只是免去了地区间的奔波。老板娘本应作为相较于制衣间女工中更有经济价值和经济创造力的女性，确仍然在这种传统的男权社会中扮演着传统女性角色，进一步暗示 A 镇制衣间

当中其男本位的核心，女性则作为辅助为之付出。

制衣间的工作机会与当地留守女工的需求实际是相辅相成的，正因为留守女性的需要，才催生了当地制衣间可以随停随走的生产模式，而这种生产模式本应是调动女性劳动力，催生女性经济价值为目的，却忽略了留守女性的存在本就是在传统男权社会下女性在生活中不得不做出的妥协与让步，男本位的社会思想熏陶并营造出了留守女性群体，其本身便为家庭的存在付出了全部精力。制衣间作为有规模、有数量的生产作坊，其凝聚的女性力量与经济价值不容小觑，其女工的数量与规模也令人无法忽略，这本应是当地留守女性的对自我的一次去性别化，将自己同样视为可以进行工作的个体，却在工作的过程中再一次被刻板地再性别化，将其经济价值打造为家庭的陪读与辅助，进一步强调了男权视角中女性作为家庭的一员应全身心服务于家庭、奉献于家庭的角色定位。自纺织业工厂开始后，女工陆续进入工厂，展示其经济能力，破除原有的性别印象，而制衣间作为纺织业的一个分支，本应给女性的去性别化带来希望，却反而成了束缚女性的枷锁，用传统的性别意识与家庭观念将制衣间女工锁在了男权社会中无法跨越的性别横沟。

## 六、共鸣中的差异：计时与计件

制衣间作为已经形成独特且固定的生产模式的场地，展现出了其许多特征，但细究发现其在工资计算方式时却存在着差异，即存在着计时工资制与计件工资制两种方法，前者的工资发放按照员工所工作时间计算，后者工资发放则按照所做成的物件数量计算，两种不同的工资计算制度看似只是制度上的区别，却在客观现实中对制衣间原有的生产特征上增加了差异与分歧，并在不同方面进行体现。

### （一）“老板是老板嘛”

计时与计件中的员工都与老板存在于同一空间进行工作，而这期间两方也自然而然在缝纫机的陪伴中进行日常的交流或打趣，但计时相较于计件却受到了更多的限制，这种限制不仅包含工作期间，也包括了社交关系。

“他们计时的（指另一家，此老板家为计件）老板很严的，有的时候都不让说话的。毕竟的呀，按照时间做的工资，你多说一点你就少做一点，老板心里肯定是不愿意的。打个比方，我一个小时给你20块了，你要创造21块的利润，如果你只做了19块钱的利润的话，就会不舒服了。你要一天两天还好说，那时间久了就会产生矛盾。”

“（此家老板为计时）有的人不能怪老板严的，有的人她也太不自觉了呀，有的人那简直就是浑水摸鱼。”

“（酒席的随礼我们）一般不收吧，总会有分开的时候啊，像我们孩子大了，他也不一定在黄桥上学呀。怕还不了礼，对，可能在别的地方去了，那个时候就不在这。”

“老板他不可能跟我们聊什么东西，老板是老板嘛，工人干活他不可能跟你去聊。哎哟，我跟老板干嘛要做朋友？我跟老板娘可以做朋友，跟他做什么朋友。……（工资是）老板给的。”

在计时工资制的制衣间中，员工和老板虽然存在交流，但流量明显要少于计件工资制的制衣间，缺失了“其乐融融”的氛围，甚至有些计时工资制的老板会要求员工尽量少说话，从而可以抓紧其手

下工作。在与老板的社交关系中也相较于计件工作制更加生疏，在随礼等赠予行为中，更注重“有来有回”的平等，而非重视礼物背后存在的意义与价值。计时工作制为老板与员工间隔上了一层壁垒，也一定程度上损伤了当地制衣间情感劳动所带来的影响，稳固了客观意义上的劳资关系，为两者的团体划分了界限。

## （二）“她自己犯的错为什么要我帮”

紧急情况的出现和应对方法往往可以反映出群体最真实的现状，针对制衣间而言，其大量爆单连夜赶工无非只是其日常生活的双重叠加，对其仍处于一种可操控的范畴内，而只有在整个制衣间出现制衣错误，需要进行大量修改时，制衣间才处于一种前所未有的紧急状态，计时工资制和计件工资制也在紧急状态中展现了不同的应对策略与情绪输出。

“（计件厂老板）今天就是出现问题了……她做什么做错了就自己改一下，要是太多了改不过来我们就会都帮着改一点，你改一点我改一点大家都早早弄完嘛。”

“（计时厂老板）可以帮忙弄弄，但是肯定你自己做错了要自己负责啊，就是如果我们指导的人指导错了，那时间就算我们的，但是如果我们指导对了，他们自己做错了，那他们打卡下班，然后去返工。这肯定不能算他们工钱的，别人也不会帮她们，他们都按时间算工钱的。”

计件工资制的制衣间通常会相互帮忙，共同度过紧急情况，体现着其“如线团般紧密”中的互帮互助与凝聚性，员工合为一体共同协助更改错误。而计时工资制的制衣间由于其工资结算方式的特殊性，以时间为单位，都在维护“属于自己”的时间，当进行协助时，“属于自己”的时间将会被占用从而无法继续产出，无法达成老板心目中的要求，从而更倾向于选择“自己的错误自己负责”。计时工作制的员工在计时制度的影响下具有更强烈的个人主义，倾向于原子化的独特个体，不但体现在上文所谈及的与老板之间的隔阂，更体现在同事之间的相处，在以手工辅佐缝纫机的第一产业，纺织业的小制衣间中，计时工资制反而催生了更接近当今现代化城市中人员的行为与心理。

## （三）“现在都用指纹打卡了”

计时制相较于计件制度，是制衣间目前逐步发展的产物，老板表明虽目前制衣间计件数量占大多数，但制衣间计时制度的数量也在逐步上升。而计时工资制似乎更具有现代化的气息与影子。

“她来找我们工作的时候我们会先给她点衣服让她先做做看，看一下她的速度啊能力啊之类的。要是做的好就把她留下来给她开工资，做的不好我们就不要或者给低一点的，她自己也明白，干一段时间就自己走了。”

“以前都是手工写。比如早上你几点上班，晚上你几点下班写下来。后来慢慢有的人嘛不自觉了，现在呢，都是指纹打卡呀。你干了多久都有记录的，不会有错的。”

“我们有的时候用人急嘛，就去找工会（中介），让他们帮我们带人过来，我们再给他们钱。”

无论是计时工资制中出现的哪一个环节，都能与现代的工作模式进行一一对应，实习期、打卡记录、中介商或是 HR，都具有当今企业工作的雏形。更有计时制度的制衣间将老板与员工的工位分离并划以距离，调整员工间工位的排列，使其规整并拒绝使用原有的面对面的工位摆放形式。计时工资制

度对传统的制衣间而言，更像是一种外来的，由现代模式嫁接转化而成的制度，既结合了目前大型服装企业工厂中的严格的计时制度与工作形式，又融合了制衣间内留守女工对平衡家庭和工作的需要，从而使当地制衣间的生产更精准化、清晰化、现代化，在制衣间的独特生产模式的共鸣中，走出属于自己具有差异化的道路。

## 七、结论与讨论

制衣间作为 A 镇具有一定规模和数量的产业类型，承接了大量留守女性的工作需求，其独特的随停随走的生产特征也正是迎合其需要的产物。在传统男权社会下，女性通常被要求远离经济岗位，从而服务于家庭，因此在拆分型劳动的生产下，女性则作为家庭中辅助的一份子进行妥协与让步，成为被留守的对象留在本地。当地的制衣间以及其发展较好的纺织业为留守在当地的女性提供了一份经济来源，而制衣间则巧妙迎合了当地留守女工的需求，为其提供着平衡家庭与工作的可能性。总体而言，这种特殊的生产模式为了迎合当地数量众多的留守女工从而催生而来，又由于制衣间的单位规模小、主要为个体经营商户不具有严格的规章制度等要素，自然而然地与制衣间相融合，形成了独特但成规模的制衣间生产现状。

制衣间满足其需求从而带来的“随停随走”“劳资平等”的情感性劳动令当地的留守女性转为了制衣间的留守女工，这种生产制度看似是为了迎合需求，其实也在无形中产生着控制，令留守女工在劳资关系中模糊了相关界限与义务，并与其独特的生产制度紧紧相连无法分割。同时，制衣间所带来的女性经济价值也由于其生产制度的特殊性而更多地被忽视掉，作为陪读孩子而衍生的工作生产制度所创造出的经济价值也在潜移默化中成为了陪读孩子照顾家庭的附属品，女性在本应为她们带来独立意识的工作中反而更进一步被强调并固化了传统观念，将女性定义为家庭的辅助者和奉献者，制衣间的工作行为反而成为了留守女工的刻板性别的枷锁。

缝纫机作为日复一日单调工作的机器，也同样昭示着女工在工作中单纯手部活动的枯燥，而在错落有致的面对面的工位中，相互交流、打趣儿成为其共同的选择，伴随着逐渐深入的交流与长时间的陪伴，女工们的角色与关系已经由同事转变为朋友，并形成了相应的团体，在团体中互帮互助、紧密依靠，制衣间中的缝纫机成了她们每日的期盼与情感、社会交往的依托。相应的，老板也形成着固定的团体，而这种团体以工作为维系，通过客单的沟通、转移进行加固，也通过客单的流失进行对“异端”的排斥。老板与员工在缝纫机的注视下形成了独属于自己的团体，并依靠其进行经济与情感的获得，从而紧密相拥，不可为外界所打破。

《客厅即工厂》中，卫星工厂的生产模式与制衣间十分相似，都顾及着居家留守女性的独特需要。但在 A 镇制衣间中，伴随现代化的发展，在原有的基础上逐步出现了两种不同的工资计算方法：计件工资与计时工资。计时工资相较于计件工资，其许多流程与特征都与现代化企业工厂中的生产相吻合，并推动着员工的个性化，加强劳资关系间权限与边界感。计时工资是在时代发展下外来的产物，在与当地制衣间相互磨合而成后，兼具当地留守女工的需求与经济发展的需要，开辟了更具现代化、精准化的独特生产方式。



制衣间事实上是纺织业行业发展中企业发展的雏形，汇聚着当代留守女性在传统要求中的让步，对情感与社会交往的渴望，人群团体间交往的法则和现代化模式入侵的痕迹，而这些都被微缩在日夜不停的缝纫机中，反映于紧密依靠的制衣间里。缝纫机间的交往不单是员工的，也是老板的，更是其行为背后制度的、思想的映射，而在错落而至的缝纫机间，欢声笑语其乐融融，交往仍在继续——并永不停歇。

### 参考文献：

- [1]陈光杰，2021，《计件工资制和计时工资制在制造型企业中的应用》，《黑龙江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第17期。
- [2]黄岩、胡侦，2020，《外发工厂：拆分型劳动体制下留守女工的兼业生产》，《妇女研究论丛》第1期。
- [3]刘芳儒，2019，《情感劳动（Affective labor）的理论来源及国外研究进展》，《新闻界》第12期。
- [4]李敏、高广祥、刘继红，2012，《制衣小企业计件工资及其谈判特征》，《中国人力资源开发》第3期。
- [5]马冬玲，2010，《情感劳动——研究劳动性别分工的新视角》，《妇女研究论丛》第3期。
- [6]苏熠慧，2021，《性别与劳动研究：理论、概念与启发》，《妇女研究论丛》第1期。
- [7]熊秉纯，2010，《客厅即工厂》，重庆：重庆大学出版社。
- [8]杨馨，2020，《情感劳动的传播政治经济学批判——以L后援会为个案》，《新闻记者》第9期。
- [9]叶文振、奂倩，2019，《社会性别视角下的情感劳动过程》，《中共福建省委党校学报》第3期。
- [10]曾迪洋、原璐璐，2022，《“去性别化”与“再性别化”：新中国工业劳动体制中性别关系的塑造》，《学习与探索》第4期。

☆ 作者简介：杨子萱，河海大学社会学 2020 级本科生

☆ 责任编辑：杨梓聪

# 守龙世家<sup>1</sup>的观念基础：一个巡护员的家族使命

玉可可

---

**摘要：**本文通过对一个巡护员的工作过程展开分析，试图呈现他建构“守龙世家”这一标签和符号背后的观念世界与行动意义。在“守龙世家”这一角色领会、互动和建构过程中，ZS 强调巡护员的行动者角色扮演与“第三代守龙人”自我观念（角色认同）的一致性程度，在竞选和工作过程中构建被排斥的外人、和被惩罚坏人，为自己的行为赋予传承和正义的理念，强调不断选择和建构自我观念。

**关键词：**符号互动 角色建构 观念基础

---

## 一、问题的提出

C 村隶属于皖南 N 县的 J 镇，位于 J 镇东部，地处 A 省周龙<sup>2</sup>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的一个重要片区。全国目前野生周龙数量仅 200 条左右，仍处于极度濒危状态，而 C 村内的核心栖息地的周龙都是野生种群。C 村从 2020 年 5 月起，在保护区管理局的领导下，通过采取地形塑造、水系连通、植被修复、食物链构建和增设防护设施等措施科学有序地开展生态修复，扩大周龙栖息地面积，提升栖息地环境质量。保护区划分成核心区、缓冲区和实验区三个部分，C 村内正是该片区的核心区域，C 村总面积约 5 平方公里，其中有 4 平方公里都在核心区域内。

ZS 是 A 省周龙自然保护区 CL 片区管理站的一名巡护员，每天的职责是巡护和保护区栖息地，以及制止违法行为，如电捕鱼、网捕鱼、网捕虾、捕鸟等。他还有另外一重身份，就是 bilibili 视频网站上一名拥有十万粉丝的 up 主（视频博主），他的“野生周龙守护者”的简介是“守龙世家，三代艰苦守龙人！请关注三连，一起宣账号传保护绿水青山，保护国宝野生周龙们！”，这是他对自我的身份定位。ZS 的爷爷 ZJR 是当地的第一位看护员，从他的爷爷 ZJR 开始，Z 家与周龙结下了不解之缘。

在 ZS 的视频网站简介中，他讲述了从爷爷开始，自己家与周龙结缘的故事，并介绍了自己想要继续做这份工作的原因。

“我是 ZS，是守龙世家第三代守龙人。我的爷爷奶奶从四十年前就开始义务守护野生周龙，为了守护野生周龙一生艰苦，一生穷苦。现在我也接手爷爷的担子，开始守护野生周龙和这片绿水青山。

我辞去外地的工作，回来接手爷爷的担子是因为受我爷爷奶奶的影响，也是我自己从小一直想做的事。（还有一个原因是之前那个新设的巡护员知法犯法，在我爷爷塘里捕鱼，极其不负责，极其恶劣，

---

<sup>1</sup> 匿名处理，隐去当事人相关信息

<sup>2</sup> 匿名处理，隐去当事人相关信息

爷爷带着我长期多次的到处求领导处理，才撤了他，几十年的心血差点毁了。）虽然回来做巡护工作工资会很低，也会十分艰苦。但我喜欢这个工作，喜欢守护周龙们，也不想辜负爷爷的重托，更不想我爷爷奶奶一生的努力白费！！我在做好巡护工作外也做了很多义务宣传和保护的义务。

每天除了巡护保护区栖息地，发现违法行为，比如电捕鱼，网捕鱼，网捕虾，捕鸟，栖息地乱种菜，砍伐树木植被等都要及时制止。虽然因此得罪了很多村民，但我从未想过放弃。另外还要给村民和更多人做宣传和科普，并制止保护区内的违法乱建，违法养殖，破坏环境等行为。我自己也做了一些宣传和警示牌，也在网上给更多人做科普和环保宣传，希望更多的人重视保护生态和保护野生周龙。

经过几年的努力，栖息地里的违法行为已经很少见到，很多以前没见过的野生动植物也经常能看到，并且新扩大的栖息地已经能经常看到小周龙活动，这是生态渐好，野生周龙种群向好和扩大的好事。

对未来，我希望野生周龙们都好好的，健康平安，小周龙的存活率高一些，生龙活虎。我也希望人们的生态保护意识更强一些，对违法行为处罚力度更强一些。对于我自己，再苦再难我也会一直坚守下去。只希望生活压力小一些，能温饱，能得到更多的支持和帮助！”

在 N 县本地，村民都称呼周龙为“土龙”。Z 家从 ZJR 开始，亲切的将其称呼为“周龙”，在 ZS 的描述中，C 村这一片的周龙和他拥有一样的姓氏，就像是他的兄弟，Z 家的子孙，将他们看作家人一样看护。ZS 也表示守护“周龙”是为了不辜负他的爷爷奶奶的努力和托付给他的重任，将其看作是一种家族使命。

笔者于 2022 年 7 月在 C 村开展了一周的实地调查，通过与 ZS 本人、保护站与村民的访谈，发现了这一现象的基本特点。第一，关于 N 县 C 村周龙的报道多与 Z 家的故事有关，ZJR 老人守护周龙的故事被很多大小媒体报道、渲染，且多强调这一守护的“义务性”。第二，Z 家人在守护周龙的过程中，身份经历了从制度外的义务守龙员，到只有补助的“看护员”，再到受 N 县保护站管理的，由保护站每月发放工资的，有“五险一金”的巡护员的三个阶段的变化历程。第三，ZS 在履行自己的职责工作时，与附近村民的关系不太好，常常得罪一些人。

更值得注意的是，ZS 在接受记者采访或在社交媒体运营中对外宣传，以及接受笔者的访谈时，多以“守护周龙的名义”，并有意识的强调“守龙世家”、“三代守龙人”等一系列具有家族传承意义的身份和符号，强调 ZJR、以及整个 Z 家对于守护周龙的贡献，他认为没有 Z 家，就没有周龙的今天。在最原始发现周龙的塘边有一座小房子，之前是 ZJR 夫妇住的地方，现在 N 县周龙保护站在此挂牌，ZS 平时上班也在这里。屋子里张贴着许多 ZJR 爷爷的物品、事迹宣传海报、保护区简介、周龙科普知识等，屋子里一部分是保护站布置的，一部分是 ZS 布置的，张贴着“守龙世家”的锦旗。周龙是 ZS 起的昵称，他很少使用学名来称呼这种动物，而是一直将其称为“周龙”，并对贴在保护站的宣传海报上的动漫龙形象“合合”和“乐乐”表示不屑，认为不延续周爷爷的传统叫“周龙”是想抹掉 Z 家守护周龙的功绩。

本文关心的经验问题是，为什么 ZS 会努力强调自己的家族使命，强调“守龙世家”的身份符号？

换言之，支撑他建构“守龙世家”这个概念，排斥“外人”插手巡护周龙业务、惩罚“入侵栖息地”的“坏人”行为背后的观念基础或者行动逻辑是什么？同时将进一步探讨，Z家的“守龙世家”符号是如何建构的，以及背后蕴含的理性和情感的考量。

## 二、理论、研究策略与调查对象

现将本文的经验问题纳入符号互动论与角色理论的研究脉络来考察：通过梳理相关理论对类似象的解释，进一步提出本文的研究策略。

### （一）符号互动论与角色理论

符号互动论又称象征互动论，是一种主张从人们互动着的个体的日常自然环境去研究人类群体生活的社会学和社会心理学理论，由美国社会学家米德创立，并由他的学生布鲁默于1937年正式提出。“符号”是指在一定程度上具有象征意义的事物。符号互动论认为事物对个体社会行为的影响，往往不在于事物本身所包含的世俗化的内容与功用，而是在于事物本身相对于个体的象征意义，而事物的象征意义源于个体与他人的互动（这种互动包括言语、文化、制度等等），在个体应付他所遇到的事物时，总是会通过自己的解释去运用和修改事物对他的意义。

早期符号互动论代表乔治·H·米德(George H.Mead)提出角色领会(role taking)概念,即个体感受并理解他人角色、视他人态度和部署而采取行动(Mead,1962)。结构论学者拉尔夫·特纳(Ralph H.Turner)指出自我角色一定程度上是对他人角色的适应和领会,互动就是角色领会和角色建构,角色建构过程涉及角色确认或校正,即个体根据重要人物、相关群体或者认同标准对角色的评价等进行角色确认,进而产生行动者之间持续的互动<sup>[1]</sup>。还有哈罗德·加芬克尔的常人方法学与欧文·戈夫曼的戏剧理论。哈罗德·加芬克尔的常人方法学强调语言是使现实得以完成的媒介,互动就是解释互动,强调了符号交往过程的索引性。欧文·戈夫曼的戏剧理论强调个体的角色扮演和印象管理,强调表演的程序和对情景的丰富定义。他指出个体直接面对的角色通常会卷入较深,甚至角色痴迷,而对于个体在其中处于从属地位的角色来说,会有相当的角色距离,个体会削弱这种角色紧张和距离,表现出溢于角色之外的新增的自我特征,丢掉完全顺从角色的包袱(Erving Goffman, 2008)。

总之,过程角色论和表演角色论受符号互动论的影响,注重角色领会、互动和建构,强调行动者角色扮演与自我观念(角色认同)的一致性程度,强调不断选择和建构自我观念。这些为研究ZS对守龙世家第三代守龙人的角色认同和角色行为之间的关系、巡护员角色认同的互动和建构等奠定了基础。

### （二）研究策略

ZS的行动不仅受到利益结构、制度、社会舆论的影响,而且与他对于这种行为“别人如何看”等内心想法紧密相关,后者是他的观念世界的主要内容,也是这种强调“守龙世家”行为中“正当”的来源。

本文的研究策略是从调查对象的说法中剥离出他们的想法和感受,从这一事件中ZS的行动和理解出发,呈现他的“守龙世家”背后的观念结构。主要的研究方法是深度访谈法。深度访谈法主要采取非结构化访谈,通过对ZS、ZS的伯母、A省N县周龙保护站的T站长、以及保护站第一任站长老L

站长的访谈，还原 ZS 及其家族的环保历程、家庭使命，以及保护区中各个空间的权力关系运作。

（三）调研地点与调查对象基本情况

C 村是一个隶属于 A 省 N 县的行政村，村面积约 5 平方公里，户籍人口 3839 人，常住人口 1100 左右，以 60 岁以上的居多，耕地主要种植水稻和小麦，外出打工人口集中在江浙沪地区。C 村地处野生周龙核心保护区，栖息有目前世界上最大的野生周龙种群，由于保护周龙，C 村大片区域被划定为自然保护核心区，村庄自身发展受到一定程度的限制，2016 年，C 村被划定为国家级贫困村。

1982 年 6 月，A 省政府批准成立 A 省周龙自然保护区。1986 年 7 月，保护区升级为国家级自然保护区，更名为“A 省周龙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由八个区域组成，总面积为 18565 公顷。

其中 CL 片区规划区域总面积 3170 公顷，核心区为 490 公顷，缓冲区为 1489 公顷，实验区 1190 公顷。CL 保护点所在的位置，位于 C 村内，这里也正是 CL 片区的核心区域。C 村总面积约 5 平方公里，其中有 4 平方公里都在核心区内。

世纪 70 年代后期开始，因为栖息地环境恶化，周龙数量锐减，仅分布于皖南的一片狭窄区域，并曾一度濒临灭绝。我国政府将其列为国家一级重点保护野生动物。最新监测数据显示，周龙野生种群数量已从最低谷时的约 120 条上升到目前的约 200 条。

1986 年，保护区建立以来，通过采取就地保护和人工繁育相结合的措施，周龙的种群数量逐渐增加。2019 年开始，周龙野放工作进入更为系统科学的五年计划。据统计，2019 年、2020 年分别放归 120 条、280 条，今年将是野放规模最大的一年，计划放归 530 条。放归野外的人工繁育周龙会在科研人员的保护下，逐渐适应野外环境并产卵繁殖，完成野化，进而壮大野生周龙种群规模。

本研究的调查对象都与 C 村的周龙保护工作有关，基本情况如下表 1 所示。

表 1：调查对象基本情况

姓 名	性 别	职业或身份特征
ZS	男	ZJR 二儿子的儿子，现任 A 省 N 县周龙保护区 CL 片区巡护员。
YL	男	在 2019 年曾任过几个月的巡护员，家住在 Z 家小屋旁边。
T 站长	男	A 省周龙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管理局 N 县保护站站长。
L 站长	男	A 省周龙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管理局 N 县保护站第一任站长。
T 伯母	女	ZS 的大伯母，ZJR 大儿子 ZHF 的妻子。

注：出于保护受访者隐私需要，上述姓名均为化名。

三、被建构的“守龙世家”

“守龙世家”指的就是 Z 家，从 ZJR 爷爷开始算起，三代分别是 ZJR，ZHF（ZJR 的大儿子），ZS（ZJR 二儿子的儿子，ZJR 的孙子）。他们仨人先后担任过巡护员的工作，有意思的是，ZS 的大伯 ZHF 只担任了两年的时间，有一年是与周爷爷共同巡护，之后被撤换。

ZJR 是 N 县 J 镇 C 村村民。1983 年初秋，N 县林业局人力有限，也没有经费建保护站，当时林业

局的同志问他是否愿意承担保护周龙的任务时，他不由得犹豫起来：家离水塘较远，管护不便；田地里农活多，没有时间和精力。但是“国家一级保护动物”几个字使他下定了决心，义无反顾地接受了保护周龙的这一重任。他对妻子说：“我们对国家没什么贡献，看看能不能在这上面做点贡献。”

夫妻俩不顾亲朋好友的劝阻，在杨树塘边搭了两间简陋的草棚。为了观察方便，靠水的一面没有砌墙，用几块塑料布来遮挡风雨。“千万不能让国宝绝在我们手里！动物跟人一样，不能断子绝孙。我们活也活在草棚里，死也死在草棚里。”他俩一边为自己打气，一边开始了对周龙的护养。看护周龙，除了要解决它的吃之外，还要防止人们伤害它、偷盗它。不但要白天护，还要晚上护，三十多年如一日。

很快，ZJR 夫妇的感人事迹吸引了许多媒体的报道。

07、08 年左右很多记者来，隔三岔五就来，后来更高级的政府才来，10 年左右更重视了。后来爷爷七十五六岁的时候搞不动了，来求大伯一起搞。ZS18 年回来，就不想出去打工了，说要搞周龙，18 年和大伯共同搞了一年。20 年和 ZS 说大伯岁数大了，保险买不到，正式把大伯裁下来了，现在大伯有时间出去打点零工，大伯自己搞了三年。（20220701TAH）

各级媒体、甚至是央视、外国记者都争相来到这个小村庄的小房子，争先报道 Z 家“人龙情深”的感人事迹。媒体增加了周爷爷和这片区域的曝光率，间接促进了周龙保护工作的发展。周爷爷看护周龙多年，为这个片区周龙的发展做出了巨大的贡献，早已把周龙当作自己的家人，也自然地将现在保护区发展得越来越好视作是自己的成果，所以他们认为自己家人去继续“守龙”是理所当然的，用他们的话说就是“保护好周龙”。

根据 ZS 伯母 T 阿姨的描述，爷爷年纪大后，一个人无法完成工作，便让自己的大儿子一起帮忙。后来 ZS 辞去工作回到村内，在 18 年帮着大伯一块巡护，后来 19 年大伯因为年龄和保险问题被辞退，站里聘请了新的巡护员，就住在 Z 家小屋的旁边，即下文会提到的 YL。后来 Z 家人通过上访将巡护员的职位夺了回来，ZS 从 19 年夏天开始担任巡护员。

“三代守龙世家”，是一个很吸人眼球的标签，因此，也有许多新老媒体争相报道 Z 家的故事，将 ZS 打造成艰苦守护、兢兢业业、背负着家族使命的新青年“巡护员”。ZS 的 b 站账号支持者也很多。有很多人给他发私信、评论表示支持，也有很多动物保护爱好者在他发起募捐时给予资金支持。ZS 在接受采访和访谈时，以及在社交平台上发布宣传视频时，他很少以“巡护员”这一身份来介绍自己，更多的是使用“守龙世家第三代守龙人”这个身份，他甚至很少穿保护站的工作服，更多的出镜是穿着自己定制“守龙世家”的文化衫。ZS 的微信、微博等所有社交媒体平台都叫“守龙世家”，世家的本义是门第高贵、世代为官的人家，在这里，更多的是强调守护周龙的这份事业，是他们 Z 家世代代的传统和责任。

ZJR 夫妇，四十载如一日，义无反顾地接受并保护野生周龙的这一重任。他们不计个人得失，历经艰难，呕心沥血，精心守护野生周龙，几乎将所有积蓄用于优化龙鱼栖息地环境，成功使 C 村野生周龙种群的繁殖数量达到目前的世界第一。他们竭力守护野生周龙，引起多个国家龙类专家的浓厚兴趣，

纷纷至 C 村考察。他们被称为“第一个能和龙鱼交流的人”，与野生周龙的事迹感人至深，创造了人与自然和谐共处的环保神话。现在，虽然日子还是很艰苦，但是 ZJR 夫妇家已经是三代共同守龙的守龙世家，他们的大爱还在继续，还在传承！”

这是 ZS 最常用的一段说明介绍，他的每个 b 站视频都会附有这段文字。“继续”“传承”等字眼，更多的可以看出他将巡护员的工作看作是一种“家族使命”，他的目的不仅仅是承担好巡护员的职责，保护周龙，还有宣传 ZJR 夫妇艰苦守护的事迹和精神。

他们（其他巡护员）做这事只是为了钱，我爷爷为了“周龙”做了这么多事情，奉献一生，如果我不继续做这个事，不继续讲的话，以后谁还记得他们，就没有人知道了。（20220630ZS）

爷爷会在小时候对 ZS 说，让他好好念书，好好念书，以后考个动物大学，好保护动物。2019 年，ZJR 老人去世。去世前他跟 ZS 说，让别人照顾周龙他不放心。ZS 决定继续守住“守龙世家”。虽然 ZS 并没有担任巡护员很长时间，但他作为巡护员对“守龙世家”的理解在爷爷的耳濡目染之下十分深刻，“第三代守龙人”的自我角色是对他的爷爷的他人角色的适应和领会，在爷爷的教育、爷爷给周龙的称谓、照顾，爷爷带着他上访夺回巡护员职位，在这样的互动中进行角色领会和角色建构，角色确认或校正。这也为下文 Z 家人排斥“外人”作了铺垫。

综上所述，ZS 在对爷爷的角色的适应和领会上逐渐构建起自己的守龙世家的观念，再加上依靠爷爷的影响力与媒体的强力推动获得了诸多益处，使他在观念上将其自己的角色建构为“守龙世家第三代守龙人”并以对待自己的家人的态度与周龙相处，排斥其他的想要“抢占功劳”的外人。这种观念的建构镶嵌于时间线与角色互动之中。这是“守龙世家”背后的第一类观念。

#### 四、被排斥的“外人”

上文提到的，Z 家上访闹事后主动退出的巡护员 YL，就是这个被排斥的外人。

2010 年，ZJR 夫妇曾与村委会签订过一份协议，协议中的最后一条写到“之后的看护，在同等条件下由乙方子女及其家属优先”。

ZJR 不愿意也不放心这份看护周龙的工作落到外人手里，只能由 Z 家人来担任，这份协议对于 ZJR 来说是一份制度上的保证。但事实上这份协议的签订并未征求过保护站的建议，而巡护员的聘用时保护站决定的，所有的巡护员都受保护站的管辖，所以此份协议实质上并没有什么效用。

在访谈过程中，ZS 和 T 阿姨都不约而同地提到了一件事和同一个人，ZJR 在去世前，也就是 19 年曾带着 ZS 到处上访，要求把现任的巡护员换下。

之前提过的那个之前的巡护员，那个知法犯法在爷爷家塘里捕鱼，特别恶劣特别不负责的人，我爷爷去世前拄着拐杖带着我几个月到处上访，到处求领导，为了不让周龙们和栖息地被践踏，为了不让一辈子的心血毁在这样的人手里。这件事是我爷爷去世前最悲伤的事，也是我必须去面对的事。每次有领导来，他追着领导车跑的画面我还记得很清楚。他家靠近栖息地，直接将化粪池的水排向栖息地，还在栖息地种树种菜，还私自去栖息地里周龙产卵的岛上采野菜。最近几天，这个人又开始了，没事就在我爷爷家附近晃悠，还随意带着别人进入栖息地，并且乱说一通。我，ZJR 的孙子，第三代守

龙人 ZS，绝对不会向违法者低头，绝对要和伤害周龙们和伤害栖息地的人斗争到底!! (20220701ZS)

跟 ZS 竞争巡护员职位的那个啊，那家人就住在我们家旁边，他们家是跟那个高站长有关系的，才当上的巡护员。他在外面打工的，老婆在家搞（看护），是不符合条件的。(20220701TAH)

ZJR 的理由是这份工作交给外人不放心，ZS 则是认为这个人玩忽职守，总是做出“侵害栖息地”的行为，ZS 伯母则认为那个人是靠关系当上的巡护员，实际不符合条件。Z 家人对此都给出了自己的解释。

但 T 站长却给出了另一种说法。

当时我们根据实际情况已经选好人选了，我们主要是想要年纪大的，已经不会外出打工的，有闲暇时间的可以帮忙巡护一下，像个兼职，因为他家离得近，人家也答应了，干了三个月，ZJR 带着 ZS 到宣城保护局上访，闹起来了。那个人就说既然这样干脆退出，让给他们。(20220630TGJ)

YL 本人则表示自己符合保护站的招聘规则。YL 的妻子则表示他们家离得近，相比起 ZS 的优势是方便巡护（ZS 住在 N 县县城，平时骑电动车上下班）。

保护站有保护站的招聘规则，五月份三十几号我就退下来了，ZJR 他们是四月份闹的，先到县里，又到宣城。ZS 又不在这里，特别是晚上，我们夫妻俩晚上吃完饭还能在附近逛逛。(20220701YL)

ZS 把 YL 当成是“破坏者”，这是在事件发展过程中一步步建构起来的。首先，巡护员的工作不再属于 Z 家，便是对外人的一种排斥，合法上岗的 YL 便已经站在了 ZS 的对立面。再加上一系列“种菜”等在 ZS 认为严重侵害栖息地的行为，虽然后期在与老李站长的求证中，认为种菜、洗衣服类的行为并不会对周龙的保护造成非常大的伤害，因为资金问题村民还未搬迁，目前保护区的核心区与村民的生活还没有办法完全分开，但是 YL 夫妇“破坏者”的形象已然在 ZS 心中树立起来了。

各方总是可以合理化自己的行为，一个人的“好与坏”并没有绝对的定论，只是在角色互动中以自己的利益为核心加以建构而呈现的结果。综上所述，在巡护员的职位竞争这一事件上加剧了两家相互对立的紧张关系。ZS 将 YL 视为破坏栖息地、玩忽职守的“坏人”，也是要破坏他家“守龙世家”使命的外人，若他不能继续当巡护员，就无法完成爷爷的遗愿，继续守护周龙。这为他的巡护员身份赋予了传承的意义，而 YL 是那个被排斥的“外人”。这是“守龙世家”背后的第二类观念。

## 五、被惩罚的“坏人”

在 ZS 负责巡护的区域，是周龙保护的核心区，国家法律明文规定，自然保护地核心保护区原则上禁止人为活动。

CL 是比较重要的，不能搞其他建筑物，人也要迁走，但是国家没这么多钱，户口要解决，工作生计也要安排，矛盾太大，就还没迁过来。(20220702LZZ)

现在村民们的保护意识已经很强了，不会再出现以前把周龙剃了喂鸭子的事情。目前周龙的保护没有什么问题，最主要的是保护栖息地，栖息地面积要足够大。这边土地流转的修复费用是县政府承担，省财政拨款，由县里执行，管理局提供技术指导。但是目前财政缺钱，只能先保持现状，慢慢流转，恢复栖息地面积。(20220630TGJ)



L 站长和 T 站长都告诉笔者，CL 的情况比较复杂，不像大熊猫出没在人迹罕至的地方，C 村的村民世代生活在这里，要搬迁涉及到资金、户口和生计等一系列复杂的问题，资金支持跟不上，所以目前核心区内仍然有村民居住，这些村民与野生周龙共生共存。他们的生活区域与周龙栖息地重叠，他们的日常生活与野生周龙息息相关。也正因如此，保护站才需要设立生态巡护员这个岗位，也就是 ZS 目前所任的职位。

CL 这片的生态巡护员主要有以下几个工作，巡护周龙，看护基地啊，制止老百姓下虾笼、捕鱼的工作。其他的巡护员还有制止违规建设。整个保护区有 23 个巡护员，要求每月巡护 42 次，一个礼拜十次。每次不低于一个小时三四千亩地，巡护要求每周全覆盖。这个工作有点像兼职，要求不是很高，设想是让周边的村民一边种田一边巡护。不是要你一天都守在那里，因为现在村民们的保护意识也上来了，只要有空的时候去巡护一下就可以了。(20220630TGJ)

每天要巡护保护区栖息地，发现违法行为，比如电捕鱼，网捕鱼，网捕虾，捕鸟，栖息地乱种菜，砍伐树木植被等要及时制止。另外还要给村民和更多人做宣传和科普，制止保护区内的违法乱建，违法养殖，破坏环境等行为。经常会得罪很多人。还有人之前扬言要撞我、恐吓我。(20220701ZS)

为了更好地发现和惩罚在栖息地内钓鱼等“违法行为”的人，ZS 有自己的办法。他在栖息地附近安装了很多监控摄像和警示牌，方便及时监控和警示伤害栖息地的行为，起到震慑作用。最常见的是向塘里丢东西，随地小便，偷鱼，下虾笼等。鱼和虾是周龙的食物，所以 ZS 不允许外人在塘里钓鱼，虾笼容易缠住小的周龙，所以也被禁止。在这里他表示自己因为制止这些事情没少得罪人，也受过很多威胁。

最常见的行为就是“偷鱼”，“偷鱼”指的是在栖息地钓鱼。ZS 把这些“偷鱼”的村民称为“坏人”，在发现有人后，他先是大声呵斥，但村民往往不怕他，两方通常会吵起来。ZS 会把这些人的照片或者监控画面视频上传到 bilibili 和朋友圈等网络平台进行曝光，配文往往是“贼”、“恬不知耻”、“恶意”等负面词汇，冲突似乎十分激烈。

#### 《赞 Z 氏守龙世家与栖地众灵》

义护珍灵胆赤诚，驱邪斗恶勇相争。

青蛇探草蜿蜒影，鹭鸟浮塘婉转声。

龙尾闲摇拂碧水，鼃头静仰沐和风。

辛劳苦守经三世，敢效愚公笃志翁。

这是 ZS 的粉丝写的一首小诗，ZS 将其分享在朋友圈，并称赞“写的真好！”，“驱邪斗恶”可以看出 ZS 将这些村民视作“黑恶势力”，并宣称要抗争到底，矛盾比较尖锐。

然而在村民的逻辑中，他们认为这片塘是公家所有，他们有权在这里钓鱼，ZS 的方法效果并不显著，因为村民并不畏惧他，因为只有县里的执法大队才有执法权，巡护员只能口头教育。主要还是老百姓对执法的权威认知，他们认为 ZS 没有实权，因此见到一个年轻人制止他们，村民们多半会恼羞成怒的反击，包括说要报复等恐吓。事实上，周龙的食物很充足，村民钓几条鱼不会对周龙造成太大的

危害，但是“偷鱼”却加剧了 ZS 与村民的冲突。

主要 ZS 他脾气也比较爆，一般那些村民钓几条鱼也不会怎么样，主要还是要注意一个方式方法，比如你好好和他说‘老师傅，这边是栖息地，不允许钓鱼的’，利用人情关系全劝导一下就可以了，没有必要引起冲突。（20220630TGJ）

T 站长认为，在搬迁之前，村民得一直和周龙共存，他们之前也在这洗衣、种菜、钓鱼，一下子让村民的生活改变，受到限制，比较困难，也可以理解，加以劝导，没有必要引起冲突，得罪村民。ZS 年轻，也因为 N 县县城居住，他与这些村民并不熟悉，更没有人情关系，不受村里的熟人社会的制约。一方面，他不会因为得罪人而在村内被排挤；另一方面，他却也很难体谅在保护区内生产生活的村民的习惯。

综上所述，ZS 为解决栖息地入侵问题而采用的应对措施一定程度上能起到震慑的效果，但在客观上也制造并加剧了与周边村民相互对立的紧张关系。将村民视为“坏人”，为他“守龙世家”的工作赋予了更为正义的、反抗“黑恶势力”的意义。这是“正当的偷窃”背后的第三类观念。

## 六、结论与讨论

围绕 ZS 的巡护员工作，本文呈现了“守龙世家”符号背后的观念世界，以及区分自己人与外人、好人与坏人的观念结构如何影响他的行动逻辑。这些观念结构平时潜隐于意识，貌似为权力和利益的理性计算压制，实际上却是支配个体行动的深层因素。本文并非要总结提炼调查对象的行为的普遍规律，而是期待通过对这样一个包含着各种复杂伦理关系并被行动者赋予多重意义的行动的理解，呈现社会行动意义的复杂性 with 微妙之处。本文的立场既非通过展示 ZS 对自己观念的描述将“守龙世家”污名化，也不是通过展现行为背后的道理单方面肯定他的行为，而是为了充分理解巡护员与“守龙世家第三代守龙人”之间的关系，呈现这些符号标签背后的准则或观念结构。

在文章中，“守龙世家”“外人”“坏人”的出场顺序，与这一事件的发展逻辑密切相关，呈现了 ZS “守龙世家”背后的三种观念结构。首先，被建构的“守龙世家”出场，这是此事件的发生机制。ZJR 老人守护周龙的精神从影响了 ZS，将周龙冠以“周龙”的昵称，将其当作家人一样守护，媒体的聚焦更加深了现在的周龙是 ZJR 艰苦守护的成果，周龙是“周龙”，是 Z 家的子孙，使 Z 家产生了“周龙优先 Z 家人保护”的想法。其次，被排斥的“外人”出场，在 ZS 的观念中，YL 是外人，不会负责，会把爷爷的心血毁于一旦，这样的逻辑让他更为坚定地要做好这份工作，不让别人插手。最后，被惩罚的“坏人”出场，这是此事件的固化机制。周边村民关于生产生活与保护生态的观念的冲突，同时又增添了“坏人”的逻辑，致使 ZS 行动开始出现正义的意义。三种观念的相互缠绕也是 ZS 身上“守龙世家”的角色认知远超于制度内的巡护员的关键。

建构“守龙世家”、排斥“外人”、惩罚“坏人”是 ZS 视角的叙事结构，“外人”和“坏人”也是 ZS 给对方贴上的标签。在“守龙世家”这一角色领会、互动和建构过程中，ZS 强调巡护员的行动者角色扮演与“第三代守龙人”自我观念（角色认同）的一致性程度，在竞选和工作过程中构建被排斥的外人、和被惩罚坏人，为自己的行为赋予传承和正义的理念，强调不断选择和建构自我观念。

总之，很难从一个普遍标准来对 ZS 的行为做出道德评价，他并非根据行为本身来判断对错，而是依据对象来定义是非。正如费孝通在《维系着私人的道德》中所言，在差序社会里，“一切普遍的标准并不发生作用，一定要问清了，对象是谁，和自己是什么关系之后，才能决定拿出什么标准来。”<sup>[2]</sup>

#### 参考文献：

- [1]周遐、朱志勇，2018，《开放大学教师角色认同建构个案研究——社会学符号互动论和建构论视角》，《开放教育研究》第4期。
- [2]费孝通，2015，《乡土中国生育制度乡土重建》，北京：商务印书馆。

☆ 作者简介：玉可可，河海大学社会学专业 2020 级本科生

☆ 责任编辑：柯佳丽

# 大梦先觉，浮世清欢

## ——读庄子思想有感

张陈晓

一提及庄子，我就会想起这篇名为《逍遥游》的古文，还记得它的第一句是：北冥有鱼，其名为鲲。这篇古文本应是高中时就要深入学习的，但大概当时是课务安排紧张的原因，我们竟只跳过了这篇文章，也就没有去系统地学习庄子的思想，语文老师也没有再找其他课余时间向我们介绍。

又因高中时我选择的是理科，对文科、尤其是历史方面的知识接触甚少，落下不少功课。好在读中国社会思想史这门专业课时，有石老师带领着我们与百家思想者促膝长谈，我感受到了从未有过的、酣畅淋漓般的思想灌溉与哲学启迪。尤其是在学习庄子的思想时，就像庄子走出了书本、带领着我的思绪在这世俗间逍遥一游一般——看万物生死轮回，感苍生有灵之道，品逍遥玄妙之学。

我还是想先简单谈谈我选择深入品读庄子思想的原因。

读了庄子，我不禁会想到在不同时代里的每一个我们，心里大概都会有这样的两个小人在作祟：一个小人常常占上风，他不断利诱、尝试说服，甚至是逼迫我们非得要在由上层统治者或领导阶级规定好的游戏规则中为争得所谓的名与利而搞得头破血流，要一丝不苟地遵循社会里条条框框的各种道德标准、传统伦理与制度规范；而另一个小人又常常只会在我们累了、倦了、困了的时候，自我们内心深处向外呼喊，试图唤醒我们沉睡已久的本心，好似是看透生死、看穿人生的沧桑老人一般，他不紧不慢地道出——放下一切世俗之辈所追逐的、所谓的心之所向，要知命顺从、去回归自然。所以我们常常唏嘘于有人奋斗一生，终于博得了所谓的名与利，可身体状况却又出现了问题，不得不用曾不顾一切去消耗、超前透支自己的身体健康换来的荣华富贵再来弥补身体的残缺与健康的滞后，一直到病重老死也未能尝遍人生至美与生命至真。

又想起曾经看过以如果终其一生只能是个普通人，你会后悔吗为辩题的辩论赛，其中詹青云先生的这样一段话令我尤为动容：人生总是这样，树林里分出了两条路，我选择了其中一条，可是我总会有一天，轻声叹息，将往事回顾，因为我只会想到那条错过路上的风景，而不会知道他的陷阱和荆棘，人会因为好奇和不了解而后悔。

人们常说，在我们志得意满、追求理想的时候，是儒家思想照亮着我们前进的道路；而当我们落寞、沮丧于挫折与失败的时候，又是道家的思想给我们以慰藉——仕途通达、人生如意时偏向积极进取，仕途不畅、落寞落魄的时候再用道家思想来平衡自己的内心……我们总是想着重来、总是不断假设着如果……就好了，可一切的一切永远都是在不停的轮回，生的终点是死，我们每一个人自出生起真正唯一的目标其实就是去赴一场终将落下生命帷幕的约定。倘若怀有这般格局，我们也不再会拘泥于生活中常见的大大小小的挫折，而是又像苏轼一般于这龌龊又浮躁的世间吟啸且徐行。

庄子有言：至人无己，神人无功，圣人无名，只为世间名利，委曲求全，犹如把自己关进囚牢一样。逍遥游中也暗含同样的道理：我们不必嘲笑决起而飞，抢榆枋而止的小麻雀，更不必羡慕其翼若垂天之云……抟扶摇而上者九万里的大鹏鸟。我们是他们，他们就是我们，我们还是他们，他们只是他们……

我也一直在思考一个问题：随着技术的发展、互联网的普及，我们总是被困在卷绩点，搞科研，搞业绩，996、KPI 等等牢笼之中，我们的个体价值为什么总要被这些界定？又从什么时候开始，我们不再拥有说走就走、做回自己的自由？杨慎写是非成败转头空，无论是过去、当下，还是今后，我们似乎把追逐名利当作人类唯一的生存手段，然而追逐名缰利锁的过程却又往往令人痛苦不堪、难以自拔。曾经的春风得意，却又经历了一番多舛命运，江山永恒，人生短暂，杨慎愈老愈深悟这一点，回首人生路经之地，青山依旧在，几度夕阳红，古今多少事没有一件不在变与不变的相对运动中流逝，是非成败又奈何，秋月春风仍依旧。庄子的高明之处就在于，他没有像杨慎那样横遭政治打击，而是在最初就看透了朝廷的腐败，宁肯曳尾于涂中，自在自得为一生所求，早早就表现出鄙夷世俗、淡泊洒脱的逍遥情怀。

《庄子讲义》的作者，复旦大学陈引驰教授曾这样自嘲：大概研究庄子久了，自己也散漫了。<sup>[1]</sup>在我深入学习庄子思想的过程中，我也真切地体会到了这一点，大胆点说感觉有点精神上的契合，但坦白地说，就是对待学习生活中的卷与不卷的现象好像也能看得更透了，有时候会出现一些懈怠懒散的摆烂躺平行为。

庄子的思想带给了我太多、太多的启迪，可我也深知，我所了解的也只是庄子思想、道家思想的冰山一角，所以我想、我愿意花更多的时间与精力去深入研究庄子，同时也希望能有给自己学习生活中出现的困惑以更多解释的话语空间。

源自生活、回溯生活，这就是我好读庄子、亦是选择读好庄子的原因了。

回归正题。

本文接下来的第一大部分将主要围绕逍遥游与齐物论，从三个方面谈谈庄子最主要的思想；第二大部分将把庄子的思想与古代其他流派的社会思想或同类型思想作一些对比研究；第三大部分，我将以前两部分所述的庄子思想为立足点，再从三个方面立足现实生活，谈谈我们现代的生活理念、伦理观念、审美情趣等方面如何受到庄子思想的影响，以及庄子思想于当今社会的现实意义与社会关照。

## 一、庄子思想概述

### （一）无可奈何花落去：消极厌世的社会思想却有死地而生的力量

我们总以为庄子逍遥于山水、无心于仕途（唯一一次当的小官，据说也是为了逃兵役），所以草率地给庄子的社会思想贴上消极厌世的标签，但我认为这个观点并不完全正确。

在《庄子·养生主》中有这样一句话：可以保身，可以全生，可以养亲，可以尽年，而养亲是指赡养父母，庄子认为是要把父母放在心里的，那么试问，又有哪一个愿意承担起对父母责任的人算得上是一个消极的人呢？

再来看看庄子所处的时代——强凌弱、众暴寡，离乱、痛苦编织着社会黑暗之网，他阐述自己的哲学理念，是为了谴责诸侯征战造成人民祸殃的社会乱象。也正是对黑暗社会的悲观，他才将视线从人世移开，纵观无穷的时空、无尽的宇宙，在那里建构一个自己的理想世界，构建出一个至德之世。试问，如果不是尚存对社会重构、天下太平的希望，又何以能有力量生发、构想一个新的理想社会？这里也许有人要反驳了：难道不是因为对社会完全失去信心，才去构建所谓的一个理想社会吗？我认为不是这样的。假设，如果你对完成一项任务没有任何的信心，你还会去思考与芸芸众生不同的方法或途径吗？不会的，我们大概率会彻底躺平，任其自然，大脑放空，停止思考。这才是消极厌世的真正状态。

显然庄子不是这样的，除对父母至亲的负责、对个体生命的珍惜以外，庄子看似消极厌世的社会思想中实际拥有着死地而生的力量，蕴含着更积极的、能动的、自我决定的含义。

因此，我们才能看到庄子思想中有空间的突破，更有时间的突破。朝菌不知晦朔，蟪蛄不知春秋：早上出生晚上就枯死的菌芝，不会知道一个月的时光；春生夏死、夏生秋死的蝉，不会知道一年的时光。与一个月、一年相比，我们的许许多多月、许许多多年到底是长还是短呢？关于这个问题庄子认为根本不重要，我们应在时间维度上突破自我局限——生命有短暂的可惜、更有永恒的可贵，从更高远的视野来观察我们的生活、好好享受生活与生命，不要局限于眼下的蝇营狗苟。哪里有那么多过不去的坎，哪里又有那么多很难放下、不能放下的执着与遗憾？有的只是，我不愿尝试过了这个坎，我不愿放下，不愿与过去释然、和解。也只有当我们可以坦然说出：也就是这样嘛，这些都没有摧毁我们啊的时候，我们才算的上是真正拥有了如庄子看待挫折、困境般死地而生的力量、胸怀与境界。

所以，庄子哪里是一个消极悲观、不愿活下去的人啊？他和我们一样：常常不能如愿以偿，常常不是事尽如意，对这个世界有太多如孩童般天真、完美的幻想。可他和我们又不一样：我们常常是经历了太多的孤独，才懂得了珍惜；经历过太多的绝望，才读懂了希望。而庄子早就能看淡世间人追逐的名与利，早就能在登山前看到天梯，在渡海前踏上小舟，比世人更早品味到余味苦涩却终有回甘的深邃与沧桑，他在我们来时路上告诉我们：无论何时，当拥有向死而生的力量。

## （二）似曾相识燕归来：对立统一与互相转换的辩证思想

庄子曾引用申屠嘉的话知无可奈何而安之若命，唯有德者能之，他超脱、豁达的力量是从无可奈何中生发出来的：安之若命，坦然接受自己的命运，面对不可避免的失败，更面对咬着牙的不甘心。这份坦荡是因为庄子明白世间万物都处在对立统一与互相转换的过程之中，那么，也就无所谓失败，无所谓成功了。

《庄子·则阳》中有这样一段话，安危相易，祸福相生，缓急相摩，聚散以成，安定与危难互相转化，灾祸和幸福交替产生，缓和与急迫相互交替，聚合和分散相互形成。安与危、福与祸、缓与急、聚与散，是我们生活中经常会遇到的事情。生命本身具有的一体性，祸福相依，所以没有绝对的好事，更没有绝对的坏事，一切都是对立统一、互相转换的。得到的同时也在失去，古有苏轼的豁达——归去，也无风雨也无晴，今有贾平凹在《舍与得的智慧》一文中表达对舍得认识的深刻要义：世界是阴

与阳构成的，人在世上活着也就是一舍一得的过程。我们不否认我们有着强烈的欲望，比如面对金钱、权势、声名和感情，欲望是人的本性，也是社会前进的动力……会活的人，或者说取得成功的人，其实懂得了两个字：舍得。不舍不得，小舍小得，大舍大得。其实，生和死也都一样，庄子在重生贵生的同时，又对死亡有着淡然的态度，生和死都是自然规律，不需要太在意。如庄子在《刻意》中说其生若浮，其死若休，《至乐》中说人之生也，与忧俱生。寿者惛惛，久忧不死，何苦也！，《庚桑楚》中说以生为丧，以死为反，生未必是绝对的好，而死也未必是绝对的坏，都是需要我们辩证地去看待。

再看一鲸落，万物生，个体生命的失去，推动了宇宙间整体生命的稳定和循环。庄周梦蝶、蝶梦庄周的故事也正是说明了这一点：宇宙的主角是生命的流动的状态，是落红不是无情物，化作春泥更护花的流动，是逝者如斯，而未尝往也，盈虚者如彼，而卒莫消长也的永恒。

再从道的角度看，天下万物生于有，有生于无，宇宙万物齐一，没有对错、美丑、善恶、大小之分。所谓事物间的对立与差异，都是我们人自己划分的结果。比如我们的绩点规则，就可以算得上是一个构建出来的评价体系。迎合这个体系，去获得这个体系的认可，叫入世；鄙夷这个体系，超越它的限制去张望外面的世界，叫出世。我们现在研究古史，看到很多我们认为出众的文学大家，像苏轼、李白等等很多很多，他们在所处的时代其实是不被主流文化认可的，因为其中的大多数文人都不愿意过分迎合当时的评价体系。我想就是如今，也有许多这样的人，他们是不可能被这个时代发现的，而只有当一个社会离开了原有的体系往回看的时候才能发现那些藏在角落里的明珠。

试看世间所谓的成功与失败的标准不也都是我们自己制定的吗？天地一指也，万物一马也，当明白了这一点后，我们会达到无我的境界，融入时空，一刹那间拥抱了整个世界。

### （三）小园香径独徘徊：逃脱世俗、独自垂钓

人活一世，无论是拥有了悲观厌世却向死而生的力量，还是明白了世间万物对立统一与互相转换的哲学思想，归根结底，还是要完成人生终极大问：我是谁？，是在乱世中不追求名利，要自在逍遥地活出的自己？还是生活在世俗的枷锁，心灵却已解放，得到真正自由的自己？

人世的生活，在庄子看来是没有生命、只剩空壳的秩序，正如天下熙熙，皆为利来；天下攘攘，皆为利往中描述的那样，为达到个人成就和目的委曲求全、糟蹋生命的纯真，而人活着的意义应当是把有限的生命放入无限的时间和空间去体验与完善自己，不受一切外因的影响，不再顾忌担忧生老病死，不再苦心钻营过去或未来。

活着，只在此时这一刻活着，方得自由与逍遥。这便是庄子逃离世俗、独自垂钓于当今社会现实意义的解读了。

曾看过这样一个小故事：端一盘切好的西瓜到后院准备吃的时候，牙签不小心掉进桌面缝里；花几个钟头，非得把牙签拿出来的是傻瓜；平静优雅地回厨房拿牙签的是儒家仁者；想都不想，直接用手拿西瓜吃的是禅宗的开悟者和道家智者。这里大底体现了人生的三种境界：执、悟、透，最高的境界便是能和天地混为一体的随性洒脱了。我尝试把自己也代入了这个故事思考，设身处地地想是我的话又会做出怎样的选择，想来想去，总能在直接用手拿西瓜吃这一动作细节描写上若隐若现地看到自

己幼时的影子。可这样来看，倘若幼时的我们已然达到道家描述的人生之最高境界，那么我们是不是在枉费大半生的力气去学习所谓的知识呢？随着年龄的成长，社会的前进，我们的思想到底是在进步还是在倒退呢？

又想起王开岭先生在《精神明亮的人》一书中说到的一句话：让我们的灵魂从婴儿做起，咬着铅笔，对世界报以纯真、好奇和汹涌的爱意。我们的世界，潮起潮退、日升日落，我们常常四处奔走却忘记为何出发、前往何处的远方天地。读庄子道家的思想，不是说我们要完全置身世外、抛弃名利，而是能在这物欲天地，于天下无道之时，挺身而出有所作为；于天下太平之后，亦能看淡世间名利功成身退。这应是一种如不羡长江无穷、不哀一生须臾，与清风明月共适造物者之无尽藏般的洒脱、自得与坦然。

在读完蔡志忠的《自然萧声的微笑：〈庄子〉解密》后，我也更加深刻地体悟到：人生在世，要逍遥于天地间并不难，人生其实很简单。我们既不必嘲笑小麻雀，也不必追求成为大鹏鸟，我们要成为我们自己。

成为我们自己并不是说，我们一定要执著于冲破现代条条框框的约定去追寻远方的自由，追求自由本身就已经落了窠臼，无所求的时候才是最自由的时候。所谓有意者反远，无心者自近，追求自由这件事本身就不自由，要想做到自由不过就是要做到无所谓。

而对于生活中的一些遗憾、一些求之不得，庄子在《知北游》一文中也有提到：乐未毕也，哀又继之；哀乐之来，吾不能御，其去弗能止；悲夫，世人直为物逆旅耳；夫知遇而不知所不遇，知能而不能所不能。我们无法阻挡各种情绪情感的喷涌而至，但也无法拦截它们散开远去。庄子说的无为，其实本质就是顺应自然的变化，尊重宇宙规律本身，使事物保持其天然的本性，去除一切人为造作，放弃和自己和社会规则的对抗。

在与人交往方面，庄子也提出了自己的见解：与其相濡以沫，不如相忘于江湖君子之交淡如水，小人之交甘若醴，淡如水只是一个结果，我们要做具有独立人格的君子，做逃脱世俗约束与繁杂、独自垂钓享浮世清欢的万物之一。

## 二、比较研究庄子思想与其他流派或学者的思想

### （一）与道家学派老子的主要社会思想

道家学说以老庄哲学为核心。老庄是两个人，一个是老子、一个是庄子。而老子是道家思想的创始人，其思想的精华是朴素的辩证法，主张无为而治。以下我将对老子和庄子的社会思想展开简要对比研究分析。

首先，关于理想社会模式的构想，庄子的理想社会简单点说是原始共产主义，是纯粹的任其自然。站在庄子齐物论的思想立场上来解读，万物都是浑然一体的，事物之间在根本上并没有彼此之分，而且还是相互依存的存在。因此也就没有家禽家畜之养，没有家庭生活了——社会里个人与禽兽杂居，自然界不会受到人类的任何改造，人们处于一个个体的天然属性得到充分体现的社会里。但他的理想社会是回归到了原始社会，终究只能是一种乌托邦理想。而老子的理想社会则是代表了农民小私有者



的利益，是一个小国寡民的理想社区模式，相较于庄子对理想社会的构想，显然老子的构想更贴合当时的社会状况，与自然间是一种和谐共生的状态，而不是庄子思想里完全融入自然、甚至听任自然的模样了。

其次，由于老子处于奴隶社会的衰落时期，而庄子见证了奴隶社会的灭亡，两人置身完全不同的社会背景，导致老子认为能够有办法及时挽回当下奴隶社会的衰落局面，而庄子则对现实社会的一切都感到毫无头绪，完全看不到奴隶社会秩序可以重建的可能。再如，对于老子来说，道是一种客观的精神实体。而我们看到《齐物论》中写到：天地与我并生，而万物与我为一，道在庄子这里则成了一种主观的精神实体。<sup>[7]</sup>

除上述提及的内容，两位学者的思想还存在很多其他方面的不同。但两者之间还存在着一定的联系。庄子是老子思想的继承者，他的思想体系整体上看还是继承老子的思想体系而来，以道观言天下之君正，以道观分而君臣之义明，以道观能而天下之官治，以道观泛观而万物之应备，从这段话中显然可见，庄子和老子一样，也提倡以道为出发点去认识世间万物的。尽管庄子把老子的事物对立转化引向了相对主义，但不可否认的是，他还是在一定程度上坚持了老子的辩证法思想。

## （二）与儒家学派孔子的主要社会思想

道家与儒家是公元前 5 世纪至公元前 3 世纪思想学派中影响最为深远的两个思想流派，两者的思想观念分别反映了中国早期传统社会生活中两个互补的特点：公与私，习俗和理智，自然与自觉。<sup>[3]</sup> 如何理解道家 and 儒家之间的关系，关于这一问题在学术界有两种不同的说法。一种是儒道互补，譬如达则兼济天下，穷则独善其身。另一种是道家主干说，站在更抽象的、哲学的角度上，具有普遍的思辨性内涵的道家比主讲较为具体事例规范的儒家担任着更为重要的角色。

儒家经孔子创立、孟子发展、荀子集其大成，之后延绵不断，为历代儒客推崇，是至今仍有一定生命力的学术流派。以下我将对儒家学派创始人——孔子和庄子的社会思想展开简要对比研究分析。

庄子描述的逍遥之游带着有着绚丽的浪漫主义色彩，充满了对凡尘世俗各种社会关系、礼俗规范和物质利益的抵触，以追求精神上的绝对逍遥和自由为人生终极目标。<sup>[4]</sup> 庄子认为社会因治而乱，强调无为而治，主张一种无为而无不为的率性政治观。然而，权利与义务之间的关系应该如同硬币的正反两面一样，无论是获得何种自由都需要肩负起相应的责任。与庄子相反，孔子一心治理社会。在孔子的思想体系中，仁是他论述的关于社会道德规范的核心，他认为每个人要主动服从礼，服从社会制定好、规定好的人与人关系的准则，主动按社会规范处理好人与人关系等等，还强调了家庭生活中的孝悌观念，社会政治生活中要保持温良恭俭让的本色，以求得那种以现实社会既得利益阶级或阶层为尊者的没有社会冲突的太平社会。我们能很容易看出以庄子为代表的道家学派和以孔子为代表的儒家学派社会思想的不同之处，前者主张对人自然天性的释放与保留，后者则希望通过礼仪规范等完善人们的社会化过程。

但其实从另外一层意义上讲，孔子的社会思想也提及到他所理解所定义的一种自由。《论语·为政》中：子曰：吾十有五而志于学，三十而立，四十而不惑，五十而知天命，六十而耳顺，七十而从心所

欲，不逾矩。孔子所理解、所向往的自由如从心所欲，不逾矩描述的那样，必须发生在仁和礼所界定的范围内，是一种相对意义上的自由。这也正如我们现代社会所讲的关于权利与义务之间的关系一样：权利和义务相互依存。义务的存在是权利存在的前提，我们是权利的主体，更是义务的主体。在权利和义务的关系上，义务占主导地位，法的根本目的是保护人的权利，但是如果缺乏义务性规范的支持，权利就形同虚设，法律就会成为一纸空文。同样，遵循社会制度和道德规范，正是孔子眼中拥有自由的前提条件，是社会机制正常运转、人民真正安居乐业的前提条件。

而庄子关于自由的社会思想就显然不一样了。庄子的自由观中，自由是乘天地之正，而御六气之辩，以游无穷，是一种绝对的自由<sup>[5]</sup>，人们自由与否、自由程度的高低完全取决于个体精神境界的高低，不存在人为设限或者人为划定自由的标准范围，也更不受是否遵循人所制定的社会制度或道德规范所影响了。因此，从两人对自由观点看法的比较来看，我们能看出，如果说孔子在意人们的行为是否合乎礼仪规范的话，那么，庄子则偏向于对个体精神最高境界的追求了。

道家思想和儒家思想同样生于乱世，却是恰好反映了那个时代和社会背景下产生的两种截然不同的生存方式和思维模式。<sup>[2]</sup>不管怎样，孔子对行为有限制的、功利性的看重，与庄子强调的无限的、非功利性的精神追求，两者都成为滋养中国几千年民族性格的思想源泉，奠定了中国传统社会思想的基础。

### 三、对庄子社会思想的现实思考

21 世纪的我们，为何要读庄子？新时代的大学生，能从庄子的社会思想中汲取到哪些精神养料？倘若庄子穿越到今天，他又会如何审视自己和世界？带着这些疑问，我展开了以下对庄子思想于当下现实的批判性思考。

我们不能否认庄子思想对我们生活的全方面深入渗透。最简单的来讲，庄子贡献了 50 多个我们几乎每天都会涉及到的成语，比如似是而非、呆若木鸡、学富五车等等。这些成语活跃在我们今天的各种形式的表述之中，虽然部分成语的含义与庄子的本意已经有了很大差别，但也说明了中华民族语言的延展性和生命力啊！

在系统学习完中国社会思想史这门专业课程后，再加上课外自己阅读获得的拓展性知识，与诸子社会思想的比照后，我还是更甚好庄子：庄子思想中展现出来的宏大视野、多元包容、变化不拘的气度，是我在精神上最为共情的、灵魂上感到最为契合的。

最后回归到我们身边生活来讲，大学生卷绩点的现象一度引发了广泛的社会关注。我们为了未来获得更好的就业机会、更广的社会人脉、更多更优的社会资源，陷入绩点至上的怪圈，在绩点游戏形塑的游戏规则中摸索尝试、执于制度规训，却往往忽视了对个体个性创新的、多样的、全面的探索。我们总是把高绩点和更美好的未来和生活简单地划上等号，因此带来了课程学习引发的自我疏离感、学习活动中的反常后果、个体的无意义感与无力感、师生同学关系的微妙与紧张得到一系列负面影响。<sup>[6]</sup>人们常说，生活不止眼前的苟且，还有诗和远方，可深陷绩点规则下的我们这样一批当代大学生的远方与诗又在何处可以寻觅？我曾一度困于这一问题的回答，可在读完庄子后，我深刻意识到了，所谓

的成功也不过是人们经过长期积累的经验做出的标准界定，同样，绩点也只是一个可以阶段性表明我们学习的部分成果的还是算不上完美的标准和依据，我们在学校中、在学习的过程中，不应该把高绩点当作唯一的追求，而是应该真正地、发自内心地去吸收真正属于自己的知识，自己想去了解、想要掌握的知识，学无止境，去认识自己、完善自己，实现属于一个社会人的自由而全面的发展！如果最后结果不如我们所意，我们也不要忘记，庄子他在那个时代是微不足道的一个人，根本改变不了历史，他更多的只是在后来改变了一代又一代人的精神，给后世很多人的精神注入了另外一种力量，他的力量是在后代，是在未来。如果我们总是抱着患得患失的心态去生活，哪里又能感受到浮世清欢的从容、快乐与真正的活着的感觉呢？

且有大觉而后知此其大梦也，而愚者自以为觉，窃窃然知之，这是庄子在《齐物论》中的一段话。我们总是在最为清醒的时候方才知人生不过是大梦一场空，他自身也是一场大梦，而愚昧的人则自以为清醒，好像什么都知晓，什么都明了。苏东坡有一句诗，人间有味是清欢，也最能体现庄子精神在俗世生活中的历练了：不过分苛求，也不过分放纵，以平和的心态去面对一切，清醒且热烈地活着，便可清澈地感受到如庄子一般逍遥于天地间的生命清欢了。

#### 参考文献：

- [1] 顾学文，2022，《飞过千年，鲲鹏依然带来启示》，《解放日报》，10月29日。
- [2] 孟季娟，2013，《道家与儒家的关系》，《中国外资》，第24期。
- [3] 王处辉，2002，《中国社会思想史》，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 [4] 王孜，2018，《自由的向度——〈庄子·逍遥游〉浅析》，《中小企业管理与科技(上旬刊)》，第9期。
- [5] 吴双，2020，《浅析孔子与庄子自由观之异同》，福建省商贸协会，《福建商贸协会2019年座谈会论文集》，[出版者不详]。
- [6] 展宁、崔志源、金敏，2023，《绩点游戏：大学生卷绩点现象的社会学解读——基于异化理论的视角》，《中国青年研究》，第1期。
- [7] 周晓红，2012，《浅析老子和庄子思想的异同》，《剑南文学(经典教苑)》，第12期。

☆ 作者简介：张陈晓，河海大学社会学专业2021级本科生

☆ 责任编辑：柯佳丽



# 脱嵌与重塑：乡村学校课后服务实践困境及优化 路径

——基于皖北 S 镇初级中学的个案研究<sup>1</sup>

何经纬 严登才

**摘 要：**“双减”意见提出学校要积极开展课后服务、并努力提升服务质量。基于 S 镇初级中学调查发现，乡村学校课后服务的开展并未取得预期效果，存在资金不足、形式单一、师资薄弱、管理混乱等诸多问题。乡村学校课后服务“落地难生根”的主要原因在于实践过程中面临着“三重脱嵌”，即课后服务理想供给与现有资源相脱嵌、课后服务价值理念与主体意愿相脱嵌、课后服务规范要求与现存机制相脱嵌。乡村地区课后服务未能有效开展不利于乡村学生素质提升和农村教育事业发展。后续，需要通过加大投资、改善基础设施建设；循序渐进、转变应试教育理念；多方协同、保证课后服务供给；因地制宜、健全课后服务机制等措施来对乡村学校课后服务予以优化。

**关键词：**乡村学校 课后服务 实践困境 脱嵌 优化路径

## 一、问题的提出

新中国成立以来，教育事业一直受到党和国家的高度重视。随着经济社会发展，贫富差距逐渐加大，地区和阶层间的教育差别逐渐显现出来。近年来，越来越多的家长在追逐子女优质教育压力下陷入了教育焦虑之中，并受此驱动选择将子女送到校外辅导机构进行补习。有学者将这种在主流学校教育之外，由家庭承担相关费用的课外补习叫做影子教育<sup>[1]</sup>。影子教育的迅速发展，给我国教育事业发展带来了严峻的挑战。譬如，干扰了学校正常的教学进度，提高了家庭教育成本，尤其加重了基础教育阶段学生的课业负担，不利于他们的健康成长。为了构建良好的教育生态以促进教育公平，我国颁布了一系列减负政策，且不断加大治理力度。2021 年 7 月，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关于进一步减轻义务教育阶段学生作业负担和校外培训负担的意见》，明确要求全面压减学生作业总量和时长，全面规范校外培训行为，并加强学校课后服务质量。早在 2017 年，教育部就曾提出通过提升学校课后服务质量从源头减少课外辅导的需求。但长期在唯分数论的教育理念影响下，许多学校的课后服

<sup>1</sup>本文已刊发于《基础教育》2022 年第 19 卷 03 期。

务质量普遍较低。尤其在大多数农村地区，许多学校甚至并未开展课后服务。直到 2021 年双减意见正式出台，许多乡村中小学在政策推动下才开始陆续开展课后服务。双减政策旨在找回教育的公共性，促进教育公平。但乡村和城市相比，教育资源仍具有较大差距。当课后服务从校外辅导机构回归校园，缩小城乡教育差距更应该关注到乡村学校的课后服务建设。那么，经过将近一个学期的发展，乡村学校课后服务的实施效果到底如何呢？

2022 年 1 月，笔者在对皖北 S 镇初级中学进行调研时发现，学校于 2021 年 9 月初开始开展课后服务。但走访中可以看到，S 镇初级中学的课后服务形式还比较单一，内容更缺少对学生综合素质的培养；高年级学生的课后服务主要以补课为主，以提高学生考试成绩为目的；低年级学生的课后服务则主要以自习课为主，老师则在讲台上处理未完成的教学任务。从 S 镇初级中学课后服务实施情况可以看到，以学生综合素质全面提升为目标的课外服务并没有在乡村学校中落地生根。基于此，本文将根据在 S 镇初级中学的调查资料，采用质性研究的方法，深入探讨课后服务在乡村学校中为何不能落地生根，并在此基础上探讨乡村学校未来课后服务开展的优化路径。

## 二、文献回顾

课后服务最早可追溯到中世纪时期的英国。当时教会为发扬博爱的基督精神，便给一些残疾儿童或孤儿提供读书唱歌免费教育场所，这成为课后服务的最初形态。<sup>[2]</sup>20 世纪初，随着西方资本主义经济的快速发展，政府便想通过解决许多家庭孩子放学后无人照顾问题来延长工人工作时间以及提高女性就业率。在这种背景下，政府开始主张推行课后服务来促进经济发展。<sup>[3]</sup>20 世纪 80 年代开始，课后服务陆续被西方国家正式纳入教育发展体系之中，被视为一项带有公益性、普惠性、包容性、公平性等特质的社会福利，受到相关法律政策保障。<sup>[4]</sup>当前，西方发达国家的课后服务已经呈现常态化、系统化、特色化的发展态势，为学生综合能力的培养发挥了促进作用，也降低了青少年越轨行为发生率。譬如，北欧四国课后通过各类活动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促进情感和道德的发展。<sup>[5]</sup>韩国课后服务则通过在学校开设特长教育、保育等多种教育教学项目，促进学生全面发展。<sup>[6]</sup>总体来看，西方国家的课后服务起步较早，发展也较为成熟，主要围绕学生的身心健康、全面发展进行课程设计，满足了学生多样化的需求。<sup>[7]</sup>

我国课后服务起步相对较晚，20 世纪 90 代后期才开始在东部沿海城市产生，并逐步向全国各省市县普及。但由于我国国情与西方国家不同，课后服务在实践过程中逐渐与促进学生全面发展的目标发生了偏离。<sup>[8]</sup>双减政策出台之前，我国课后服务的实施一直由政府主导、其他盈利机构等多主体参与，服务费用则以家庭承担为主、政府补贴为辅。在望子成龙、望女成凤的压力之下，课后服务的内容逐渐成为了辅导作业为主、培养兴趣为辅的变相补课。在缺少政府有效监督下，许多课后服务不仅没有促进学生综合素质的提高，反而加剧了教育不平等。<sup>[9]</sup>为此，学界提出了一些解决措施。譬如，周玲认为课后服务应该采取自愿形式，由财政和家庭各自承担一部分费用，将义务教育阶段的学校老师作为服务的主要提供者并积极引进校外非学科类培训机构参与课后服务。<sup>[10]</sup>游莎、周先进提出课后服务出现问题多是由于缺少服务资金造成，后续应该拓宽课后服务的资金来源渠道。<sup>[11]</sup>还有一些学者认为当

前应该建立课后服务评价体系,才能进一步提高课后服务的质量。譬如,刘慧琴提出,课后服务质量的提升关键在于转变传统教育观念,改变一直以来唯分数论为主导的学业评价体系。<sup>[12]</sup>双减政策出台之后的课后服务如何发展,学界也开展了一些讨论。贺芳、彭虹斌在其研究中认为,课后服务是为满足学生培育兴趣爱好、启发智力情感、提高综合能力等需求而开展,应该依托现代互联网技术,协同政府、学校、家长、社会组织等多方主体共同推动课后服务向高质量方向发展。<sup>[13]</sup>柯清超等人认为想要达到减负目标必须要依赖现代化的信息技术,促进教学方式的转型,提供更加优质的教育资源。<sup>[14]</sup>

从现有文献来看,学界对于课后服务的相关研究相对较少,主要集中在对课后服务的内容设计、资金来源等具体操作层面。近年来,也有部分学者开始关注到课后服务在我国实践过程中遇到的困境,并试图从文化、制度等层面予以解释。但总体来看,仍存在几点不足之处。一是学界当前对于课后服务开展提出来的意见主要是借鉴西方而来,从学理上来说具备可行性,但是和中国的具体实际仍存在一定差别,实际操作存有一定疑问。二是学界对于课后服务的论述比较笼统,忽视了城乡学校之间在课后服务开展上的差异性特征。一味强调课后服务在缩小城乡教育差距上的作用,而忽视城乡之间教育资源差距,最后只会导致城乡教育之间的鸿沟越来越宽。所以,必须要将城乡之间的课后服务分开进行研究,尤其要加快农村地区的课后服务建设。鉴于此,本文将通过具体的调查案例,从乡村学校具体实际出发,阐述当前乡村学校课后服务发展的实践困境,并在此基础上探索其优化路径。

### 三、“脱嵌”:乡村学校课后服务的实践困境解析

S镇位于滁州市定远县东部,距县城约8公里,省道S311线贯穿东西,交通非常便捷。S镇人口45000人左右,辖11个行政村,252个村民组,是定远县的人口和农业大镇。S镇初级中学成立于1956年,是S镇唯一一所初级中学。校区占地面积76亩,建筑面积约10000平方米,包含初一、初二、初三三个年级。七十年来,S镇初级中学的教学能力不断提升,许多学生从这里考进县城的重点高中,又考取大学,从此走出农门,改变了自己和家庭的命运。1956年刚建校时,全校仅有4名教师,学生也只有90余人。改革开放后,随着农村经济状况改善、对义务教育的重视程度提高,学生人数逐渐增多,教师队伍也逐渐扩充且专业化程度越来越高。从2000年开始,S镇初级中学几乎年年成为全县农村中学里考取重点高中人数最多的学校,许多周边乡镇的学生也选择在此借读。近年来,由于县城寄宿制的私立中学增多,S镇初级中学学生人数受到一定影响。根据学校的最新数据,当前S镇初级中学学生总数共有543人,专职教师共有39人。39名专职教师中,在性别上,男性教师24名,女性教师15名;在年龄结构上,40岁以上的共有25人,30岁到40岁之间共有12人,20岁到30岁之间共2人;在学历层次上,第一学历大学本科的共有8人,大专学历的19人,中专的12人。一直以来,S镇初级中学都将教学成绩作为工作的重中之重,获得了学生家长的一致认可。

2022年1月,笔者对S镇初级中学进行了为期一周的实地调查,主要针对学校的教学管理、基础设施,尤其是双减意见出台后的课后服务等方面进行细致考察。在一位介绍人的带领下,笔者对S镇初级中学校长及主要领导、专职教师、各年级学生以及家长等都进行了深入访问,访谈内容具体包括双减意见出台后课后服务开展的时间、内容和形式、实施效果以及各方满意度等方面。S镇初级中学的

课后服务分下午上学前和放学后两个时段进行,每次各一小时。经过实地走访发现,S镇初级中学的课后服务并没有得到较好的实践,主要有以下三个表现:一是课后服务开展的形式和内容比较单一,不能满足学生多样化需求,S镇初级中学开展的课后服务以课业辅导为主,和传统意义上的补课并没有较大差异。这不仅没有让学生在双减意见下减轻作业负担,反而增加了更多的课业负担,更不利于学生的全面发展;二是课后服务的提供完全依赖学校专职教师,导致教师职业疲倦明显,甚至影响正常的工作教学;三是对于课后服务的各项管理不足。走访发现,学校并没有制定课后服务相关配套机制,使得课后服务的开展非常混乱,系统性较差。笔者通过走访获得的详细资料认为,课后服务在乡村学校的开展过程中遭遇的一系列实践困境,是因为当前开展课后服务的要求并没有和农村地区教育现状完全适应,二者存在着三重脱嵌。

### (一)课后服务理想供给与现有资源相脱嵌

理想的课后服务供给是要能够满足学生多样化的发展需求,不仅包含课业辅导、问题答疑等学科知识延伸服务,也应该包括科技、文体、艺术、劳动实践等各类课外拓展类服务。<sup>[15]</sup>可见,理想的课后服务供给需要大量人力、物力和财力的支持。但走访中可以看到,乡村地区教育基础薄弱,乡村学校现有资源不足,严重限制了课后服务的开展。

在课后服务开展所需资金上,乡村学校承受着巨大压力。我国义务教育资金投入主要来自县市级政府财政,并采取转移支付的方式予以保障。<sup>[16]</sup>但根据公共产品理论,课后服务从本质上来说属于一种准公共产品,并不属于义务教育阶段范畴。<sup>[17]</sup>所以,政府对课后服务的专向资金投入相对缺乏,导致乡村学校开展课后服务可以从上级财政部门处获得的资金支持较少。针对这一情况,有学者指出课后服务作为一项非公共产品可以向家长收取部分费用,以此弥补资金不足的问题。<sup>[18]</sup>但这一想法在城市中或许可以得到家长认可,对大部分的农村家长来说并不认可。走访过程中,许多农村家长仍坚持认为学校开展的课后服务费用应当包含在学费当中,不应该单独收费;另外,还有一些农村家庭经济状况较差,无力承担课后服务费。在政府财政补贴甚微以及家长难以接受收费的情况下,造成了学校在课后服务上出现收支不平衡。笔者在走访过程中发现,S镇初级中学对于课后服务资金投入非常有限,多用来支付老师薪酬,很少有针对性改善课后服务内容和形式进行投入。S镇校长在访谈中也说了他的难言之隐。

“看到城市和我们农村孩子的差别,作为乡村教育工作者,也很着急。但是,想要把课后服务办好必须要有资金支持。如今,学校课后服务这一块资金存在很大缺口,老师上完两小时课后服务只有10块钱补助,更不用说花钱来提升课后服务质量了。”

其次,乡村学校和城市学校相比基础设施较差,不具备开展多样化、高质量课后服务的物质条件。城市学校的课后服务多依托于现代化的信息技术,利用专门的艺术、体育器材等进行开展。然而,当前乡村学校和城市花园式学校在基础设施层面仍然存在较大差距。笔者走访过程中发现,S镇初级中学仅拥有一台电脑机房且无法连接网络,只能进行简单的操作;多媒体教室仅有三间,老师基本采用传统的板书教学;由于没有专业教师,课程设计上的音乐和美术课直接被自习课替代;学校体育器材很

少，仍然是土操场，冬天雪后长时间无法上体育课。从 S 镇初级中学可以看出，乡村学校落后的基础设施给理想课后服务供给树立起了一道铁栅栏。一位老师在访谈中就说到了这个问题。

“课后服务在我们乡村只能开展补课或者自习，主要因为信息化跟不上，很多现代化的设施还没有进入到农村，要求农村学校和城市学校的课后服务达到同等效果是绝对不可能的。”

最后，课后服务不得不关注到谁来提供的问题。理想的课后服务是来自于学校、家长、社区、社区组织等多方协同供给，从而促进学生的全方面发展。<sup>[19]</sup>对于作业辅导等方面的课后服务，学校老师可以提供相关服务。但是，对于一些课外兴趣培养、科技普及等知识，必须要依赖于其他服务主体。城市学校课后服务除了利用丰富的学校资源，还可以利用学校之外的科技馆、博物馆以及一些专业性较强的社会组织资源。另外，城市学校已基本建立了相对完整的家校平台，成立了家长委员会，联合家长共同对学生进行培养。但是，乡村学校课后服务能够获得的外部资源非常有限。一方面由于农村中的专业化、志愿化社会组织并不常见；另一方面，农村许多家长常年在外地务工，学生与爷爷奶奶留守在家，导致家校联合这一培养模式难以建立。在这种情况下，学校成为了课后服务的唯一提供者。但是，由于乡村教师综合素质不足，只能提供与自己所授专业相关的知识，便大大缩小了课后服务的内容和范围。

S 镇校长在访谈中表示：“乡村学校课后服务开展不起来是因为服务提供者太少，只依靠学校万万不行。我考察了几所省内课后服务开展比较好的城市学校，他们都有一个共同的特征就是多方合作。只有多方合作，课后服务才能进行下去，取得效果。”

## （二）课后服务价值理念与主体意愿相脱嵌

不管是国外还是国内，对于开展课后服务的价值理念几乎一致。各国推行课后服务普遍建立在让基础教育阶段学生除了学习书本知识之外，还要发展他们在兴趣培养、身心健康等方面的能力，提升他们的综合素质，帮助他们快乐成长。<sup>[20]</sup>但这些年来，我国学生长期处在考试升学的压力之下，学校和家庭都将高升学率作为教育的最终目标。随着素质教育理念的宣传，城市地区教育理念逐渐受到影响，越来越多的城市学生家长为促进子女全面发展，选择一些文体类的辅导班。但农村地区经济贫困，许多学校、家长、学生等教育主体仍然坚持唯分数论，其他兴趣培养甚至被看作不务正业；还有部分学校在不出事的逻辑下，不想开设课后服务给自己增添麻烦。可见，理想的课后服务价值理念并没有和农村地区的教育主体意愿达成一致。笔者在 S 镇初级中学走访发现，学校、教师、家长以及学生自身对于课后服务的开展意愿都不强烈。

学校的部分领导对于开展课后服务的热情并不高，主要有两方面的原因。一是担心开展课后服务会影响到学校的整体升学率。S 镇初级中学自 2000 年开始，重点高中升学率一直在全县乡镇中学里名列前茅，也是校领导引以为傲的一件事。S 镇初级中学围绕升学率有一系列严格的教师以及教学管理机制。譬如，学生座位完全按照每次月考成绩安排、每月变动一次；教师要对自己所在班级同学负责，必须保证每年在全区考试中获得相应名次；每周一早上召开国旗下讲话，对于表现较差的班级、老师以及学生进行国旗下批评；每天早上，校领导会轮流在学校里用喇叭催促学生进班级背书。在这种学



业紧张的氛围下，学生全面发展排在了升学率之后。在和 S 镇初级中学的教导主任访谈中，可以感受到乡村教育工作者对于乡村教育的关心和无奈。

“我们作为校领导，必须狠抓教学。课后服务虽然好，但是这些农村学生现在开展课后服务，就是在浪费他们的时间。只有争分夺秒地拼命学习，让他们考上高中，考上大学，才有可能改变他们自己和家庭的命运。他们的下一代才有可能接受良好教育，再去参加课后服务。如果我们因为课后服务导致升学率下降，就没办法面对镇上的父老乡亲。”

另一方面，还有部分领导认为课后服务会导致学生安全受到一定影响。近年来，校园安全事件频发，保证学生生命健康安全是学校的基础性工作。延长学生在校的时长，会增加学生在校以及放学路上安全事故发生的风险。除此之外，课后服务引起的资金、管理等问题都给学校增添了额外的工作。鉴于这些原因，学校领导对于开展课后服务的意愿并不强烈。

对于一直处于考试强压之下的学生和老师来说，他们开展课后服务的意愿也并不强烈。课后服务的开展不仅需要教师拥有一定的技能，还需要延长自己的工作时间。但是，课后服务可以获得的酬劳却非常低，这让大部分老师失去了开展课后服务的积极性。S 镇初级中学的许多老师在县城买了房，每天坐乡镇大巴来上班，课后服务的开展严重影响了自己和家庭的生活节奏。一位老师在访谈中说出了自己的心声。

“说心里话，老师肯定都不想开展课后服务。以前上完课就可以回家，现在有时为了课后服务得在学校待上一整天。另外，课后服务给的薪酬太低，值一次班才十块钱，不够来回的路费钱。”

访谈中有这样想法的老师并不在少数。而对于接受课后服务的同学来说，他们也非常清楚学校并不会给他们开展丰富多彩的课外活动，只会加剧自己的课业负担。所以，很多学生在访谈中谈到了他们的想法。

“课后服务没有意思，就是上自习课，做作业呗。这些事情我们回家也可以做啊，为什么非要在学校做呢，做着就在想着什么时候放学，还会分心。”

从学生口中不难听出，课后服务并没有给他们带来更丰富多彩的生活，甚至会影响他们全方面发展。

最后，许多农村学生家长素质教育缺乏，也并不想学校开展一些和考试无关的课后服务。在他们眼里，学校的责任是教书育人，而不是教学生开展唱歌、跳舞活动。走访过程中，部分学生家长坚持认为，课后服务就应该开展教学活动，以提高学生成绩为目的。

“课后服务肯定就是要补文化课啊，我们不可能让小孩在那里看电视、看电影，跑步，打篮球。这些事情回家都可以做，为什么还要在学校玩，这不是浪费孩子的学习时间吗？”

可见，在城乡教育差距逐渐加大的情况下，农村家长的教育焦虑与日俱增，短时间内想改变农村学生家长教育理念并非易事。

### （三）课后服务规范要求与现存机制相脱嵌

课后服务想要获得长期性、稳定性供给必须要进行规范化和制度化建设。但是，2017 年和 2021 年

两次对于课后服务的指导意见都相对宏观，对于课后服务具体开展过程中的服务提供主体、资金来源、内容形式、组织分工等并没有提出实质性的政策规范。从各地实施情况来看，城市学校由于治理经验丰富、组织机制基础良好，能够较好地对课后服务进行合理安排。然而，农村学校的组织机制本就存在诸多缺陷，很难适应新事物的出现，导致课后服务开展得比较混乱。可见，当前课后服务规范要求与乡村学校现存机制之间仍存在着一定脱嵌。

首先，乡村学校在开展课后服务时缺乏非常明确的分工运行机制。在 S 镇初级中学走访中得知，虽然课后服务已经开展了半年，但并没有形成常态化、规范的分工机制。刚开始时，一般是由上午和下午最后一节课的老师带领学生开展课后服务；后来，很多任课老师抱怨如此分工分配不平均，逐渐演变成班主任带领学生进行课后服务；最后，班主任也不愿意每天去看管学生，常常导致课后服务出现没人看管的情况。

有学生谈到了这一问题：“课后服务就是自习课，有时候班主任会来看看，有时候会让其他老师帮忙来看一下。”

在这种无组织的分工机制下，课后服务开展得较为混乱。

其次，农村地区开展课后服务时缺少对于乡村学校以及教师的激励制度，造成了做得好和坏都无所谓的局面。笔者走访了解到，S 镇初级中学上级教育部门没有针对课后服务实践成效的评比活动或者相关政策。因此，乡镇中学并没有将其作为一项重点工作看待，这同样发生在乡村学校内部。很多一开始想要把课后服务开展好的老师慢慢发现自己的付出和劳动并未受到外界认可，逐渐失去了积极性。对于开展课后服务，很多老师在接受访谈时提出非常有必要建立奖惩制度。

不少教师认为：“要想学校把课后服务做好，必须要有一定的激励机制。这个激励机制不仅仅要在学校中，还应该在教育系统中。一方面，学校要给课后服务开展得好的班级和老师给予一定的奖励；另外一方面，上级教育主管部门应该给课后服务开展得好的学校给予一定的奖励。”

另外，课后服务的质量和效果如何，需要通过对课后服务评价来进行了解。这不仅可以激发各主体参与课后服务的积极性，还可以帮助找到课后服务开展中的不足之处。<sup>[21]</sup>但是实际上，在许多乡村学校中，课后服务形同虚设，更不会有相关的评价标准和机制。在 S 镇走访过程中发现，学校唯一可以规范化和标准化的指标就是升学率。这也是评价教师工作能力、课堂效果的唯一评价指标。

对于课后服务缺少评价指标，一位校领导这样解释：“课后服务暂时还未建立起来一项非常清楚的评价标准，这也是课程内容和形式所决定的。由谁来评价，是我们教师自己评价还是学生和家长评价，现在上级也并没有指导意见，我们也没厘清这其中的关系；最后，一旦学校建立起来两个考核指标，肯定会引起学校很多老师的不满。”

除此之外，笔者在走访中还发现，S 镇初级中学对于课后服务也并未建立起相关的监督管理机制和安全责任制度。

#### 四、“重塑”：乡村学校课后服务的优化路径

课后服务在乡村学校实践过程中的三重脱嵌导致其并未取得良好的预期效果，甚至产生一些消极

影响。譬如，不仅没有为乡村学生减负，反而增加了他们的课业负担；另外，由于缺乏稳定的资金来源，增加了乡村学校的经济负担，导致教师职业倦怠，影响正常的教学活动等。这些消极影响有悖于课后服务开展的初衷，最终也将加剧城乡之间的教育差别。所以，为了缩小城乡教育差距，未来必须要解决乡村学校开展课后服务的突出问题，重塑乡村课后服务的优化路径。

### （一）加大投资，改善基础设施建设

充足的资金是乡村学校高质量课后服务开展的物质保障和前提。当前，乡村学校课后服务开展过程中遇到的形式单一、内容不足、参与意愿不强等诸多实践困境都是受到资金不足影响。所以，想要优化乡村课后服务质量，必须要加大资金投入，改善乡村学校的基础设施。

课后服务作为准公共产品，学理上一般可由政府、学校、家庭共同承担费用。但是，课后服务作为促进教育事业发展、学生全面发展的普惠性民生工程，理应获得政府财政支出。尤其对于农村地区来说，许多家庭经济条件困难，对课后服务的费用确实无力承担；而乡村学校的资金供给能力也严重不足，无法独立承担对课后服务的额外投入。所以，随着课后服务的常规化、日常化、普及化，鉴于当前乡村学校发展现状，政府应该逐步将课后服务纳入公共教育服务体系，通过教育财政预算对其进行资金保障；另外，地方教育部门也可以通过建立课后服务专项，以专项资金的方式拨付课后服务经费。目前，已经有一些省市开始了这方面实践，但多局限在城市地区。譬如，郑州市目前已将课后服务经费纳入财政预算，并且出台了相关政策法规，保障课后服务有稳定的经费保障；上海静安区设立课后服务专项资金，为学校提供资金保障。当课后服务拥有稳定的资金后，学校便可加快相关基础设施建设，创新课后服务的形式和内容。除以之外，还可以利用专项资金对课后服务开展良好的班级和教师给予一定奖励，提升教师开展课后服务的积极性。

### （二）循序渐进，转变应试教育理念

乡村学校课后服务开展中遇到的许多困境，如家长、学校担心课后服务会影响升学率等，很大程度上源自当前唯分数论的应试教育观念。尤其在农村地区，在面对城乡差距的现实情况下，家庭和学校在教育上达成了高度统一，从而忽视学生的个性发展。但不可否认的是，农村地区的这种唯分数论的应试教育理念在当前教育生态面前也具有一定的合理之处，不可能在短时间内破除。今后，推行多样化课后服务、促进学生全面发展，不能操之过急，而是要逐步转变家长和教育理念，用素质教育来替代应试教育。

首先，要利用各种媒介加大对课后服务内容 & 理念的宣传力度，及时向乡村学校、学生和家长进行渗透。很多家长并不理解开展课后服务的意义，甚至认为会耽误子女的学习成绩。对于这些对课后服务的认知偏差，上级教育主管部门或者学校应该及时和家长进行交流沟通，进一步加强与家长的交流和沟通联系，帮助家长形成正确的教育理念。其次，可以将学生的综合素质作为学生成绩考核的要素之一。乡村学校和家长对于课后服务开展意愿较低，主要是怕影响学生的升学。如果将学生的综合素质纳入到各地区义务教育阶段成绩考核指标体系中，则会大大提高他们开展课后服务的积极性。最后，乡村学校教育体系中领导和教师队伍年龄普遍较大，传统教育方式在他们心中根深蒂固。所以，

当前开展课后服务，迫切需要引进一批易于接受新事物、思想开放的年轻教师。通过这些措施，可以有效帮助乡村地区教育主体转变过去传统的应试教育理念，增强开展课后服务的积极性。

### （三）多方协同，保证课后服务供给

《双减》政策的主要目的是将教育回归到校园之中，保证教育的公共性，促进教育公平。但是，强化学校在教育当中的主阵地作用，并不是意味着学校要包揽一切，承担学生的所有教育行动。尤其农村地区教育基础薄弱，仅依靠学校开展课后服务压力较大，难以保证课后服务的持续供给；另一方面，对于学生的教育也不应该只有学校，还应包括政府、家庭、第三方机构、托管平台等在内的各参与主体。当前，很多农村家长将子女送到学校便外出务工，忽视了子女的教育问题，导致家庭教育严重缺乏。另外，农村地区可以利用的社会资源较少，也是课后服务的制约因素之一。所以，当前不仅要发挥学校在课后服务供给中的主体作用，还应推动家庭、社会组织等多方主体参与课后服务建设。

双减意见出台后，学校在课后服务的提供上承担着主体责任，必须要增强主体意识和责任意识。这要求学校利用好现有设施条件，真实、有效地去开展课后服务，并且要不断创新课后服务的内容和形式。许多乡村学校为了减轻工作任务，直接将课后服务变成风险与成本相对较小的自习课，导致课后服务名存实亡；另外，乡村教师普遍年龄较大，不会使用计算机、多媒体等现代化的教学工具，直接影响课后服务的质量。所以，学校应定期组织课后服务的教师进行技能培训，帮助他们进行能力提升。

同时，家长作为学生的监护人，对子女进行教育有着不可推卸责任。在课后服务的开展中，家长也应该是重要责任方和参与方，要与学校共同履行课后服务的监管。学校可以广泛吸纳部分常年在家 的学生家长，成立家长委员会，并挑选出部分能力强的家长轮流帮助学校开展课后服务。而对于那些常年务工的家长，可以成立网上家校群，让他们及时了解子女在校表现，在网络上参与到课后服务中来。不仅如此，家长对课后服务拥有监督的权力和义务。家长针对课后服务提出的改进意见能够帮助学校改进服务，提升课后服务质量。

除了学校和家庭，还应借鉴城市学校课后服务经验，通过引入专业性较强的社会力量来提升课后服务的质量。许多城市学校在开展科普、文体、艺术等兴趣拓展类课后服务时，采取志愿活动、政府购买等方式，与校外专业人士、正规机构积极合作，借助社会力量为学生提供更为广泛和专业的服务。但对农村地区来说，可以链接的第三方社会力量资源较少。这就要求政府和有关部门要通过购买社会服务的形式或者链接一些志愿性质的社会组织入驻农村地区，以此来丰富课后服务资源，提供多元化的课程服务。

### （四）因地制宜，健全课后服务机制

当前，政府对于课后服务并没有制定明确的实施细则，导致课后服务在开展过程中缺少政策指引，存在权责不明、监管不力、资金短缺等情况，在农村地区体现得尤为明显。所以，想要在乡村学校中开展好课后服务，必须要积极建立课后服务机制。但也应当注意到，各地情况具有差异性，相关政策和机制的建立不能一刀切，必须要因地制宜。

首先，地方教育部门应制定学校课后服务质量标准，依据标准对各个学校课后服务的开展时间、内容与形式等方面进行统一考评，进一步提升课后服务的重要性。对于考核结果要及时向社会公布，并且将其纳入学校教育质量评估的总体框架之内。另外，地方教育部门还应建立课后服务资金筹措机制，明确各方责任，保证课后服务的开展有充足的资金。

其次，乡村学校也要从自身具体实际出发，制定相应的课后服务机制。一是要建立合理的激励机制。激励机制是学校课后服务开展的重要保障。课后服务给乡村教师带来了额外的工作量。所以，应该通过相应的物质激励和精神激励来对课后服务中的老师予以鼓励；二是要建立课后服务的反馈机制，这是课后服务质量提升的重要保证。学校应该设立相应的意见收集渠道，全面了解教师、学生、家长等各主体对于学校课后服务实施的满意度，并及时反馈给授课教师，帮助老师及时优化课程设计。最后，学校还应该建立课后服务的安全管理机制。良好的安全管理机制不仅能够起到预防和及时处理课后服务中的安全问题，还能够在保证学生安全下更大程度地开展好课后服务，提升课后服务的质量。

## 五、总结与讨论

双减意见的出台推动了各地中小学课后服务的开展与质量提升，不仅增强了教育服务能力，营造了良好的教育生态环境，还对促进青少年综合素质的发展起到了重要作用。本文通过对皖北一所乡村中学实地调查发现，虽然学校在双减政策推动下开展了课后服务，但仍存在内容和形式单一、资金不足、师资力量缺乏、管理混乱等诸多问题，并未取得良好效果。而造成乡村学校课后服务难以落地生根的主要原因在于乡村学校在课后服务实践过程中面临的三重脱嵌：一是课后服务的理想供给与现有资源相脱嵌；二是课后服务价值理念与主体意愿相脱嵌；三是课后服务规范要求与现存机制相脱嵌。在这三重脱嵌下，乡村地区的课后服务不仅没有促进学生全面发展、提升教育公平，甚至导致了学生负担加重、教师职业倦怠、学校正常教学秩序被打乱等意外风险。为了缓解乡村学校课后服务的实践困境，后续需要通过一系列措施来重塑乡村学校课后服务的优化路径。首先，要加大投资，改善基础设施，解决课后服务开展过程中物质条件匮乏的问题；其次，要循序渐进，逐步转变家长和学校唯分数论的应试教育理念，提高课后服务开展的主体意愿；三是要多方协同，学校、家长合作参与的同时，也要积极引进社会力量来保证课后服务供给；最后，要因地制宜，健全课后服务机制，保证课后服务有序进行。

最后，本文仅是基于一个乡村中学为案例开展的质性研究，受制于个案研究的局限性，代表性尚有不足。但是，其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当下我国广大农村地区学校课后服务开展的真实现状。现有研究多立足于双减政策，广泛探讨课后服务的重要性并且提出较多理想化的措施。但是，他们却忽视了长久以来农村与城市之间的教育差距，很少有将二者分开论述。农村和城市学校在课后服务建设面临的问题各不相同，课后服务质量提升的方式也应有所差别。未来希望社会各界给予乡村学校的课后服务建设更多的关注，帮助乡村学校积极探索课后服务质量提升的优化路径。

## 参考文献：

- [1]陈园园、李会春, 2021,《影子教育治理的政策演变、困境及对策》,《复旦教育论坛》第5期。
- [2]郭静、车丽娜, 2019,《英国课后服务的运行模式及启示》,《教学与管理》第6期。
- [3]张忠华、潘婷, 2021,《美国儿童放学后计划实施的成效与借鉴》,《教育学术月刊》第8期。
- [4]熊熊、刘宇佳, 2019,《美国中小学课后教育的兴起之路、发展之困与经验之谈》,《教育科学研究》第6期。
- [5]贾利帅、刘童, 2021,《北欧四国中小学课后服务的实践、特征及启示》,《基础教育》第4期。
- [6]李文美, 2021,《韩国放学后学校教育项目评析——基于扩大教育机会的视角》,《比较教育研究》第10期。
- [7]张亚飞, 2020,《主要发达国家中小学课后服务研究》,《外国教育研究》第2期。
- [8]余晖, 2021,《双减时代基础教育的公共性回归与公平性隐忧》,《南京社会科学》第12期。
- [9]韩登亮、郭翠萍, 2019,《我国课后服务政策实施的理性思考》,《教学与管理》第33期。
- [10]周玲, 2021,《双减背景下的课后服务供给方式及质量评估》,《中小学管理》第12期。
- [11]游莎、周先进, 2020,《弹性离校背景下中小学生学习服务的内涵、价值与目标》,《教学与管理》第9期。
- [12]刘慧琴, 2022,《课后服务治理的理论逻辑、现实境遇与实践路径》,《河北师范大学学报(教育科学版)》第24期。
- [13]贺芳、彭虹斌, 2022,《多方主体协同课后服务模式探究》,《教学与管理》第1期。
- [14]柯清超、鲍婷婷、林健, 2022,《双减背景下数字教育资源的供给与服务创新》,《中国电化教育》第1期。
- [15]周奇, 2021,《课后服务工作可以更细致》,《人民教育》第22期。
- [16]马海涛、李剑, 2004,《我国财政对义务教育支出的现状及原因分析》,《财政研究》第4期。
- [17]屈璐, 2019,《我国基础教育课后服务政策嬗变及展望》,《现代远距离教育》第4期。
- [18]付卫东、郭三伟, 2022,《双减格局下的中小学课后服务: 主要形势与重点任务》,《河北师范大学学报(教育科学版)》第1期。
- [19]康丽颖, 2020,《促进儿童成长: 课后服务多元主体协同育人探讨》,《中国教育学刊》第3期。
- [20]晋银峰、孙冰冰、张孟英, 2021,《中小学课后服务的历程、问题与展望》,《教育科学研究》第11期。
- [21]杨清溪、邬志辉, 2021,《义务教育学校课后服务落地难的堵点及其疏通对策》,《教育发展研究》第22期。

☆ 作者简介: 何经纬, 河海大学社会学专业 2022 级博士研究生

严登才, 河海大学公共管理学院副教授

☆ 责任编辑: 潘思羽

# 城市新老人的群体特征与代际责任研究<sup>1</sup>

徐依婷 沈 毅

**摘要：**在积极老龄化背景下，越来越多的“新老人”进入大众视野。与传统老人相比，城市“新老人”经济自足、心态年轻、积极参与社会。受个体化进程与传统文化观念的影响，“为自己而活”的价值理念在现实中常常与代际责任构成了明显的张力。城市“新老人”运用重新定义代际责任、重新分配时间和人力、赞助子女金钱、购买家政服务等策略来应对自我实现需求与代际责任的冲突。城市“新老人”的出现为未来养老服务的发展带来了新思路与新挑战。

**关键词：**城市“新老人” 个体化 “为自己而活” 代际责任 养老服务

第七次全国人口普查数据显示，2020 年我国 65 岁及以上老年人口为 19064 万人，占总人口的 13.50%。<sup>[1]</sup>随着人口老龄化程度的逐渐加深和老年群体的逐渐扩大，客观认识这一群体成为养老服务领域面临的重要问题。长期以来，学界对老年群体的认识存在一定的刻板印象，认为老年人教育程度低、思想保守、健康状况不佳、经济基础差，给家庭和社会带来巨大的抚养负担。老年人口的快速增加的确给家庭和社会增添了养老压力，但在研判这一群体时，应该以积极的眼光考察其代际更替和群体分化。随着 20 世纪 50 年代和 60 年代初出生的一代人陆续步入老年，老年群体中涌现了一批新老人。人口学家翟振武指出新老人现象值得关注。<sup>[2]</sup>他们与传统老人在生活方式、人生态度与价值观方面存在显著区别。本文拟在分析城市新老人群体特征的基础上，考察个体化进程中城市新老人在面临自我实现需求与家庭代际责任伦理冲突时采取的策略，进而为未来相关部门制定养老服务政策提供依据。

## 一、文献回顾与研究视角

个体化理论由德国社会学家贝克提出。他认为，在第二现代性社会，既有的诸如阶级、地位、性别分工等社会形式解体以及国家承认的标准化人生、参照图式和角色模式瓦解的同时，个体被强加了新的要求、控制和限制。<sup>[3]</sup>个体化进程是指个体从原有的社会结构中抽离再重新嵌入新的社会整合形式的过程，也是个体从原有的传统角色中解放出来、主体性日益得到彰显的过程，其显著的特征是越来越多的人从为别人而活转向为自己而活。阎云翔指出，中国社会尽管缺乏欧洲个体化进程中的先决条件，即福利国家、文化民主化、古典个人主义，但还是走上了个体化道路。<sup>[4]</sup>在政府主导的集体主义方式的个体化阶段（1949—1977 年），个体逐渐从家庭走出，突破传统规范的束缚，同时浪漫爱情、两性平等、婚姻自由等观念也逐渐形成。在市场主导的个体化阶段（1978 年以后），消费主义与市场理性裹挟而来的西方社会的价值观念，潜移默化地影响着个体的抉择，为自己而活以及重视私人生活中情感因素获得文化上的合法性。

费孝通将中国传统社会代际关系总结为反馈模式，与西方的接力模式形成鲜明对比。<sup>[5]</sup>在反馈模式

<sup>1</sup>本文已刊发于《中州学刊》2022 年 04 期。

下，权威性孝道彰显，老年人的社会地位较高。随着经济社会的变迁，权威性孝道衰落，基于亲子自发情感的相互性孝道的重要性日益提升，代际注重资源交换，代际关系呈现失衡的趋势。一方面，老年人肩负的代际责任日益加重，扩展为养育、教育、婚姻和隔代抚养责任；<sup>[6]</sup>另一方面，年轻人自主性增强、注重自身权利，利用传统文化资源为自己谋取利益。阎云翔通过对黑龙江省下岬村的长期追踪调查提出私人生活的变革，指出年轻人追求自己的权利而忽视自己的义务，成为无公德的个人。<sup>[7]</sup>沈奕斐认为城市年轻人基于个体需求进行家庭认同。<sup>[8]</sup>在个体化趋势下，一些年轻人往往追求个体独立<sup>[9]</sup>而忽视了个体责任<sup>[10]</sup>。年轻人个体化和理性化程度的提高冲击着家庭养老的伦理基础，导致孝道衰落，严重影响老年群体的生活境遇。相关研究倾向于将老年群体视为个体化进程中的受害者。有学者指出，子代通过索取彩礼转移亲代财富，致使老年人背负债务、陷入贫困。<sup>[11]</sup>还有学者研究了孝道衰落与老人绝望自杀<sup>[12]</sup>、代际关系倾斜与恩往下流<sup>[13]</sup>等现象。这些研究认为老年人权威降低，地位下降，在家庭处于边缘化位置<sup>[14]</sup>，沦为成年子女家庭的保姆<sup>[15]</sup>。

由于中国社会尚缺少健全的医疗、托育、就业培训等社会福利体系，个体在面对社会风险时不得不求助于家庭。在农村，留守老人通过隔代照料、经济支持帮助成年子女参与城镇化竞争。在城市，老年人重视经营与成年子女的关系，并在子女成婚、就业、买房、育儿等事务上力所能及地施以援手。<sup>[16]</sup>可见，个体化进程并未导致代际关系简单走向个体化，传统社会中被视为理所当然的家庭责任及其分配成为代际间需要协商的事务。<sup>[17]</sup>

上述研究为我们提供了启示，也存在明显不足。如个体化理论相关研究主要将焦点放在青年群体上，仍将老年人与青年人视为传统与现代、家庭主义与个体主义、前喻文化与后喻文化的两端，强调个体化进程中老年人的牺牲者角色，对老年群体的个体化趋势视而不见。另外，现有研究从客体角度探讨个体化进程中老年人的生活状况，将老年人视为被动的受害者，忽略老年人的主观体验和价值诉求，遮蔽了老年群体的内部分化。基于以往研究的优势与不足，本研究将主要呈现两方面内容：一是分析个体化进程中城市新老人的群体特征；二是阐述城市新老人为自己而活的生活安排以及其力图平衡代际责任与个体需求的策略。本研究采用质性研究方式，田野调查资料主要来源于湖北省武汉市洪山区南湖街道。获取资料的方式主要是实地访谈，访谈时间为2020年12月、2021年3月，访谈对象均为城市户口，平均年龄为63岁，其基本情况如表1所示。

## 二、“为自己而活”：城市“新老人”的群体特征

本文的研究对象是出生于20世纪50年代后期、60年代初期的城市新老人。在他们的青壮年时期，国家实施改革开放政策，高考制度恢复，社会逐步走上快速发展的道路，退休后他们又经历中国从富起来向强起来转变的好时代。与此同时，他们也是中国个体化进程的亲历者。西方消费主义裹挟而来的独立自主、注重隐私、珍视情感等观念与改革开放后积极进取价值观的共同作用，促使过自己生活的追求成为他们彰显自身权利与能力的表征。

在身体状况方面，城市新老人预期寿命延长，健康状况较好。新中国成立以前，我国人口死亡率约为25%，平均预期寿命仅为35岁。<sup>[18]</sup>新中国成立以来，政府大力发展公共卫生事业，合理分配城乡



医疗资源，建立完善的医疗卫生服务体系，开展爱国卫生运动。这些都极大地改善了中国社会的医疗卫生状况，城市居民的预期寿命不断延长，老年群体的健康水平不断提高。加上城市新老人崇尚科学养生，经常运动，定期体检，他们的健康状况普遍良好。这成为城市新老人进行广泛的社会参与的客观基础。

在文化水平方面，城市新老人的受教育程度越来越高。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的教育事业取得了巨大成就。2020 年湖北省 15 岁及以上人口的平均受教育年限由 2010 年的 9.20 年上升至 10.02 年，文盲率从 5.32% 下降到 2.32%。<sup>[19]</sup>由于较晚出生的人口队列平均受教育年限增加，在可预见的未来，城市新老人的受教育程度明显提高，他们是未来老龄化社会的潜在人力资源。

表1：访谈对象基本情况

序号	姓名	年龄	性别	文化程度	退休前职业	家庭状况	月收入 (元)
1	YQ	64	男	博士	公务员	已婚，独子已婚，孙女由育婴师照顾	6000
2	DB	61	女	本科	保险公司干部	已婚，独子已婚，孙女由儿媳照料	5000
3	HXP	63	女	初中	电力公司职员	已婚，独女出国与他人同居	4000
4	WXJ	62	女	本科	大学副教授	已婚，独子已婚丁克	5000
5	QL	61	女	在职硕士	公务员	丧偶，独子与女朋友恋爱同居	5000
6	FG	65	男	本科	工程师	已婚，老伴去上海照顾外孙	4000
7	DS	65	男	高中	军官	已婚，独女未婚	4000
8	HJ	63	女	本科	律师	再婚，独女已婚，外孙由 HJ 照顾	3000
9	RYH	66	女	大专	工人	再婚，独女已婚，外孙由 RYH 照顾	2500
10	LS	65	男	高中	国企工会领导	已婚，独子已婚，孙女由 LS 跟老伴照顾	4000
11	XA	60	女	大专	医生	丧偶，独女已婚丁克	5000
12	SY	62	女	大专	公安局干部	已婚，独子离婚，孙子由 SY 照顾	5000
13	CRH	60	女	中专	中学语文老师	已婚，独子已婚，孙女由儿媳照顾	5000
14	RB	62	男	大专	部队干部	已婚，独女已婚，外孙由 RB 和老伴照顾	15000
15	LCM	61	女	本科	行政	已婚，独女已婚，外孙由 LCM 照顾	6000
16	FYN	64	女	本科	大学教师	已婚，独女在国外已婚丁克	5000
17	CLS	63	女	高中	会计	已婚，独子已婚，孙女由外祖母照顾	4500
18	FJ	62	女	高中	医生	已婚，独女已婚，外孙由 FJ 照顾	6000
19	TZ	65	男	初中	个体户	已婚，独子已婚，孙子由儿媳跟外祖母照顾、TZ 出钱	4000
20	SM	60	女	高中	公务员	已婚，独女已婚，外孙由 SM 照顾、祖母给钱	5000
21	XJ	61	女	中专	个体户	再婚，独子已婚未育	10000
22	YY	65	男	大专	事业单位行政	再婚，独子已婚，孙子由育婴师照顾	5000
23	YS	63	女	本科	医生	已婚，独子已婚，孙女由育婴师照顾	5500

在经济状况方面，城市新老人经济自足，消费能力强。新中国成立初期，老年人的收入来源主要以子女供养为主，来源比较单一。改革开放以后，随着经济社会的快速发展、社会保障制度的逐步建立，城市老年人收入来源多元且更加稳定，依靠退休金的老人比例大幅上升，依靠子女供养的老人比例逐步下降。<sup>[20]</sup>城市新老人大多有固定的养老金，相比传统老人，其经济基础较为雄厚，依靠子女养老的较少，选择为自己而活的底气较足。这为其个体化的生活安排打下了经济基础。

在心理状态方面，城市新老人心态年轻，积极跟随社会发展潮流，力图跨越数字鸿沟。据统计，2022 年中国老年网民规模达 1.19 亿人，老年群体互联网普及率达 43.2%。<sup>[21]</sup>城市新老人热衷于在网上看视频、浏览新闻、聊天、购物等。通过互联网，相同兴趣爱好的新老人可以跨越空间距离进行交流，建构内部的亚文化。比如，抖音网红北海爷爷只穿高跟鞋的汪奶奶姑妈有范儿我是田姥姥等一批老年博主的粉丝均已达到百万级别。这些老年网红以精致的老年生活挑战社会对老人的刻板印象。

在社会参与方面，城市新老人注重社会参与和实现自身价值。退休后，城市新老人并不满足于局限在家庭。部分新老人注重自身需求，用多彩的精神文化生活充实自己的闲暇时间，他们热衷旅游、摄影、合唱、舞蹈、时装走秀、上老年大学等。2019年年末，中国共有老年大学 76296 所，在校学员共计 1088.2 万人。<sup>[22]</sup>由于供需失衡，老年大学课程报名的竞争激烈程度不亚于幼升小。

我的日程都排满了，钢琴课、合唱课、独唱课、踢踏舞课、模特课、摄影课……每天不是在参加活动就是在参加活动的路上。去年为了报上老年大学，我大半夜就去排队了，那竞争真是激烈。(QL)

部分新老人选择再就业、灵活就业、创业等形式，继续发挥余热。XA、FYN、WXJ 等退休后，被返聘到原单位，发挥传帮带作用。XJ 退休后，与朋友共同创业，开办了托育园。城市新老人学历高、工作经验丰富，具备专业技能，对这批人力资源的开发将有助于缓解人口老龄化、少子化所带来的人力资源结构性短缺问题。由于目前鼓励老年人再就业的社会机制尚未形成，只有少数科研院所具有返聘机制，因此有再就业意愿的老人较难找到合适的工作岗位。部分新老人活跃于志愿服务。他们协助社区开展公益讲座、义诊及募集防疫物资等活动。参与志愿服务使他们实现了个体价值，同时也为基层社会治理贡献了智慧和力量。

经济社会变迁导致老年群体的特征发生改变。与传统老人成长和生活环境不同，城市新老人经历过改革开放、恢复高考、住房改革、社会保障制度逐步建立等重大事件，享受到了中国经济社会发展的红利，因此这一群体与传统老人之间存在较大的差异，具有不同的群体特征。城市新老人受教育程度相对较高、经济自足、心态年轻、注重晚年的生活质量。他们具有强烈的社会参与意识，在实现自我价值的同时，也为社会发展贡献力量，一定程度上使社会大众改变了老人负担论的刻板印象。在个体化进程中，为自己而活并非年轻人的特权，城市新老人也有自主选择生活方式的意愿。

### 三、城市“新老人”的生活安排与代际关系

在个体化进程中，城市新老人的价值观念逐渐发生改变，在心态上从以家庭为中心向以自我为中心转变，他们试图超越原来标准化人生的限制，脱离原有社会角色的束缚，自主安排晚年生活。

#### (一) 居住安排：同城空巢

传统中国社会民众崇尚四世同堂，老人往往与家中成年子女同居共餐。与子女同住能够最大限度地满足老年人的生活照料、情感慰藉及疾病护理等需求。改革开放前，老年人大多与已婚子女同住。受个体化进程中情感需求凸显的影响，民众日益重视夫妻关系和个人隐私。在当下社会，扩大家庭不再是约束性的文化理想。城市新老人希望与已婚子女分开居住，按照自身的喜好安排生活，避免同住引发的代际冲突。已有研究显示，当前城市老人空巢的比例达到 60% 左右，其中真正对老年生活带来困扰的异地空巢比例并不太大，只有约 10%。<sup>[23]</sup>同城空巢的居住安排既满足了城市新老人追求过自己生活的愿望，又能在子女需要协助育儿或老年人需要子女照料时实现代际团结。

女儿谈恋爱时就给她装修好了市中心的房子。没想到女儿结婚后非要跟我们老两口住，打乱了我的计划。两代人住一起，还是有很多不方便的地方。(LCM)

#### (二) 隔代照料：祖母撤退

儿孙绕膝是中国人向往的晚年生活景象。不论是基于代际交换或责任伦理，祖父母都是当下中国照料孙辈的主力军。<sup>[24]</sup>但是，高强度、全天候的隔代照料有可能损害老年人的身体健康、挤压其社会交往时间，降低其主观幸福感，代际还常因教养理念不同产生家庭矛盾。<sup>[25]</sup>在中国传统文化情境中，祖母负有隔代照料的责任，而对外祖母并没有文化规则上的强制性要求。在个体化进程中，个体试图脱离传统角色规范的束缚，自主选择新的生活方式。城市四二一的家庭结构以及与子代培养亲密感情的需要使得外祖母更积极地投入到隔代照料中，而祖母呈现撤退的趋势。

他们都说带大一个孙子会老五岁，我才不想帮忙。她(媳妇)满月后就回娘家了，现在由她娘家人帮忙看孩子，我们周末过去看看，每个月赞助一下奶粉钱。大家都轻松点。(TZ)

### (三)养老方式：自我养老

家庭养老一直是历代政府重视和倡导的养老方式，并且通过颁布的法令、律法以及民间宗规家训深入人心。得益于生活水平提高、交通便利、身体健康以及足够的经济基础，城市新老人热衷于旅游养老、医养结合等新兴养老方式。城市新老人在经济上大多依靠养老金，摆脱了日常对子女的经济依赖；在生活照料上大多依赖伴侣。在个体化进程中，部分老人对外在的社会福利制度的依赖越来越高，但也需要面对由此带来的新问题。随着年龄的增加，城市新老人势必会逐渐丧失自理能力，他们大多不愿意为子女增加负担，但现实社会中养老机构床位不足的问题一直存在，一些养老机构服务质量差、护工虐待老人等负面事件给城市新老人带来了困扰，未来何去何从，他们也不得而知。

我们都不寄希望于子女孝顺，大家都有自己的生活。他们要工作，还有子女要养。我不希望成为孩子的拖累，现在能动就自己干，以后不能动了，直接进养老院，他们经常来看一下就行了。(YQ)

### (四)晚年生活：注重自我

在传统社会，构成老人安身立命的基础是传宗接代、光宗耀祖，通过繁衍子嗣来延续个体有限生命的意义。<sup>[26]</sup>因而传统老人往往更重视家庭的需求，愿意为子女牺牲一切，自身的情感需求和生活意义在家庭中也得到满足。在个体化进程中，个体从旧有的社会结构中脱离，传统意义上的大家族解体，传宗接代、光宗耀祖等传统观念的影响力式微，个体生命意义的来源更加多元。相比将子女视为一切的传统老人，城市新老人不再把子女孝顺、儿孙绕膝当成唯一的幸福源泉，人生态度也从为子女而活转变为为自己而活。尤其是对于承担着主要家务责任的老年女性而言，年轻时她们承担养家糊口的责任，难以顾及自身的兴趣爱好，退休后时间富余的她们选择弥补年轻时的遗憾。城市新老人试图从以家庭为中心逐渐向以自我为中心过渡，追求自我价值的实现。

我为这个家奉献了半辈子，剩下的时间，我想干点自己的事。年轻时没有时间，要挣钱养家，哪有心思去学钢琴。现在条件好了，我想弥补年轻时的遗憾，买了这架钢琴。(CLS)

## 四、城市“新老人”“为自己而活”的基础：成功履行代际责任

在中国本土文化情境中，城市新老人为自己而活的理想受到经济条件、代际责任、社会舆论压力等因素制约。在个体化进程中城市新老人试图在个体自我实现需求与代际责任间寻求平衡。

### (一)自我实现需求与代际责任的冲突与妥协

在传统文化中，家庭主义毫无疑问占据主要位置，个体应以家庭利益为重，重视对家庭的责任，追求自身自由、权利、欲望的行为受到抑制。改革开放以来，受个体化趋势的影响，个体不再完全以家庭利益为中心，但也并非完全追求以个体利益为中心，而是呈现为不论亲代子代，都开始关注如何在个体利益与家庭利益之间达成平衡。家庭利益仍是城市新老人行为选择的重要考量因素。在中国社会的个体化进程中，从家族和集体脱嵌的个体，面对风险社会和福利制度不足的现实情境，不得不重新回归家庭寻求支持。代际团结仍是城市家庭解决住房、教育、养老、抚幼等重大事务的主要方式，亲代与子代之间不可避免地发生经济与劳务等家庭内部资源的互惠。因此，纯粹追求为自己而活在中国家庭亲子一体的文化情境中难以获得道德合法性。

由于金钱、时间和精力等资源有限，城市新老人面临着个体还是家庭优先、自我实现还是代际责任为主、横向夫妻关系还是纵向代际关系为重的两难选择。隔代照料是城市新老人面临的个体实现需求与代际责任冲突的典型事件。单位制解体后，公立儿童托育事业发展缓慢，市场托育服务价格高昂，普通家庭通常采取隔代照料的方式解决 0-3 岁婴幼儿的照料问题。隔代照料减少了城市新老人自由支配的时间，降低了其生活质量，造成了代际冲突，甚至许多老年夫妇不得不异地分居，因而城市新老人隔代照料的主观意愿越来越低。相比于西欧社会个体化进程所依托的较高水平的社会福利体系，中国社会的市场化路径明显缺乏国家福利主义的支撑，家庭仍是个体重建安全感的重要基础。城市新老人虽不需要子女提供经济与日常照料，但对代际亲密关系仍有着强烈的需求。因而，在自我实现和代际责任平衡的过程中，为维持与子女的亲密关系，帮助子女事业发展，城市新老人不得不做出妥协，有限度地追求为自己而活。

## （二）协调自我实现与代际责任的微观策略

研究发现，城市新老人通过四种策略寻求自我实现需求与代际责任的平衡。一是重新定义代际责任，走出无限制的代际责任链条。二是重新分配时间和人力，明确代际的分工与合作。三是直接给予子女金钱，豁免隔代照料义务。四是购买家政服务，转移代际责任压力。

### 1. 重新定义代际责任

随着社会变迁，老年群体肩负的代际责任发生改变，从基础性的养育扩展至教育、婚姻、隔代照料，呈现出责任加重和无限制的趋势。为了实现为自己而活的愿望，城市新老人赋予代际责任不同的含义。他们厘清亲代和子代间的责任和义务，重新定义代际责任。部分城市新老人甚至不主张隔代照料，认为老人会宠溺孙辈，不利于孙辈的成长。重新定义代际责任体现了个体化进程中的去传统化，个体从传统文化规范赋予个体的义务中解放出来，重新诠释原有的知识、信仰与意义，为个体自主选择生活方式提供观念上的支持。

我儿子就是他奶奶带的，独立能力很差。三年级了还要大人喂饭、扎鞋带。等我们发现时已晚了，孩子性格和行为已经养成了，现在都改不过来。所以千万别让老人带，老人带跟你想的肯定不一样，以后只会后悔。（DB）

### 2. 重新分配时间和人力

在个体化进程中，个体往往更在意拥有用于自我发展的闲暇时间。隔代照料则要求家庭成员通力合作，需要人力、物力、时间等资源的充分投入和合理安排。城市新老人采取重新分配时间和人力的方式，通过代际轮流合作进行隔代照料，使部分家庭成员能够暂时抽身于照料劳动。比如，LS 平时跟老伴帮子女带娃，夫妻俩轮流参加合唱团活动。而家庭内部人力、时间等资源整合的方式往往面临突发性紧急事务的挑战。比如，CRH 参加合唱比赛集训时，孙女感冒高烧，打乱了她的行程安排，她面临着继续参加社会活动与回归家庭的两难选择。

我参加武汉市合唱比赛集训时，孙女发烧了。大半夜去医院，挂号看病拿药，回到家都凌晨五点了。当天还要参加合唱训练，真是累得不行。这种大型的比赛五年一次，下次就没有机会了。家里就媳妇照顾孙女，又搞不定。我都想放弃了。(CRH)

### 3. 赞助子女金钱

与农村老人让渡工作权利不同的是，城市新老人更珍惜自己的时间和精力，在经济上也更为宽裕，他们在履行代际责任方面有更大的选择空间。他们通过给钱的方式履行代际责任，形成老人出钱，年轻人出力的隔代照料分工，从而达成家庭内部照料责任的均衡。赞助子女金钱这种方式也是有一定代价的，比如牺牲了城市新老人与孙辈亲密互动的机会。在社会福利制度不健全的现实情境中，隔代照料仍被视为老年人应肩负的代际责任，因而采取这一策略的城市新老人面临较大的舆论压力。可见，在中国社会个体化进程中，传统与现代因素交织，个体既有选择自主生活方式的自由，也会面临传统文化规范带来的社会压力。

我只帮她带三个月孩子，后面她自己带。我就出去工作。孩子更需要的是妈妈，不是奶奶。怎么说呢，同龄人都在带孙子，你就给钱还是会让人觉得不称职。(XJ)

### 4. 购买家政服务

具有一定经济基础的城市新老人通过购买家政服务等市场手段转移家务料理、隔代抚育负担，缓解个体实现需求与代际责任间的冲突。一些城市新老人表示，聘请家政工处理家务是一种高效、低成本、不易引发家庭矛盾的方式。由于市场经济中信任的匮乏与家政市场服务品质的良莠不齐，多数城市新老人表示家政工起到的是补充而非替代的作用，需要额外付出时间和精力去监督家政工的劳动，增加了他们的精神负担。可见，在个体化进程中，一些老人开始拥有更多的自主权，但也需要面对自主选择带来的问题并承担相应的责任。

退休了，我还是想跟大家一起参加各种活动，现在不参加，以后大家的圈子都形成了，人家都不带你玩了。现在我家请了一个育婴师，她帮忙看孩子，我就可以外出活动。(YS)

上述城市新老人平衡个体实现需求与代际责任的策略体现了个体化进程中原有的家庭责任重新分配的问题。一方面，个体在不确定的自反性中打破了既有规则；另一方面，个体在新规则的塑造中不断与相关利益群体进行协商，争取自我、他人乃至社会的认同。

## 五、结论与讨论

随着老年人内部代际更替，越来越多的出生于 20 世纪 50 年代以后的城市新老人步入老年阶段。

由于成长生活于不同的历史社会情境，城市新老人的生活方式、价值观念与传统老人存在显著区别。本文作为一项探索性研究，发现城市新老人的群体特征为经济自足、心态年轻、业余活动丰富、积极进行社会参与、人生价值观从为他人而活开始转向为自己而活。个体化进程中城市新老人为自己而活的生活安排体现在居住上与子女同城空巢、在隔代抚养上祖母撤退、在养老方式上多依赖自我养老、在晚年生活中注重自身需求。城市新老人为自己而活的愿望，面临着代际责任伦理约束与外在社会养老、托幼等福利制度不完善的现实制约，因而采取重新定义代际责任、重新分配时间和人力、直接赞助子女金钱、购买家政服务等微观策略平衡两者间的张力。城市新老人的行为选择既体现出个体化的面相，同时也有家庭主义的底色，是个体化进程中传统与现代因素交织的表现，同时也与中国社会个体化进程中社会福利总体水平较低密切相关。

未来将有越来越多的新老人进入老年群体，我们应摒弃老年人负担论无用论，树立和培育积极老龄观。在个体层面，老年人自身应注重学习，保持良好的心态。在家庭层面，家庭成员应合理分工，不能过于依赖老年人承担儿童照料的责任，应尊重老人的个体化需求。在企业层面，应重视银发经济，精准发展老年娱乐、老年旅游、老年体育、老年教育等新业态，创新老年康养服务模式，满足新老人提高生活品质的需求。在政府层面，应完善促进老年人社会参与的支持政策。一方面，通过增设更多的老年大学和老年培训班，帮助老年人跨越数字鸿沟；另一方面，开发老年人力资源，设置弹性退休制度，出台鼓励新老人灵活就业、自主创业、参与志愿服务的支持政策，发挥新老人参与社会治理的积极作用。未来城市新老人终将老去，我们应未雨绸缪，构建完善的养老服务体系，优化养老服务质量，以主动积极的态度构建老龄友好型社会。

### 参考文献：

- [1]国家统计局网站，2021，《第七次全国人口普查公报(第五号)》，([http://www.Stats.gov.cn/tjsj/tjgb/rkpcgb/qgrkpcgb/202106/t20210628\\_1818824.html](http://www.stats.gov.cn/tjsj/tjgb/rkpcgb/qgrkpcgb/202106/t20210628_1818824.html))。
- [2]翟振武，2019，《关注新一代老年人口的新特点》，《北京日报》，7月29日。
- [3]李荣山，2012，《现代性的变奏与个体化社会的兴起——乌尔里希·贝克制度化的个体主义理论述评》，《学海》第5期。
- [4]阎云翔，2012，《中国社会的个体化》，陆洋等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
- [5]费孝通，1983，《家庭结构变动中的老年赡养问题——再论中国家庭结构的变动》，《北京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第3期。
- [6]王跃生，2019，《社会变革中的家庭代际关系变动、问题与调适》，《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研究》2019年第3期；张雪霖，2020，《代际责任与家庭发展能力的区域差异研究》，《南京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第6期。
- [7]阎云翔，2006，《私人生活的变革：一个中国村庄里的爱情、家庭与亲密关系：1949—1999》，龚晓夏译，上海：上海书店出版社。

- [8]沈奕斐, 2013,《个体化视角下的城市家庭认同变迁和女性崛起》,《学海》第2期。
- [9]林蒙丹、林晓珊, 2020,《结婚买房: 个体化视角下的城市青年婚姻与住房消费》,《中国青年研究》第8期。
- [10]施磊磊, 2020,《个体化进程与农村青年离婚的形成机制——以皖北Y村为个案的质性探究》,《中国青年研究》第8期; 章宏、邵凌玮, 2020,《个体化视角下中国当代青年对代际相亲节目的接受研究》,《浙江社会科学》第3期; 徐依婷, 2016,《个体化视角下的农村离婚现象与婚姻价值观的变迁》,华中师范大学硕士论文。
- [11]王跃生, 2010,《婚事操办中的代际关系: 家庭财产积累与转移——冀东农村的考察》,《中国农村观察》第3期。
- [12]陈柏峰, 2009,《代际关系变动与老年人自杀——对湖北京山农村的实证研究》,《社会学研究》第4期。
- [13]魏传光, 2011,《中国农村家庭恩往下流现象的因果链条分析》,《内蒙古社会科学》(汉文版)第6期。
- [14]梁鸿, 2000,《边缘化: 老年人家庭地位日渐式微》,《社会》第5期。
- [15]肖索未, 2014,《严母慈祖: 儿童抚育中的代际合作与权力关系》,《社会学研究》第6期。
- [16]许琪, 2017,《扶上马再送一程: 父母的帮助及其对子女赡养行为的影响》,《社会》第2期。
- [17]钟晓慧、何式凝, 2014,《协商式亲密关系: 独生子女父母对家庭关系和孝道的期待》,《开放时代》第1期; 杨善华, 2015,《以责任伦理为核心的中国养老文化——基于文化与功能视角的一种解读》,《晋阳学刊》第5期。
- [18]《中国卫生年鉴》编辑委员会编, 1986,《中国卫生年鉴 1985》,北京: 人民卫生出版社。
- [19]湖北省统计局网站, 2021,《湖北省第七次全国人口普查公报(第五号)》([https://tjj.hubei.gov.cn/tjsj/tjgb/pcgb/qrp/202105/t20210526\\_3560295.shtml](https://tjj.hubei.gov.cn/tjsj/tjgb/pcgb/qrp/202105/t20210526_3560295.shtml))。
- [20]王雪辉、彭聪, 2020,《我国老年人口群体特征的变动趋势研究》,《人口与社会》第4期。
- [21]中国互联网络信息中心网站, 2022,《CNNIC 发布第49次〈中国互联网络发展状况统计报告〉》([http://www.cnnic.net.cn/gywm/xwzx/rdxw/20172017\\_7086/202202/t20220225\\_71724.htm](http://www.cnnic.net.cn/gywm/xwzx/rdxw/20172017_7086/202202/t20220225_71724.htm))。
- [22]光明网, 2021,《逾千万老年人老有所学, 中国老年教育进入发展快车道》(<https://m.gmw.cn/baijia/2021-10/20/1302645633.html>)。
- [23]风笑天, 2020,《空巢养老? 城市第一代独生子女父母的居住方式及其启示》,《深圳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第4期。
- [24]郑佳然, 2019,《代际交换: 隔代抚养的实质与挑战》,《吉首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第1期。
- [25]刘中一, 2019,《祖辈托育及其与积极老龄化的关系》,《城市问题》第10期。
- [26]贺雪峰, 2008,《农民价值观的类型及相互关系——对当前中国农村严重伦理危机的讨论》,《开放时代》第3期。

☆ 作者简介：徐依婷，河海大学社会学专业 2018 级博士研究生

沈 毅，南京大学社会学院教授

☆ 责任编辑：潘思羽

※ ※

### 我院在“中国社会工作教育协会 2022 年年会暨第四届研究生论坛”优秀论文评选中取得佳绩

2022 年 12 月 24 日至 25 日，中国社会工作教育协会 2022 年年会暨第四届研究生论坛在线上举办。我院社会学博士研究生张志华撰写的论文《依附式嵌入与合作式嵌入——国际化社区建设中的社会工作参与》荣获博士组二等奖，博士研究生孙旌程撰写的论文《造血式扎根：企业社区参与的驱动因素与现实路径》荣获博士组三等奖，社会工作硕士研究生钟丽阴撰写的论文《青少年参与社区的成效、经验总结及路径研究——以 P 社区“快乐雷霆”志愿者队伍为例》荣获硕士组三等奖。

本次研究生论坛为广大师生提供了交流的平台、创造了学习的机会，促进了专业学科的建设和专业人才的培养。此次获奖是对我校师生努力成果的肯定，也是我院发挥社会学学科的基础作用，突出学生综合素养和科研能力培养的体现。同时，我们也期待未来能有更多优秀作品的涌现。





# 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与乡村振兴产业有效衔接

——以新疆易地搬迁社区W县P村为例<sup>1</sup>

閤小操 陈绍军

**摘要：**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同乡村振兴产业有效衔接是边疆民族地区产业发展的重要内容，易地搬迁安置区的产业发展状况与移民返迁或返贫状况在一定程度上构成负相关关系。通过对新疆W县P村易地搬迁安置点的产业发展状况调查发现，P村的产业发展对政策依赖性较强，脱贫攻坚完成后，由于政策衔接处于过渡期，对产业帮扶力度有限。为此，本文基于近五年中央颁发的政策文件，提出衔接过渡期易地搬迁安置区产业发展三阶段，即贫困阻断阶段、均衡区域发展阶段和可持续发展阶段。对于这三阶段如何实施，文中提出在“主体+资源”多重嵌入的基础上促进产业“统合发展”。具体而言，首先，应精准产业衔接，建立贫困阻断机制。其次，在此基础上还应注重缩小城乡产业发展差距，均衡区域发展。最后，通过主体渐进性嵌入和资源多种方式下沉，构建产业发展共同体。

**关键词：**边疆民族地区 乡村振兴 易地搬迁 产业实践

## 一、引论

2020年12月，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央农村工作会议上强调：“脱贫攻坚取得胜利后，要全面推进乡村振兴，这是‘三农’工作重心的历史性转移。”2022年2月22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做好2022年全面推进乡村振兴重点工作的意见》明确指出，要加大对乡村振兴重点帮扶县和易地搬迁集中安置区支持力度。在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的过渡期，中国各地通过与乡村振兴战略的政策衔接，中国的贫困治理自此也从消除绝对贫困转换到防止返贫，进一步消除相对贫困的阶段。截至2020年，我国的农村相对贫困群体仍有2亿人<sup>[1]</sup>。新疆的脱贫攻坚区域大多处于少数民族聚居地，同时也是易地搬迁战略实施的重点区域。一方面，易地搬迁后，新疆少数民族贫困群众的生活水平得到较大改善，其基本生活需求得到保障，也由此摆脱了绝对贫困的困境。另一方面，新疆深度贫困地区贫困脆弱性较强，经济社会发展尚不发达，脱贫水平不高，群众生计水平和收入来源易受到内外部因素的影响，尤其是刚满足脱贫条件的边缘人群，仍然存在易返贫、易致贫的潜在贫困风险。产业发展是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同乡村振兴有效衔接的重要内容，新疆地区亦如此。在脱贫攻坚实施过程中，产业扶贫政策对

<sup>1</sup>本文已刊发于《农村经济》2022年12期

贫困户稳定脱贫增收起到了重要的作用，但也存在产业可持续性不强、同质化和短期化、带动能力不足<sup>[2]</sup>等一系列问题。在乡村振兴的开局时期，如何巩固拓展边疆民族脱贫攻坚成果同乡村振兴产业有效衔接，实现社会经济的持续、稳定发展，是新时代亟待解决的重大问题。

自 20 世纪 50 年代以来，国外相关学者已对乡村产业发展理论进行了较为成熟的研究。以刘易斯为代表的“二元经济结构理论”指出，传统小农经济的大量剩余劳动力，一方面向城市转移从事现代产业；另一方面随着工业现代化推进农业现代化，传统庄园农业将发展为企业化农业<sup>[3]</sup>。而以舒尔茨为代表的“传统农业改造论”指出，只要改变市场机制，通过价格变动调整农业生产中的投入与产出，而原有组织结构和生产关系不变的情况下，通过提高边际生产率和更加细化的市场分工，就能促进传统庄园农业和小农经济发展为规模性的专业农场，从而实现传统农业向现代农业的改造<sup>[4]</sup>。经济学家缪尔达尔的研究表明，对于贫困人群而言，援助依然是主要手段<sup>[5]</sup>。回顾国外乡村产业发展史，从发展路径上而言，大多是以工业化带动农业现代化，运用现代科技引领农业发展，利用政府主导下的大量资金投入培养新型农业人才去发展农业。但需要指出的是，欧美及东亚发达国家的农业振兴大多建立在个体化、私有制、大农场与庄园制特征的基础上，与中国的生产关系、土地制度、分配制度等方面具有明显的差异。因此，中国的乡村产业振兴必须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下的发展之路。

近些年来，国内相关学者也对巩固拓展脱贫攻坚产业同乡村振兴有效衔接的相关内容进行了较为丰富的研究。具体而言，学者们主要从产业衔接的理论逻辑、内涵与价值、问题、发展模式及衔接路径等方面进行了探讨。首先，从理论逻辑上而言，有学者认为，当前亟需守住防止规模性返贫底线，提升自我发展能力、协同区域发展差异，建立有效衔接等长效机制<sup>[6]</sup>。有学者提出，建立乡村振兴与脱贫攻坚精准衔接机制，因地制宜、分类指导、精准施策<sup>[7]</sup>。也有学者研究表明，应根据当地资源、人力、资本、企业家才能等生产要素的禀赋结构，依循“市场逻辑+政府逻辑”的双重逻辑，培育和发展具有竞争优势的产业形态，并构建多主体激励相容的参与机制及利益分配机制<sup>[8]</sup>。其次，在衔接内涵与价值上，有学者认为脱贫的成果能否得到稳固和拓展在很大程度上也取决于脱贫群体的收入是否稳固提升，而脱贫群体收入能否稳固提升则取决于脱贫产业能不能可持续<sup>[9]</sup>。农村不仅要通过发展产业实现脱贫致富，而且要形成可持续增收的产业体系，真正释放农村产业潜力<sup>[10]</sup>。再次，也有学者从问题出发进行了相关研究。有学者指出，政府在产业发展决策过程中出现基于市场“效率逻辑”与基于扶贫“公平逻辑”的“钟摆”现象，导致产业扶贫成效偏离<sup>[11]</sup>。也有学者认为，以组织化的专业村为主体发展特色农业推动产业振兴是有效路径，政策上要注重村庄内生动力的培育，避免严苛考核造成产业发展内卷化困境<sup>[12]</sup>。最后，在产业振兴路径上，有学者指出，在西部地区，要支持一些乡村振兴重点帮扶县，增强其内生发展的动力，大力发展特色产业，推进“一村一品”“一县一业”，形成稳定的产业链和供应链，积极培养新型农业经营主体，扶持家庭农场和合作社，推广规模化、专业化农业生产模式，大力支持龙头企业发展，带动形成产业化、集约化效应<sup>[13]</sup>。也有学者研究表明，要基于资源禀赋条件，形成诱导产业做大做强的制度安排，推动乡村产业形成资源、政府、市场、技术和人协同效应下的“阶梯式上升”内生可持续发展路径，并产生持续稳定助农增收成效，提高村集体组织带动能力、强化与

农产品电商等消费新业态对接<sup>[14]</sup>。

从以上文献梳理可以看出，部分学者对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同乡村振兴有效衔接已作了较为丰富的研究，但也存在一定的局限性。一是现有研究在顶层设计上对宏观政策性解读较多，而对微观现实样态阐释较为缺乏。二是对于欠发达地区研究较少，尤其是对新疆地区的少数民族易地搬迁社区的产业发展研究尚处于萌芽阶段。鉴于此，本文试图将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与产业发展相结合，将其衍生为三个阶段，即贫困阻断阶段、均衡区域协调发展阶段和内生性可持续发展阶段，并据此提出过渡期产业衔接与发展路径。

## 二、田野解读：易地搬迁安置区产业发展样态

2020 年，中国的脱贫攻坚提前完成，自此，中国的贫困治理从消除绝对贫困转换至防止大规模返贫，建立贫困阻断机制的阶段。脱贫攻坚战略实施过程中，易地搬迁作为“五个一批”的重要举措之一，在生态环境脆弱地区发挥了巨大作用。搬迁前，贫困群众的生产生活一度陷入困境，在生活上，交通出行不便，上学难、就医难，公共基础设施建设较为落后，“生计内卷化”现象较为突出；搬迁后，安置区当地政府结合国家惠民政策，积极发展生产，采取一系列措施发展特色种植业、鼓励移民就近或外出务工、招商引资发展劳动密集型产业等，拓展移民收入来源。经调研发现，易地搬迁安置区在短时间内难以发展本土产业，产业发展也并非短期内就能形成完整的产业体系。而在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的过渡期，易地搬迁安置区的基层政府首要任务应是防止大规模返贫，尽快建立贫困阻断机制，促进产业融合发展，不断提高移民收入。实践证明，易地搬迁安置区产业发展稳定，移民安置区才能长治久安。

本文以新疆W县P村的田野调查资料为例进行研究。P村位于W县东南面，是W县重要的荒漠化、戈壁滩改造生态旅游区，森林覆盖率较高，旅游资源丰富且独特，村域有天然草原、雪山及风蚀丹霞地貌。村民以维吾尔族、柯尔克孜族为主，户数400户，总人口2057人，其中“建档立卡”脱贫户30户，低保户202户，人口主要从附近四个牧场搬迁而来。安置点距离迁出地约138.4公里，为典型的易地搬迁安置区。P村产业以牦牛、绵羊等畜牧养殖与白杨林、玉米、核桃、红枣等粮食、林果种植业为主，兼营手工业、旅游业。村民收入来源主要以种养殖业收入为主、手工业、旅游业收入为辅，副业为农闲时政府组织就近或外出务工。2021年，P村人均年收入5000余元。

近年来，W县积极招商引资，引进国有农业开发企业H进驻P村进行精准扶贫工作。而W县选择国企的原因主要有两个方面：一是因为国企经济实力相对较好，二是更具社会保障性质的“社会性兜底”效应，对定点帮扶对象的社会责任完成度较高。H公司进驻P村后主要是帮助安置区建设农田水利等基础设施，兴建了可供安置区饮水、灌溉之用的中型水库，在2017年已经完成蓄水并聘请专人进行管理，平整种植核桃、红枣等经济作物所需的土地，以及种植畜牧业所需的牧草。H公司帮助P村建立了种养殖专业农业合作社，创建了核桃林、白杨林、红枣林种植基地及绵羊、牦牛养殖基地，并结合当地旅游资源开办了红酒庄园。H公司负责帮助村民恢复生计，为其提供针对性的种养殖技术服务，在农闲时联合政府、村委会组织村民就近务工或外出打工，以此帮助村民恢复生产，提高经济收

入。在H公司的帮扶下，P村人均收入增收明显，促进了易地搬迁安置区社会经济发展与稳定。

本研究以P村为研究对象，原因有两点：一是P村在地理位置上处于南疆，为维吾尔族、柯尔克孜族等多民族聚集地，能够很好地代表边疆民族地区；二是P村为易地搬迁安置点，脱贫人口较多，并且有国企H公司进行定点帮扶，产业融合空间特征突出，样本代表性十分明显。

文中的P村作为易地搬迁安置点，其产业发展主要依赖于国家政策性帮扶，其产业发展主要是“国企+合作社+移民”的方式，国企资金、人力资本等资源雄厚，与村委会联合建立农业发展合作社有助于更好地利用国家优惠政策发展企业，集体经济的壮大势必会带动移民发展，激发其内生发展动力。质言之，易地搬迁安置区产业得到发展后，贫困阻断机制才能真正得以建立。就目前P村的产业发展而言，农业发展合作社并不能持续发挥其作用，移民参与合作社获得收入占家庭总收入10%~50%，因此P村的产业发展应积极融入县域产业发展。

### 三、多重嵌入：巩固脱贫攻坚成果与乡村振兴产业有效衔接三阶段

从社会学角度而言，个体的组织行为总是嵌入在组织结构之中<sup>[45]</sup>。嵌入理论常见于组织社会学理论中，用以解释各主体之间的互动关系。在脱贫攻坚战略实施过程中，易地搬迁安置区的产业发展主要依赖于政府惠民政策。在“资源下乡”过程中，自上而下的各级政府嵌入其中，引导金融、人力、市场等资源的合理分配。从宏观视角上而言，政府、企业、村委会、移民四大主体共同构成了易地搬迁安置区产业发展的社会网络，无论从宏观政策制定抑或是从产业发展方式上而言，这种产业发展共同体的有机生态链毋庸置疑。然而，从现实经验来看，在产业发展过程中也涌现出了一系列问题。一方面，从产业发展所需的基本要素而言，交通通达度、劳动力富裕度、自然资源拥有量、社会经济发展状况、生态产业链等要素必不可少。而安置区通常“见物不见人”，青壮年劳动力和技术人才缺乏；产业集聚不明显，难以形成完整产业链；自然资源和社会经济条件均处于不发达状态。这些因素都将不利于产业发展壮大。另一方面，易地搬迁安置区是国家十四五规划的重点建设内容，规划中明确指出要加大安置区的后期扶持支持力度。从产业发展的外部因素而言，政策性支持也对产业的发展状况起到至关重要的作用。虽然安置区的产业发展面临一系列困境，但在多主体协同行动下，产业发展也将在多方位全生命周期的调适下得到良性发展。此外，地方基层政府和组织服务动员能力弱化，村集体管理和服务能力不足，陷入“集体行动困境”<sup>[16]</sup>。鉴于此，本文根据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同乡村振兴有效衔接、乡村振兴目标及共同富裕目标规划，将易地搬迁安置区的产业发展分为贫困阻断阶段（2021年~2025年）、均衡区域发展阶段（2026年~2035年）、产业可持续发展阶段（2036年~2050年）三个阶段，以试图建构“主体+资源”多重嵌入视角，将纵向分阶段的历史视角与横向“主体+资源”多重嵌入视角有机结合，以此阐述衔接过渡期易地搬迁安置区的产业发展样态与机理。

#### （一）贫困阻断阶段（2021年~2025年）

2020年底，我国完成了脱贫攻坚任务，消除了绝对贫困，但这并不意味着中国不存在贫困群体。根据中央一号文件对贫困治理的解读，脱贫攻坚完成后，我国的贫困治理是从消除绝对贫困转为防止大规模返贫，亟需建立贫困阻断机制的阶段。从宏观政策上而言，近五年中国的贫困治理将转为解决

相对贫困的阶段。易地搬迁作为脱贫攻坚战略中“五个一批”的重要脱贫方式，在生态脆弱地区已得到有力检验。实践表明，易地搬迁是解决生态脆弱地区贫困问题的有效手段。对于迁出地而言，易地搬迁战略的实施缓解了由于资源紧张引发的人地矛盾，极大改善了原住民的生产生活。于迁入地而言，搬迁后带来了充足的人力资源，国家政策带来的资源倾斜也促进了县域经济的发展。脱贫攻坚时期，易地搬迁主要依赖于国家的政策性优惠，地方政府主要解决的是移民的“两不愁、三保障”问题。而在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同乡村振兴有效衔接的过渡期，地方政府仍需注意移民返贫的问题，尤其是大规模返贫，移民返贫原因主要是因灾因病、生计难以得到保证而致贫。因此促进易地搬迁安置区产业发展势在必行，产业发展才能促进安置区稳固发展。

笔者在P村的田野调查中发现，P村移民大多都是从牧场迁移而来，国家“退牧还草”政策下发后，地方政府便着手于易地搬迁行动。移民迁徙一方面是由于国家政策，防止过度放牧导致的土地沙漠化，保护生态环境而作出搬迁的决策；另一方面，牧民常年放牧，收入水平并未因此提高，边际效益逐年递减，生计内卷化<sup>[17]</sup>突出，收入不稳定也使得牧民生产生活难以持续。而搬迁后，生计选择更加多样化，收入水平稳步上升，因此也使得安置区更加稳定。2021年9月26日，受访者YXC谈到，“以前我们在山上放牧，日子过的还是很苦的，需要不断迁移到水草丰厚的地方，住的是蒙古包，现在在政府的帮助下，迁到距离县城很近的安置区，还为我们修建了房屋和固定的羊圈，种植牧草，还有核桃和红枣，也可以去合作社打工，现在的收入比之前好很多，小孩也能在附近上学，老人看病也方便多了。”通过访谈可知，易地搬迁政策的实施在很大程度上解决了移民“两不愁、三保障”的问题，但在衔接过渡期，移民仍然存有因病、因灾致贫的风险，种植业和临时性的就近或外出务工终究是权宜之计，从根本上而言，只有发展产业才能促使移民安置区得到稳固发展。而就调研的现实情况来看，移民产业落地难、同质化严重、带动能力有限。在巩固脱贫攻坚成果过渡期，国家应继续加大对易地搬迁安置区的政策优惠力度，安置区的产业发展也应积极融入县域经济，以县域产业发展带动易地搬迁安置区的发展。与此同时，W县政府也应积极探索安置区产业融合发展路径，发展特色种植业，促进农旅有机结合，真正做到让易地搬迁安置区“稳得住、有就业，逐步能致富。”

## （二）均衡区域发展阶段（2026年～2035年）

在脱贫攻坚战略实施过程中，由于区域发展上的时空差异，各地资源禀赋、基础设施条件、基层执行等方面存在一定的差距，因此中央政府对地方的资源投入也存在一定的差异性。从宏观理论政策层面而言，从早期的“精准扶贫”“脱贫攻坚”到近年来的“有效衔接”“乡村振兴”或是“共同富裕”，其本质都带有缩小城乡、区域差距的现实意义。从微观施策层面而言，国家主导的政策性扶持，诸如“五个一批”“两不愁、三保障”等，无论是从“输血式”政策依赖性扶贫到“造血式”开发式发展，还是从满足基本生产生活需求到发展产业实现可持续发展的目标，政府施政策略都带有明显的“渐进性嵌入式发展”导向。从总体而言，作为脱贫攻坚“五个一批”方式中的易地搬迁政策，在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同乡村振兴有效衔接过渡期，一方面在安置区亟需建立防止大规模返贫监测机制，防止移民大规模返贫；另一方面在防返贫基础上也应积极融入县域发展，以县域经济发展带动安置区产业

发展，由此缩小城乡之间、区域之间的发展差距。

P村属于城镇化安置，临近W县，交通通达度高，具备产业发展的便利条件。近年来，P村积极对接县政府，引进H国企发展特色种植业，开发旅游业，产业发展初具规模。然而P村也难以避免产业同质化、落地难，村庄空心化、老龄化等共性问题，以及民族互嵌社区的受民族文化影响较大，游牧转农耕难适应等特殊性问题。为此，P村积极利用地方资源，与高校科研单位合作，组织农业专家对接“科技下乡”服务，传授核桃和红枣种植技术，为规模化种植创造条件。2021年9月13日，笔者在与P村第一书记<sup>1</sup>访谈时，他谈到：“目前村民的收入来源还是以养殖业和就近或外出打工为主，企业也对村民进行了核桃、红枣种植及养羊帮扶，专门安排H公司的技术人员还有农科所的专家教授种养技术，现在核桃种植下去了，目前成活率还可以，但是也需要后期的水肥维护，红枣是个技术性很强的活儿，种植的农户目前还比较少。农闲的时候我们会安排一些富余劳动力来合作社打工，剪羊毛或者挖地，一天给80—100元，或者联合县政府组织他们外出务工。我们也想了很多办法来帮助他们创收，在2019年的时候全村已经脱贫了，但是现在的问题就是以后怎么发展，产业发展需要持续性的投入，是一个较为长期的过程。现在政府的投入少了，企业效益也不怎么好，我们的帮扶也比较有限，移民收入可能会受到影响。”通过对受访对象的访谈可以看出，在欠发达的边疆地区，易地搬迁扶贫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生态与发展的矛盾，但移民的后期扶持也不容忽视，在巩固脱贫攻坚成果与乡村振兴的衔接过渡期，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应继续加大对边疆民族易地搬迁安置区的政策支持，将政府和市场两大主体嵌入安置区产业发展。易地搬迁安置区也应积极融入县域发展之中，以县域发展带动易地搬迁安置区产业发展，推动县域融合和产业融合，均衡区域发展，不断缩小安置区与县域的发展差距，推动安置区产业发展的持续性和稳定性，真正让易地搬迁社区实现“稳得住、能致富”。

### （三）产业可持续发展阶段（2036年～2050年）

19世纪70年代，英国的杰文斯、奥地利的门格尔和法国的瓦尔拉各自完全独立地发现了边际效用递减原理，这一原理后来被称为“边际革命”<sup>[18]</sup>。这一理论可以用来解释易地搬迁安置区的产业发展状况。一方面，易地搬迁扶贫产业是在政府主导下，通过行政手段运作与市场上的企业达成合作协议应运而生，存在政府和市场“双重逻辑”。质言之，产业发展可能面临行政干预过多而影响市场化运作，亦或是政府监管不足，由此出现“精英俘获”的现象，因此平衡行政化与市场化是扶贫产业亟需解决的重难点。另一方面，易地搬迁扶贫产业大多是企业响应脱贫攻坚政策应运而生，在初创落地阶段通常享受来自政府在土地、资金等一系列资源的集中式扶持，而在2020年底脱贫攻坚完成后，绝对贫困基本被消除，转为解决相对贫困和防止大规模返贫的阶段。脱贫攻坚完成后，政府提供的资源与开始阶段的集中性投放环比减少，部分对政府投入依赖性强的企业易出现发展后劲不足、产业发展不可持续的状况。因此，容易造成易地搬迁企业效益不佳、带动能力失灵等问题。

P村易地搬迁安置区的产业主要以第一产业为主，村民收入主要为“半牧半工”，中老年人在家附

---

<sup>1</sup> 第一书记，既是P村村委书记，同时也是H公司总经理。

近进行放牧或耕作，青壮年就近在县城或外出去省会或内地务工。从人口结构上而言，其产业发展缺乏“中坚力量”。笔者在易地搬迁安置区实地观察时往往“见物不见人”，可以看到崭新的房屋、道路、水库等生产生活资料和基础设施，但走访时难以碰到几户人家有年轻人。2021年9月15日，受访的P村书记谈到“村里以前是有很多年轻人的，因为安置区大多为少数民族，其实他们的民族性格是很恋家的，很希望在家附近工作，安置初期政府会提供一些生态补贴、安置补偿款等，也会派人指导村民进行就业安置，比如H公司需要劳动力的时候会优先选择移民。现在的问题就是种核桃需要几年才能结果，养殖业需要技术支持，而且如果想要扩大规模就需要大量的资金注入。扶贫时期是产业基数小，稍微投入一点就能起到很好的效果，而脱贫后资金支持就没有那么多了，所以现在很难发展起来。之前政府有领导说要规划旅游业，以旅游业带动一二产业，现在也还没有见到动静，可能需要一段时间。”通过访谈可知，易地搬迁安置区产业关联性不强和产业难融合，其主要原因是产业发展资金受限、高质量劳动力不足及产业发展技术落后，而要破解这一难题，其主要发力点还是应该继续加大对脱贫区的政策支持，将巩固脱贫攻坚成果与乡村振兴的有效衔接真正落到实处，持续性投入才有可能换来安置区的稳定和可持续发展，进而实现共同富裕的目标。

#### **四、统合发展：巩固脱贫攻坚成果与乡村振兴产业有效衔接路径**

2020年，脱贫攻坚任务顺利完成，标志着中国从此消除绝对贫困，正式迈入全面小康时代。但这并不意味着中国的贫困治理至此结束，而是中国的贫困治理从此转入相对贫困治理阶段。本文根据国家政策将易地搬迁社区的产业发展分为贫困阻断、均衡区域发展和可持续发展三大阶段，而三大阶段的顺利实施必须遵循相应的产业发展规律。因此，在近五年，首先，应精准产业衔接，建立贫困阻断机制。其次，在此基础上还应注重缩小城乡产业发展差距，均衡区域发展。最后，应将主体的渐进性嵌入和资源多种方式的下沉，共同构建产业发展共同体。当然，由于时空差异性和资源投入的差别，三大阶段也并非完全遵循时间线，其产业发展方式具有系统性、融合性、嵌入式特征，在统合发展中实现脱贫攻坚与乡村振兴产业的有效衔接。

##### **（一）精准产业衔接，建立贫困阻断机制**

2013年，习近平总书记在湖南湘西考察时提出“精准扶贫”的重要指示。这一思想对“脱贫攻坚”战略的实施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因此，在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同乡村振兴有效衔接过渡期，精准衔接仍然是易地搬迁安置区产业发展的有效指导方略。脱贫攻坚时期，易地搬迁安置区的产业大多处于初始发展阶段，存在政策资源碎片化、产业难以落地、带动能力不足、效益不突出等问题，难以有效带动移民致富。在巩固拓展脱贫攻坚过渡期，易地搬迁安置区的产业发展首先应考虑防止大规模返贫的问题，尽快建立贫困阻断机制。从逻辑上而言，只有易地搬迁安置区产业稳固才能从根本上解决其面临的返贫问题，而产业衔接主要从资源、主体、要素等方面进行，安置区产业发展的最终目的是将外在的资源型援助转换为本土化产业。从现实经验上看，产业的“本土化”建设应从特色产业、品牌建设、县域对接、生态产业发展等领域着手。首先，在政策上，边疆易地搬迁安置区的产业衔接应积极运用“对口援疆”“西部大开发”“新型城镇化”等一系列优惠政策，将东部的先进产业发展理念

融入本土实际。其次，产业的精准衔接应注重县域政府、企业、安置区村委会、移民四大主体间的有效协作，将产业发展理念融入主体，提升主体的参与价值、内源性与主观能动性。最后，县政府和安置区村委会应注重发展产业所需的基础设施、信贷资金、公共服务等硬性和软性因素。

就P村的产业发展实践而言，近些年来，W县积极对接援疆省市的产业发展政策，利用援疆地区的纺织全产业链集中力量发展上游纺织加工业；充分利用区域独特的温差大、光照充足的自然环境优势，发展特色农产品生产加工业；此外，县政府还积极申报旅游项目，利用丹霞地貌等自然景观和丝绸之路人文景观打造精品旅游项目。而P村在产业发展上精准衔接县域产业资源，在县域发展的基础上立足自身优势资源，承接县城产业转移，提供农产品加工业的原材料，将村域内旅游资源融入县域旅游产业发展。从宏观政策层面而言，P村积极对接易地搬迁安置区的国家优惠政策、县域支持政策及援疆省市的帮扶政策，将外界政策与内部产业发展政策相衔接，由外而内再造安置区的产业发展韧性。以微观实践来看，P村尝试探索本土化产业发展路径，促进三产融合发展。一方面，P村在种植业和畜牧业方面与科研院校合作，运用现代科技发展经济作物和牛羊养殖；另一方面，P村积极融入县域发展，利用其交通优势发展旅游资源，并且探索“直播经济”和“网红经济”，试图将传统优势行业与新技术相结合，形成新业态。

## （二）缩小城乡产业发展差距，均衡区域发展

2021年，共同富裕示范区落地浙江，学界对于共同富裕进行了诸多阐释。有学者指出，共同富裕不是“平均主义”，而是不断缩小城乡、区域差距，促进农村地区经济社会不断发展，农民收入增速超过城市居民。而在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同乡村振兴有效衔接时期，边疆民族地区易地搬迁安置点亟需推进其产业发展，促进城乡产业融合，不断缩小城乡产业发展差距，进而实现区域均衡发展的目标。易地搬迁安置区的产业融合不仅要促进安置区积极融入县域经济，而且县域经济也要不断向安置区进行产业渗透，助力安置区实现产业重组，直至融为一体，逐步形成新产业。从现实经验看，安置区的产业发展主要以第一产业为主，兼营二三产业，产业衔接和产业融合尚处于初级阶段。对于边疆地区而言，应积极利用“对口援疆”“西部大开发”“访惠聚”等一系列援疆政策。首先，在产业链的提升上，应将发达地区的产业发展经验与本地的产业发展实际有机衔接，运用发达地区的产业链、价值链和供应链的经验“嫁接”至本地。其次，要注重提升产业价值，提升产品力，注重挖掘本地产业特色，政府应积极对接科研院校，建立产学研合作基地，重点在推动农业现代化上“做文章”，提升技术性耦合能力，围绕全产业链开展科技研发进而带动移民实现技术致富。最后，边疆地区应进一步加强基础设施建设和产业上的公共服务，三产融合的重要内容是促进各产业要素的相互渗透与全面交叉，以此促进全产业链的重组，也由此产生新兴产业，即紧抓“直播经济”和“网红经济”的产业风口，加强各产业要素的流动，提升产业价值。

具体到边疆易地搬迁安置区，首先，P村作为靠近县城的易地搬迁安置区，具备天然的产业发展条件，交通上具备优势、社会经济相对较好，在产业链上应积极与县城对接，将安置区产业发展与县域经济发展相衔接，在产业融合上与县域内融合相结合，以县域产业发展带动易地搬迁安置区的持续



稳定发展。其次，P村也应利用自身的优势，整合土地、厂房等现有的资源，打造“特色民族村寨”、发展智慧农业、乡村休闲旅游，承接县域产业转移，发展农旅融合性产业，积极推动县域合作，打造产学研基地，将先进科技运用于产业发展，在促进移民就业的基础上延伸产业链、提升产品价值。最后，P村应主动对接国家发展政策，积极申报政府“发包项目”，推动安置区的基础设施建设，在“硬件”上“做文章”，进一步深化产业发展的必备要素。

### （三）多重嵌入发展，构建产业发展共同体

近些年来，学界对嵌入研究较为集中，嵌入式发展也成为社会科学研究的热词。学界之所以强调嵌入式发展的视角，是由于基层出现较多的“悬浮”现象，集中表现为政策难以落地、基层组织松散、农民参与较少等。在脱贫攻坚中，学界试图用开发性扶贫去改变贫困人群中出现的“等、靠、要”等完全依赖于政府的“输血式”扶贫方式，而在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同乡村振兴有效衔接的新时期，嵌入式发展应成为新时期产业发展的重要内容。在易地搬迁安置区的产业发展中，从理论逻辑上而言，主体嵌入和资源嵌入或许可以阐释嵌入式发展的主要内容，产业发展中的主体性嵌入包括政府、企业、村委会、村民四大群体的参与，而资源嵌入则涵盖资金、科技、人才、基础设施等产业发展要素。从现实经验来看，易地搬迁安置区的产业发展亟需破解产业同质化、持续性不强、人力资本紧缺的难题，要解决以上困境，则需要多主体协同，形成安置区产业发展共同体。此外，易地搬迁安置区需要整合优势资源，盘活土地要素，运用一系列援疆政策，并将安置区发展与县域发展相结合，积极融入县域产业发展。

从P村的产业发展实践来看，P村作为易地搬迁安置区，其本身自带来自上而下的政策倾向性资源，属于国家“五个一批”中的重点关注对象。在国家政策上，对移民安置区落实“两不愁、三保障”，从自治区政府到乡镇给予了层层划拨的配套优惠政策。鉴于其处于混合型民族易地搬迁安置区，在政策性兜底中，P村已提前完成脱贫任务，而对于移民的后期扶持上，W县政府积极对接援疆省市，利用其全产业链的优势发展安置区产业。从主体嵌入而言，P村不仅拥有常规性的四大主体，而且还能利用“第一书记”和“访惠聚”的下沉人才资源进行产业规划指导，在多方相互协同行动下，P村的产业发展逐渐步入正轨。从资源嵌入而言，一方面，P村积极引进外部援疆省市的资金、人才、产业发展经验等产业发展要素；另一方面，P村也注重整合本土的特色优势资源，包括农产品加工业、棉纺织业及旅游业，通过政府的上下协调联动，以及产业发展所需主体和资源“双嵌入”，P村的产业发展实践也在政策性衔接和资源下沉中获得稳步发展。

## 五、结论与启示

2020年脱贫攻坚任务顺利完成，地方政府通过“五个一批”等帮扶行动让易地搬迁安置区移民基本实现了“两不愁、三保障”，基本满足了移民的生活需求。然而在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同乡村振兴有效衔接的新时期，易地搬迁安置区只有实现了产业稳定发展才能促使移民稳固发展。现阶段，易地搬迁安置区的产业尚处于初始发展阶段，产业呈现出“低水平均衡”、产业融合不明显及发展较为松散的特征。究其原因，一方面，从理论逻辑上而言，在政府和市场双轨制逻辑下，产业发展过度依赖于

政府政策与市场难以有效调节形成矛盾体；另一方面，从田野调查实践来看，易地搬迁安置区难以形成独立产业，因此必须融入县域产业发展。

为此，笔者认为，边疆民族地区的产业发展既要尊重多民族风俗习惯，同时也要注意挖掘民族特色。首先，易地搬迁安置区应注意促进三产融合，提升产业价值，发展多元化产业，以此避免同质化带来的产销难题。其次，各级政府应注重衔接各类国家政策，包括“对口援疆”、“西部大开发”、“乡村振兴”等一系列政策，利用政策带来的优质资源促进产业“本土化”。最后，易地搬迁安置区的产业发展应具备嵌入式发展思维、可持续发展观念，利用主体和资源双重嵌入促进产业发展，积极对接外界资源，构建政府、企业、村委会、移民四大主体形成发展共同体。

在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同乡村振兴有效衔接的过渡期，产业发展成为易地搬迁安置区稳定发展的重要内容。然而，根据田野调查的现实情况来看，安置区产业出现同质化、难以持续带动能力有限、产业融合状况不佳、三产发展松散等一系列问题。新时期，安置区的产业发展亟需持续加大政策和资金投入，以县域产业发展带动安置区三产融合发展，在主体有效衔接和资源持续下沉中谋求安置区产业发展长效机制。一方面，边疆民族易地搬迁安置区的产业发展对政策性依赖较强，在产业发展的初始阶段，政府应积极对接自上而下的外界政策与各类资源，利用优惠政策和援疆省市的全产业链资源发展本土产业。另一方面，安置区基层政府也应做好产业发展规划，在防止返贫的基础上继续做好脱贫攻坚的政策衔接，与此同时也要注重保护生态环境，汲取“先发展后治理”的经验教训，构建政府、企业、村委会、移民四方产业发展共同体，通过精准的政策与资源衔接，发展“本土化”产业，并且注重三产融合发展，提升产业价值，以产业发展促进乡村振兴，缩小城乡差距，不断提高移民收入，创造移民共同富裕新篇章。

## 参考文献:

- [1]李培林、崔岩，2022，《从乡村入手分阶段推进共同富裕的目标和路径》，《学海》第一期。
- [2]刘明月、汪三贵，2020，《产业扶贫与产业兴旺的有机衔接：逻辑关系、面临困境及实现路径》《西北师大学报（社会科学版）》第四期。
- [3]阿瑟·刘易斯，1989，《二元经济论》，北京：北京经济学院出版社。
- [4]西奥多·W·舒尔茨著，1987，《改造传统农业》，北京：商务印书馆。
- [5]缪尔达尔，1991，《世界贫困的挑战——世界反贫困大纲》，北京：北京经济学院出版社。
- [6][13]尹成杰，2022，《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同乡村振兴有效衔接的长效机制与政策研究》，《华中师范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第一期。
- [7]陆益龙，2021，《精准衔接：乡村振兴的有效实现机制》，《江苏社会科学》第四期。
- [8][14]朱海波、聂凤英，2020，《深度贫困地区脱贫攻坚与乡村振兴有效衔接的逻辑与路径——产业发展的视角》，《南京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第三期。
- [9]李小云，2021，《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的政策与实践问题》，《华中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第二期。

- [10]张琦, 2021,《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同乡村振兴有效衔接: 基于贫困治理绩效评估的视角》,《贵州社会科学》第一期。
- [11]梁辰、余成龙, 2020,《有限理性与不确定性视域下基层产业扶贫的决策过程分析——基于豫南石村的个案研究》,《公共管理学报》第三期。
- [12]夏柱智, 2020,《中国特色农业产业化的村庄基础分析——以专业村为研究对象》,《贵州社会科学》第十期。
- [15]马克·格兰维特、理查德·斯威德伯格, 2014,《经济生活中的社会学》,瞿铁鹏等译,上海: 上海人民出版社。
- [16]涂圣伟, 2022,《产业融合促进农民共同富裕: 作用机理与政策选择》,《南京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第一期。
- [17]閻小操、陈绍军 2021,《重启与激活: 后扶贫时代易地搬迁移民生计转型与发展研究——以新疆W县P村为例》,《干旱区资源与环境》第五期。
- [18]张昆仑, 2001,《“边际效用价值论”的合理成分》,《经济学家》第二期。

☆ 作者简介: 閻小操, 河海大学社会学专业 2020 级博士研究生  
陈绍军, 河海大学公共管理学院教授

☆ 责任编辑: 李 懿

※ ※

### 我系 2 位教师喜获江苏省第十七届哲学社会科学优秀成果奖

2023 年 1 月, 江苏省第十七届哲学社会科学优秀成果奖评审圆满结束。我校公共管理学院社会学系沈洪成和陈阿江 2 位教师获奖。其中, 沈洪成教授的《如何打开黑箱? ——关于教育不平等的西方民族志研究及其启示》(论文) 荣获二等奖, 陈阿江教授的《面源污染的社会成因及其应对: 太湖流域、巢湖流域农村地区的经验研究》(著作) 荣获三等奖。此次评审我校共有 16 项优秀成果获奖, 其中一等奖 2 项, 二等奖 5 项, 三等奖 9 项。

江苏省哲学社会科学优秀成果奖是江苏哲学社会科学领域的成果最高奖, 旨在奖励个人和集体在哲学社会科学研究领域的优秀学术著作、论文、研究报告和普及成果, 鼓励广大社科工作者从事哲学社会科学的前瞻性、创新性、科学性研究。

# 环境协同治理势能何以转化为治理效能

## ——基于兴国县水土流失治理的观察<sup>1</sup>

赖慧苏 曹海林

**摘要：**环境协同治理是我国生态文明建设的内在要求，也是实现环境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重要内容。通过对兴国县水土流失治理的实地调查，基于势能转化的“前提条件—转化机制—效能呈现”的分析框架，讨论环境协同治理势能转化为治理效能的内在逻辑。结果表明，在水土流失问题社会化的基础上，各主体达成治理共识，在高位推动下生成协同治理势能是效能转化的前提条件；效能转化的过程中，不同协同类型有其差异化转化机制，即以组织建构和压力传导促进多部门、多层级协同，以制度规范和多重激励促进政社协同，以多元驱动和优势互补促进本地治理者与外来治理者的协同，最终将效能呈现为合作化技术创新、共赢式开发治理和协同化目标推进。推动环境协同治理势能转化为效能，要注重构建势能转化的前提条件，催生协同治理势能；根据不同协同治理行动的内在逻辑，运用差异化转化机制；突出协同治理效能的共赢和共享性，以进行可持续的势能转化。

**关键词：**环境协同治理势能 治理效能 水土流失 兴国县

### （一）问题的提出

环境治理是一项复杂的系统性工程，仰赖于政府部门和其他相关利益群体的合作。早期依靠政府单一力量形成的“政府管制型”环境治理模式，弊端逐渐显露。为了改变该模式，我国的政策和法律不断在释放倡导环境协同治理的政治信号。进入新时代，党和政府日益强调“构建政府为主导、企业为主体、社会组织和公众共同参与的环境治理体系”，突出多元参与是构建环境治理体系现代化的重要内容。2020年3月，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的《关于构建现代环境治理体系的指导意见》又一次强调“跨区域跨流域污染防治实行联防联控”。可见，协同治理已经成了我国环境治理的内在要求。

“协同治理”强调治理主体的多元性、各子系统的协同性，指多中心主体采用协同合作的方式参与治理活动<sup>[1]</sup>，也是多元主体在开放系统寻找有效治理的过程<sup>[2]</sup>。这一概念进入中国后逐渐本土化，主要表现为“回应治理张力而呈现的政党力量整合嵌入及回应现代性扩张而被赋予复合的价值属性”<sup>[3]</sup>，这表明在中国场域内，协同治理实际上暗含了党政引导和整合的组织作用，体现为党政引导下协同关系的建构。“势能”原本是一个物理学概念，指“相互作用的事物之间存在的位置上的落差”<sup>[4]</sup>，

<sup>1</sup>本文已刊发于《河海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2年第24卷05期。

有学者把这一概念延伸到政治领域,孕育了“政治势能”这一中国共产党治国理政的核心理念,用来解释中国政策执行经验<sup>[5]</sup>,它指“公共政策发文的不同位阶所展示出不同强弱的政治信号”<sup>[6]</sup>。有些学者在政治势能的基础上提出了“治理势能”的概念。薛泽林等认为治理势能是“政府内部政治压力通过相应组织结构向其他部门和社会传导的动力效能”<sup>[7]</sup>,强调政治权威自上而下释放的压力和动力;而李明等指出治理势能是公共政策在不同位阶和单位之间协同情势下的执行动力<sup>[8]</sup>,凸显了协同情势的背景。结合势能的原始意涵来理解,治理势能是治理主体在某一问题上有协同治理需求,这种需求借助某种社会位或政治位的落差,形成更为强烈的治理趋势和动力。学界虽然少有人专门探讨治理势能,但这一概念早已被基层政府广泛应用,以此表达党政引领下积蓄的治理能量。由于中国化后的协同治理本身隐含着党政引导的意涵,所以它存在因党政推动而产生势能的可能性,这即是协同治理势能这一概念来源的依据。协同治理势能相对政治势能和治理势能来说,具有更多的社会基础和社会认同,强调协同共识的达成。所以协同治理势能是多中心主体就某一问题达成治理共识,并在党和政府推动之下加强多主体协同合作的治理动力。环境治理中的协同治理势能主要表现为环境问题出现和泛化,各相关群体因利益受损而产生环境治理诉求,愿意与其他主体形成协同关系,党政部门高位推动协同关系的建立和环境协同治理实践的开展。环境治理中的协同治理势能可以加强跨政府部门、跨地域和全社会共治,有效解决水污染和空气污染等具有明显跨域特征和涉及多利益相关者特征的环境问题。

治理效能是治理活动产生的一系列可衡量、可感知和可比较的有利作用或积极效果<sup>[9-10]</sup>。关于效能转化问题,我国的一些重要会议和重要文件都对其进行了强调。2019年10月,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审议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指出,“把我国制度优势更好转化为国家治理效能”;一年后,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四个五年规划和二〇三五年远景目标的建议》再一次强调,在“十四五”期间要提升国家治理效能的目标。这意味着接下来我国要致力于提升国家治理效能。环境协同治理势能作为国家治理能力的一种体现,将其转化为治理效能是实现我国发展目标的内在要求之一。

目前有关环境协同治理的文献,大致有以下4个研究视角:环境协同治理何以可能的视角,研究环境协同治理形成的条件<sup>[11-12]</sup>;环境协同治理如何表现的视角,主要从经验的角度分析环境协同治理的现实案例,归纳总结出协同治理经验与模式<sup>[13-15]</sup>;环境协同治理为何难能的视角,研究协同治理的困境与问题<sup>[16-18]</sup>;环境协同治理何以可为的视角,关注实现协同治理的路径与方法<sup>[19-20]</sup>。从已有文献中可以看出,学界缺乏对环境协同治理何以有效的研究。环境协同治理本身不是目的,目的在于通过多方共治,提高治理成效。这就涉及一个重要问题,即环境协同治理何以有效,特别是高位推动生成的环境协同治理势能如何转化为效能的问题。回溯已有文献,学界当前并没有关注协同治理势能这一概念,所以有关环境协同治理势能转化为效能的文献罕见,但有少部分文献探讨了高位推动或权威驱动对环境协同治理及环境改善发挥的作用,这也可以算作一种对潜在的协同治理势能转化为效能的研

究。司林波等认为,京津冀的生态环境协同治理模式是由政治权威驱动的,在中央宏观统筹之下,通过任务分配与监督考核,将治理成效和奖赏、问责相挂钩等方式,作用于统筹型承载场域,促进了三地生态环境的改善<sup>[21]</sup>。魏巍指出,频繁的高位推动将京津冀三地捆绑一体,形成一股自上而下的协同治理势能,高位推动通过为协同治理的核心驱动力赋能、长期引导治理主体开展政策协同和重塑协同治理主体的角色定位等机制,促进三地的环境改善<sup>[22]</sup>。任敏指出,依托等级权威的河长制可以通过高权威打破部门间的掣肘,明晰政策空间的模糊地带,通过政绩考核这种强制方式,建立起相对正式的有约束力的协调机制,来促进等级协同治理效能的产生(水环境的改善)<sup>[23]</sup>。盛志宏等认为跨流域、跨部门水环境治理中的政治势能转化为治理效能的内在逻辑在于:党政联合的指挥部通过科层再造,构建地方政治利益联合体,再通过技术嵌入指挥部体系,为效能的转换提供工具支撑,使治理的效率和适应性得以提升,最后组织与技术互动重塑治理行为,使治理效能得以实现<sup>[24]</sup>。

总体来说,这部分文献虽然注意到高位推动对环境协同治理和环境改善的作用,但忽视了环境协同治理势能的转化条件。协同治理势能的诞生有一定的前提条件,如若不阐述清楚,就很难理解协同治理结构和势能为何能够存在,势能转化成效能这个过程何以产生。另外,现有文献主要讨论跨域、跨部门的环境问题治理中高位推动和政治权威对协同治理的效能转化作用和机制,忽略了治理过程中其他协同形式的转化机制分析。实际上,某一长期且复杂的环境问题的治理,往往有多种协同治理类型,不同协同治理类型的势能转化存在其特定的内在行动逻辑。例如,多部门协同治理更受自上而下的行政压力驱动,而政社协同治理则更受制度、利益和权利等因素的驱动。所以,不同的协同治理类型要有不同的效能转化机制。再者,现有文献对效能呈现方式及其推动势能持续转化的重要性缺乏关注。效能呈现方式是促进协同治理的各个主体持续通力合作和势能持续转化为效能的重要因素,若其无法兼顾相关群体的利益和诉求,持续的协同行动和效能的持续产生将可能不复存在。

通常来说,在政治管理领域,势能一旦产生,就会形成行动,水到渠成的产生效能。但在协同治理中,势能产生后,并不一定能顺利转化成效能,因为多主体常常面临利益冲突和协同行动困难等问题,导致集体不行动或个体的分散行动,影响效能转化。考虑到协同治理势能与效能的特殊性,探究如何将协同治理势能更好地转化为效能显得很重要。这可以为构建协同治理格局和建立有效的效能转化机制提供方向,推动达成提升国家治理效能的目标。基于以上考虑,本文关注在党政引导下,环境治理中的协同治理势能如何产生并转化为治理效能,其前提条件、转化机制和效能呈现方式,以及如何更好地将环境协同治理势能转化为治理效能。

## (二) 案例与分析框架

本文选取的研究案例是曾经水土流失比较严重的兴国县。兴国县位于江西省赣州市东北部,是著名的革命老区,被称为苏区模范县和将军县。全县辖 25 个乡镇,总人口 71.5 万人,土地总面积为 32.44 万 hm<sup>2</sup>,其中耕地面积 2.86 万 hm<sup>2</sup>,林地面积 24.65 万 hm<sup>2</sup>;山地居多,呈现出“七山一水一分田,一分道路和庄园”的风貌。该县原本生态环境良好,在经历过战争、大炼钢铁和不合理的生产生活活动后,成为我国南方红壤区水土流失最严重的县份之一,被国内外水土保持专家称为“江南沙漠”。

随着水土流失的社会危害日益凸显,该地从 1951 年开启治理工作,经历了 4 个治理阶段:第一阶段为试验治理(1951—1982 年),该阶段主要是在省和地区相关部门的主导下,外来科研人员与本地相关工作者在水土流失严重区域进行试验治理和技术推广,同时发动群众开展植树造林等活动;第二阶段为恢复治理(1983—1992 年),该阶段兴国县被纳入全国八片重点治理区之一,获得国家治理资金,外来科技人员前来提供技术支持,与当地全县上下齐心协力开展小流域综合治理,群众大量投工投劳支持水土保持工程建设、配合政府的封禁管护和植树(草)造林等活动;第三阶段为开发治理(1993—2002 年),该阶段注重开发与治理相结合,从单一的“生态型”治理到“生态经济型”治理转变,在制度与市场机制的作用下,群众和企业逐渐主动加入水土流失治理;第四阶段为全面治理(2003 年至今),企业逐渐成为重要的治理主体,水土保持任务也逐渐嵌入其他政治任务之中,治理更加全面。经过多年治理后,当地水土流失面积从最多时的 18.99 万 hm<sup>2</sup>,减少至 2020 年的 5.16 万 hm<sup>2</sup>,森林覆盖率从 28.8%增加到 75.36%,生态在很大程度得到恢复。因其水土流失的严重性、典型性和治理的长期性、有效性,使其成为江西省乃至整个中国南方红壤区水土流失治理的典型案例。兴国县水土流失治理有如此成效,关键在于其有突出的协同治理势能,其在各种转化机制下,形成丰富的治理效能。

根据笔者观察,兴国县水土流失治理呈现以下特征:第一,兴国县水土流失协同治理势能的转化有其前提条件,即水土流失问题逐渐社会化,损害地方发展和相关群体利益,相关群体就这一问题达成治理共识,在党政高位推动作用下,催生多主体协同治理势能。从这一点上可以看出,水土流失问题的社会化、治理共识的达成和高位推动是水土流失协同治理势能产生的基础,也是势能转化的前提条件。第二,当地不同的协同治理类型有着差异化的效能转化机制。协同治理势能形成后容易丧失,只有借助他力才能发挥作用<sup>[25]</sup>。综观兴国县水土流失治理历程,当地从 1951 年试验治理开始,呈现出以林业水保等部门引导其他部门和社会主体治理水土流失的特征,其主要的协同治理类型包括不同部门和不同层级之间的协同,政社协同以及地方治理者与外来治理者的协同。不同的协同类型有着差异化的协同行动与效能转化机制。就部门协同治理而言,组织构建与压力传导是型塑协同治理结构和促进效能转化的重要机制;就政府、群众和企业的多主体协同,制度规范和多重激励强化建构协同治理模式和推动效能转化;对于地方治理者与外来治理者的协同,多元驱动和优势互补加强了协同关系,推动了效能转化。由于协同治理势能的效能转化涉及多个主体,主体之间在利益诉求和行动偏好等方面有所差异,所以协同治理势能与效能之间并非线性关系,充满复杂性和曲折性,需要在效能转化的过程中,围绕消除利益矛盾、减少协同梗阻、提升协同度而采取相应的治理技术。第三,在效能呈现方面,体现了共赢、共享和协同的特征。一方面,不同主体通过协同行动,不仅推动了技术创新,获得诸多成果,而且还实现了效益共享和多主体共赢;另一方面,当地通过多种协同治理模式,推动不同类型的治理目标,最终实现缓解水土流失,绿化兴国的这一总目标。环境协同治理势能转化为效能涉及多方利益协调问题,这不仅体现在协同行动上,还体现在效能的分配上,若要继续推动效能的持续转化,就要突出治理成效的共赢和共享性,即只有各主体都能够从效能中获益,才能持续实现环境协同治理。这一点也是协同治理效能转化的特殊性。

本文关注当地如何从协同治理势能产生到转化再到效能呈现的整个过程。根据案例特征，从中构建“前提条件—转化机制—效能呈现”的分析框架(图 1)，探讨环境协同治理势能转化为效能的内在逻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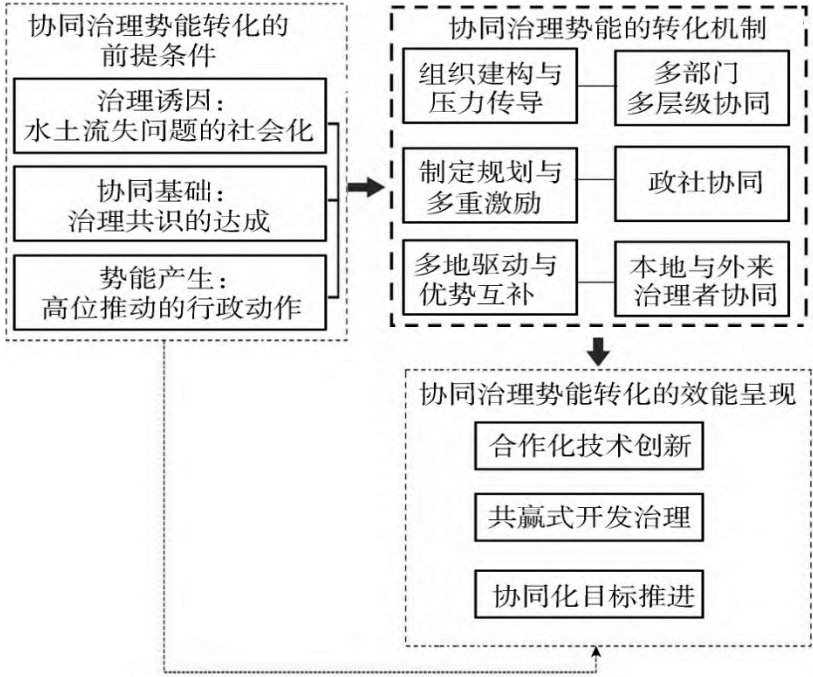


图 1：兴国县水土流失协同治理势能转化为治理效能的分析框架

## 二、环境协同治理势能转化的前提条件

如前所述，协同治理势能的转化以势能生成为前提。本文依循“问题社会化—治理共识达成—高位推动势能产生”的路径，分析当地协同治理势能的生成基础、转化的前提条件。

### （一）治理诱因：水土流失问题的社会化

从土地革命时期到 20 世纪 80 年代，兴国县的水土流失情况不断恶化，呈现出“光山秃岭，田瘦低产、十年九旱”的境况，严重威胁居民生存和地方发展。1930 年，毛泽东同志作《兴国调查》时，特地提到“那一带的山都是走沙山，没有树木，山中沙子被水冲入河中，河高于田，一年高于一年，河堤一决便成水患，久不下雨又成旱灾”，形象地展现了当年兴国水土流失的景象。水土流失问题的社会化表现为对不同群体产生了负面影响。水土流失造成当地防洪抗旱能力、土壤肥力下降，农作物减产、燃料不足，极大影响了农民的生计；同时，它也抑制了农业、工业和交通的发展，对经济的制约非常显著，也带来很多不稳定因素，以至于政府官员既难以从经济增长中获得政绩，又面临因生态问题演变而来的社会问题造成的管理压力。20 世纪 80 年代中后期企业出现后，水土流失也影响了企业的生产与经营，如增加成本、提升经营风险等。因此，水土流失这一生态环境问题不断社会化，其在



自然、社会、政府和个体层面的不利影响逐渐凸显，成为各主体治理水土流失的诱因，同时也是协同治理势能生成的条件之一。

## （二）协同基础：治理共识的达成

政府、企业和农民都是兴国县水土流失治理中的关键主体，他们对于治理水土流失都有各自的动力和需求。各层级政府、官员和业务部门的领导干部在晋升与考核机制的作用下，具有环境治理政绩共识。企业在利润最大化的驱使下，形成了治理认知。通常情况下，企业可能基于水土流失正在恶化其生存与发展环境，或是治理是一个有利可图的投资机会和有效利用闲置资本的途径，又或是当地政府或主管部门要求企业参与生态治理活动<sup>[26]</sup>这三方面原因，寻求利润最大化，从而参与水土流失治理。农民在生计的压力下，急迫想要改变贫困状态，增加收入。以农业为生计来源的农民对周边的生态环境具有较强的利益和情感关联。农民的生产生活高度依赖土壤、水源、山林和气候等自然环境，为了维持生计，治理水土流失成为当地农民的不二选择。他们懂得土地和水对农业生产的重要性，知晓生态恢复与农作物生长、生活燃料和农业收入的正向关联。农民对增收和美好生活的向往，以及不同阶段政府的引导，正是他们形成生态治理共识的动力。总的来说，政府追求政绩、市场追求利润和农民追求生计保障的行动逻辑恰好在治理水土流失这一事情上得以整合，三者达成了生态利益共识和生态治理共识，而这种共识即是协同治理势能产生的重要基础之一。

## （三）势能产生：高位推动的行政运作

治理共识的达成并不意味着治理行动的产生，因为认知到行动之间存在诸多限制因素。以农民为例，他们即使很清楚山—水—林—田—农—贫之间的关联，但没有引导者和资金支持，分散的个体无力进行治理。一般而言，政府作为环境治理的主体和引导力量，通常发挥组织协调和引领的作用。而政府的引导功能常常依靠高位推动的方式来展现。高位推动是政治目标落实的重要手段，其可通过吸引和整合相关资源与力量，为各主体提供合作动能，促进各方协同。兴国县水土流失治理呈现出显著的高位推动特征，从试验治理、水土保持区划、规划、治理技术到政策制度的制定和实施等，都是在高层权威的关心或参与中进行的，高位推动长期主导了兴国县水土流失的治理，主要表现为中央的高位推动和地方的高度重视。

首先，中央的高位推动。中央的发文、资金支持、中央领导的指示和在场视察(考察)等是强政治势能的重要标志。兴国县作为红军县、将军县和烈士县，在建立新中国的历程中立下汗马功劳。新中国成立后，中央开始“反哺”革命老区，兴国县的生态与发展问题逐渐受到国家关注。1964年，周恩来总理在全国三届人大会议期间对时任江西省委书记刘俊秀进行了治理兴国水土流失以摆脱贫困的指示；1964—1966年，国家内务部给兴国县累积拨款244.3万元用于治理水土流失；1983年，兴国县被列为全国八片重点治理区之一，一个县单独成一片，独享一个片区的治理资源；这之后，兴国县又被纳入了全国重点治理的第二期工程的名单之中，成为贡水片区的组成部分，又获得了10年的国家治理资金。该县水土流失问题一直以来受到国家的重视，并逐渐从地方问题上升为国家问题。另外，从20世纪70年代末到90年代末，国家农委、科委和水利部相关领导多次前往兴国指导和考察，释放

出高位重视的政治信号，促使兴国县具有权威性和合法性的推动水土流失治理。总的来说，中央以自上而下传递政治势能和政治“关怀”的形式，提高了不同层级、不同主体治理水土流失的积极性，催生和增强了协同治理势能。

其次，地方的高度重视。在中央的关注和支持下，地方政府高度重视兴国县的水土流失问题，省级主要领导干部多次前往兴国县考察、指导水土保持工作，主持召开多次会议。在此情况下，兴国县委县政府高度重视水土流失治理工作。1981年1月，该县作出了《全县动员，全民动手，坚持不懈开展水土流失治理的决定》，号召把治理水土流失作为经济发展的突破口、生命线来抓。1983年之后，林业水保工作被当地政府作为重点工作，摆在特殊重要的位置。此外，县委县政府陆续出台一系列文件，仅造林绿化方面就先后出台了《十年绿化兴国的决定》《关于确保十年绿化兴国的决定》和《关于实现绿化达标和在山上再造一个高效益兴国的决定》等文件，彰显治山治水的重要性。即使到了1999年，县委书记还多次在会议上强调林业水保在全县工作中的特殊位置。当地政府以发文和话语强调为表征，向全县上下传递其生态重建的决心，各部门、各层级政府和群众共同为了“绿化兴国”而相互协作。总体上，高位推动的行政运作是协同治理势能生产的关键，往往也能为此后的效能转化提供有利的政治动力。

### 三、环境协同治理势能的转化机制

兴国县在水土流失治理的历程中，存在多种协同治理类型，包括多部门、多层级协同、政府、群众和企业的政社协同、地方治理者和外来治理者的协同。由于不同协同治理行动的内在逻辑不同，其势能转化的机制也具有差异性。

#### （一）组织构建与压力传导：多部门、多层级协同及效能转化机制

一般而言，政治体系内部行动大多是围绕政治目标开展的，基于实现统一政治目标需求下的政治权威推动能够减少政治体系内部协同行动的大部分阻力，这也是跨区域、跨部门、多层级协同治理的重要动力来源。政治权威需要依靠一定的组织平台将势能进行横向到边和纵向到底的传递，以组织化形式向治理对象发力。而在依托科层组织结构进行协同治理时需要借助其他机制，以减少协同梗阻和提升协同度。在兴国，组织构建是用以集中呈现政治权威，释放协同治理势能的权力结构，而压力传导则是用以提高势能转化率的工具。

##### 1. 组织构建

科层组织是效能转换的组织结构，具有部门捆绑、横纵联动、分工协作和资源共享等功能，能够较好地强化协同治理结构，集中和释放协同治理势能。自20世纪50年代以来，各级政府在治理兴国水土流失过程中，根据阶段性需求和整体治理的需要，成立了各种各样科层组织机构。1958年，兴国县成立水土保持委员会，“文革”初期遭撤销，1979年得以恢复，恢复后的县水土保持委员会由县长兼任主要领导，水利、林业、农业等相关成员单位组成，下设办公室处理日常工作，从此当地进入了有领导、有计划、有组织的治理阶段。水土保持委员会是该县治理水土流失的核心组织，在它的领导和安排下，党政和各职能部门捆绑在一起，进行职责分工：新闻和文化教育部门进行宣传、大造舆论

声势；水保部门进行工程和生物技术治理；能源部门进行“开源节流”和能源改造；林业、土地管理部门严把林木砍伐和土地审批关；矿产、公安、工商等部门协助联合执法；法院发挥其强制性和权威性，指派专庭，定人联络，同水保监督大队处理一些棘手案件。各业务部门持续协同，推进水土流失治理。除此之外，当地还建立了封山育林指挥部、水保系统领导小组和农村能源综合建设领导小组等科层组织。当地建立各种各样的“资源协同、责任共担的‘政治利益联合体’”<sup>[24]</sup>，为党政同责、条块结合、部门横向联动、属地纵向联动创立条件。这既是多部门、多层级政府协同治理的组织基础，也是促进协同治理势能呈现和效能转化的组织媒介。

## 2. 压力传导

压力传导是一种以组织权威或等级权威为依托、以减少体制内合作阻力的协同机制。为了重建生态，兴国县建立了目标管理责任制、承包责任制、管护责任制、岗位责任制、包干制和一票否决制等制度，这一套责任制体系促进了县乡各级政府部门“两线并联”和条块勾连，将村委会与地方政府形成一种“责任连带关系”，从而被纳入治理共同体中<sup>[27]</sup>。1984年，兴国县委县政府作出《十年绿化兴国的决定》，建立目标责任制和岗位责任制，县、乡、村按照“十年绿化兴国”的规划任务分年完成治山造林的具体目标。各乡镇场的主要领导于每年年初要向县政府递交一份当年治理水土流失和绿化造林的责任状，定目标、任务和管理措施，年终检查验收，按责任状进行奖罚。同时，各乡镇场对所在乡和村干部普遍建立岗位责任制，把治山造林和山林管护的责任直接落实到每一位领导和干部身上。1990年，兴国县推行了“一把手抓一班子，一班子抓一项程”的领导责任制，每年按总体规划把任务分解成依法治山工程、依法治水工程和绿化开发工程，分别由县委、县人大、县政府主要领导抓落实。县级领导班子成员都分别包乡(镇)，乡(镇)领导包村，村干部包组，并层层签订依法治理领导责任书，根据完成情况，依照规章对其进行扣除保证金、黄牌警告和一票否决等相应处罚。以目标责任制为核心的压力传导机制，通过责任和考核等纽带，能够将多部门和多层级联结起来，促进协调行动的产生以及效能的转化。

### (二) 制度规范与多重激励：政社协同及效能转化机制

政社协同是兴国水土流失协同治理的主要形式之一。2000年之前，群众是我国水土保持工程建设的主要力量，在这之后群众投入逐渐减少，企业在水土保持领域日渐活跃。政府、群众和企业3个主体有着不同立场和利益诉求，即使在高位推动下能够生成协同治理势能，政社协同行动也不一定能高效转化为效能。由于主体利益多元，难以单纯倚靠政治权威推动的特征，政社协同一般由约束与激励因素共同驱动。因此，当地运用制度规范与多重激励机制来促进协同治理行动势能转化为效能。

#### 1. 制度规范

群众大量的投工投劳以及群众对相关制度的遵守是兴国县水土流失治理有效的法宝之一。农村义务工和劳动积累工(以下称“两工”)制度为当地政府和群众开展协同治理水土流失的活动奠定了制度基础，主要表现为广大人民群众为农田水利基本建设和植树造林等公益事业而义务出工。1991年，国务院出台《农民承担费用和劳务管理条例》规定，按标准工日计算，每个农村劳动力每年应承担5~10

个义务工和 10~20 个劳动积累工。兴国县依托“两工”制度，每年动员大量劳动力参与治山。在重点治理那些年，全县一年发动群众进行 4 次水土流失治理，夏秋冬三季上山进行工程治理，例如挖竹节水平沟、建谷坊和筑梯田等，春季则种树种草。据统计，1983—1992 年 10 年间，全县群众投工投劳 3329.9 万个工日，折合人民币 9464.65 万元；1993—1998 年，群众投工投劳 1211 万个工日，折合人民币 1.211 亿元；1998—2002 年，群众投工投劳 381.84 万个工日，折合人民币 5103.46 万元。

有一套成体系的、具有较强约束力的乡规民约是兴国县水土流失治理有效的又一法宝。当地政府将社会自发管理与政府权威管理结合起来，于 1985 年 11 月通过《兴国县治理水土流失的若干规定》，要求全县各乡、村按照这一规定因地制宜地制定更加细致的乡规民约、村规民约，内容主要包括保护植被、保护水保设施、严禁铲草皮、挖树兜、放牧、砍树和耙柴等。当地乡规民约的执行可以简单概括为：“一宣传、二教育、三放电影、四杀猪”，即宣传乡规民约；批评教育首次违反公约者，处罚屡次违约者或情节严重者请全村人看电影(村干部借助看电影的机会将村里人聚集，对村民进行宣传教育)；若有违背公约且拒不罚款者，护林员队伍则强行杀他家的猪。这样能促使村民遵守乡约。在水土保持领域法制尚不完善的时期，乡规民约以其政治强制力和民间非正式规范力两股力量，约束群众行为，督促群众之间相互监督，保护和提高水土流失治理成效。

企业也是水土流失治理的重要主体，政企合作也是后来水土保持的主要形式之一。对于山地开发，国家和地方都出台了一些制度以预防和减少开发方对水土资源的破坏。其中，“三同时”制度和制定水土保持方案是规范开发行为的重要制度规范，较好地约束了土地开发行为。除此之外，随着我国生态文明建设的深入，兴国县对山地开发的水土保持要求也不断提高。从 2016 年开始，当地油茶、脐橙等山地林果业开发项目需要签订水土保持方案等级备案表，按照要求采取一系列水土保持措施，包括实行“山顶戴帽”，保留山顶树草植被，预留水源涵养林和实行“山脚穿靴”，山脚植被保留，防治山上泥沙下山等等。这些制度规范可以在一定程度上预防企业在山地开发中对水土的破坏，从而强化效能转化。

## 2. 多重激励

协同治理不仅依靠制度约束，更需要激励机制。兴国县的政社协同治理模式之所以能够形成并转化成效能，在于社会主体可以通过市场和经济激励机制获得各自利益。市场激励主要指政府通过出台促进土地、劳力、资金、技术等生产要素的合理配置的一系列政策和制度，来激励群众和企业积极地进行山地开发。从 20 世纪 80 年代初，兴国进行林业“三定”，划定自留山和责任山，落实林业生产责任，同时鼓励农民进行土地承包治理，利用市场机制促进“四荒”资源的有效配置和合理流动。1993 年 6 月，该县出台《关于果茶开发的实施意见》，明确制定了包括允许经营权转让、入股和赋税从优等一系列鼓励农民进行开发的优惠政策。在市场激励机制下，当地在 20 世纪 80 年代后出现了以户为单位的大规模开发治理高潮，呈现出多种政群合作形式。第一，部门投资，乡村组织，承包经营，收益分成。由林业水保等部门投资，乡村两级统一规划山头、组织劳力和调运种苗、肥料，并负责协调开发山权和各种经济关系。种植后，承包给个人或专业队管理，经营收入按部门投资、乡政府、村委会

和出山农户以及承包者分成。第二，国家辅助，集体开发，承包经营，收益分成。县乡村各级办果茶场、林场，由老区建设、林业、水保部门提供有偿扶助，待有收益后分年偿还，建园后承包给个人或专业队管理，定额上交利润。第三，国户合作，收益分成。国家与个体共同开发山地资源，劳力、山地、资金实行股份制，按股分红。这些协同形式的出现很大程度上提高了当地的植被覆盖率和山上效益。

经济激励则是政府通过奖励、扶持和补贴等形式，吸引社会力量共同参与水土流失防治。2000年后，兴国县利用政策优惠引入了一些外商企业加入山地开发治理事业，企业也逐渐承担如蓄水池、拦沙坝和排灌沟渠等工程项目建设的主要施工单位。2018年9月，当地发布了《兴国县水土保持工程建设以奖代补试点工作方案》的通知，对部分水保相关项目和措施进行相应的奖补，以此吸引市场主体主动参与水土流失防治。该地通过以奖代补的方式，发挥杠杆作用，以带动建设主体在水保设施建设方面的更多投资，从而降低生态破坏的风险。2018—2020年兴国县水土保持工程建设以奖代补试点项目共有75个建设主体参与，其中专业合作社12个、专业大户63户，所有的奖补项目均有管护责任主体，据统计3年投入1260余万元的奖补资金，撬动2635万元社会资本参与水土保持生态建设，资金撬动率达到1:1.6。经济激励措施加强了企业和群众参与水土保持的积极性，有助于势能的转化。

### （三）多元驱动与优势互补：本地治理者与外来治理者协同及其效能转化机制

兴国县的水土流失具有严重性和典型性，国内外多所科研机构的科研人员前来兴国与之开展合作治理，这也是当地水土流失治理有效的重要因素之一。外来的科研力量与本地治理者之间协同行动的特征在于，一方面由权威或需求推动，另一方面则需要达到优势互补和效益最大化的效果，否则两者的合作行动难以持续和有效。基于此，多元驱动与优势互补则成了促进本地治理者与外来治理者协同及其效能转化的机制。

#### 1. 多元驱动

上级政府部门的推动与分派、环境问题科研价值的吸引、本地治理者的邀请和支持是促使本地治理者与外来治理者进行合作，将协同行动高效转化为效能的重要驱动因素。首先，水利部和长江水利委员会为了解兴国县水土流失规律、掌握治理方法，下派中科院南京土壤所、植物所和地理所等科研机构的科研工作者到兴国进行调查和试验治理，为他们与本地治理者的合作提供政治支持。例如，80年代初，长江水利委员会水土保持局就派出了专家组到兴国与当地政府相关部门开展农业资源与水土保持区划。其次，兴国水土流失的长期性、典型性和复杂性，为外来治理者提供了科学研究价值，他们在价值吸引的基础上持续开展与本地治理者的合作。例如，日本京都大学农学院教授来兴国考察，考察后与当地治理者形成了合作意向，两者共同搞了一个水土保持试验区，开展长期交流与合作。最后，本地治理者邀请外来专家来兴教授科学知识，同时也为外来专家的研究和治理实践提供支持。例如，邀请华中农大和福建农学院的专家教授前来兴国交流；当外来治理者产生科学研究成果后，地方治理者会积极致力于技术的扩散和推广应用。基于地方治理者缺乏现代科学水土保持知识，积极寻求外来治理者帮助的角度，以上三方面的驱动能够建构和巩固推动本地与外来治理者的协同关系，从而

促进势能的转化。

## 2.优势互补

外来科研人员与本地的治理者在协同治理中优势互补，促进效益最大化。一方面，外来科研人员为当地提供地质、土壤和植物等方面的现代科学知识，促进当地进行科学的水土保持，探索水土流失的原因、规律和合适的治理模式。地方治理者则利用有关地形、地貌、降雨和气温等本地知识，帮助外来科研人员因地制宜的调整相关治理技术，使技术能够更好地落地和发挥效用。例如，兴国县龙口乡水保站的工作人员在外来科研人员运用科学知识计算出水平沟的基本形态和标准的基础上，根据当地地形和水文条件，重新调整了水平沟的长度、宽度和深度，使其更能起到保持水土的作用。另一方面，外来科研机构通常只能派驻有限的人员在兴国进行水土流失科学研究与治理，所以他们在进行相关课题研究时，需要本地治理者提供人力进行协助。这一点我们可以从 ZCH 的访谈录中得以证实。

中科院南京土壤研究所、地理研究所、植物研究所以及省科委技术委员会和有关部门的科技人员陆续来到兴国蹲点示范，进行指导。他们的课题定下来了，县里出力。比如要在哪里布置一个试验，他们人可以不过来，告诉我们怎么做，我们县里派人去做，最后成果两家共有。举个例子，在塘背小流域的治理过程中，长江水利委员会就派了 ZLS 一个工程师过来，他是外地来的，虽然理论知识丰富，但很多地方的情况不是很了解的，所以我们跟他合作，在他的技术指导下铺开来搞，贡献了很多智慧。(2022 年 2 月 28 日，兴国县第一任水保局局长 ZCH 的访谈录)

## 四、环境协同治理势能转化的效能呈现

因协同治理涉及多方利益协调等问题，其势能在行动过程中容易消散，无法转化为效能。如若要持续保持协同治理关系，采取协同行动，则需在效能中体现共赢、共享和协同性，只有相关群体都能从治理中获益，才能持续维持协同治理结构。兴国县水土流失协同治理能够获得明显的效能，原因之一在于效能呈现体现了共赢、共享和协同性。根据案例情况，本文从合作化技术创新、共赢式开发治理和协同化目标推进 3 个层面展现协同治理效能的实践呈现方式。

### (一) 合作化技术创新

技术是水土流失末端治理的关键，也是预防进一步水土流失的科学保障。兴国县在水土流失治理的不同领域进行了技术创新和改进的探索，这些技术创新既建立在基本科学理论知识的基础上，又内嵌了地方经验和需求，是外来科学与本地知识结合的产物。当地与外界科研机构的协同成效集中呈现在水土保持技术的进步上，主要包括创新了竹节水平沟技术和因地制宜采纳 5 种治理模式。竹节水平沟是兴国水土保持的一个创新举措，它是 20 世纪 80 年代水利部长江水利委员会的工程技术人员与当地水保人员，在兴国县塘背小流域开展花岗岩山地水土流失综合治理时，对已有工程措施不断改进和调整的产物。竹节水平沟是指在较缓的山坡上沿等高线每隔一定距离修建的截流、蓄水沟，其沟内间隔一定距离培筑横向土挡，沟被截成竹节样的蓄水坑。其主要作用在于截短坡长、拦蓄田面/坡面径流，从而蓄排水、保土保肥；常用于立地条件较差的经果林以及水保林种植。该技术在当地治理水土流失中发挥了重要的作用，成为后来山地开发和人工造林的常用水保措施。另外，当地水保工作者

与长江水利委员会相关专家还共同探讨出来针对当地不同情况的 5 种治理模式：在重度流失区强度流失区采取治沟与治坡、治理与管护、工程与生物、人工与飞播、治山与节能以及乔灌草结合的方式；中度流失区主要进行打穴补植；轻度流失区主要采取造林封禁措施；在紫色页岩流失区，通过爆破整成梯田种植经济作物；在崩岗治理中采取上截、下堵、内外绿化的技术方法。这 5 种治理模式是兴国县水土流失治理有效的关键技术，同时也是当地协同治理的显著成效，被推广至其他地区应用。技术手段的改进实现了对不同区域较为精准化的治理，避免眉毛胡子一把抓，减少了治理成本，治理效率得到提高。同时，合作化技术创新不仅获得了较大的生态效益，还产生了明显的政治绩效。例如，由长江流域规划办公室工程师和当地水保工作者共同完成的《南方花岗岩剧烈侵蚀区塘背小流域综合治理研究》获水利部科技进步二等奖和国家科技进步三等奖，此奖项无论对于外来科研人员还是本地治理者都有明显的助益作用。不同主体合作推动的技术创新是兴国县水土流失治理最“耀眼”的经验，推动了治理效能的提升。

## （二）共赢式开发治理

协同治理本身不仅强调治理行动的协同性，也强调治理成效的共赢、共享性。兴国县在治理水土流失过程中，借助政策和多重激励机制，通过挖掘现有资源，打造生态重建与经济发展相互耦合的开发治理模式，这种模式不但满足了政府官员获得政治绩效的需求，也满足了企业和农民获得更多利润和收入的需求。该地的共赢式开发治理在不同阶段有不同的体现。20 世纪 80 年代后期至 90 年代初，当地对紫色页岩进行开发利用，同时鼓励户包小流域治理，开发利用“四荒”资源，在山上种植有经济价值的树木；20 世纪 90 年代初至 2003 年，大力推动油茶种植，同时发展“猪—沼—果”模式的庭院经济；2003 年之后，当地开始在立地条件较好的山地进行大规模的果茶开发。以“猪—沼—果”开发治理模式为例。该模式是以流失劣地为对象，以果园套种猪饲料(青饲料)，以猪(人畜粪便)为沼气发酵原，以沼气为能源，沼液沼渣(沼肥)为果蔬肥料，组成生态良性循环系统，来提高土地生产和土地产出商品率，以实现既控制水土流失又提高经济收入的目的。据统计，当全县建立 10474 个沼气池时，每年可产生直接经济效益 1600 万~2100 万元。接低标准计算，5 年累计总效益 3162.69 万元，其中节柴效益 1057.9 万元；沼肥增果效益 919.9 万元；养猪效益 558.09 万元；沼肥增产效益 626.8 万元。减去投资有净收入 1526.76 万元，产投比为 1.93：1。共赢式开发治理是政府、群众和企业共同参与的治理实践，政府通过政策吸引和鼓励群众与企业进行山地开发，最终实现生态效益与经济效益的耦合和相关利益群体的共赢，进而增强多主体治理的可持续性，促进效能转化。

## （三）协同化目标推进

长期的、多种类型的协同治理行动推动了各项政策和目标的实现，最终促使当地“青山再现”。兴国县的水土流失治理的总体目标是生态重建，这项总体目标在实践中被拆解为多个子目标，包括节能改灶、植树造林和封山育林等，这些子目标的达成，都得益于各主体的协同合作。以植树造林为例，在 1986—2000 年的十几年间，当地造林总面积达到 58238.8hm<sup>2</sup>，其中人工造林 31704hm<sup>2</sup>，飞播造林 26534.7hm<sup>2</sup>，“四旁”植树 1140.94hm<sup>2</sup><sup>[28]</sup>，森林覆盖率从 20 世纪 80 年代初的 20%提高到 2020 年的

75.36%，实现了绿化达标。在此过程中，相关群体都发挥了各自的功能。水保部门在水土流失严重的几个乡镇结合开挖竹节水平沟等工程措施大面积人工种植乔灌木；林业部门则同时以人工和飞播造林两种方法大面积造林，其中包含幼林抚育、低质低效林改造和建立各种类型的经济林基地等；群众以投工投劳的方式直接在山上种树，同时在“四旁”种植薪炭林或者具有经济价值的林木。据统计，到2000年，当地社会造林效果较为明显：个体造林总面积3170hm<sup>2</sup>中，杉、松、毛竹等用材林1643hm<sup>2</sup>，经济林1528hm<sup>2</sup>，其中个体承包经营216hm<sup>2</sup>，农民个体自己开发经营的2955hm<sup>2</sup>，占93.2%。根据消灭荒山和治理水土流失的目标，林业和水保部门按照各自的种树方式和标准，在不同程度的水土流失区域因地制宜的植树造林，群众则在政府动员和利益驱动之下广泛参与到这一活动中来，与林业和水保部门共同推进绿化达标，实现绿化兴国的目标。不同主体的协同合作使各主体的功能汇聚一起，资金、技术、政策和人力得到整合，回避了分散治理的弊端，提高了治理效率。

## 五、结论与建议

近年来，无论中央还是地方，都在倡导环境协同治理，各个层面的环境协同治理势能正在逐步生成。如何将环境协同治理势能高效和持续的转化为效能是实现环境目标的重要内容。兴国县水土流失治理的经验表明，实现环境协同治理势能有效转化的核心在于，在促使势能生成的基础上，有针对性的根据不同协同类型的行动逻辑，采取差异化的转化机制，同时注重效能呈现的共赢性和共享性。具体来说：在势能产生阶段，强调多主体的协同治理共识达成基础上的高位推动，此即势能转化的前提与基础；在势能转化过程中，减少协同梗阻和提升协同度，此为势能转化的机制条件；在效能的实践体现阶段，强调各主体的协同共赢共享面向，此即效能呈现方式。其中，构建有效的效能转化机制是关键。长期存在的、棘手和复杂的环境问题在治理过程中涉及诸多主体，在不同情境和治理目标下，形成多种协同治理模式，其中多部门、多层级协同，政社协同和地方治理者与外来治理者的协同是较为常见的类型。协同治理中的势能转化有其特殊性，势能的产生并不意味着行动和效能的产生，存在消耗势能的阻碍因素，需要采取相应的措施进行应对。因此，根据不同协同治理类型的行动逻辑，制定差异化的势能转化机制，是更高效实现治理目标的重要内容。

在推进环境治理现代化过程中，可从以下几方面强化环境协同治理效能：首先，注重构建势能转化的前提条件，即各级政府向其他治理主体强调环境协同治理的重要性与必要性，促成环境治理共识的达成，利用高位发文、领导指示和视察等方式，催生环境治理势能。其次，根据不同主体协同治理的内在逻辑，建构差异化的效能转化机制。根据多部门、多层级协同治理主要由政治权威驱动的特征，建立科层组织机构，例如跨区域、跨部门合作的区域环境治理管委会、领导小组和指挥部等，推动部门协同、纵横联合、分工协作和资源共享，构建“利益—责任”共同体。在此基础上，利用压力传导等机制减少政策执行的异化程度，强化协同治理效能。根据政社协同治理主要由约束与激励共同驱动特征，通过正式或者非正式的制度规范，预防制度外行为，维护协同治理的阶段性成效；通过环境资源使用权承包、转让，奖励、扶持、和补贴等市场和经济激励机制，激发社会力量参与环境治理。根据本地治理者与外来治理者协同主要由多元驱动和优势互补的特征，在科技力量薄弱地区，积极引入外



来科技力量,将其带来的现代科学技术知识进行本土化调整,促进本土知识与外来知识的高效互补与融合。最后,在协同治理效能的呈现方面,建立利益分配机制,使不同主体都能共享协同治理效能,如此才能持续维持协同治理关系。

## 参考文献:

- [1] 孙萍、闫亭豫,2013,《我国协同治理理论研究述评》,《理论月刊》第3期。
- [2] 李汉卿,2014,《协同治理理论探析》,《理论月刊》第1期。
- [3] 单学鹏,2021,《中国语境下的协同治理概念有什么不同?——基于概念史的考察》,《公共管理评论》第3期。
- [4] 王海洲,2011,《政治仪式中的权力结构及其动态分析》,《南京社会科学》第3期。
- [5] 贺东航,2021,《政治势能:中国共产党治理之道的内在图式》,《行政论坛》第3期。
- [6] 贺东航、孔繁斌,2019,《中国公共政策执行中的政治势能——基于近20年农村林改政策的分析》,《中国社会科学》第4期。
- [7] 薛泽林、孙荣,2016,《治理势能:政策协同机制建构之关键——台北与上海文化创意产业培育政策比较》,《情报杂志》第10期。
- [8] 李明、许文鑫,2021,《治理势能:中国情境下公共体育政策高质量执行的驱动力——基于近30年体育产业政策文本解读》,《北京体育大学学报》第11期。
- [9] 吕普生,2020,《我国制度优势转化为国家治理效能的理论逻辑与有效路径分析》,《新疆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第3期。
- [10] 马亮,2021,《四位一体的国家治理——制度优势何以转化为治理效能?》,《广西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第1期。
- [11] 余敏江,2013,《论区域生态环境协同治理的制度基础——基于社会学制度主义的分析视角》,《理论探讨》第2期。
- [12] 潘加军、刘焕明,2019,《新时代环境利益冲突协同共治的运行机制与制度保障》,《贵州社会科学》第12期。
- [13] 吴建南等,2020,《中国区域大气污染协同治理机制何以奏效?来自长三角的经验》,《中国行政管理》第5期。
- [14] 乔花云等,2017,《京津冀生态环境协同治理模式研究——基于共生理论的视角》,《生态经济》第6期。
- [15] 郭施宏、齐晔,2016,《京津冀区域大气污染协同治理模式构建——基于府际关系理论视角》,《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研究》第3期。
- [16] 王喆、周凌一,2015,《京津冀生态环境协同治理研究——基于体制机制视角探讨》,《经济与管理研究》第7期。
- [17] 秦立,2016,《政治学视野下的雾霾协同治理机制》,《江西社会科学》第5期。
- [18] 李永亮,2015,《新常态视阈下府际协同治理雾霾的困境与出路》,《中国行政管理》第9期。
- [19] 李宁,2019,《协同治理:农村环境治理的方向与路径》,《理论导刊》第12期。
- [20] 卢青,2020,《区域环境协同治理内涵及实现路径研究》,《理论视野》第2期。

- [21] 司林波、张锦超, 2021,《跨行政区生态环境协同治理的动力机制、治理模式与实践情境——基于国家生态治理重点区域典型案例的比较分析》,《青海社会科学》第4期。
- [22] 魏巍, 2021,《高位推动模式下区域协同治理政策的时空演进——以2014—2019年京津冀协同发展的政策文本分析为例》,《长白学刊》第1期。
- [23] 任敏, 2015,《河长制:一个中国政府流域治理跨部门协同的样本研究》,《北京行政学院学报》第3期。
- [24] 盛志宏、李雨明, 2021,《从政治势能到治理效能——基于指挥部结构—技术—行为的三维分析》,《江汉论坛》第12期。
- [25] 虞崇胜, 2020,《将制度优势转化为治理效能——国家治理现代化的关键环节》,《理论探讨》第1期。
- [26] 李周、包晓斌, 2002,《我国水土流失治理机制研究》,《中国农村经济》第12期。
- [27] 王汉生、王一鸽, 2009,《目标管理责任制:农村基层政权的实践逻辑》,《社会学研究》第2期。
- [28] 兴国县地方志编纂委员会, 2008,《兴国县志(1986—2000)》,西安:三秦出版社。

☆ 作者简介: 赖慧苏, 河海大学社会学专业 2019 级博士研究生  
曹海林, 河海大学公共管理学院教授

☆ 责任编辑: 李 懿

※ ※

### 我校江苏高校哲学社会科学重点建设基地通过考核验收取得“优秀”等级

2023 年 4 月, 江苏省教育厅公布了江苏高校哲学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和优秀创新团队考核验收结果, 我校陈阿江教授主持的江苏高校哲学社会科学重点建设基地——环境与社会研究中心参评, 考核验收结果为“优秀”等级。

中心聚焦科学研究、社会服务、人才培养、学术交流以及国际合作, 均取得了显著的成就。建设期内, 中心在《社会学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内部文稿)》《中国行政管理》等权威期刊发表论文多篇, 近 10 篇研究成果被《新华文摘(网刊)》《中国社会科学文摘》、人大复印资料《社会学》《生态环境与保护》等全文转载。2022 年, 中心联合河海大学社会科学研究、中国社会学会环境社会学专委会创办学术集刊《环境社会学》, 并获评 2022 年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优秀新创集刊”奖。2022 年, 中心作为重要力量支撑河海大学社会学学科申报并获批“十四五”江苏省重点学科(A类)。此外, 中心骨干组成的环境社会学教学团队荣获河海大学首届“优秀研究生教学团队”(全校首批一共三支导师团队入选, 该团队为哲学社会科学领域唯一入选的导师团队)。

本次江苏高校哲学社会科学重点基地考核验收工作, 共有 40 家江苏高校哲学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参加, 其中 12 家重点基地验收结果为“优秀”。



## 近 20 年国内外独生子女研究

### ——基于 CiteSpace 和 HistCite 的可视化分析

昌昊甜 亓 迪

**摘 要：**本文运用 CiteSpace、HistCite 文献计量软件，以 2003 年—2022 年间有关独生子女主题的中文核心文献和 web of science 核心集文献为分析对象，通过对发文数量、引文编年图、研究作者及机构、研究热点和前沿趋势进行可视化分析发现，国际上独生子女文献相互引证关系不强，但前十年和后十年研究热点呈现明显的不同；我国作者和机构合作度不高；国内外关于独生子女的研究主题、研究内容和研究方法上的成果较为丰富，研究热点和前沿也较为明显，但是在独生子女与非独生子女问题比较上，如心理健康问题，目前尚未形成一致的研究结论。在“后独生子女时代”由生育政策变化而衍生出的各类社会问题将成为研究的主要方向，未来仍需重视独生子女相关研究，并形成较为统一的研究结论。

**关键词：**独生子女 CiteSpace HistCite 可视化分析

#### 一、引言

1971 年 7 月我国政府为了缓解当时庞大的人口需求，在《关于做好计划生育工作的报告》中明确指出，“人类在生育上完全无政府主义是不行的，也要有计划生育。”这是我国推行计划生育政策的开端。1982 年 9 月，中国政府正式将计划生育政策作为一项基本国策，提倡一对夫妇生育一个子女，基本缓解了当时中国的人口问题。为了更好的实施独生子女政策，同时也结合我国基本国情和农村的传统习俗等，我国在 1984 年修订独生子女政策，允许农村家庭在得到审批的情况下生育二胎，一些地方针对当地实际情况围绕独生子女政策，出台了相关实施条例。

独生子女政策实施 40 年来，虽然有效解决了当时我国的人口矛盾问题，并一定程度上提升了女性的社会地位，但是也确实带来了新的社会问题。截至第六次人口普查显示，我国人口出现男女比例失调、老龄化加剧和人口少子化的现象。人口少子化是指人口数量减少，生育率不断降低，新生儿占总人口比重不断减少的现象<sup>[1]</sup>。2013 年 12 月我国正式颁布“单独二胎”政策，但是二胎政策的放开并未如预期一样能显著提高我国的生育率。经过社会各界的呼吁和征求民众生育意愿等举措之后，2016 年

1月1日又颁布“全面二孩”政策，随后在2021年颁布“三孩”政策。尽管我国大力提倡生育二胎、三胎，但经学者们的实证研究我国的育龄人群生育水平和生育意愿仍呈走低态势<sup>[3]</sup>。陈蓉通过针对上海的调研显示，无论是户籍人口还是流动人口，人均生育意愿子女数均已低于两个孩子<sup>[4]</sup>。于潇、张争光等人的研究也显示独生子女的生育意愿明显降低<sup>[5][6]</sup>。在未来30年内最后一批独生子女将成为社会的主力军，因此回顾和总结独生子女相关文献具有一定的普遍意义，对于未来多胎家庭的研究也具有一定的参考价值。

## 二、研究方法

### （一）研究工具

CiteSpace知识图谱早在2005年就在我国学术领域兴起，并迅速掀起了相关研究的热潮，该软件是陈超美博士团队基于web of science数据库进行研发，其分时、动态的可视化科学知识图谱能够将一个研究领域内的发展历程，包括作者、机构、关键词和共被引期刊等展现在一幅图谱上，其中引文节点和引文聚类表征的研究前沿会自动进行标注<sup>[7]</sup>。

引文分析是文献计量学研究中一个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其中引文节点的研究是引文分析的一个重要方面，它通过文献中引证事项的时间序列及联系，运用引文编年图展示某个研究主题的文献源流、最初作者和主题的发展脉络，加菲尔德的HistCite（即History Of Cite）引文图谱分析软件为主要代表<sup>[8]</sup>。

### （二）数据来源

中文期刊数据来源于中国知网（CNKI），在高级检索界面中搜索主题为“独生子女”，并选取社科类学术期刊。为了保证文献质量，文献来源为核心期刊。由于独生子女相关的研究自2003年开始激增，因此本研究的时间跨度为2003年1月1日至2022年11月1日，共搜索到1956条结果。对检出的数据中的新闻、政策法规类文本、广告等与“独生子女”主题研究不相关的文献进行剔除，最终确定2003年—2022年期间的1751篇文献作为本次研究的分析对象。经CiteSpace6.1R3（64-bit）软件数据转换，并设置时间跨度为2003—2022年，时间区值分为1年，时间切片阈值设置为50，分别进行发文时间规律、发文机构和作者、关键词、研究热点和前沿相关分析。自2003年1月1日—2022年11月1日以来，1751篇核心期刊文献共涉及569位作者，483家科研机构，涵盖575个关键词。期刊主要涉及《人口研究》《中国人口科学》《社会科学》和《教育研究》等。

外文期刊来自web of science核心集数据库，检索式为SU=（only child in china），研究方向为Psychology、Sociology、Social Work，类型选定Article，共搜索到2082条结果。将WOS数据库中的2082条结果以文本文件的形式导入CiteSpace6.1R3软件中，软件自动剔除重复论文，共得到1991篇外文文献。

## 三、结果分析

### （一）近20年独生子女相关文献发文随时间分布情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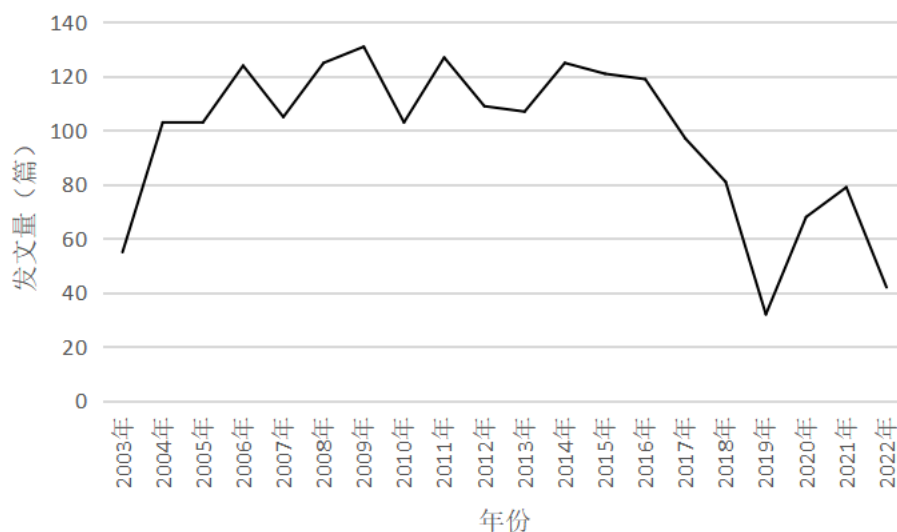


图 1：我国近 20 年独生子女相关文献发布随时间分布图

### 1.我国近 20 年核心期刊发文情况

2003 年至 2022 年独生子女相关研究的发文数趋势如图 1 所示，从图中看出近 20 年我国独生子女相关研究可以分为三个时期。首先是快速增长时期（2003 年—2004 年），由于当时计划生育政策的全面落实，独生子女数量急速上升，在 2003 年左右大量独生子女步入适婚年龄，因此以风笑天和李嘉岩为代表的学者开始研究独生子女的生育意愿情况。又有较多学者将独生子女和非独生子女进行比较研究，如探究独生子女的体质状况<sup>[9]</sup>、职业适应能力<sup>[10]</sup>、社会适应能力<sup>[11]</sup>等，在这一年中相关研究开始从 55 篇激增到 113 篇。

其次是研究繁荣时期（2005 年—2016 年），这十年学界的研究内容更加细化，研究角度更加丰富。除了将独生与非独生子女进行比较研究外，研究热点开始关注到独生子女父母的养老问题，如独生子女养老观念的转变、第一代独生子女父母的养老风险和养老焦虑、家庭结构变迁及亲子支持等问题进行分析，并且对于失独父母也进行了大量深入的研究，研究主题包括对失独家庭的帮扶机制的思考、失独家庭的规模预估、失独父母的心理健康问题。

最后是研究热潮褪去时期（2017 年—2022 年 11 月），自 2016 年“二孩政策”的出台，独生子女相关研究开始急速下滑，但随着生育政策实施效果并不显著，以及在新冠肺炎疫情的背景下，有关研究在最近两年有小幅上升趋势。在微观层面研究上独生子女父母的养老问题、独生子女的心理健康和社会支持状况、生育意愿和同胞关系等是最近几年的研究主题。在宏观层面上学者对于我国计划生育政策的解读和总结也更为丰富。由于独生子女是在特定历史背景下应运而生的，因此我国独生子女的研究趋势紧跟政策颁布和实施情况。

### 2.国外近 20 年 WOS 核心期刊发文情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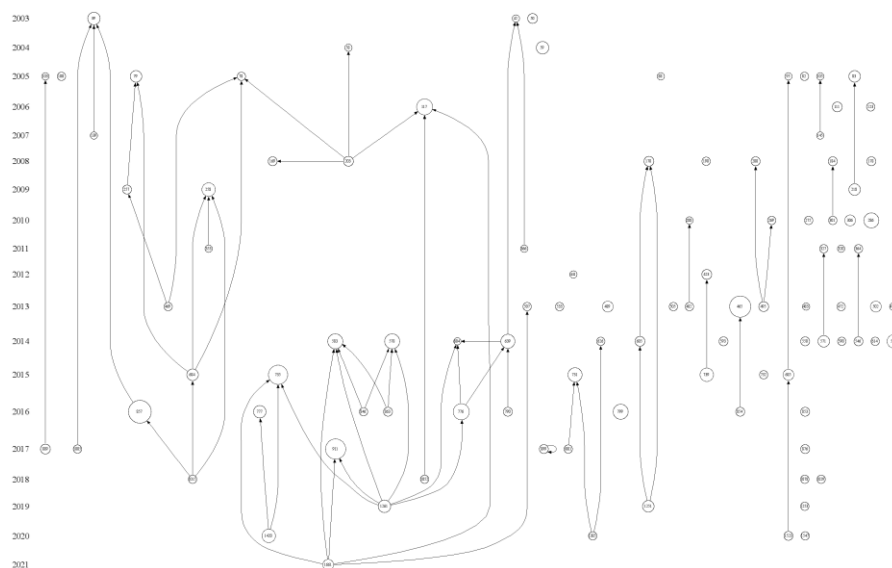


图 2: WOS 核心集中独生子女研究引文编年图

HistCite 生成的引文编年图如图 2,从图中我们可以清晰了解该研究领域的发展脉络和继承关系<sup>[12]</sup>。在 HistCite 生成的引文编年图中,每一个节点代表一篇文献,节点圆圈越大代表该文献 LCS 值越高,LCS 值即为该文献在 2082 篇文献中被引用的次数。节点的数字代表该文献在 HistCite 软件中的序号,节点之间的连线代表两篇文献存在引证关系,箭头所指即为被引用。本文运用 HistCite 软件对近 20 年 WOS 数据库中的 2082 条文献进行整理分析,生成国际期刊关于近 20 年独生子女研究文献的引证关系图 2,发现独生子女研究主题在国外期刊中总体联系并不算密切,引证关系一般,但前后十年的研究热点差别却很明显。

近 20 年国际上关于独生子女的研究发展脉络,以 10 年为一组进行分析:

(1) 2003—2012 年:在独生子女研究的前 10 年国外学者的节点文献主要呈现两个特征:一是在某些问题研究上,研究者通常会对独生子女和非独生子女进行比较研究,以更好地了解他们的特点。另一个特点是对中国的独生子女政策进行历史回顾和影响分析。文献 39 探讨的主题是独生子女的营养状况,该研究为 Hesketh T 等人发表在《ARCHIVES OF DISEASE IN CHILDHOOD》期刊上的“Health effects of family size: cross sectional survey in Chinese adolescents”,为确定中国独生子女的发病率、营养情况、风险行为和卫生服务利用率是否与非独生子女不同,研究者针对中国浙江省三个不同地区的 4197 名中学生进行调查,结果表明无论是独生还是非独生子女在一些关键指标上没有显著差异,独生子女并不会会有较高的发病率、危险行为和较低的营养状况<sup>[13]</sup>。文献 58、117 和 203 主要对中国独生子女的照顾父母意愿进行研究,文献 58 探讨了家庭和社会因素对中国独生子女一代对赡养父母责任态度的影响。家庭社会化并没有提高年轻人对孝顺责任的态度,独生子女政策实施后出生的子女在预见到工作和赡养父母冲突时,其赡养父母的意愿低于有兄弟姐妹的子女。作者认为,在中国社会结构而非社会化在塑造独生子女一代对赡养父母的态度<sup>[14]</sup>。但文献 117 的研究者认为独生子女赡养父母的

可能性与有兄弟姐妹的子女一样大,而且更有可能打算在同一座城市居住。另外 Deutsch, FM 认为赡养父母的责任更多依赖于女性,因此独生子女政策正在破坏中国家庭的父系制度<sup>[15]</sup>。文献 203 在文献 58 和 117 的基础上,探讨了第一代独生子女在独特的社会文化背景下是如何理解“孝道”的, Liu, FS 认为孝道自我意识的构建,以及独生子女与父母之间的整体意义的构建,是在当今中国特定的社会文化背景下,个人自我与集体家庭之间进行的。与此同时,独生子女身份深刻影响孝道自我意识的构建,并且受到家庭经济条件的作用。进一步研究表明,由于独生子女的身份,独生女已经成为“替代儿子”,承担传统上规定的儿子的孝道义务<sup>[16]</sup>。文献 79 和 257 针对独生和非独生子女的心理健康状况进行研究。文献 79 针对的是中国城乡高中生的心理健康状况,结果显示城市独生子女的家庭幸福感较低,而在农村的独生和非独生子女中不存在显著差异<sup>[17]</sup>。文献 257 针对 4502 名香港华裔青少年进行研究,研究控制了潜在的人口变量,如性别、年龄、学习水平、经济状况、家庭结构和移民身份,研究发现独生子女相对于有兄弟姐妹的同龄人在三个方面有优势:身心健康、生活满意度高和较多参与慈善捐款<sup>[18]</sup>。文献 42、366、258 作者分别进行了对中国计划生育政策的人口学思想阐述、政策发展脉络和由此产生的社会影响的研究。文献 42 是 Greenhalgh, S 发表在《POPULATION AND DEVELOPMENT REVIEW》上的关于中国独生子女政策制定的探讨,这篇文章认为,独生子女政策背后的核心思想来自西方科学。文章分析了独生子女政策的两个核心概念:“中国实际上面临着人口危机”、“独生子女政策是唯一的解决方案”。另外,作者通过探讨人口研究的人文和历史特征,强调了人口知识制造的复杂性和科学实践在帮助构成人口现实本身方面的力量<sup>[19]</sup>。文献 366 在文献 42 的基础上进一步探讨独生子女政策导致的中国男女比例失衡问题<sup>[20]</sup>。文献 258 是由 Wang, Y、Fong, VL 两人 2009 年发表在《JOURNAL OF THE AMERICAN ACADEMY OF CHILD AND ADOLESCENT PSYCHIATRY》上的一篇探讨中国独生子女政策发展脉络和影响的文章,文中从社会和文化两个角度分析独生子女政策,并探讨“四二一”家庭结构对独生子女的影响<sup>[21]</sup>。

(2) 2013—2022 年:独生子女研究的近 10 年,涌现出一些高被引文献,整体上也呈现两个特征,一是关于二孩、三孩政策实施后的衍生问题探讨,如民众生育意愿变化、新政策的合理性及社会影响;二是研究对象开始聚焦到失独家庭或者失独父母。文献 790 运用历史分析方法说明即使在中国“重男轻女”的文化影响下,西北地区的人民生育意愿仍未有显著提高<sup>[22]</sup>。文献 639 和 857 分别对新生育政策颁布的历史背景、制定合理性和对社会发展的影响进行论述。从 2014 年开始,研究者对一类特殊家庭——失独家庭进行深入研究,文献 578 和 583 是该领域发表最早的引证文献。文献 578 主要研究汶川地震后失独母亲的心理健康和后续生育意愿,文献 583 的研究者们认为在当时政府已经意识到需要帮扶失独家庭,但力度仍然不够,需要为失独家庭提供全面的支持体系,如经济救济和老年人救助,并努力减少社会对这些家庭的污名化<sup>[23-24]</sup>。文献 846 和 863 在文献 578 和 583 的基础上,聚焦于汶川地震后的失独父母他们的心理健康状况,如创伤后应激障碍。文献 735、776 则进一步细化研究视角,将目光聚焦于失独父母在失独后是如何变化的,这些失去亲人的父母不仅深受失去亲人的影响,而且还受到文化的污名化,“失独”这个集体身份的定义不仅来自个人的悲痛,还来自文化的独特性和独生

子女政策带来的后果<sup>[25-26]</sup>。文献 911、1261、1661 主要研究失独父母在创伤经历后生理、心理、社会支持等方面的变化。大量节点文献都表明,“失独”带来的四个主要生活后果:心理和身体健康受损、社会支持和互动减弱、生活意义丧失、缺乏关怀和安全感。研究者们呼吁要对失独群体进行健康监测和心理健康干预、给予充分的社会和社区支持以及改善社会保障体系<sup>[27-29]</sup>。

## （二）研究机构分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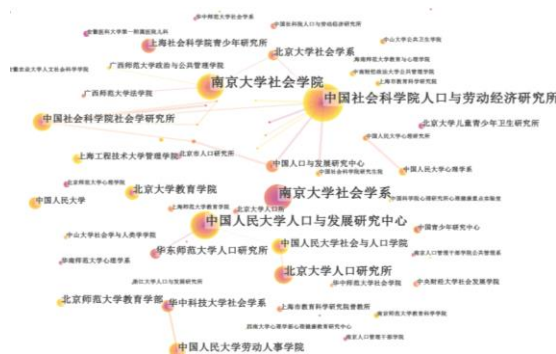


图 3: 我国近 20 年独生子女研究机构图谱

### 1.国内发文机构分析

如图 3 从统计结果来看,我国近 20 年发表独生子女相关文章的科研机构总共 483 家,172 条连线,密度 0.0015 说明合作并不紧密。发文数量排名前五的是南京大学社会学系(院)、中国社会科学院人口与劳动经济研究所、中国人民大学人口与发展研究中心、北京大学人口研究所、北京大学教育学院,发文量依次是 32 篇、29 篇、25 篇、17 篇、11 篇。图 3 为发文机构图谱的全景图,可见虽然南京大学社会学系(院)发文量最高,但是与其他科研机构合作得并不紧密,仅与三家科研机构产生合作,分别是广西师范大学政治与公共管理学院、北京大学社会学系、广西师范大学法学院。与其他机构合作较多的是中国社会科学院人口与劳动经济研究所,在近 20 年间与 8 家机构进行合作共发文 34 篇,主要针对家庭结构<sup>[30]</sup>、独生子女政策<sup>[31]</sup>以及由独生子女问题而衍生的养老问题进行研究<sup>[32]</sup>。

## 2. 国际发文机构分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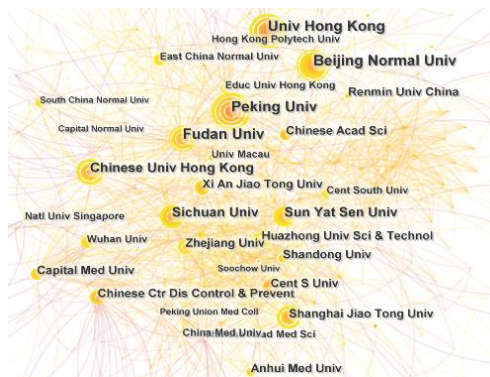


图 4: 国外近 20 年独生子女研究机构图谱

从图 4 得知, 近 20 年来在 WOS 核心集发表独生子女相关文章的研究机构一共有 489 家, 1661 条



连线，密度 0.0139 可见不同机构之间合作相当紧密。发文数量前五的机构是中国的大学，依次是北京大学（121 篇）、香港大学（101 篇）、北京师范大学（101 篇）、复旦大学（94 篇）、香港中文大学（86 篇）。其中发文数量最高的北京大学与 101 家机构存在合作发文，被引量最高（455 次）的文献是《The Development of Executive Functioning and Theory of Mind:A Comparison of Chinese and U.S. Preschoolers》，文中将中美学龄前儿童进行比较，发现中国学龄前儿童在执行功能的所有指标上都优于美国儿童，但在思维推理方面却比美国儿童差。国外研究机构发文数量前五的依次是新加坡国立大学、宾夕法尼亚大学、纽约大学、伦敦大学、哈佛大学。

（三）作者分析

1.国内作者分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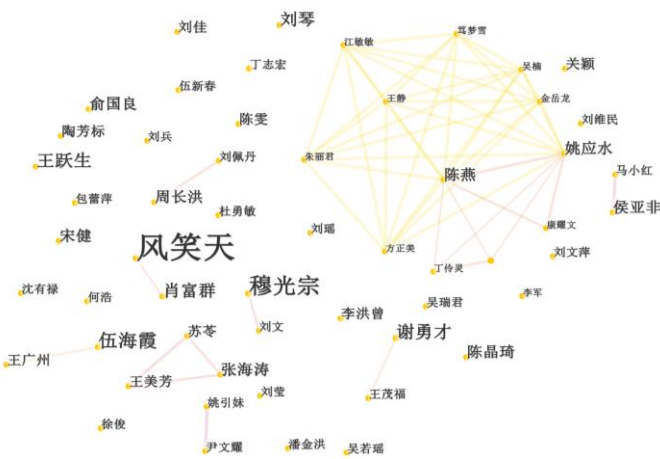


图 5：我国近 20 年独生子女研究者图谱

我国独生子女文献作者可视化网络图谱如图 5 所示，近 20 年独生子女研究涉及 569 位作者，作者之间有合作的用连线表示。可见姚应水和陈燕两位学者与倪仕钢、康耀文、丁伶灵等 11 位来自皖南医学院的作者都存在紧密合作。其研究对象大部分是安徽省的青少年群体，研究内容围绕青少年的亚健康状态、心理健康状况以及新冠肺炎疫情期间的大学生抑郁焦虑情况进行深入细致地研究，学科主要涉及医学和教育学两个领域<sup>[33]</sup>。风笑天学者是社会学领域的专家，近 20 年独生子女研究核心期刊文献总计 44 篇，其突变值 4.06 说明风笑天学者在独生子女领域短时间内集中发表论文数量多，如在 2010 年发表核心期刊 9 篇。2003 年，风笑天学者就进行了独生子女和非独生子女的比较研究<sup>[34]</sup>，后续对第一代独生子女的生活能力<sup>[35]</sup>、社会适应<sup>[36]</sup>、养老观念<sup>[37]</sup>、婚后居住方式<sup>[38]</sup>、以及生育意愿<sup>[39]</sup>做出了较多实证研究，近年来又对独生子女的 40 年研究历程进行了深入的总结和回顾<sup>[40]</sup>。另外，谢勇才和肖富群两位学者也是突变值较高的专家，其中谢勇才学者的研究对象主要是中国的失独家庭，肖富群学者主要针对的是农村独生子女进行研究。发文量大于 5 篇并存在突变值的作者如表 1 所示。

表 1: CiteSpace 导出的 20 年间发文量大于 5 篇的作者

作者	发文量	突变值	年份
风笑天	44	4.06	2005
穆光宗	13		2007
伍海霞	8		2015
谢勇才	7	4.13	2015
王跃生	7		2013
肖富群	6	3.36	2010
刘琴	6		2013

2.国际作者分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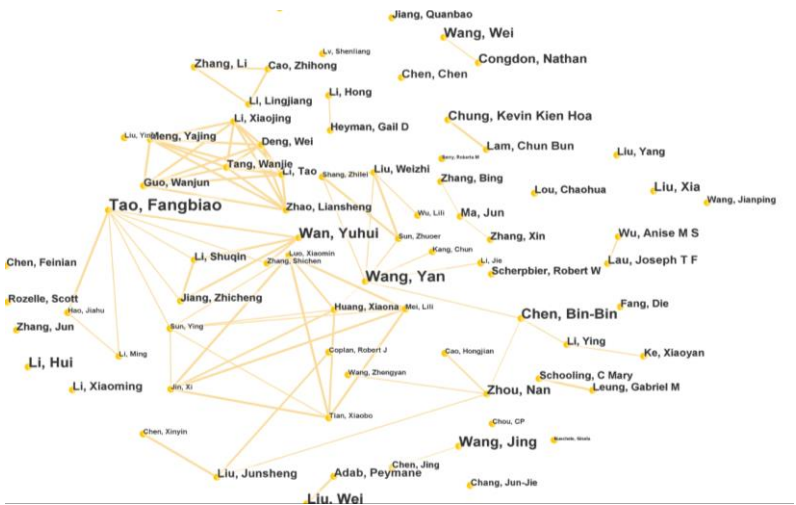


图 6：国外近 20 年中国独生子女研究者图谱

WOS 核心集数据库近 20 年研究中国独生子女的作者如图 6 所示，共有 690 位作者，924 条连线，可见作者之间存在紧密合作关系，学术团体网络较为清晰。其中 20 年间发文数量最多的学者是 Tao,fangbiao，共计发文 11 篇，研究内容涉及中国儿童的身体健康和精神卫生等方面，较多关注我国儿童的肥胖、自尊、焦虑等问题。在 690 位作者中，唯一有突变值的作者是 Zhou,Nan，他的研究主题包括家庭幸福感、儿童情绪、儿童肥胖等方面。在其独生子女研究中，值得关注的两个研究结论是：独生子女相较于非独生肥胖的可能性更大；在家庭中，幸福感的积极方面（即主观幸福感）在家庭成员间传播，并且儿子可以预测到父亲的主观幸福感，但幸福感的消极方面（即心理痛苦）仅从父亲传递给母亲和从父亲传递给孩子。

（四）国内研究热点分析

运行 CiteSpace 软件，Note Types 选定 Keywords，TopN=50，即在每个时间分区中提取出现频数为前 50 的关键词为分析对象。因此形成独生子女研究的关键词聚类图谱（如图 7），及重要关键词共现情况图（如图 8）。以关键词聚类图为例，N（node）代表关键词聚类图谱的节点数，E 代表连线数，网络

密度值为 0.0059，近 20 年关于独生子女的研究中一共有 575 个关键词。其中 Q 值（Modularity，模块值）为 0.6213。满足大于 0.3 的条件，且聚类显著，S 值（Mean Silhouette，平均轮廓值）为 0.872，S 值大于 0.7 则聚类效果令人信服。图中标签显示聚类号及标识词，聚类号按数字大小依次排列，运用 LLR（对数似然率算法）提取标签来显示聚类命名，并且由于 CiteSpace 系统默认一个聚类的关键词数量少于 10 个则不形成一个聚类。由此得出以下 9 大聚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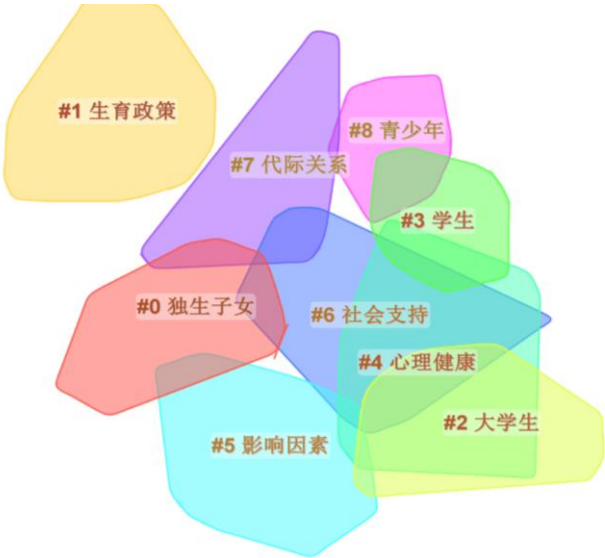


图 7：我国近 20 年独生子女关键词聚类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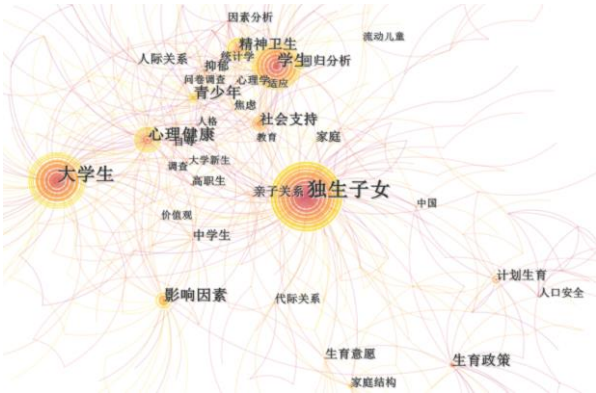


图 8：我国近 20 年独生子女关键词共现图

1.关键词聚类分析

575 个关键词总共分为 9 类，聚类号越小，节点数越大，研究也就越为集中，热度也较高。每一类

的 *Silhouette* 都大于 0.7, 则分类是令人信服的。由图 7 可知, 各个聚类之间又有大面积的重合说明此类研究涉及多个主题。下面将从研究较多的独生子女心理健康、社会支持和代际关系三方面进行综述。

### (1) 对独生子女心理健康状况的研究

目前学界对于此主题的研究结果较为丰富, 研究方法也较为多样, 研究基本思路是将独生与非独生子女进行比较, 但是研究结果却不同。俞国良在进行我国心理健康研究的综述中曾经总结到独生子女已经是心理疾病和心理障碍频发的高危人群, 在性格上也伴有任性、骄气和自私的特征<sup>[41]</sup>。而张朝对来自全国 23 个省市的大学新生采用症状自评量表调查得出, 非独生子女的心理问题较严重<sup>[42]</sup>, 此研究结果与戴伟民<sup>[43]</sup>、王光严<sup>[44]</sup>、廖友国<sup>[45]</sup>等人的研究结果一致。美国学者对这上述两种结论提出了疑问, 他认为我国对独生子女存在刻板印象, 研究结果也揭示大学生对独生子女的刻板印象与大学生是否是独生子女这一变量显著相关<sup>[46]</sup>。我国学者近年来也针对大学生的独生子女属性和心理健康的关系进行了研究, 例如武华君、俞宁等人的研究表明, 不同家庭背景的大学新生在心理健康方面存在显著差异。特别是在农村地区, 非独生子女的心理健康状况可能更优秀。然而, 这种差异并不会影响到城市来源的大学新生<sup>[47]</sup>。

### (2) 对独生子女社会支持的研究

这一主题主要分为两方面, 一方面是针对独生子女父母养老问题的研究, 王文娟认为我国政府应该重视计划生育开展后的社会保障问题, 如建立独生子女养老制度, 妥善解决独生子女父母的养老问题<sup>[48]</sup>。另一方面是关于中职生、失独家庭、农民工子女、大学新生和困境儿童的社会支持层面的研究, 学者们倡导为这些弱势群体建立社会保障制度及引入社会工作方法对其进行帮扶, 一般采用领悟社会支持量表、社会支持评定量表 (SSRS) 等进行调查。

### (3) 对独生子女代际关系的研究

当计划生育政策颁布开始, 就有众多学者预见未来我国会大量出现“四二一”特殊家庭关系结构, 即两个独生子女结婚后, 与其双方父母、子女之间形成的家庭结构。随着大批独生子女陆续进入婚龄期, 这类家庭将增多<sup>[49]</sup>。风笑天学者认为“四二一”家庭结构对于中国来说只是一种部分现象, “双独家庭”对中国的影响主要发生在 2020 年至 2040 年期间<sup>[50]</sup>。独生子女父母逐渐成为我国一批特殊的群体, 现有研究围绕独生子女父母的自我养老问题、独生子女家庭的情感依赖、代际互动关系和代际支持关系等主题进行。例如现代城市中普遍存在独生子女中年父母家庭与多胎家庭, 丁志宏等学者利用中国老年社会追踪调查数据, 对两类家庭的经济支持、家务支持、精神慰藉三个层面进行深入比较, 并且对比独生子和独生女, 结果发现独生子女较多胎家庭代际支持都较为均衡<sup>[51]</sup>。宋健、范文婷的研究也显示独生子女与父母情感交流也更为密切<sup>[52]</sup>。

## 2. 频次分析

表 2：我国近 20 年 TOP15 研究热点对比

2003—2012 年高频关键词 TOP15				2013—2022 年高频关键词 TOP15		
序号	频次	中心性	关键词	频次	中心性	高频词
1	127	0.52	独生子女	79	0.45	独生子女
2	109	0.25	大学生	78	0.22	大学生
3	85	0.09	学生	70	0.11	学生
4	50	0.08	心理健康	50	0.05	精神卫生
5	37	0.04	精神卫生	50	0.18	影响因素
6	25	0.13	生育政策	41	0.15	心理健康
7	24	0.09	计划生育	30	0.01	回归分析
8	20	0.04	青少年	27	0.02	失独家庭
9	18	0	因素分析	24	0.1	青少年
10	17	0.02	生育意愿	21	0.08	社会支持
11	15	0.03	中学生	17	0.05	家庭结构
12	15	0	统计学	15	0.02	生育政策
13	15	0.06	影响因素	14	0.04	家庭
14	15	0	对比研究	13	0.04	计划生育
15	14	0	大学新生	13	0.05	生育意愿

从独生子女研究的前后 20 年的关键词频次（如表 2）可以看出大学生一直是研究的重点人群，学者们对我国大学生的心理健康、精神卫生都给予关注。独生子女研究的前十年讨论较多的如生育政策、计划生育等，分析其主要原因 2003 年至 2012 年是计划生育政策广泛普及的时代，全国大部分的家庭尤其是城市家庭都生育一个孩子，社会上出现了大量的独生子女，因此学者们在前十年重点对我国生育政策的探讨便不足为奇，其中被引频次较多的文献主要讨论的主题是：我国生育政策的多样性、计划生育下的家庭照料的需求变动、对独生子女政策的微调探讨等。我国在后十年的研究中开始注重于影响因素的分析，研究方法上较多涉及统计学，如回归分析。另外学者们在后 10 年开始将研究视角转到一类特殊的家庭——失独家庭，此关键词在近 20 年的研究中突变值为 9.23。而对于生育政策的研究无论是中心性和频次均有下降，这说明即使我国陆续颁布“二孩”、“三孩”政策，但是因其实施效果甚微并没有达到很广泛的影响力。

### 3.中心性分析

中介中心性表示关键词在主题研究中的影响，中心度大于 0.1 的关键字为代表性话题，对于后续该主题的研究与思考具有关键性影响。21 世纪以来独生子女中的大学生群体是现代社会的新生力量，由于女性地位的上升、社会文化的影响以及生育政策的调整，部分大学生的心理健康状况、生育意愿和养老观念等都发生着巨大变化，由此以下五个关键词为近 20 年的代表性话题（如表 3）。

表 3：中心性大于等于 0.1 的关键词

频次	中心性	关键词
206	0.47	独生子女
187	0.24	大学生
65	0.14	影响因素
40	0.1	生育政策
91	0.1	心理健康

#### （五）国际研究热点分析

将 1991 篇文献导入 CiteSpace 软件，一共得到 1480 个关键词，Q 值为 0.6949，S 值为 0.8891，说明聚类效果是显著且令人信服的。由于英文关键词较多，我们直接进行关键词聚类分析，这里我们显示前 9 项聚类效果。这 9 类分别是#0 社会支持（social support）、#1 肥胖（obesity）、#2 艾滋病预防（hiv prevention）、#3 知识（knowledge）、#4 跨文化护理（transcultural nursing）、#5 饮食习惯（food habits）、#6 流行病学（epidemiology）、#7 中国儿童（chinese children）、#8 人口政策（population policy），接下来我们对社会支持、肥胖及饮食习惯、人口政策三个重要社会学领域的聚类进行分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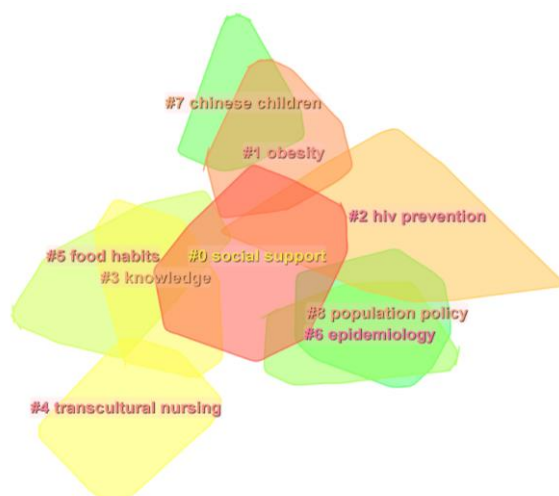


图 9：近 20 年国外关于中国独生子女的关键词聚类图

#### 1.对独生子女社会支持的研究

国际上关于独生子女社会支持的研究总体与我国的保持一致，也分为两个方面，一是关于失独家庭的社会支持研究，二是对一些弱势群体进行社会帮扶。总体来看，国内外学者对失独群体社会支持体系的建立主要有四个建议。第一，社会工作介入可以为失独父母提供支持。较多学者倡导应在中国大力发展社会工作，提高该行业准入门槛和薪资，吸引更多专业人才从事社会工作行业，社会工作者可以链接多方资源，为失独群体重建社会支持网络。第二，政府需要完善养老院的准入和监管制度，以确保服务质量和机构的运营。第三，政府应主导建立社会支持网络。政府可考虑为失独老人制定社会救助框架，并提高现行医疗服务机构服务质量。第四，将失独老人社区医疗服务纳入当地卫生规划，



由用人单位或居委会负责规划工作。随着社区基层卫生服务的发展，可以为失独老人提供小区内常见病和小病的综合预防和治疗，以改善失独老人的保健和护理服务。

2.对独生子女肥胖及饮食习惯的研究

研究者认为由于中国的计划生育政策，独生子女的比例越来越高，父母和祖父母溺爱他们，家中的“小皇帝”营养过剩导致了儿童超重和肥胖的患病率不断上升，因此研究独生子女和肥胖之间的关系非常重要<sup>[53]</sup>。多数研究表明，在中国城市独生子女较非独生会有更高的可能性患肥胖症，并且男孩比女孩更容易肥胖，但是在农村独生子女和肥胖症之间相关性不显著<sup>[54]</sup>。在饮食习惯上，独生子女比拥有兄弟姐妹的儿童来说，营养相对更均衡，但是也较多可能摄入含糖饮料和快餐<sup>[55]</sup>。分析其中原因还需要考虑到中国社会文化的背景下，城市独生子女往往得到更多的照顾和家庭资源，这些营养和照顾通常体现在饮食和体育活动上，对于中国家长来说，独生男孩的饱腹感代表着“健康”、“好运”，女孩则受到社会审美的影响，肥胖症与独生女相关性并不显著，而农村营养环境相对城市匮乏，因此超重和肥胖现象在农村并不明显。

3.对独生子女政策的研究

在独生子女政策研究的前十年，较多学者认为每个家庭只能生育一个孩子导致了中国社会老龄化加剧、男女比例失衡和年轻人生育意愿的降低，但是随着我国社会结构的变化和社会文化的不断更迭，Lopez, FZ 等人认为独生子女政策并不是导致产生此类现象的唯一因素，甚至在“三孩”政策背景下，中国人口数量并不会有明显上升，生育率也不会有较为明显的提升<sup>[56]</sup>。Liu, Yong 的研究结果表明在老龄化对经济增长的制约作用下，单独实施二胎政策可以促进经济增长，但如果将二胎政策与促进人力资本增长的政策相结合，会更有利于促进经济发展。

四、研究前沿

对于研究领域的前沿趋势分析，CiteSpace 拥有突变词探测技术，可以反映该关键词在一段时间内的影响力增加速度。图中 strength 表示关键词的强度，强度越高说明该关键词在该突变时间内具有较强的影响力。begin 和 end 分别表示该关键词开始出现突变的时间和结束突变的时间。

（一）国内研究关键词突变分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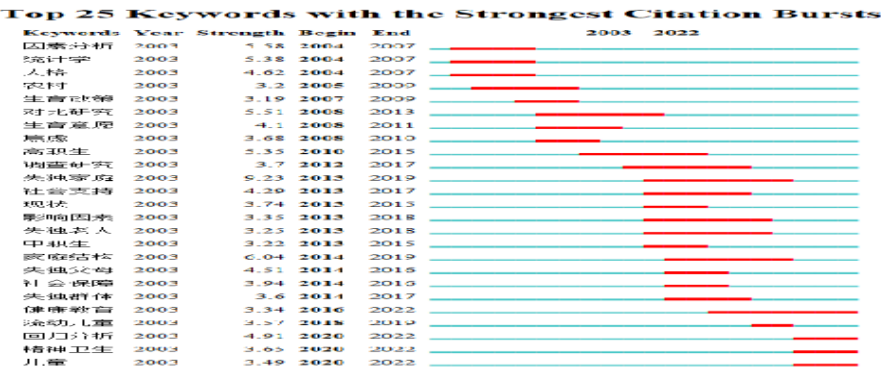


图 10：国内独生子女研究领域关键词突现图

### 1.研究对象的演变

独生子女的研究自开始就以大学生群体为主，涉及心理压力、性格特征、自我概念等方面，其后开始关注高职生、中专生、流动儿童群体，研究对象年龄逐渐降低，这主要是因为我国最后一批独生子女将成为未来我国发展的主力军，对于今后的二胎、三胎家庭的陆续出现，在家庭教育、社会支持等层面都具有参考意义。另外在全面三孩的背景下，较多学者将独生子女与小孩儿童进行比较研究。在失独家庭这一方面，失独家庭、失独父母、失独老人和失独人群的研究基本同步。

### 2.研究内容的演变

前十年学界关注独生子女的人格特征、生育意愿、焦虑状况等内部特点，近十年开始逐渐关注影响独生子女的外部因素，如社会支持情况、家庭结构特征和社会保障情况的分析，研究主要涉及独生子女父母自我养老问题、老年保障政策和机制的完善以及失独家庭困境的帮扶等，研究视角更为多元，研究内容更为全面。由于现代社会压力的不断增加，并且又处于新冠疫情社会背景下，不少青少年群体患有抑郁症、焦虑症等心理健康问题，我国近年来又大力发展素质教育，青少年的体质健康状况是全社会关心的话题，因此未来独生子女的健康教育、精神卫生等仍是研究的前沿。

### 3.研究方法的演变

对于独生子女的研究方法，从研究初始阶段就进行科学的量化方法，如运用幼儿性格发展趋向量表、艾森克人格问卷、Achenbach 儿童行为量表等进行评定研究对象的性格、心理、行为特征。后来研究者开始扩大调查研究范围，如陈宁、胡超异从中、东、西部六个省市选取 6867 名青少年就其责任发展状况进行调查<sup>[57]</sup>。对比研究也是一种重要的研究思路，2008 年—2013 年研究较为火热，主要进行的对比研究包括：独生与非独生子女的研究、农村和城市独生子女的研究。大部分研究显示独生子女与非独生子女在某些研究主题上具有显著的统计学差异，例如在家庭教育投入、焦虑抑郁状态、社交能力和生育意愿等方面。而仅有小部分研究结论显示独生和非独生子女比较并无显著差异，例如在情绪适应和生活满意度等研究主题上。未来在研究方法上回归分析仍是重要的研究方法，但仍需对重要的变量进行控制，以形成较为统一的研究结果。

## （二）国外研究关键词突变分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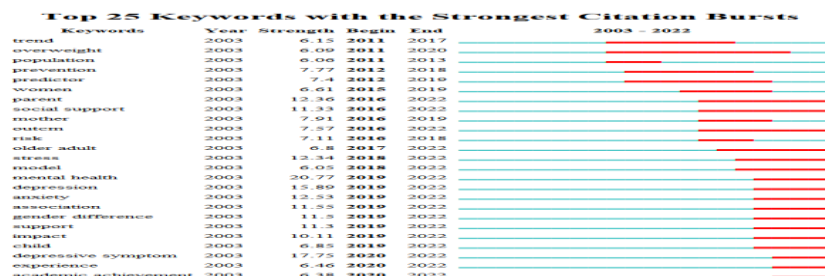


图 11：国外独生子女研究领域关键词突现图

### 1.研究对象的演变



最早从 2015 年开始, 女性、父母、老人陆续成为独生子女领域中的主要研究对象并成为研究热点。学者们研究话题大多涉及失独父母的社会支持体系的建立、女性生育意愿的变化、父母与独生子女之间的关系亲密状况以及独生子女父母的生活满意度等方面。近年来独生子女个体成为研究热点, 包括对独生子女的生理、心理、行为的研究, 并且细分性别和城乡差异的影响。

## 2.研究内容的演变

国外对独生子女的研究也呈现较为明显的趋势, 从早年间关注其生理状况, 例如肥胖、超重等, 到近年来主要研究独生子女的心理健康状况, 例如独生子女的压力、抑郁、焦虑等心理问题。另外, 社会支持和学业表现也是近几年的研究前沿。但是无论国内还是国外对独生子女的心理健康状况都尚未形成较为统一的研究结论。在学业表现方面, 之前研究认为城市独生子女相较于非独生有较好的学习优势, 主要原因是父母参与孩子学习的时间更多, 精力也更充分<sup>[58]</sup>, 但是近年来部分学者认为独生子女的学业成就并不是一直优于非独生子女, Shi, JY 等人认为农村地区有兄弟姐妹的青少年他们的学业表现可能更好, 幼儿园水平、视力状况和父母的期望都是农村青少年学业成就的显著影响因素, 这为未来农村青少年的学业成就预测提供了较好的借鉴, 即教育局应当营造公平的教育环境、给予平等的教育机会, 父母也应当提高保护孩子视力的意识<sup>[59]</sup>。

## 3.研究方法的演变

在独生子女研究中, 较多采用调查研究, 学者们选择将独生与非独生子女进行比较, 并运用相关问卷或者量表进行分析。但是在一些政策分析和个别主题研究上, 质性分析也成为主要研究方法, 例如民族志、内容分析、Atlas.ti 等的运用, 都帮助我们更好的了解研究对象的成长环境和心理变化。

# 五、结论与展望

## (一)研究结论

本文通过 Citespace 和 Histcite 可视化分析图谱直观地展现出近 20 年来关于“独生子女”文献的研究现状和研究热点。纵观国内外近 20 年独生子女相关研究, 在研究对象、研究内容和研究方法上已经较为丰富和完备, 研究热点和未来前沿趋势也较为清晰, 但是国内和国外针对中国独生子女的研究各有特点和侧重, 通过梳理国内外近 20 年关于独生子女的研究可以得出以下结论。

第一, 国外学者对独生子女的研究更能结合多学科的成果, 涉及学科不仅包括教育学、社会学还将较多的医学、生物学等成果结合在一起研究。国内学者关注的焦点主要在心理健康、社会支持和代际关系等方面, 有些文献虽然跨学科研究, 但更多的落脚点依旧在教育和社会学上。

第二, 国内外学者对我国“失独群体”的探讨都较为关注, 研究内容涵盖对失独成因、失独父母的社会支持帮扶、失独养老研究和失独父母心理、生理等方面的影响探讨。由于“失独”是极具中国时代背景的社会性议题, 因此在全球范围内都引起了激烈的探讨, 但是随着我国老龄化程度的加深, 失独救助的体系又容易模糊, 关于“失独群体”的探讨仍需保持重视。

第三, 国内外文献都较为关注心理健康问题, 心理健康涵盖人的智力发展、情绪调节、人格发展和人际关系等方面, 研究对象涉及独生与非独生子女、失独父母, 所采用的研究方法和研究思路也较

为类似，多数将两类人群进行比较研究，并采用相关心理健康量表进行测量，但是相比之下国外学者的研究切入点较小，研究内容更为新奇。

第四，国外学者独生子女研究选题的角度较小，基本从一个细微的问题着手展开研究，研究逻辑清晰、过程深入，结果也具有说服力，国外学者较为擅长实验的方法，通过一步步的实验设计和清晰的操作步骤，最终得出研究结论。另外，一些质性的研究方法也经常用于独生子女的研究。国内学者研究的选题有较多的重复，研究角度相比不够新颖，导致相关文章的内容比较泛化，对策和建议也缺乏创新性。

第五，国外研究主要关注中国全体独生子女，较少研究一些特殊儿童群体，相比之下，中国对一些流动儿童和留守儿童较为关注，但是相关文献还比较有限，尤其缺少对农村地区独生子女的研究。在我国除了关注特殊儿童心理健康、社会支持和代际关系等方面外，营养状况、精神卫生和身体健康等方面也应多围绕展开。

## （二）未来展望

虽然独生子女这一研究主题在我国较为典型，学者们已经取得了丰富的研究成果，但是放眼国内外研究仍有一些研究方面未来需要不断丰富和完善，国外研究的深度和广度值得我们借鉴学习。未来我们可以从以下五个方面展开研究。

第一，需形成对某些研究问题较为统一的结论。独生子女的 20 年研究是紧跟国家政策动向和社会发展变化的，但是在独生与非独生子女一些关键问题的研究上，例如心理健康问题、学业表现问题上，目前国内外研究仍未形成一致的结论，风笑天认为之所以研究结论互不相同，主要是研究者在研究中缺少对前人的借鉴和积累，对于问题的研究缺乏重要变量的控制，因此研究结论基本都是独生子女和非独生子女之间存在差异，在某些方面独生子女表现较好，而在其他方面非独生子女表现较好。

第二，需加强不同机构和学者间的合作。通过 CiteSpace 图谱我们可以清晰看到我国作者之间合作紧密性不高，合作较多的十余位学者也只是在一定的范围内合作，他们大多同属一个科研机构或同一课题下。未来研究需要加强不同机构学者间的合作，拓宽研究领域，将独生子女研究领域进行细化分类，从更加有利于独生子女发展的角度出发研究问题。

第三，独生子女的研究应多关注特殊儿童。从 Citespace 图谱我们可以发现大学生、中学生和流动儿童是研究的主要群体，但是一些弱势儿童群体，如独生的留守儿童、孤残儿童和事实无人抚养儿童等特殊儿童群体近年来研究的较少，在对这些困境儿童进行心理、生理、社会特征等进行研究时，应对其独生子女的身份给予关注。在研究内容上，应更多着眼于社会支持体系的建立，帮助更多困境独生子女健康成长。

第四，需结合多学科成果丰富研究领域，加强文献之间引证关系。独生子女的研究具有跨学科的特点，其研究涉及社会学、社会工作、心理学、教育学、医学、法学等，因此应吸收各学科的成果，加强学科之间的交流，丰富独生子女的研究领域，这是深化完善独生子女研究的必经之路。

第五，未来应拓宽比较研究范围，与国外独生子女进行比较。独生子女的出生具有较为典型的政

策背景,除了我国是独生子女的大国外,韩国、日本和一些西方国家仍有一些独生子女家庭,因此可以扩大研究视角,将不同国家的独生子女的政策和个体的生理、心理等方面进行比较研究,推动全球独生子女研究的发展。

随着我国未来“二孩”、“三孩”政策的广泛实施,独生子女时代逐渐终结,我们即将迎来“后独生子女时代”<sup>[60]</sup>,当然这并不意味着在“后独生子女时代”就没有独生子女问题,由于现代社会青年人群婚恋意愿、生育意愿的降低,社会压力的不断加大,未来可能仍有较多一孩家庭出现,那这些在“二孩”和“三孩”政策背景下结婚的独生子女夫妻,他们的生育意愿是否会受到现有政策的影响?未来出生的独生子女他们在既有多孩家庭又有独生子女家庭的社会环境下成长会产生怎样的变化?50岁以上第一批独生子女父母他们的养老问题该如何解决?他们的子女该如何平衡赡养老人和照顾子女之间的矛盾?生育政策的变化会带来哪些社会影响?笔者认为这些由生育政策变化而衍生的种种社会问题将会成为未来研究的主要方向,我们需要在前人的研究结论上不断丰富现有研究,以充实“后独生子女时代”相关问题的探讨。

#### 参考文献:

- [1] 陈晓晓.人口老龄化与少子化的影响及应对策略[J].经济研究导刊,2022(21): 45-47.
- [2] 风笑天.“全面三孩”政策背景下青年生育意愿及行为研究[J].青年发展论坛,2022,32(05): 3.
- [3] 张静、雍会.育龄人群三孩生育意愿的影响因素分析[J/OL].统计与决策,2022(20): 72-77.
- [4] 陈蓉.中国大城市不同人群生育意愿的变迁趋势及比较研究——以上海市为例[J].人口学刊,2020,42(01): 17-29.
- [5] 于潇、梁嘉宁.中国独生子女生育意愿研究——基于生育代际传递视角[J].浙江社会科学,2021,(11): 80-89+97+158-159.
- [6] 张争光、赵爱莉、李亚红.全面二孩政策下陕西省育龄妇女二孩生育意愿调查[J].医学与社会,2020,33(02): 82-85.
- [7] 陈悦、陈超美、刘则渊、胡志刚、王贤文.CiteSpace 知识图谱的方法论功能[J].科学学研究,2015,33(02): 242-253.
- [8] 李运景、侯汉清、裴新涌.引文编年可视化软件 HistCite 介绍与评价[J].图书情报工作,2006(12): 135-138.
- [9] 庞标琛、黄小鹏、彭崇基、许明荣、杨秀枝、陆焯平.广西汉族独生与非独生子女大学生体质状况分析[J].体育科学,2003,23(03): 113-116.
- [10] 风笑天、王小璐.城市青年的职业适应: 独生子女与非独生子女的比较研究[J].江苏社会科学,2003(04): 18-23.
- [11] 杨世炳、唐久来、吴德、刘维民、许晓燕、周翔.独生子女与非独生子女的社会生活能力配比研究[J].实用儿科临床杂志,2003(12): 992-993.
- [12] 刘丽.基于 HistCite 的图书馆服务领域引文脉络分析[J].情报科学,2014,32(05): 91-96+101.
- [13] Hesketh T, Qu J D, Tomkins A. 2003, *Health effects of family size: cross sectional survey in Chinese adolescents*[J]. Archives of disease in childhood, 88(6): 467-471.

- [14] Zhan H J. 2004, *Socialization or social structure: investigating predictors of attitudes toward filial responsibility among Chinese urban youth from one-and multiple-child families*[J]. The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Aging and Human Development, 59(2): 105-124.
- [15] Deutsch F M. 2006, *Filial piety, patrilineality, and China's one-child policy*[J]. Journal of Family Issues, 27(3): 366-389.
- [16] Liu F. 2008, *Negotiating the filial self: Young -adult only -children and intergenerational relationships in China*[J]. Young, 16(4): 409-430
- [17] Fuligni A J,Zhang W. 2004, *Attitudes toward family obligation among adolescents in contemporary urban and rural China*[J]. Child development, 75(1): 180-192.
- [18] Kwan Y,Ip W. 2009, *Life satisfaction, perceived health, violent and altruistic behaviour of Hong Kong Chinese adolescents: Only children versus children with siblings*[J]. Child indicators research, 2(4): 375-389
- [19] Greenhalgh,Susan.2003,"*Science, modernity, and the making of China's one - child policy.*" Population and Development Review 29.2: 163-196.
- [20] Li H,Yi J,Zhang J. 2011, *Estimating the effect of the one-child policy on the sex ratio imbalance in China: Identification based on the difference-in-differences*[J]. Demography, 48(4): 1535-1557.
- [21] Wang Y,Fong V L. 2009, *Little emperors and the 4: 2: 1 Generation: China ' s singletons*[J]. Journal of the American Academy of Child & Adolescent Psychiatry, 48(12): 1137-1139.
- [22] Jiang Q,Li Y,Sánchez-Barricarte J J. 2016, *Fertility intention, son preference, and second childbirth: survey findings from Shaanxi Province of China*[J]. Social Indicators Research, 125(3): 935-953.
- [23] Xu Y,Herrman H,Bentley R et al. 2014, *Effect of having a subsequent child on the mental health of women who lost a child in the 2008 Sichuan earthquake: a cross-sectional study*[J]. Bulletin of the World Health Organization, 92: 348-355.
- [24] Song Y. 2014, *Losing an only child: the one-child policy and elderly care in China*[J]. Reproductive Health Matters, 22(43): 113-124.
- [25] Zheng Y,Lawson T R. 2015, *Identity reconstruction as shiduers: narratives from Chinese older adults who lost their only child*[J].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Social Welfare, 24(4): 399-406.
- [26] Wei Y,Jiang Q,Gietel-Basten S. 2016, *The well-being of bereaved parents in an only-child society*[J]. Death Studies, 40(1): 22-31.
- [27] Zheng Y,Lawson T R、Anderson Head B.2017, *"Our only child has died" —a study of bereaved older Chinese parents*[J]. OMEGA-Journal of Death and Dying, 74(4): 410-425.
- [28] Wang Q,Xu W, Ren L et al. 2019,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hope and post-traumatic stress disorder in Chinese shidu parents: the mediating role of perceived stress*[J]. Journal of Affective Disorders, 251: 23-30.
- [29] Wang N,Hu Q. 2021, *"It is not simply the loss of a child": The challenges facing parents who have lost their only child in post-reproductive age in China*[J]. Death Studies, 45(3): 209-218.
- [30] 王跃生.当代中国家庭结构变动分析[J].中国社会科学,2006(01): 96-108+207.
- [31] 王广州.生育政策调整研究中存在的问题与反思[J].中国人口科学,2015(02): 2-15+126.
- [32] 伍海霞.城市第一代独生子女父母的社会养老服务需求——基于五省调查数据的分析[J].社会科

- 学,2017(05): 79-87.
- [33] 吴楠、张婉君、笃梦雪、江敏敏、王静、方正美、朱丽君、金岳龙、陈燕、姚应水.新冠肺炎疫情期间某高校返校大学生抑郁焦虑现状及影响因素[J].中国学校卫生,2021,42(04): 602-605+610.
- [34] 风笑天、王小璐.城市青年的职业适应: 独生子女与非独生子女的比较研究[J].江苏社会科学,2003(04): 18-23.
- [35] 风笑天.关于已婚独生子女独立生活能力的实证研究[J].中国青年研究,2005(09): 32-36
- [36] 风笑天.中国第一代城市独生子女的社会适应[J].教育研究,2005(10): 28-34.
- [37] 唐利平、风笑天.第一代农村独生子女父母养老意愿实证分析——兼论农村养老保险的效用[J].人口学刊,2010(01): 34-40.
- [38] 风笑天.第一代独生子女婚后居住方式: 一项 12 城市的调查分析[J].人口研究,2006(05): 57-63.
- [39] 风笑天.从两个到一个: 城市两代父母生育意愿的变迁[J].南京大学学报(哲学·人文科学·社会科学),2017,54(04): 74-87+159
- [40] 风笑天.一个时代与两代人的生命历程: 中国独生子女研究 40 年(1980—2019)[J].人文杂志,2020(11): 22-36
- [41] 俞国良、董妍.我国心理健康研究的现状、热点与发展趋势[J].教育研究,2012,33(06): 97-102.
- [42] 张朝、于宗富.非独生子女大学生心理健康状况的调查研究[J].现代预防医学,2008(07): 1308-1310.
- [43] 戴伟民、冯淑兰、余兰琼、张生平、章星波、彭启智、朱伟、刘正荣.独生与非独生子女的 SCL-90 及 EPQ 对照研究[J].中国心理卫生杂志,2005(04): 256-258.
- [44] 王光炎、王佳、李继国、张心雨.大学生心理健康状况调查与分析[J].武汉体育学院学报,2005(08): 72-76.
- [45] 廖友国、连榕.独生与非独生子女心理健康变迁的差异——一项横断历史研究[J].西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0,46(03): 117-126+203.
- [46] Toni Falbo、陶艳兰.独生子女大学生的心理健康和人际关系——兼对独生子女“刻板印象”的讨论[J].广西民族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1,33(05): 10-14.
- [47] 武华君、俞宁、蔡远、李斌、周健君、蔡智勇.大学新生独生子女属性与心理健康的相关性[J].中国心理卫生杂志,2021,35(09): 781-787.
- [48] 王文娟、陈岱云.城市独生子女父母养老社会支持问题研究[J].山东社会科学,2008(09): 31-35.
- [49] 梁秋生.“四二一”结构: 一种特殊的社会、家庭和代际关系的混合体[J].人口学刊,2004(02): 61-65.
- [50] 风笑天.“四二一”: 概念内涵、问题实质与社会影响[J].社会科学,2015(11): 71-81.
- [51] 丁志宏、夏咏荷、张莉.城市独生子女低龄老年父母的家庭代际支持研究——基于与多子女家庭的比较[J].人口研究,2019,43(02): 87-99.
- [52] 宋健、范文婷.中国城市家庭的代际情感交流——基于独生子女生命历程视角的实证分析[J].南方人口,2016,31(02): 26-35+80.
- [53] Tian X,von Cramon-Taubadel S. 2020, *Are only children in China more likely to be obese/overweight than their counterparts with siblings?*[J]. *Economics & Human Biology*, 37: 100847.
- [54] Li M,Xue H,Wang W et al. 2017, *Increased obesity risks for being an only child in China: findings from a nationally representative study of 19,487 children*[J]. *Public Health*, 153: 44-51.
- [55] Cai L,Lin L,Dai M et al. 2018, *One-child policy, weight status, lifestyles and parental concerns in Chinese children: a nationwide cross-sectional survey*[J]. *European journal of clinical nutrition*,72

(8): 1150-1158.

- [56] Zamora López F, Veiga C R. 2020, *From One Child to Two: Demographic Policies in China and their Impact on Population*[J]. Revista Española de Investigaciones Sociológicas (REIS), 172(172): 141-178.
- [57] 陈宁、胡超异. 我国当代青少年责任感的发展特征——基于六省市的调查[J]. 中国青年研究, 2015(12): 56-59+88.
- [58] Wei, Wei et al. 2016,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parental involvement and elementary students' academic achievement in China: One-only children vs. children with siblings." Journal of Comparative Family Studies 47.4: 483-500.
- [59] Shi J, Li L, Wu D et al. 2021, *Are only children always better? Testing the sibling effects on academic performance in rural Chinese adolescents*[J]. Children and Youth Services Review, 131: 106291.
- [60] 风笑天. “后独生子女时代”的独生子女问题[J]. 浙江学刊, 2020(05): 64-73.

☆ 作者简介：昌昊甜，河海大学社会工作 2021 级硕士研究生

亓迪，河海大学公共管理学院副教授

☆ 责任编辑：肖典

※ ※

### 《环境社会学》获评优秀新创集刊

日前，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集刊工作委员会组织对 2022 年评审年度内（2021 年 9 月 1 日至 2022 年 8 月 31 日）出版集刊进行评审，最终评选出 95 种名录集刊、19 种优秀集刊、2 种优秀新创集刊。其中，《环境社会学》喜获“优秀新创集刊”。

《环境社会学》是由河海大学环境与社会研究中心、河海大学社会科学院以及中国社会学会环境社会学专业委员会主办的学术集刊，致力于对环境社会学界搭建探索真知、交流共进的学术平台，推进中国环境社会学话语体系、理论体系建设。据悉，第 3 辑即将由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刊出。

# 社工赋能，新心相印

## ——新业态新就业女性社工公益服务项目

王悦 马嘉璐 潘恩慧 王世文

### 一、背景介绍

#### （一）新业态女性

伴随数字技术的趋于成熟，数字经济的发展经历了从“互联网+”再到全面数字化的阶段性演变，中国社会也开启了从工业社会向数字社会的转型。通过数据化、平台化和普惠化等特点，数字经济与诸多行业领域深度融合，对人们的生产生活包括就业带来了新的深刻的变化。其中，对于长期困扰于潜在就业歧视的女性群体而言，新业态的出现一方面为女性带来了更多的机会，但另一方面也会因来自于家庭角色、社会观念等传统因素的限制使得女性陷入新的就业桎梏之中。首先，基于数字经济背景产生的众多新业态不仅是对女性提供了新的就业选择，也是给更多的男性带来了更多的工作岗位，而且相比之下，由于数字性别鸿沟<sup>1</sup>，男性整体呈现出更好的适应与融入效果。由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发布的《弥合数字性别鸿沟技术报告》指出，在设备使用上，男性上网频率更加频繁、在互联网环境中开展更多元的活动，而女性更多使用互联网进行社交活动。同时，女性对数字技术的使用相对有限，尤其在出于商业或经济层面的使用更少。其次，虽然植根于农业经济的“男主外、女主内”的分工观念在工业化和数字化的趋势中被不断弱化，但缘于女性在就业选择中的相对弱势使得家庭杂务一般来说与女性的联系更加紧密。数字经济所催生的新就业形态在工作时间上相较于传统的二、三产业具有更加灵活的特点，从而在一定程度上为部分女性兼顾职场发展与家庭维持提供了可能。但是伴随着女性所承担的家庭职责并未得到减轻，以及现实中工作时间的延长，导致女性工作与生活大量重叠、家庭与事业产生矛盾继而激化了工作与生活中的角色紧张甚至角色冲突，使得新业态职场女性在当下面临着新的就业问题。

#### （二）案例背景

当前，我国经济新业态、新就业蓬勃发展，吸纳了千万量级的就业人员，其中妇女也占有一定比例。以J省H市为例，截至2021年底，H市从事外卖、快递、网约车三类新业态、新就业群体的女性人员1652人，分别是外卖108人，快递1400人，网约车144人，她们来自108个企业。H市经济技术开发区各类人员及企业约分别占总数的1/9。本次社区工作的服务对象主要是在H市的外卖、快递、网约车等相关企业从业的女性员工。调研过程中，采取文献调查法查阅近三年H市外卖、快递、网约车三类新业态女性员工就业情况以及所在企业的妇联组织情况，并运用问卷调查，在H市经济技术开发区辖区内随机抽取了上述三类从业的女性员工60人进行一般性问题和需要的收集和统计。在此基础

---

<sup>1</sup> 男性与女性之间的数字技能水平及信息通信技术有效获取的差异的存在

上结合个别访谈法在 H 市经济技术开发区上述三类从业的女性中选择 5 人进行了深度访谈。

## 二、分析预估

### （一）服务对象的困境分析

通过直接与间接的调查，社会工作者对本社区新业态女性的相关信息进行了多个维度的收集。首先采取文献调查法查阅近三年 H 市外卖、快递、网约车三类新业态女性员工就业情况以及所在企业的妇联组织情况；其次，采取问卷和访谈调查法在 H 市经济技术开发区辖区内随机抽取了上述三类从业的女性员工 60 位，进行一般性问题和需要的收集和统计，如每日工作时长、月工资；最后，从上述三类从业的女性中选择 5 人进行深度访谈，探求其对自身境遇的认知、社会支持网络状况以及面临的多方面困境与需求。经过资料的搜集整理以及预估，从专业角度分析，新业态女性目前面临的主要问题有以下几个方面：

#### 1. “困在系统中”的新业态女性

新业态女性的劳动过程均紧紧围绕着“平台”，它以数字技术为基础、以智能平台为支撑、以海量数据为驱动，平台系统基于掌握的数据信息对从业女性进行工作分配与管理，从业女性在被派单后必须接受平台系统的任务。调查发现，新业态女性在工作中常陷入全方位的监控中，她们不仅面临着从被派单、开始服务到结束全过程的平台监管；还常常在服务过程中被平台提醒“微笑服务”、“平台已对行程录音”；同时，平台系统赋予消费者以“上帝视角”对从业者进行监督与后台凝视，其行程从被派单的一刻开始就被呈现给了消费者。最后，平台系统会根据消费者的评价对从业者给出具体的奖惩措施，但多数从业女性均因为身体素质无法与男性相比，而在服务速度等多方面落后，而面临被消费者催件和投诉进而被扣除工资的困扰。因此在多方凝视的劳动过程中，身体方面处于先天劣势地位的新业态女性常发展出两种生存策略：一种是用男性气质包装自己，强调自己能与男性竞争的能力，这会为女性带来极大的工作压力；另一种是将自己下沉至相对轻松的服务站点，展现“笑脸迎人、有耐心”的女性特质，并请求消费者的好评，将硬性弱点转化为软性竞争力，但这一过程极消耗女性情感，增加其心理压力。

#### 2. 经济与“母职”的双重负担

长期以来，女性在劳动力市场中处于弱势地位，同时由于长久的劳动力性别分工，女性在原来更多从事的是传统服务业，工作时间长且工资较低。而在传统家庭中，女性往往承担着更多的家庭与教育责任，传统服务业无法满足其双重需求。调查发现，多数服务对象选择从事新业态工作，便是因为了解到这一职业不仅能够得到可观的工资，并且工作灵活性强、能够自由安排工作时间，与她们一边工作一边兼顾家庭、照料孩子的需求相匹配。但是新业态女性往往不仅因为家庭经济压力沉重而想多接单、多赚钱，工作时间延长；还因平台往往规定了从业者必须在岗、关乎从业者等级的高峰期。这样一来，新业态女性便失去了陪伴和教育孩子的时间，当被问及困扰和需求，服务对象均反映自己不仅因为学历不够而无法在学业上给予孩子一定的帮助；还因为工作较忙，难以抽出时间陪伴、关心孩子，对孩子生活方面的照顾也不周到，经济和母职的双重压力让她们陷入持续的焦虑。



### 3.工作系统中女性服务的缺位

外卖骑手、网约车司机等仍是以男性为主导和优势的新业态，在劳动强度与管理规则方面均偏向男性气概和特点。例如在外卖行业，男性的身体素质、拿餐数量、送餐效率普遍高于女性，网约车“女司机”会被乘客质疑驾车技术和安全性，并且困扰大部分女性的问题还有生理期的存在。服务对象反映因为每个月的轮休时间仅有几天，只要生理期的症状不是严重到无法工作，也会坚持上岗，这不仅会造成潜在的危险，也会降低其工作效率，进而影响消费者的满意程度、投诉率，环环相连。但新业态女性并没有固定的休息时间与落脚场所，遑论能够为她们提供女性应急必需品的工作站点，她们大多数时间都一直“在路上”。因此，在平台算法以男性工作者的数据为基础制定管理规则，并且缺乏女性工作者的需求申请渠道时，会使加入这一行业的女性感到不适和压力。

### 4.相关权益难以获得保障

新业态作为对传统雇佣关系和劳动管理模式的打破，其面临着更多的社会风险，首先便是新业态从业者社会保险的缺失问题。因为在新业态中，经营模式、用工形式多样，传统的劳动关系与保障关系不适用，导致从业者与平台间的劳动关系含糊不清；同时，新业态从业者受平台制度的管理，但因工作方式、时间灵活，没有固定的保障。其次，新业态从业者的工作环境具有不确定性，其接触到的责任主体也相对多元，主体间的关系也更加复杂，导致权责关系尚无明确的界定，一旦发生纠纷，劳动者的权益难以得到保障。例如，在服务对象送外卖的过程中，很多小区禁止外卖员进入，或是让外卖员办理十元一张的门禁卡，但这一问题无法得到相关责任主体的解决，服务对象唯有自己买单。总的来说，因新业态的特殊性，从业者普遍缺乏获得感、安全感与归属感，针对这一群体的社会保障制度也相对缺乏。

## （二）受益群体描述

### 1.服务人群

聚焦于在 H 市经济技术开发区辖区内从事外卖、快递、网约车等新业态女性群体 30 人，年龄集中于 20-40 周岁；

### 2.直接受益群体（新业态女性群体 30 人）：

本区域新业态女性群体具有无固定时间、无固定工作场所、无固定收入的“三无”特点，根据问卷调查，八成从业者平均每天工作时间在 8-12 小时；从业者年龄低，平均年龄为 33.2 周岁；并且存在工作与家庭的双重压力、送件时间紧且在整个工作系统中相对男性处于弱势地位、收入一般且波动性强、被催件和被投诉等问题。另外，新业态女性工作的稳定性差、相关权益难以得到充分保障。本项目在微观层面能够识别脆弱性较高的新业态女性，提供个案救助与辅导服务；同时，通过开展社区教育服务与法律、心理咨询服务等，提升女性的劳动权益保护等意识和能力、自我认同感，增强其可持续发展能力，改善其生命境遇。

### 3.间接受益群体（30 位新业态女性的家庭、社区管理者）

通过本项目的实施，能够链接社区资源，为新业态女性提供家庭与亲职服务，减轻其母职压力的

同时促进家庭的良性运行与积极发展，构建新业态女性的社会支持网络。同时，支持新业态女性在其群体内部建立互助支持关系，提高其权能。

### 三、理论依据

#### （一）增能理论

##### 1. “权能”的概念内涵

“增能”理论由权力、权能和去权等概念构成，而权能是增能的核心概念，其实质是一种利己能力。Pinderhughes 认为权能是一种能力，即对自己的生活空间和发展的有利动力。陈树强在此基础上指出，这种能力不仅是一种客观存在，而且体现为人们的主观感受，即权力感。因此，权能本身有着显著的主观能动性，其价值基础也在于激发个体的潜能，增能并不是赋予服务对象实际权力，而在于激发其潜能，逐渐恢复被剥夺的服务对象的尊严与自由。

##### 2. “服务弱势群体”的应用方向

增能作为一种积极的策略是针对弱势群体工作反思的结果。唐咏认为弱势群体的无权状态体现在三个层面。首先在个体层面，弱势群体相对缺乏自我生活控制力和社会资源，也缺少改变自身困难处境的能力与信心。其次从人际关系层面看，弱势群体难以运用有限的社会资源和人际关系网络去创造良好的就业和竞争机会。最后，从社会参与的层面出发，弱势群体没有属于自身利益的表达组织。因而，增能理论重视人际关系、社会机构或政策对弱势群体的影响，主张通过赋能弱势群体达到对人际关系、社会结构和社会政策的完善。

##### 3. “人在情境中”的实践逻辑

增能理论的实践逻辑紧扣个体、情境和环境三要素之间的内在关系顺应了“人在情境中”这一社会工作的核心观点。宁玉梅认为基于增能理论，人是由于环境本身的压迫而产生的无力感和缺权化，缺乏掌控自己生活空间行使决策权力的机会。因此，从情境层面出发，增能理论的目的在于协助服务对象获得掌控生活空间和发展的动力以降低社会经济结构包括阶级地位、权利不均、标签等带来的情境压迫。此外，在介入策略层面，增能理论的核心在于增强弱势群体的权能，包括使服务对象觉得他有能力去影响或解决问题，帮助个人获得和他人合作促成问题解决的经验，改善社会制度或结构等。

#### （二）社会性别理论

社会性别理论是女性主义的核心观点，这一概念兴起于 20 世纪 60 年代的第二次女性主义浪潮，区别于生理性别概念，后者指代男女与生俱来的生理属性区别，社会性别则强调而性别是社会文化建构的产物，社会对男女分别具有一套性别气质的期待，包括行为方式、思维感情特征等方面，于是人们按照此种社会期望成长为“男人”和“女人”。在社会文化为女性角色赋予了较低的社会地位和社会价值的同时，性别分工进一步巩固了男性在劳动力市场的优势地位，限制女性对于优质劳动资料的占有和控制，女性的结构性从属地位由此产生和维持。社会性别理论认为性别中包含了不平等的权利关系，男权社会主导下的婚姻制度、劳动分工等共同形成了对女性日常生活的压迫。结构化的性别秩序深入到日常生活中对女性产生压迫、让女性陷入弱势地位，但社会结构的可建构性为具备社会性别

视角的社会服务提供了可能性。在传统性别分工下，女性多承担着照料家庭与养育子女的任务，传统以家庭为本的社会服务通常教育女性如何补救和发展这些基于家庭的角色，加剧了传统社会的性别分工。具备社会性别视角的社会服务则希望以妇女为本，冲破既有的社会性别刻板印象，在评估服务对象需求时，既着眼于帮助女性面对最直接与现实的问题，还须关注女性所意识到其因处在性别秩序中从属地位而产生的需要，对服务对象这两方面需求的满足能够从微处入手，促进性别平等。

#### **四、服务思路**

本项目的服务对象为 H 市经济技术开发区内从事外卖、快递、网约车等共计 30 名新业态新就业女性及她们的家属、子女和父母等，共计辐射约 200 人。

##### **（一）总目标**

围绕“调研摸底、团结聚拢、思想引领、服务需求”主线，以妇女儿童之家等妇联服务机构为依托，综合运用社会工作的理念和方法，扩组织、造阵地、建网络、树典型、送服务，将社会工作介入到服务新就业妇女群体中，从就业、人际、心理等层面开展相应的介入活动，从多层次帮助服务对象激发潜能，链接资源，构建社会支持网络，增强新业态新就业女员工的获得感、安全感、幸福感。

##### **（二）项目具体目标**

根据服务群体的需求，主要针对以下几个方面具体展开：

1.法律知识普及。通过举办就业法律等讲座，帮助服务对象掌握一定的就业必需法律知识，解决就业过程中出现的障碍和问题，维护自身的权益；

2.搭建休息服务平台。依托“妇女儿童之家”等平台，帮助链接资源，整理服务对象所需要如产业政策、维权知识等信息和政策，汇编成册并发放，推动设立服务站点，为新就业女性提供休息的场所，搭建自助互助平台。协助开通“驿姐热线”服务，通过热线、网络提供服务，提高自助、互助能力；

3.子女关爱和心理疏导。有针对性地开展亲子小组、家庭成长小组活动，在家庭背景中理解新就业女性的需求，关注这部分人群自身的情绪需求，促进母亲和孩子彼此配合，增进彼此了解，加深感情，促进亲子关系良性发展。针对部分典型进行个案介入，开展学业辅导、心理疏导等服务，弥补新就业女性无法按照传统的家庭性别角色按时照顾家人，缺少时间精力关爱子女和辅导学业的不足，缓解其后顾之忧；

4.女性权益赋能。肯定、重视新就业女性自身所蕴含的潜能，并借助社会工作充权模式强化并扩大这部分服务对象可以利用的资源，推进新就业女性参与社区行动，激活妇女所拥有的权能，提升社会适应能力。

##### **（三）介入逻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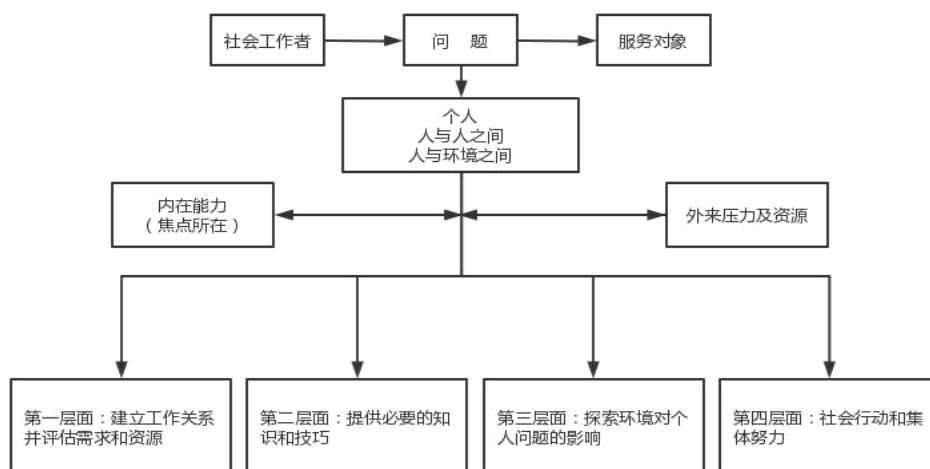


图 1：服务逻辑图

本项目计划在当前发展党建引领新业态新就业群体的背景下，以新就业妇女为服务对象，首先综合访谈法和问卷法，了解 H 市经济技术开发区从事新业态新就业女性的问题和需求；接着根据问题和需求，从“个人—人际—社会”三个层面逐层制定服务计划并进行介入赋能，重点聚焦个人内在能力及女性现有的性别角色，结合个案、小组、社区社会工作方法和社会工作行政等方法 and 手段，与服务对象建立信任关系、提升意识、构建支持网络、传授技巧，进行社会倡导，建构更具积极意义和潜能的自我效能感；最后通过“驿姐热线”“新业态群体妇女服务平台”等平台的搭建，切实发挥新就业女性在疫情防控及家庭中的积极作用，展现新就业女性新风貌，不断提升她们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促进新就业女性自我发展。

表 1：计划服务内容

计划服务内容
<b>（一）新业态妇女群体区域调研</b> 调研服务对象基本情况、工作内容和强度、困难和需求，形成调研报告。
<b>（二）家庭走访与建档</b> 进行走访慰问，表达妇联和社工关爱。建档 30 人。
<b>（三）个案服务</b> 选择 5 个重点对象进行个案服务，服务≥50 人次，提供情感支持，缓解心理压力，矫正非理性情绪，增强工作、生活信心。
<b>（四）“就业能力成长小组”活动</b> 组建“我的未来不是梦”妇女就业能力成长小组，招募 8-10 人，针对当前新就业女性在工作中遇到的职业困境进行解答，提升工作能力，开展 4 次活动提升就业能力。

<p><b>（五）“与你共成长”亲子小组活动</b></p> <p>针对众多新就业女性反应的亲子关爱缺失等问题和需求，开展亲子成长小组，帮助女性掌握亲子沟通方法，子女更能理解家长的工作，促进亲子关系发展。</p>
<p><b>（六）法律、心理咨询</b></p> <p>举办 2 场法律、心理咨询会，每场≥20 人，线上线下形式结合，帮助解决权益维护、亲子教育等方面的疑惑，指导问题解决途径，提升心理素质。</p>
<p><b>（七）“点亮微心愿”活动</b></p> <p>选择服务对象 10 人，引导提出微心愿，社工通过链接资源帮助实现心愿。</p>
<p><b>（八）新业态群体妇女服务平台建设</b></p> <p>依托“妇女儿童之家”等平台，推动设立服务站点 2~3 个，为新就业女性提供直接明了的互助服务场所。由平台整理服务对象所需要如产业政策、维权知识等信息和政策，汇编成册（30 册）并发放，提高自助、互助能力，全年服务≥80 人次。</p>
<p><b>（九）开通“驿姐热线”服务</b></p> <p>开通电话热线及线上服务平台，通过热线、网络提供服务，及时链接资源，快速解决服务对象在工作、生活上遇到的困难，全年服务人数≥80 人。</p>

## 五、服务过程

### （一）需求评估，制定方案

2022 年 5 月，社会工作者在 H 市经济技术开发区妇联干部的帮助下与所在辖区内的快递点取得联系，并根据当地妇联提供的名单进行了为期一个月的走访活动。在初步了解 H 市经济技术开发区内的从事外卖、快递等职业的女性家庭、工作及社会支持情况之后，选取了其中 30 名 20-40 岁较为有代表性的新就业女性作为本项目的服务对象。社会工作者对信息整理与分析基础上，界定服务对象问题和需求，进而策划一套灵活有效的服务方案。



图 2、3：座谈会与走访

### （二）认识自我，激发潜能

个人层面的增能主要强调提升自我对环境的适应能力和才能，能够拥有改变自身困难处境的能力与信心和获得社会资源的能力，社会工作者主要通过社会倡导活动及小组活动，纠正新就业女性对于自身的偏差认知，提升新就业女性自助互助，适应环境的意识。

### 1. 社会倡导活动

2022年5月，社会工作者于H市经济技术开发区X街道开展了两场关爱新业态新就业妇女倡导活动。现场通过张贴海报，发放折页等方式向周边居民宣传本项目，选取已经挖掘到的新就业妇女群体的典型样板、事迹和凡人善举进行展示，呼吁大家对于从事外卖、快递、网约车的女性给予关爱，营造和谐友爱的社区氛围和环境，提升新就业女性的公民意识和性别意识，使个人变得自尊自强自信。

### 2. “我的未来不是梦”女性就业能力成长小组

2022年8月至9月，每两周的周三下午3:00-4:00于H市经济技术开发区B街道暖“新”驿站开展“我的未来不是梦”女性就业能力提升小组。第一次小组通过“我们真的很不错”游戏破冰，发挥同伴意识，帮助小组成员快速认识，减少陌生感和距离感。接着社会工作者与组员共同制定小组契约并现场宣读，建立专业关系，制定小组目标；第二次小组活动，通过“我对镜子说”游戏通过自我吐露的方式让组员重新了解和认识自我的就业优势和不足，同时社工根据组员的倾诉发现和了解组员潜在的就业能力挖掘方向。针对组员在自述中存在的非理性信念，社工对其进行了辩驳，帮助组员正视自身的不足。接着通过手工diy活动引导组员发现自己未被察觉的内在潜能与优点，提升其自我效能感，组员表示：“没想到自己可以做出这么漂亮的灯笼，感觉自己的动手能力挺强的。”社工运用鼓励等技巧，增强了组员自信心。第三次小组活动，通过“我是演员”的游戏让组员进行分组角色扮演并相互点评，在扮演日常工作过程中遇到的困难中发现问题，引导组员共同出谋划策，给出意见和建议；最后一次小组活动，组员共同推选出了一名群体骨干，作为这一部分新就业女性群体代表，后期进行定期跟踪回访，接着社会工作者邀请每一位组员畅谈在小组中的收获，最后总结性陈述，宣布“我的未来不是梦”女性就业能力成长小组结束。



表 2：我的未来不是梦小组工作计划表

	单元 节次	时长 /地点	名称或主题	单元（节）目标	主要活动内容	所需物资
各单元 （节）小组设计大纲及流程	1	2022年8月10日 15:00-16:00/ 暖“新”驿站	敞开心扉，相知你我	1. 营造温暖的团体氛围； 2. 工作者澄清小组目标； 3. 商讨和签订小组契约。	1. 通过破冰游戏引导小组成员之间互相认识 2. 介绍小组活动主要内容，明确小组目标；	笔和纸若干
	2	2022年8月24日 15:00-16:00/ 暖“新”驿站	探索自我，挖掘潜能	帮助组员探索 and 了解职业偏好和职业技能，在给予服务对象肯定和鼓励的同时挖掘其就业潜能。	1. 热身活动 2. 学习制作手工灯笼 3. 小组分享	音乐播放器、手工材料 10 份
	3	2022年9月7日 15:00-16:30/ 暖“新”驿站	技能培训，赋能就业	向组员讲授基本就业技能和技巧，以赋能方式提升小组成员就业能力。	1. 热身活动 2. 安全技能普及 3. 小组分享	音乐播放器、安全宣传手册 10 份
	4	2022年9月21日 15:00-16:00/ 暖“新”驿站	小组总结，情绪处理	培育小组骨干，让更具有持续性。组员间互相交流，巩固成果。	1. 进行小组活动总结 2. 巩固组员收获 3. 处理组员离别情绪。	笔和纸若干



图 4、5：我的未来不是梦女性能力成长小组

### （三）改善人际，增强归属

在人际交往层面，社会工作者主要关注新就业女性在亲子关系和工作当中缺少维护自身权益的问

题。社会工作者一方面从服务对象的家庭入手，开展“与你共成长”家庭亲子小组，改善家庭内部的亲子关系，调整女性传统的家庭角色认知；另一方面从女性自身权益维护的角度出发，帮助新就业群体运用有限的社会资源和人际关系网络为自身创造良好的就业和竞争机会。

### 1. “与你共成长”家庭亲子平行小组

经过前期走访了解到大多数新就业从业女性在平衡家庭和工作的方面存在问题。2022年6月-7月，选取B街道内一社区邀请服务对象及其子女共计开展四次亲子平行小组活动。第一次小组活动中，社会工作者用“心解千千结”游戏进行热身。接着向组员介绍了小组目标，共同制定了小组契约。然后通过制作家庭树的方式让组员呈现当前所处的家庭结构，发现新就业女性在家庭生活中缺失的部位，了解问题所在；第二次小组活动，首先用“抓手指”游戏热身，带领组员回顾上一次小组内容，接着运用家庭游戏卡牌，让子女组员了解各自家庭中相似的问题，读懂自己的母亲，在家长小组中以两个案例示例，引导组员换位思考，读懂孩子的想法；第三次小组活动中，首先由亲子互相协作绘制送给妈妈的帆布包，绘制过程中提醒父母注意家长权威，后面各自分享手工制作过程中的矛盾和冲突，引导各自掌握正确的沟通方式和方法；最后一次小组活动通过情景模拟的方式让子女帮助处理母亲在工作上遇到的困境，接着让组员分享亲身实践的体验，理解母亲平时工作的辛苦，最后社会工作者总结此前几次小组获得的成效并宣布小组的结束。

表 3：爱在心里，表达于行亲子小组工作计划表

各单元	单元节	时长/地点	名称或主题	单元（节）目标	主要活动内容	所需物资
节）小组设计大纲及流程	1	2022年6月8日 /B街道S社区	相亲相爱一家人	增进亲子互动、交流，培养亲子关系	1. 热身游戏促进组员相互认识； 2. 介绍小组目标，形成小组规范；订立小组契约； 3. 引导组员一起动手制作全家树枝画，使其体会到亲子互动的乐趣。	树枝画材料包、签到表



	2	2021 年 6 月 16 日 /B 街道 S 社区	我眼中的父母	用色彩表达爱意，促进父母和子女之间和谐有效的沟通。	1. 抓手指 热身游戏后，回顾上节活动内容； 2. 使用家庭游戏卡牌，使小组成员发现大家所面临问题的共同性或相似性，推进组员共同反思与学习经验； 3. 学会换位思考，初步改善亲子关系意识，加强亲子间的理解。	家庭游戏卡牌、签到表
	3	2021 年 7 月 5 日 /B 街道 S 社区	携手共进，跨越距离	在亲子合作中加强沟通技巧的实践与运用，构建良好的亲子关系。	1. 开展亲子手工互动绘制帆布包； 2. 分享总结环节由父母和子女各自分享制作过程中的感受，增强亲子合作的技巧	帆布包、签到表

	4	2021年7月15日/B街道S社区	亲子合力，其乐融融	通过亲子活动加强亲子间的黏度，引导青少年学会与父母沟通交流，增加亲子之间的信任 and 安全感。	1. 情景模拟，社会工作者让组员在指定的家庭情境中运用之前小组活动中所学的各种沟通与冲突处理等技巧，让处于情境之外的小组成员点评他人的表现，帮助组员了解自己的相处模式是否有所改进；2. 在分享总结环节中，儿童和家长共同制作爱心卡片，表达爱意。	签到表、卡片、画笔
--	---	-------------------	-----------	--	---	-----------



图 6、7：亲子平行小组

## 2.法律、心理讲座与个案介入

社会工作者前期通过电话联系的方式对 H 市经济技术开发区内 200 名从事新业态行业的工作人员进行访问，了解到大多数新业态从业女性都或多或少因为工作节奏快，体力跟不上男性，没有时间照顾家庭及子女等工作和生活上的压力。基于此，2022 年 7 月和 9 月，社会工作者分别邀请到 T 律师事务所的律师和 Y 心理服务中心的心理咨询师分别开展了法律、心理知识讲座。在心理咨询师的建议下与其中的 5 名服务对象制定了工作计划。

### （1）接案与建立专业关系阶段

在这一阶段，通过面谈的方式，社会工作者与服务对象分别建立了专业关系，同时了解了服务对象过往经历及个人当前生理、心理和社会情况。在搜集到每位服务对象的基本情况之后，社会工作者初步预估判断服务对象的问题和需求，为后续计划的制定提供了依据和方向。根据服务对象的陈述，发现多数服务对象存在认知偏差，对于工作及自身能力的认可度较低，认为自己当前是别无选择才选择了这样的工作。

服务对象1：我很少有时间辅导我家小孩的作业，暂时也找不到其他的工作，我只能先这样能送几单是几单赚点钱，等到我家小孩马上再大一点我就不干了。

服务对象2：我每天要干到至少10小时才能赚够基本工资，时间全都耗在上面，家里顾不上，像我们这样岁数稍微大点又没到退休年龄，没什么文化，还要带小孩的人，哪有单位愿意用我们这样的人啊？

服务对象3：我也不是这边人，老公在外面打工，为了孩子陪读我才来这边，我一个人人生地不熟的，只能跟着导航跑跑网约车补贴点家用。

服务对象4：有的小区给我们进，有的就不让，一不小心超时了不仅会被扣钱还会被顾客骂，要不是当时不好好学习现在说什么也不想干这个。

服务对象5：这个工作不交保险，我每年还要自己掏一大笔钱交社保，最后退休了也拿不到多少退休金。

### （2）制定计划与具体介入阶段

这些服务对象所反映的“自身没有文化”“要照顾家庭因此没有其他合适的工作”情况都是属于对于自身认知存在偏差，自我效能感较低，自身的尊严与自由权能被剥削，周围的社会支持网络较为缺乏。社会工作者运用增能理论和社会系统理论，将服务对象放入周围的情境中，纠正服务对象对于自身的不理性认知，链接多方资源共同搭建社会支持网络，增加服务对象可用的社会资源，增强对自身的社会控制力。



图 8、9：家庭教育讲座，个案工作

### （四）链接资源，构建网络

#### 1. “点亮微心愿”活动

2022年9月，社会工作者采用“线上+线下”的形式，通过前期走访、微信平台、电话等多种途径向新业态群体征集“微心愿”，根据心愿的迫切程度选取了其中十位新就业女性，为她们准备了子女的课外读物、学习资料、生活用品等“微礼物”，点亮服务对象的心愿，发布圆梦瞬间。并和她们进行单独的交谈，了解她们的近况，提供情感支持，帮助增强工作、生活信心。针对部分子女关爱缺失的服务对象帮助链接民政与社区携手开展的托管服务，解决新就业女性的后顾之忧。

服务对象1：之前社工问我有啥微心愿，我说给点洗衣液、沐浴露这种生活用品就行，没想到今天就在暖心驿站领到了，特别高兴。感谢社工，感谢经开区妇联对我们的关爱。

服务对象2：我特别感谢社工给我们家小孩找到了个学习的地方，每次在路上跑的时候就总想着小孩马上要放学了，晚上回家还有作业要检查，没把小孩安顿下来心里总是想着一件事。现在社工帮我们找到了社区托管的地方，孩子放了学直接去那里学习写作业，到点我就把接回家，方便多了，能让我家小孩平安成长就是我最大的心愿了！

## 2.新业态群体妇女服务平台建设

为解决当前新就业女性缺少休息场所，体力跟不上男性等问题，2022年6月-10月，依托H市经济技术开发区“妇女儿童之家”，社会工作者一方面联合当地妇联及部分企业，为新就业女性设立了互助服务站点2个，分别为B街道红亲亭·暖新驿站和X街道如意园·新新驿站。在驿站内设置了休息区、阅读区和服务区，分别提供了休息桌椅、沙发、茶水、消暑物资、急救用品和女性用品等，让新就业女性群体能够及时获得休息，细节之处表达对于这部分群体的关心；另一方面搭建新就业女性服务平台，整理了服务对象所需要的产业政策，权益保护、法律法规等信息和政策，汇编成册，发放至每一位服务对象及周边居民的手上。扩展服务对象了解最新政策和产业动态的途径，学会用合理的渠道获取资源并保护自身权益，在整个辖区内营造了关爱新业态女性的氛围。

服务手册由社会工作者和妇联工作者共同制定，主要包括：当前国家和所在市、县区对于新业态新就业妇女的相关政策，项目及社工介绍，周围的服务站点服务内容及地理位置，维权途径和社会工作者的联系方式。布置服务站点时邀请了两位女性小组领袖共同参与，由服务对象自己参与设计服务站点需要的服务，充分发挥新就业女性在参与社会事务的意识和能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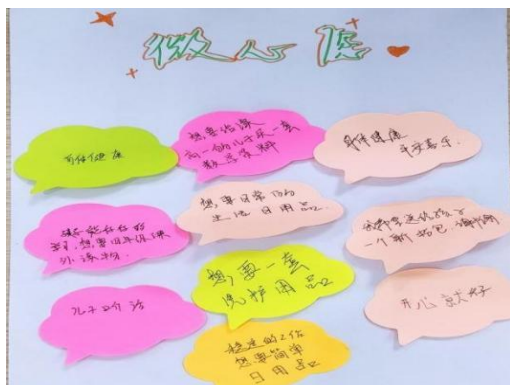






图 10、11、12、13：社会支持网络搭建

### 3.开通“驿姐热线”服务

依托前期搭建的新业态群体妇女服务平台，引入专业团队配备心理咨询师、家庭教育指导师、社会工作者等，设置排班表轮流值班，倾听新业态新就业女性群体的心声，并对有困难需要帮助的新业态新就业女性开展一对一服务，提供政策咨询、法律咨询、就业指导、权益保障、心理辅导等精细化服务。



图 14：驿姐热线服务

在前期开展座谈会及讲座的过程中也有邀请心理咨询师，社会工作者等专业人士提供服务，但是由于其开放性及对于相关服务了解不足，许多服务对象不愿意求助。为了提升“驿姐热线”和服务平台的知晓度，社会工作者链接媒体资源，多次在省妇联、市妇联等平台进行宣传报道和社会倡导，让更多的服务对象了解并熟知休息和解决问题的途径和渠道。驿姐热线在开展服务的过程中必须进行过程记录，并定期进行回访跟踪，确保在项目服务期内最大可能解决问题。

## 六、成效评估

社会工作者在项目结束后进行服务回顾，采用服务对象自我评估、第三方评估机构对服务对象状态的评估以及社会工作者的观察评估三种方法进行服务评估，评估结果显示，接受服务的新业态新就业女性在个人、人际和社会环境层面均有了相应提升。

表 4：服务对象前后变化表

层面	具体服务	接受服务前	接受服务后
个人层面	女性就业能力成长小组	自我评价低	改变了不合理认知，认识到自己的长处，提高了自我效能感
	社会倡导活动	公民意识和性别意识缺失	认识到女性在社会发展过程中的重要性，肯定了自身的价值
人际层面	家庭亲子小组	亲子关系疏远	亲子关系得到改善
	法律、心理讲座和个案介入	社会资源缺失、人际关系网络简单	服务对象建立起小团体，并且能够运用团体内的资源解决没空接送孩子等生活中的问题
社会环境层面	“点亮微心愿”活动、新业态女性服务平台、“驿姐热线”	新业态中的女性服务缺失	设置驿站为女性提供服务区：提供政策咨询、法律咨询、就业指导、权益保障、心理辅导等精细化服务。

### （一）个人层面

由于行业特殊性，新业态女性群体常常因为身体方面处于先天劣势而认为自己不如男性，存在巨大的工作和心理压力。针对此问题，社会工作者主要从社会倡导活动、女性就业能力成长小组两方面入手，首先从社会层面入手开展社会倡导活动，营造和谐友爱的社区氛围和环境，进而帮助新就业女性提升公民意识和性别意识；其次从个人层面入手开展女性就业能力成长小组，引导组员发现自身就业优势和潜在的就业能力，提升她们的自我效能感。服务结束后，服务对象向社会工作者表示自己现在不那么悲观了，她们能够发现身边人对她们都持有友好的态度，也相信可以运用自己的长处在工作中取得优势。

服务对象1：我之前确实感觉自己赚的没有男的多，但是后来我发现抢外卖订单也是有技巧的，可以同时抢两个路线大致一样的订单，这样就可以赚双份的钱了。

服务对象2：上次我送外卖迟到了，客户不仅没怪我还给了我瓶水，当时超级感动，我明显感觉他们对我们宽容多了，让我更有信心继续工作了。

### （二）人际层面

一方面，针对新业态女性由于工作时间长而亲子关系疏远的问题，社会工作者从服务对象的家庭入手，开展“与你共成长”家庭亲子小组，改善家庭内部的亲子关系，调整女性传统的家庭角色认知。在开展小组的过程中，社会工作者观察到服务对象很享受亲子相处的时光，在亲子沟通方面有了显著

提升，孩子也更愿意和母亲进行交流了。看到自己的孩子能体谅自己的工作，服务对象表示非常欣慰。

服务对象1：我每天在外面跑单子，这小孩跟我一点都不亲，平常在家都不肯跟我说话，今天说的话还挺多的，以后还是得多抽空陪陪他。

服务对象2：今天儿子竟然跟我说妈妈辛苦了，叫我工作忙别忘了注意身体，以前在家他从来不会说这些话的，太感动了！

另一方面，针对新业态女性缺乏社会资源和人际关系网络简单的问题，社会工作者开展法律、心理讲座并进行相应的个案介入帮助服务对象善于运用有限的社会资源和人际关系网络来帮助自身创造良好的就业和竞争关系。服务对象在社会工作者的帮助下建立起小团队，并创建微信公众号，每天在群里发送就业、政策报道等信息，有时服务对象还会在群里排班轮流接送孩子上下学，在相互基于精神支持的同时一定程度上解决了他们的工作和生活困扰。

服务对象1：刚开始从事这个行业没有啥朋友，每天就是风里来雨里去，现在认识的人多了一点，他们会在群里发各种搞笑视频，有时候没接到单子就打开看一看也挺有意思的。

服务对象2：正好我们几家小孩在一个学校，我们每天就排班接送小孩上下学，这样不仅可以照顾到家庭还不耽误工作。

### （三）环境层面

针对新业态新就业环境背景下女性服务缺失的问题，社会工作者通过“点亮微心愿”活动征集服务对象心愿，在此基础上搭建新业态群体妇女服务平台并开通“驿姐热线”为需要帮助的新业态女性提供帮助。服务对象表示，平台的建立给她们提供了极大的便利。

服务对象1：这个驿站休息区也太好了，有时候过了饭点没人下单，我就会去驿站睡会觉，而且还免费提供茶水，很人性化！

服务对象2：我不太会上网搜什么政策信息，有时候我会打“驿姐热线”咨询社保怎么缴纳这些信息，那边的工作人员都挺有耐心的，很热心帮我解答。

## 七、专业反思

### （一）理论反思

#### 1. 服务对象众多的情况下如何挖掘个别化优势

赋权视角下自我赋权原则超越了案主自决原则，它强调组员在赋权过程中的权力和责任。由于本项目的服务对象较多，在提供的过程中存在将服务对象优势类型化的缺陷，因此在关注不同服务对象个别化上有待提升。

#### 2. 如何在制度层面寻求改变

赋权理论在提升女性就业能力问题上表现出较好的效果，有其独特的实践层次，包括个人、人际、环境三层次，为整个实务提供了基本逻辑与框架。但是，本案例中对于理论的使用还存在一些问题，赋权理论属于激进传统，追求更彻底的、更深层次的变化，特别是社会结构与政策，而赋权的效果也依赖于这种更深层次的结构的变化。目前案例中服务对象在社会工作者的帮助下虽然在价值观与就业能力方面有所提升，但是项目能提供服务的新业态就业女性仍是少数，我们无法改变整个大社会的就

业环境与趋势，现有的力量无法从社会层面有较大的推动与改变，这是本项目的不足之处。

## （二）实践反思

### 1.关于服务对象界定的思考

该项目的服务对象直观看是新业态就业女性本人，但实际上更多地是面向其家庭，这些女性的家庭在经济、照护、心理等更多方面面临同样甚至更大的压力。社会工作者在开展服务时单单关注女性本身可能很难实现服务效果，更多地是在面向其家庭开展服务。在界定服务对象的时候，要有别于其他领域主要关注个人的视角，更多地考虑以女性家庭为服务对象开展系统化服务，更好地争取服务对象问题和困难的解决。

### 2.综合性提供服务，不局限于操作层面

在学习能力、勤奋程度、讲诚信等方面，女性和男性并没有明显的差别，而且在与她们的交流中可以发现许多可圈可点的想法，还可以发现有的妇女在模仿学习方面有着很大的潜力，另外还有部分服务对象在喜欢的技能方面有着非常高的积极性。因此，对于新业态女性的发展，我们应该注重女性在整个过程中的主体性和主观能动性，发掘她们的潜力，强调增强她们的能力和权力，从而不仅仅是参与服务的操作层面，更要参与政策、制度、项目和计划的决策、实施、总结的各个层面，从而自发地去改善个人处境并获得社会福利。

☆作者简介：王悦，河海大学社会工作 2021 级硕士研究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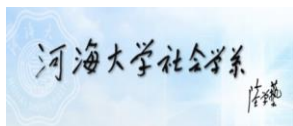
马嘉璐，河海大学社会工作 2021 级硕士研究生

潘恩慧，河海大学社会学系 2021 级硕士研究生

王世文，河海大学社会学系 2021 级硕士研究生

☆责任编辑：肖典





## 硕士毕业论文信息

### 2023 届社会学硕士论文信息统计表

姓名	题目	指导老师
蔡荣治	双循环背景下水利风景区高质量发展	许佳君
曹琬迪	草原生态治理政策变迁下牧民生计研究	杨方
陈云娇	返乡能人创业的行动策略研究——以湘西 L 农民合作社为例	王毅杰
黄彩云	农村老人自我养老何以可能——以安徽省 W 村为例	张虎彪
胡琛	供需匹配视角下的城市社区居家养老服务研究-以 TQ 社区居家养老服务项目为例	陈绍军
何家敏	企业发展过程中的社会关系建构——皖南阳光农业公司案例研究	陈阿江
景文文	农村青年职业历程的个案研究-以 Y 镇农村青年为例	沈洪成
孔苗蓉	农村老年人智能手机使用与代际交流研究——基于山东省济南市 Y 村的调查	朱秀杰
李聪	家庭代际支持对流动老年人口社会健康影响研究	王欢
刘静雯	S 水利枢纽工程移民居住权益保障与实践研究	许佳君
李娟娟	缅籍来华劳务移民社会适应研究——以云南省 M 镇为例	曹志杰
李琳	何以跨越数字鸿沟——以临安区两个电商村为例	邵占鹏
牛帅	企业污染企业治——基于乡村企业抱团治污的案例研究	陈涛
沈雯珂	油菜种植小农的行动逻辑研究——以苏北地区 Y 村为例	顾金土
施玉鸿	脱嵌与再嵌——新生代打工女性“二次进城”的生命历程	亓迪
郑迪	不同规模城市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程度的差异研究--基于 CMDS2017 的数据分析	秦贤宏
谈梦雨	抵边村镇虚空化的生成逻辑--以云南边境线 M 镇为例	曹志杰
童欣	小镇做题家的身份建构研究	陈涛
田娟	乡村医生职业身份的乡土脱嵌——以扬州市丁沟镇为例	胡亮

王瑞清	高考小镇空间生产的社会学研究—以皖西 M 镇为例	顾金土
吴玉	0-3 岁婴幼儿托育服务的家园信任关系研究—基于常州市 BBJ 托育机构的调查	朱秀杰
吴琼	失地老人“圈地种菜”行动研究——以南京市江北新区 J 社区为例	何志扬
吴晓彤	商业化陪伴：南京市 Y 机构早教老师情绪劳动研究	沈洪成
王盼盼	农村陪读妈妈的角色冲突与调适	许佳君
汪函丹	风水先生的职业实践与角色塑造：以江西都昌县为例	胡亮
王丽	农村运动式治理的成果生成与长效演变逻辑	张虎彪
万梦丽	研究生心境障碍患者的疾痛叙事与自我疗愈研究	王毅杰
相妍	中缅跨境婚姻移民污名现象研究--以云南省 M 镇为例	陈绍军
于安行	三峡外迁分散安置移民社会融合目标偏离及原因分析——基于苏、皖、沪的个案研究	严登才
袁霞	三峡远迁移民地域身份认同形成与转变研究--基于苏、皖、沪三地的调查	严登才
袁雪纯	“复养”现象研究——贝镇白对虾养殖业治理分析	陈阿江
于方园	文化娱乐消费的新趋势：90 后“盲盒”消费行为研究—以南京市为例	石德生
赵婷婷	雇员加班的前因后果—基于劳动过程理论的分析	王毅杰
赵聆茹	生存之苦和工作之险：红旗渠修渠人的集体记忆研究	施国庆